# 我的回忆

张国焘

（第二册）

# 我 的 回 忆

张 国 焘

## 第 二 册

（供内部参考）

我的回忆
张国焘
第二册
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印刷
工本费 1.50元

# 第二册目录


**第九篇　工运与反帝**……1—45

第一章　重返中共中央……2
第二章　职工运动的复苏……16
第三章　在“五卅”运动中……25

**第十篇　孙中山逝世后的国民党**……47—88

第一章　国民政府建立的前夕……48
第二章　革命阵容的分化……60
第三章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70

**第十一篇　三月二十日前后**……89—139

第一章　中共中央的烦恼……90
第二章　“三二〇”事变以后……101
第三章　北伐的前奏……128

**第十二篇　武汉政府时期**……141—287

第一章　军事占领下的武汉初期……142
第二章　鲍罗庭到达武汉以后……167

第三章　清党与宁汉对立 ……184
第四章　农民运动 ……208
第五章　中共内部的混乱 ……226
第六章　分裂 ……237

第十三篇　从机会主义到盲动主义 ……289—369

第一章　南昌暴动 ……290
第二章　八个月的地下生活 ……330

第十四篇　在莫斯科 ……371—451

第一章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 ……372
第二章　中山大学的风波 ……390
第三章　斯大林与立三路线 ……415

第十五篇　从立三路线到王明路线 ……453—489

第一章　白区党的团结工作 ……454
第二章　移向苏维埃区域 ……480

# 第九篇

# 工运与反帝

# 第一章

# 重返中共中央

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似随着孙先生的逝世而消沉了，但国民革命运动却因时势的进展而日趋蓬勃。它循着两个主要方向发展：一个是职工运动的复苏，逐渐表现了反帝国主义的色彩，蔚成为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另一个是广州国民政府的建立奠定北伐胜利的基础。

中共在国民革命运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走出了小团体的狭隘范围，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

一九二四年十月间，曹锟、吴佩孚政权瓦解，职工运动随着复苏起来；尤其是在直隶、河南等省，国民军势力范围内，工会恢复公开活动。在其他地区，也因统治势力的混乱，工会活动乘机复活。

我在出狱后，虽花了不少时间去协调有关孙先生北上的事，但我的主要任务，仍是领导铁路工会。我们利用时机，力争工会的合法权利，迅速恢复工会的组织与活动，颇具成绩。同时，并严防在组织力量未充实之前，受到各种可能的压迫。我们采取若干预防的步骤，如工会虽有开会会所，但另设秘密办公处所等。

为了应付这个复杂局势，我不能抽身去出席一九二五

年一月间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大会闭幕后，我获得中央通知，我已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主持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中共中央根据这个决定，要我从速辞去在北方所担任的一切职务，到上海去就任新职。我覆信表示，因孙先生病重，我不便立即离开国民党在北京的政治会议；同时我又在筹备第二次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的工作，难于立时南下。

一九二五年二月七日，铁路总工会在北京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共到代表四十五人，代表十二条铁路的工会。大会议决案有：争取工会集会、言论、罢工等自由，参加国民革命，参加国民会议，恢复和改进各工会，力争工人的经济利益等十项。这次会议象征着铁路工会运动自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后，经过两年的蛰伏，又再行抬头了。

大会在"二七"开幕的那一天，我第一次向大会致词的时候，全场代表对我热烈欢呼，他们并对我蒙难入狱表示敬意。选举时，我提出我因须赴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的工作，辞去总干事的职务；到会者知道无法挽留，改选我为铁路总工会委员，并给我以铁路总工会名誉会长的荣衔；这事使我非常感动。至于总干事的职务，则改由我的主要助手张昆弟同志继任。

我所作的工会工作，引起了段政府的嫉视。在段祺瑞的爪牙们的眼中，我是鼓动工人捣乱的主要人物，又是国民党的要角，曾领导过民众团体，欢迎孙的北上；又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与善后会议对抗（其实我为了避免军阀们的嫉视，没有参加促成会的会议；但颟顸的段祺瑞却写在

我的帐上)；所以他们企图再拘捕我，给革命力量一个打击。

朋友们提醒我，要我注意可能再度被捕的危险。国民党的朋友们如王法勤等也向我说，段政府企图逮捕几个国民党人，给孙先生一点颜色看，气死孙先生，而我是目标之一。中共的同志李大钊先生等也因此要我早点南下。但我仍愿稍留时日，主要是为了不愿于孙先生病危时，先行离去。我于二月中旬交代了铁路总工会总干事任务之后，匿居在北京的西城，由李斌夫妇出名租了两间房子，我分住了一间。为了绝对保密，我这住址连李大钊先生都不知道。

三月七日，李大钊先生经过我的“交通”找到我，问我：“你是不是住在西城××胡同××号?”在我承认是住在那里之后，他说这是从段政府的警探们那里探听出来的；他并指出：我的住址既被侦知，显有立即被捕的危险。他要我依照国共两方同志的意见，立即离京，不能再有任何耽搁。

八日清晨，我在几位铁路工人护送之下，悄然出京；步行到芦沟桥车站，搭上了京汉车，前往郑州。当时，段政府的权力有限，我一离开北京城，便算太平无事。京汉路北段是国民军地盘的大动脉，车上虽很拥挤，也有不少无票乘车的军人，但秩序还不算十分糟。

我在郑州停留了好几天，主要是为了与我妻子会合。我妻出狱后不久即回湖北原籍省亲。我们约好她暂在家乡等我的确定消息。三月八日晚我抵达郑州后，即电约她来

郑州，一同赴沪。那时湖北仍是直系肖耀南的地盘，我不能冒险到湖北境内去接她。

我利用在郑州停留的时间，考察当地铁路工会情况。京汉路中段的工会机构仍设在两年前被吴佩孚封闭的旧址。工会负责人员也多系“二七”时的老战友。我每天和他们在一起，同去慰问在二七事件中受迫害的各工友或其家属，并凭吊与二七事件有关的地方。往事历历，不无馀愤。现在，工会在形式上是恢复了旧观，但一般工人明知工会的合法权利仍无保障，所以他们的情绪，究不如“二七”以前那样热烈。

在与一般工人的谈话中，我发觉他们对河南的统治者胡景翼及其所统率的国民第二军极为不满。他们指责国民第二军毫无纪律。向我诉说军人们在铁路上种种胡闹。在各县的农村中更是无法无天，已引起民愤，红枪会在各地发展起来；甚至还发生一些反抗国民二军的自卫行动。

当十三日我们举行追悼孙先生的大会时，我在致词中指出革命阵容虽然失去了孙先生，但革命力量仍将团结一致并继续发展；革命军不久将由广东北上，扫荡这班军阀。这些话颇使到会者感到兴奋。会后，郑州铁路工会的会长刘文松向我热烈表示：希望我这次到南方去，领着广东的革命军到河南来，解救工人们和农民们的苦难。

同日，我妻赶到了，我们就于十四日清晨搭上陇海车赴沪。我们挤进车厢，立即证实了工友们对国民二军的指责。车上秩序非常凌乱，到处都是横行霸道的军人，他们不仅自己不买票，还以眷属名义挟带搭客私收车资，以饱

私囊。这样，一般歹徒和走私者，争与不法军人勾结，横行无忌，而农民和正当的商人买贩，则虽买了票也往往挤不上车。沿途各站和列车中更是一片吵闹之声。车行的速率也不正常，花了双倍的时间，天黑后才到徐州。

徐州当时是国民军、奉军和直系军三种势力交叉的地方，秩序同样凌乱不堪。我们夫妇在那里停歇一夜，才搭上翌晨向南开行的火车；可是所有客栈被各方军人占满了，旅客们都挤在车站里过夜；有的在这里候了两三天，还没有搭上火车。我们好不容易才在挤满了人群的车站中，占得一席地，度过一宵。

翌日，天还未亮，我们便挟杂在蜂涌的旅客群中，提着行李，争先恐后地挤上车厢去占据座位；假若稍迟一步，就连站立的地方也不容易得到了。我们在占得的座位上呆坐着，一步也不敢离开。候到上午九时左右，车才开行。车行以后，车上秩序才逐渐好转。这些亲身经历的事，每一细节都曾不断的萦绕于我的脑际；我那时就确认，军阀们的所作所为，事实上等于在培育着革命的种苗。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六日，我到达上海，立即住入中共中央所指定的地点。那所两上两下的房子，就是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办事处。刘少奇和他新婚的妻子已先我住在楼上的前房。我们夫妇则住在楼上的正厢房。楼下便是我们的办公处所。邓中夏等人有时也在那里下榻。这不过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分支机构，但气象较之已往，显得堂皇多了。

陈独秀先生当天就来看我们。他首先慰问我们夫妇在

北京的入狱，对我妻子更是慰勉有嘉，又为我和刘少奇这两对新婚夫妇祝福，态度诚恳亲切，表现了充分的友谊。

我们互诉别后情况，他赞扬我纠正赵世炎等反孙北上的左倾错误，也称许李大钊先生和我在北京对国民党所持的态度，认为是能于不动声色之中，贯彻了中共的主张。他对孙中山先生的逝世可能引起的后果，表示忧虑；对于广东东江的军事胜利，则引以为快。他主张失去了领袖的国民党应扩大党内民主，实行委员制的领导。他认为中共已克服了许多困难，对中共的前途增加了自信；并强调中共必须独立发展。

陈独秀先生的这种对前途的乐观看法，是以中共工作的进展为其背景的。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时，党员人数已近千人，中央及地方组织均已略具规模，党员的活动能力也已大为增强；因此，在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已提出中共要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我参加了中共中央的工作后，很快体会到造成陈先生乐观的因素。四次代表大会后的中共中央，虽仍未设立政治局，但雏型已具。我们每星期的会议分为两种：一种多半假威金斯基的住所举行；经常参加的只有陈独秀先生、蔡和森、瞿秋白和我四名中央委员①。威金斯基则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所讨论的，多是政策问题。另一种会议，威金斯基不参加；出席者除我们四人外，还有新任中央委员主管宣传工作的彭述之、少共中央书记任弼时、上海区委书记王一飞、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刘少奇、李立三和妇女运动委员会主委向警予等；会议讨论的则多

属日常工作。所以这两种会议的性质，前者颇类似于政治局会议，后者则系中央工作会议。

中共中央这些会议显得更有秩序。每次开会都有预定的议程和明确的决议。我这里仅就相当于政治局的会议的情形，及与中共发展有重大关系者，略述一二。

这个时期，中共中央很重视统一战线的策略。我们认为中共自身和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通过统一战线的工作，去团结更多的力量，才能完成国民革命。我们把完成国民革命这一主要任务，看作是各阶级应有的联合行动。这种观点解除了第三次代表大会时中共可能变成国民党左翼的疑虑，也获得了全党一致的支持。

我们在威金斯基的住所所举行的会议主要讨论的，大致可归纳成为下列三个范畴：一是工人阶级领导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并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反对买办、军阀、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二是团结国民党左派，联络中间派，反对右派；三是中共自身的发展、职工运动的统一，与农民协会的发展等。

上述这三方面的问题牵涉极为广泛，国共关系是问题的核心。我们认为国民党左派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拥护联俄容共及工农三大政策，是中共最接近的战友。右派则正相反，代表买办及其他守旧势力，反对三大政策。至于中间派则代表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一般倾向，左右摇摆，不完全赞成三大政策，但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我们认为中间派的人数较多，联络和争取中间派便是实现广大联合战线的要图。

为了上述见解，中共中央与鲍罗庭之间有了分歧。孙先生逝世后，回到广州的鲍罗庭，在专心致志地培植黄埔，并企图凭借其力量，建立所谓“革命的专政”。他根据广东实况，认为国民党内只有左右两派，并无所谓人数众多的中间派。因而不满联络中间派的统战策略。

威金斯基与中共中央合作得很好，我们与他之间从未发生政策上的严重争执。其实，中共中央政策的制定，威金斯基具有甚大的影响力。他也小心翼翼的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行事，决不任意自作主张。但他的权力有限，不能左右在北京的加拉罕和在广州的鲍罗庭，因为他们直接受苏俄政府的指挥，而威金斯基在苏俄政府中并无地位；所以他不得不仆仆于莫斯科与北京之间，进行协商。

威金斯基负担着中共中央与莫斯科之间的联络责任，我们不通过他就无法与共产国际接触。在“五卅”前后，他多半居住上海。他的工作组织得很好，有几位助手帮忙他处理日常事务，他自己则专心考虑政策问题。他的妻子沉静和蔼、身体瘦弱，时常闹病；但她仍努力协助她的丈夫工作；为了秘密文件的送达，她还常奔走于莫斯科与中国之间。

那时，威金斯基住在一座面临昆山花园的小洋房的三楼上，房东是一位白俄富商；我们出入其间，从未惊动这位房主人。有一次我们正在威金斯基房间内举行会议，楼下突然来了一些租界的外国警官，我们颇为不安。威金斯基却处之泰然；他说，这些警官不过是房主人的宾客，他们常有往来。所以在这里开会，只要大家来时没有暗探

跟踪，就很安全。由此足见威金斯基那时在上海已获得白俄的掩护。

我们的会议由陈独秀先生任主席，他每次都准备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提出讨论；与会者也都可以随时提出议案，会议进行得颇有效率，民主气息也相当充分。威金斯基虽发言最多，但从不以“共产国际”的帽子，来左右会议的决定。他总是表示尊重多数的意见；这与已往马林的盛气凌人大有区别。

当时，中共中央，尤其是陈独秀先生，很重视提高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力问题；也不喜欢苏俄人太多干涉中共内部的事务。在中共内部，北京、广东两个区委会，历来有些独立自主的倾向；它们有时候甚至不尊重中央的指示，而根据当地的实况，或者经加拉罕（在北京）、鲍罗庭（在广州），直接获知共产国际的意向，作出与中央指示并不完全一致的决定。尤其是广东区委在“五卅”后向中央的报告中，往往以鲍罗庭的意见，作为不尊重中央指示的根据。这引起了陈独秀先生的不快。他常在会议上表示：广东区委似乎有了鲍罗庭的意见，就可以不尊重中央了。在这一点上，威金斯基与中共中央站在同一立场，他表示任何损害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的行动，都是不应该的。

第四次代表大会后的中共中央组织日趋庞大，会议更是频繁；一切事务，就得循着组织的体系，经过复杂的手续来处理；陈独秀先生的权力也就因之扩大了；甚至各地方组织的负责人亦多由中央委派。接着，中共内部，所谓实际工作派和留俄留法书生派之间，也出现了互相磨擦的

倾向。

陈独秀先生以中央书记的身份领导中央秘书处，并兼任组织部部长。中央秘书处主管行政事务，设秘书一人，受书记的指挥，总揽各项工作。这个职务最初由一位姓任的同志担任，不久就由自法返国的王若飞接替。秘书处之下分设文书、财务、发行、交通四部分。中央的一切决定均由秘书处作成正式文件，分送各地方组织遵办。财务是完全秘密处理，并不提交中央会议讨论。当时中共经费主要是倚靠共产国际的支持(党员所捐只占小部分)，由陈独秀先生根据需要与威金斯基商定。

陈独秀先生所兼任的中央组织部,较以前也大为充实。以前党员人数很少，组织部工作简单；到了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党员数达千人，且还在增加之中；组织部的工作才开始繁复起来。这时组织部内有党员调查登记、工作分配、党员训练等三部分。一切人事的调动，均由陈独秀先生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提交有关的会议通过任命。

中共中央的宣传工作也同样繁重了，彭述之任部长；他有一幢三层洋房的办公室，负责指导党内宣传工作；包括通俗宣传、政治宣传及党员文化教育等工作。至于《向导》等党刊的编辑，中共中央认为是具有政治指导作用的，由蔡和森、瞿秋白主编；其编辑方针直接由中央议定，不受宣传部的管辖。

我所领导的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也算得是人才济济。委员除我以外，有曾主持安源路矿工会（后来又扩大为汉冶萍工会②）的主角李立三、刘少奇；曾在北方主持工运

因无法立足而来到上海的邓中夏；在武汉从事秘密工会活动的项英、林育南；出狱不久的李启汉和浦口铁路工会的领袖王荷波等。我任主任，主持决策。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刘少奇助理。李立三则专负上海工会的领导责任。邓中夏那时在上海大学任教，负责物色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工会工作。其余的委员多分赴各地指导工作。

“二七”失败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已不存在了，召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准备工作，就成了我们职工运动委员会的中心任务；目标在于建立全国总工会，以统一全国工运的领导。

此外，中共中央曾计议要增设军事部和农民运动委员会，但因无适当人选，搁置了一个时期。在“五卅”以后，先成立军事部，由我兼任部长。农民运动委员会则迟至一九二六年春才组织成立，这是后话。其他如妇女运动委员会等机构的组织与工作也都扩展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一九二五年二月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已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人数扩展至九千人，其中百分之三十为青年工人；此外则多系进步的知识分子，尤以青年学生为多。它的中央组织与工作自然也同样的扩展了。

中共这许多中央机构在上海地下存在着，自然要注意保密，于是中共中央开始建立了“交通”制度。各机构之间和各负责人员之间的联络，以及由外地来上海接洽工作者的招待、财物的运送等，均由交通人员负责。中央秘书处的交通人员也就因之日渐增加起来，由数人增至十数人乃至二三十人。

组织日益扩展的中共，在众民广土的中国，固然仍不过是一只“小麻雀”，但五脏确已俱全；因之，它的革命雄心已勃勃然而兴了。当孙中山先生在世的时候，中共的首脑们总觉得孙是老资格，须让他领先。现在孙已去世，而国民党右派正极活跃；马君武、冯自由等已另行组织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于是中共中央认为革命的统一战线的建立，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实现这种雄心的首要条件是中共自身力量的壮大。因此，中共中央及其地方组织都在积极研究：如何征求党员、如何增强它的领导力量、如何统一工会的领导和扩大少共的组织等等问题。当时中共广东区委会已有了军事部和农民运动委员会的组织，中共中央自愧不如，急起直追，积极商讨如何在北方军队中展开活动，并将河南等地的红枪会转化为农民协会等等。一般说来，中共这时奋斗的目标，是力图壮大自身，以增强其在国民革命中的份量。

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共也产生了内部的困难。当时，中共内部政见的分歧虽然缩小了。但在组织问题上，却滋生了纷扰。彭述之等要求继续扩大中共权力，主张中央集权。他们缺乏实际工作的经验，往往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来为自己的主张辩护；指责一般实际工作者忽视组织原则，保持着一种落后的“手工业式”的工作方法，不了解马列主义的理论，而依据一些零碎的经验行事。

彭述之等这种见解在党内得到有力的支持。首先是陈独秀先生左袒其说。陈先生这时是得心应手名符其实的“家长”，他没有了一九二四年五月扩大会议时那种愁眉苦

脸的样子，而且初期的反对党魁制的议论也听不见了，似是要百尺竿头再进一步，成为无限权力的党魁。此外多数留俄、留法归来的同志，如在中央秘书处工作的王若飞（留法）、组织部秘书尹宽（留法）、少共书记任弼时（留苏）、上海区委书记王一飞（留苏）、上海区委组织部长罗觉（留苏）等，都或多或少的附和彭述之的主张；而且他们也时常捧着陈独秀先生的招牌发号施令。

不同意彭述之这种见解的，则是党内大多数实际工作者，他们不赞成中央过份的集权；主张党员在中央决定的原则之下，应有较多的活动自由。他们要求根据各地实况，来运用马列主义的原则。他们指斥彭述之等是不懂实况的书生，背着背诵马列主义的教条，专拿"中央指示"的大帽子来吓唬人。

中央委员中蔡和森、瞿秋白和我都支持后者的见解：尤其是我，常表示过份的中央集权，会扼杀一般同志的活力，因而被视为"实际工作派"的首脑。当时李立三、刘少奇、邓中夏等，与少共中央委员恽代英等以及众多的地方组织的同志，都或多或少的支持这种观点。

李立三尤其反对彭述之的作风。他是个热情奔放的汉子，只求工作实效，不惯组织的约束。他所主管的上海工运工作也多采取速战速决的行动。对于工作方案，要经历上海区委、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屡次的商讨，许久才能解决，表示不耐烦。他老是以"急待解决"为理由，要求举行联席会议或另行指定一个行动委员会来处理。他更不愿听那些马列主义的说教，认为坐而论道只能

贻误事机。他在上海工运中进行工作时不用说服的方法，而采取强迫的手段。他认为根据实际情况的行动是最重要的，甚么“中央集权”、“一知半解的教条”，都是废话。

在当时幼龄的中共，一切都是为了急赴事功，因而这种歧见未致演成严重的争执；但后来中共内部的一切纠纷，却多少与最早的这种分歧有关。不仅武汉时期的中共内部纷争是循着这个脉络而来的，即后来米夫派的王明、秦邦宪等，也多少继承着彭述之的衣钵，而后来毛泽东的“马列主义中国化”，则与当时的实际工作派，可说是一脉相承的。

① 第四次代表大会当选的中央委员的名单，我已不能完全记忆清楚。只记得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彭述之、罗章龙、项英、王荷波等十人是当选的。其中李大钊、罗章龙二人，当时在北京，谭平山在广东。

② 汉冶萍工会是由安源煤矿工会、汉阳钢铁厂工会、大冶铁矿工会联合组织起来的，为当时长江中部一带的主要工会。

# 第 二 章

# 职工运动的复苏

由于工会组织的恢复，一九二五年春各地的罢工事件日益增多；而这年二月间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的罢工，又是“五卅”运动之前，罢工规模最大的一次。

在列强之中，日本在华工业是首屈一指的，它利用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在中国境内开设了各种工厂。那时日本在中国境内所设置的纺织厂，共有四十一所，在上海一地即有三十七个厂。纺织业间的竞争相当剧烈。日厂资本既雄厚，又有不平等条约为护符，不惜采取降低劳动待遇的手段，来维持和增加利润；同时对中国民营的纺织厂；积极进行吞并和排挤。这些事首先引起纺织工人酝酿反抗，也引起中国工商界的愤怒。

日本纺织厂中资力最雄厚的是“内外棉株式会社”，它在中国有十六个厂；其中十一个在上海。中国工人在“内外棉”做工的境况之惨，简直如处地狱。工人分日夜两班，每班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众多的女工和童工，每天平均工资不过一角多一点(约五分美金)。他们的食宿条件，坏到难以形容。管理工人既严格周密，额外克扣工资的事件，又层出不穷；打骂工人，更是司空见惯。进而发明了一种

独特办法来榨取利润；它利用中国人民的困穷和大量失业，招收大批男女童工，设立集中营式的训练所，名之为“养成工”。以这种“养成工”制度，用来对付反抗力较强、工资较高的男女成年工人，因此，成年工人之被淘汰者，日益增加。

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内外棉”第八工厂传出大批成年男工被开除的消息，引起工人的骚动，并发生逮捕和殴打工人的事件。二月九日，工人开始罢工；罢工的主要口号是“反对东洋人打人”；罢工风潮迅速蔓延到二十二个在上海的日本纱厂，罢工人数达四万余人。

这次罢工具有反日的性质，获得上海各民众团体，如学生联合会等的支持。二月二十五日，上海总商会出面调停。日本厂方接受了“不得无故打人”等四个条件，罢工才告结束。这次罢工虽未获得全部的胜利，但上海纱厂工会的势力，却迅速膨涨起来（日本纱厂工人加入者增至九千人）。此后，日本纱厂中继续发生一些劳资纠纷和工人反日的举动，终于酿成了五月十五日内外棉第七厂，日籍职员杀死工人顾正红的事件；这一事件便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线。

我于三月十六日到达上海后，同志们向我谈起这次罢工的壮烈经过。我以前一直认为纱厂工人多系童工和女工，团结力较弱，组织工会和进行罢工困难多端。现在居然出现了可观的成绩，足见职工运动已有了新的生机。

我曾亲到沪西纱厂区去考察，看出同志们颇能利用已往的经验，尤其是我在长辛店发动职工运动以来的经验。

中共上海区委会在纱厂工人密集的地方，设立了一些工人补习学校和工人俱乐部等，团结了不少工人。这些学校和俱乐部大多数由青年知识分子负责领导，其中上海大学学生刘华就是最能干的一个。在二月间的罢工中，纱厂工会组织尚未健全，罢工工人在“反日”的口号之下，曾采取阻拦女工童工上工的手段，这是李立三根据安源路矿工会罢工的经验所表演出来的杰作。不过这种兼用强迫的方法所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在当时尚未为人重视。

我曾和一些工人谈话，他们大都表示：“反对东洋人打人”是天经地义的，每个中国人都应当赞成。即使是知识较低的女工童工，一听反对东洋人的话，也均义愤填膺。我认为这是上海职工运动的一个新的动向；这种工人的经济斗争，加上民族主义的因素，发展确具无比的活力。

延搁了两年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终于一九二五年五一节在广州举行了。这次大会的成就，为紧接着爆发的“五卅”运动，准备了组织上的条件。

这次大会虽是由北方的全国铁路总工会、华中的汉冶萍总工会、广州的工人代表会[1]、香港的海员工会四个主要的工人团体出名召集的，但实际的筹备工作，仍由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持。我们忙着联络各工会选派代表，并以全国铁路总工会和汉冶萍总工会的名义，电邀赤色职工国际派代表出席，以及拟定议事日程等等。四月下旬，我们纷纷前往广州主持其事。

五一节那一天，广州市举行了一个超过五万人的劳动节纪念大会。会后游行示威，参加的除各业工人外，还有

广州四郊的农民和市内各校的学生。示威行列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当推黄埔军校的队伍；这些军官学生擎着“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旗子，颈项间系着条鲜红的领带，气度轩昂，显然与旧式军人不同。他们和全体队伍一起高呼：“工农兵大联合”、“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革命气氛的弥漫，为前此所少见。

广东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也定在那一天同时举行；因此，劳动和农民两个大会的代表们就在五一节的下午，假广州大学大礼堂联合举行开幕式。到会者连来宾共千余人。廖仲恺先生代表国民党，我代表共产党，先后致词。赤色职工会国际代表奥斯脱洛夫斯基也应邀发表演说。此外，还有黄埔军校代表等的演说。这一切举动，使“国共两党密切合作”、“全世界工人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工农兵大联合”等的气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次劳动大会共到代表二百八十一人，代表一百六十六个工会单位，会员人数约计为五十四万人；这较之一九二二年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时的实力，大有增加②。代表中的国民党员，中共党员以及无党籍者，似各占三分之一。中共的力量较之以往，有了显著的增强，而那些并非共产党籍的代表，也多系同情中共的左倾人物。所以在大会中，中共党团具有控制的实力。

在七天的大会中，主要通过了：《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组织问题》、《工农联合》、《铲除工贼》、《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及《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等七个议案。这些决议都没有发生甚么重大的争辩，便获得最大多

数代表的认可。

大会进行相当顺利，所以如此，是得力于中共的党团组织作用。我专任中共中央代表，并未兼任工会代表，因此，我不必经常参加会议，只在中共党团中，从事幕后指导。参加中共党团委员会的，有香港海员工会代表苏兆征，铁路工会代表王荷波、孙云鹏，上海纱厂工会代表邓中夏、李启汉，广州工人代表会代表冯菊坡、刘云松等。这个党团无异是大会决策的机构，决议案和选举名单，都是由中共党团准备就绪的。

中华全国总工会由此诞生了。大会选举了二十五人组成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林伟民（海员工会会长）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汉冶萍总工会会长）、刘文松（京汉铁路总工会会长）为副委员长；邓中夏为委员兼秘书长和宣传部长；李森（即李启汉）为委员兼组织部长；孙云鹏为委员兼经济部长等。并决定总会设在广州，立即行使职权。

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接着就在广州举行。它鉴于总会偏处广州一隅，势难指导其他地区工会工作的进行，乃决定在上海秘密设立一个办事处。我被选为上海办事处的处长。这个决定给予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工作上极大的便利；后来我曾利用这个职务，在“五卅”时，迅速地组成了上海总工会，并推动了这个运动的进展。

中华全国总工会根据大会的决定，正式加入了赤色职工国际；从此，中国职工运动便与莫斯科发生了组织上的关系。上面所说的奥斯脱洛夫斯基在这次大会中参加了大

会工作，使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的决议，顺利通过，并解决彼此关系上的一些实际问题。中国各工会前此都未与亚姆斯坦的职工国际发生过联系，也未受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因而新成立的总工会加入莫斯科的赤色职工国际一事，毫无阻碍。

在领导这次劳动大会的工作中，国共两党合作得很好。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长的廖仲恺先生，因忙于处理广东的财政，乃本着与中共热诚合作的精神，将领导工会的工作都交由工人部秘书冯菊波（中共党员）处理。虽然如此，我遇有重要问题，还是直接找廖先生商谈；我的意见，他从没有表示过异议。他的太太何香凝女士更向我明白表示，廖先生忙于广东的政务，在职工运动方面，他只愿做一面旗帜，一切实际工作他无暇过问，大家做了，他也不会反对。

中共在这次大会中，最大的收获是增加了对香港工人的影响。香港海员工会是香港各工会中的柱石，苏兆征是海员工会中具有信誉的一位领导人。他在轮船上工作了约二十年，长住香港，连广州都很少去，对国内情形更是陌生。他于一九二五年二月间代表香港各工会赴北京，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因而他有机会了解了内地的情况，并对中共发生了好感；终于由老资格的国民党员，转而加入中共为党员。

他回到香港以后，曾将他北上所目击的职工运动的情形，介绍给香港的同事们，因而增加了他们对内地职工运动的了解，并对中共产生好感。

这次大会也顺利的消除了香港工团总会的反对意见。香港工团总会虽然派了代表出席这次大会，但对中共的领导表示不满。一位香港工团总会的主要代表曾向我指出：香港工团总会是由一百多个工会组织起来的，海员工会不过是工团总会中的一个单位。他并质问：为甚么要海员工会做这次大会的召集人，却不理工团总会？是瞧不起工团总会，抑或是企图包办？我虽曾向他多方解释，但误会并未冰释。

在中共党团中，处理这个歧见的时候，我坚持对工团总会采取友好的态度。认为不应将工团总会称为“黄色工会”，形成职工运动的分裂。同志们接纳了我的意见，选举了工团总会一位主要代表参加大会主席团，表示我们并无歧视的意思。又经过苏兆征等人的从中疏解，工团总会也就积极参加了大会的工作。这件事不仅弥补了原有裂痕，也为香港各业工人后来之一致参加“省港大罢工”，排除了不少障碍。

但也有一部分工会始终对这次大会采取反对的态度。如广东机器工会，曾参加第一次劳动大会，而这次却采取了消极不参加的态度。当中共与国民党左派于一九二四年八月组成广州工人代表会时，广东机器工会这个国民党右派的堡垒即谢绝参与。此后，它也凭借在广东根深蒂固的地位，与新成立的广州工人代表会明争暗斗。这次它又拒绝出席劳动大会的邀请，我们明知无能为力，只好任之。

另一个代表反对态度的团体是上海工团联合会，它是在一九二四年八月间由国民党右派人物组织起来的。参加

的工会有三十二个，会员号称三十余万人；其实这一数字是过份夸大的。它始终以反共为立场，不肯与中共所领导的工会合作。一九二五年二月间，日本纱厂罢工时，这个工团联合会又组织了一个“反共产主义男女劳工同盟”，在工人中散发传单，表示愿意支持罢工，但劝工人不要受中共的利用。这种事曾引起中共的愤怒，认为是破坏反日罢工。而其援助罢工的诺言，也从未兑现。

就由于工团联合会不关切工人利益，专以反共为立场，中共方面斥之为“空招牌的工会”和“工贼的工会”，并不邀请它去参加这次的大会。它也因此发表宣言，反对第二次劳动大会的召集，但未发生任何影响。后来这个组织在“五卅”运动中，便消声敛迹了。

一般说来，革命力量虽曾遭受右派的阻挠，但仍急步向前发展。广州市这个革命中心仍为滇桂军所盘据，包烟包赌，弄得乌烟瘴气；但黄埔党军迅速成长，已能放出光芒，使多数人对前途抱有信心。同时，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举行，和包括约二十余万人的农民协会的成立，也使一般人觉得革命的影响，已远及于穷乡僻壤了。

第二次劳动大会充满了乐观的气氛。广州的工人代表们时常竖起大拇指，津津叙述他们在剿平商团和第一次东征中，与党军和农民群众共同作战的经过。我们这些中共负责人也觉得这次大会获得了预期的成果，它团结了可能团结最大多数有组织的工人，成立了总工会，实现了工会的统一领导。从此，中共自身也就名副其实的称得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了。

五月八日，大会在一片欢欣声中闭幕，从各地来到广州参加大会的工人代表们，纷纷北返。他们多怀着兴高彩烈的情绪，要将大会的成就介绍给各地的工人群众。

我因另负有中共中央的使命，需指导广东区委会的工作，暂留广州。这时已是讨伐杨刘的前夕，国民政府之改组，也正在酝酿中，我须与鲍罗庭和广东区委负责人商谈政策方面的问题，如果不是上海发生了顾正红被杀的事件，我可能要等到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之后，再行北返。

上海"内外棉"第七厂工人顾正红被杀一事，恰恰发生在第二次劳动大会闭幕以后的五月十五日，特别易于激起人们的愤怒。上海中共中央将上海工运的紧张情况函告我，要我从速返沪策划。我于是匆匆结束广州方面的工作，于五月廿六日首途，到达上海时恰恰又是"五卅"之夜，行装甫卸，立即又卷入了反帝的洪流。

① 广州工人代表会是由国民党工人部发动组织起来的。表面上包括了广州所有的工会，事实上右倾的广州机器工会是与之对抗的。

② 据《向导周报》第一百五十五期（一九二六年五月出版）所载，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只代表有组织的工人二十万人。

# 第 三 章

# 在“五卅”运动中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租界老闸捕房门口，巡捕开枪，发生毙伤徒手群众数十人的惨剧；表面上看来似系偶发事件，实际上是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人民一贯的压迫。这种压迫使中国人民积压于胸中的反帝怒火，猛烈地爆发出来，遂演成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五卅”运动。

我由广州经香港返抵上海，恰是五月三十日下午。在这次航行中，我曾患感冒，乃拖着病躯，提着行李，由十六铺登岸，坐上一辆人力车，直奔闸北。沿途行人车辆稀少，街头巷尾，三五成群的人们，交头接耳，神态相当紧张，小别的上海，仿佛发生了甚么严重的事件。

我到达闸北宝兴里我的寓所时，我妻及与我们同住的刘少奇太太何葆贞出来欢迎我。何葆贞曾经任安源矿工子弟学校教员，一见面就愤激的说：“你知道吗？两个多钟头以前，南京路巡捕开枪，打死打伤很多学生和市民。”接着，她简直就大声叫喊：“中国人是可以随便宰杀的吗？我这条命这次一定和帝国主义者拼了！”

何葆贞的愤怒是当时一般人们心情的缩影。为了“反对东洋人打人”，曾在二月间引起激烈的罢工风潮，日本厂

方虽答允“不得无故打人”，但事实上仍是借故打人。

一九二五年五月初，上海日本内外棉第八厂又发生开除工人代表和打伤工人的事情，因而引起小沙渡路几个日本纱厂中工人抗议性的罢工。厂方对这次罢工采取强硬态度，拒绝与罢工工人谈判，其时正值不景气，乘势关闭工厂，不准工人复工。

五月十五日，内外棉第八厂的罢工工人群众集厂门外，要求复工，遭厂方拒绝，引起争执。纱厂日籍职员向工人开枪，重伤八人，顾正红身中四枪，当场毙命。

上海租界当局对于顾正红被杀事件，并不依法追究；反禁止工人集会，并逮捕一些罢工工人。同时，租界捕房禁止上海各报揭载顾正红被杀的真相。

这些事，首先激怒了上海各校的学生。上海学生联合会原是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会同领导的，自然很快的就将这一不平事件传播开来。学生们本有反日的传统，早就感觉到在中国境内如果有一个日本人稍受损害，那就要闹得天翻地覆，而日本人却可以凭借不平等条约，任意在中国境内杀害中国人，顾正红被杀这个活生生的事例，更沉重地刺伤了他们的心。

上海学生联合会当即发动了宣传，组织学生进行街头讲演，募捐救济被害者，为顾正红举行追悼大会。对此，租界当局采取了压迫的措施。五月二十三、二十四两日，有些学生因讲演而被捕。学生们要求上海交涉使陈世光向租界当局交涉，释放被捕学生，租界当局置之不理。这样，就更激起学生的愤怒，进一步扩大街头讲演的行动。

上海中国商人平日对租界当局是敢怒而不敢言的。他们受外商雄厚资本的压迫，在租界内只有纳税的义务，甚么权利也没有。上海的纳税人会和工部局的董事会完全由外国人操纵，早就发生了中国商人要求增加华籍董事的问题。恰在这时，租界当局又实施印刷附律、码头捐、交易所注册费等加重中国商人负担的措施，引起一般商人的反对。租界当局还借越界筑路的手段，扩大租界的管辖区域，由各国领事所操纵的会审公廨①，平日处理中外诉讼时，中国商人往往遭受不平等的待遇。因此，中国商人对顾正红被杀事件，也同情学生们的行动。

当时，上海学生联合会发布了一个简短的传单，颇能代表当时一般的民族情绪。原文如下：

“打倒帝国主义！

列位！你们觉得生活苦么？你们知道为甚么比从前要苦吗？因为：(一)英、法、美、日各帝国主义者占据海关，把入口税弄得比出口税轻，所以国货不振兴；外国人把洋货来换了洋钿去，因而弄得我们一天穷一天了！(二)英、法、美、日各帝国主义者常常借钱给我国军阀，拿了铁路、矿产种种权利去；军阀借了债，又向他们流氓买军械来打仗，打得我们生命都难保。(三)日本人杀我们工人同胞，巡捕房反捕了工人去；学生们要募捐去接济，免得工人暴动，捕房又捕了去；我们要去吊被杀的顾正红，又被捕房捉了去；他们在牢里又饿又冷，不但食品衣服拿不进，连望望

都不准！但是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呀！（四）最近工部局越界筑路，侵占我国土地；又要实行甚么印刷附律、码头捐，处处压迫我们！鸦片之毒，人人皆知；但鸦片大本营，是在租界（尤其是法租界！），这样的压迫，是要压死人的！我们起来同他们争生路呀！大家团结起来：

打倒帝国主义！”

五月三十日下午南京路的枪声，便使反帝怒火，与帝国主义的高压政策正式接触了。这天，上海学生又分途在租界作街头讲演，巡捕仍照旧制止。下午三时许，一个外国巡捕抓住两名讲演的学生，向老闸捕房行进。跟在后面的有手执小纸旗的讲演学生两百余人和无数看热闹的群众。当这一群人挤到老闸捕房门口时，即遭受巡捕们的排枪射击；死者十一人，伤者四十余人。这一惨剧在日益觉醒的中国人们的心灵上，无异是火上加油；它对中国反帝运动的发展以及后来中国历史的演进，皆具有重大的影响。

五卅之夜八时左右，陈独秀先生和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恽代英、王一飞、罗觉等人先后来到我的寓所。他们原不知道我已返沪，只约定假我的住所商讨应付南京路惨案的办法。时机急迫，我们不及多所寒暄，即在我的卧室内举行紧急会议。首先由各人报告其工作有关方面的情况。负责工运的李立三和刘少奇说，各工厂区都已骚动起来了；工人们要求总罢工。恽代英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青年部秘书，刚从环龙路四十四号国民党办事处来，他叙述国民党人都非常愤慨，大家在商讨对策，有人甚至捶胸

痛哭。中共上海区委会负责人王一飞、罗觉等则说明各学校各民众团体纷纷集议，气势高昂。我从这些报告中，觉得整个上海都在沸腾了。

会议迅速决定，首先发动反抗外力压迫的罢市、罢工、罢课运动。接着，我们拟定要求条件的大纲，主要内容是：租界当局须承认此次屠杀的罪行，并负责善后；租界统治权应移交上海市民，废除不平等条约，如在华的领事裁判权等；并提出撤退驻华外国军队等要求。

我们进而讨论如何实现这些要求的具体办法和组成领导这一运动的中心机构。我们估计一般大商人的态度可能不够坚定，主张运用民众力量，促使上海总商会采取一致行动。我们决定立即组织上海总工会，并由上海总工会、全国学生总会和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总商会和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共同组织一个工商学联合会，为这一运动的领导中心。

我们又讨论到这次运动是反帝性质的，不应使一般市民感觉不便，更不应使中国人因而受到经济上的损失。罢市的目的主要是断绝在沪外国人供应，应尽量减轻对中国商人所造成的不利，而对一般市民照常供应。罢工不宜波及华资工厂、公用事业如电灯、自来水等关系市民生活者，应暂缓罢工等等。

我们深知这些决定的实现，不过是消极性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鉴于民众还没有武力作后盾，北京政府更不可能与民众站在一条战线上，因而我们认为在这一运动中，应避免杀害外国人的群众性的骚动发生，以免外人以此为

借口，实施武力镇压。

这些方针与办法决定后，与会者即分别担任各项具体工作。我首先表示，明天一清早，我愿到那即将成立的上海总工会临时办事处去坐镇，处理有关成立这个机构的事务。当时同志中即有人称许我："那好极了；你带病出马，难得难得！"分工的结果，是由陈独秀先生居中指挥，李立三代表上海总工会负责对外活动，特别是去联络商界，以达成一致行动的目的；其余各人都就原来工作岗位，展开对国民党和各民众团体中的活动；以期所有决定能够全盘实现。

这个会议不过两个钟头，就解决了所有的重要问题。会后，同志们都连夜分途展开活动，各项决定因之一一实现。这次会议进行的紧张和顺行，以及同志们情绪的热烈，确是前此所罕见的。也许有人只知道五卅运动的蓝图，是中共所预拟的，但我却认为民族主义的影响，即对中共本身说来，也是超过一切的。而在我的亲身经历中，五卅运动的民族情绪，其感人之深，尤胜于当年的五四运动。

五月三十一日清晨，我和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秘书张学琅到达闸北天通庵路一所一楼一底的房子——上海总工会临时办事处。这所简陋的房子，是刚租妥的，还没有任何设备布置。张学琅去张罗了一张粗糙的木桌子、一张椅子和几张长凳，并将他带来的文具和簿册摆在桌上。他用一张大白纸，写上"上海总工会临时办事处"几个大字，贴在大门口，我则坐在那张唯一的椅子上，阅读今早出版的报纸。这些报纸都登载了上海总工会的启事，要各工会

派代表到我们这个临时办事处来登记。各报所发表的评论和记载，字里行间都表示出反对外人压迫的强烈意向。

十时左右，各工会和各工厂的代表，纷纷来到这里登记了。他们所登记的内容，除工会的组织情形外，主要是填明“已否罢工”和“能否罢工”两项。全部登记表在上述项目上都是肯定的：不是说已经罢工，就是说可以立即罢工。约莫三个钟头之内，来办理登记的和接洽事务的超过百人。其中只有少数人是认识我的；有些认识我，而我却记不起他们的姓名；多数则从来未见过面。有些新来的工会代表，目击这个空无所有的会所，似乎有些怀疑；在那里自言自语：“全上海的总工会，那能是这个样子？”有些知道内情的老资格的工会代表却自告奋勇的解释：“这不过是临时办事处。”他们并为我介绍，说我是有名的张特立，老底子是北成都路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头脑，现在是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主任等等。他们并进而说明：“总工会众多的职员都到各工厂去活动去了；他自己带病坐镇在这里，不怕巡警的干涉，那能还有甚么闲话可说哩！”

我们这个小小的房间，挤满了愤慨万分的人群，带来发自上海每个角落的一致罢工的呼声。有的说：有了上海总工会，一切就好办了。有的说：这里没有凳子坐，站也可以，席地而坐也可以。有的还自告奋勇为总工会做事，或要求留下来担任保卫总工会的责任。

除工人代表外，来到这个办事处的还有十几个市民，是带着钱来捐给总工会的。我告诉他们：今天还没有管钱的人，要他们明天再捐。其中有两个送捐款的人是我认识

的，他们一定要我先收下来；情绪之热烈真是动人，我只好写了临时收据，收下他们送来的二百多块钱的捐款。

正午以后，工人代表们大概看见我仍带病容，多劝我先回去休息；一切事情暂时交由他们照料。我也要求他们多数仍回到各工会去进行原任的工作，只要少数人留在这里，协助张学琅继续办理登记。我还要他们去选租房子，作为总工会新会址，并进行布置和登报通告等工作，以便明早能够举行上海总工会正式成立的典礼。

这天下午，在我看过医生和略事休息之后，陈独秀先生暨李立三等人陆续来到我的住所，交谈情况。本日大致的情形是这样：最大多数的外资工厂都能按计划实行罢工；各学校大致也都罢课了；各马路商界联合会赞成罢市，并在开始实行之中。下午二时左右，大批学生、工人和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的代表们涌到天后宫上海总商会，要求它一致行动。最初总商会负责人还有一些犹疑和推诿，但在群情激昂之下，上海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终于签字赞成罢市。工商学联合会的机构也已经过三方面的会商，决定组织了。上海总商会虽赞成这种组织，但它不愿加入，以保留它将来可以出面斡旋的余地。

为此，我们昨晚的决定，大体可算一一实现了。同志们为了让我能够多休息一会，就在黄昏时离去，另择他处再行会谈。我得到一夜的休息，病体也就开始康复了。

六月一日上午八时左右，我到达闸北宝山路顺泰里二号，那是昨天下午刚租好急促布置起来的上海总工会的新会址。这是一座三层洋房，每层有两个正房和一个大厅；

用作办公是颇适宜的。当时已到了一百多名工人代表，众人在楼下的大厅里，还不嫌十分拥挤。我在全屋上下巡视了一番；所有布置，尚称齐全，足证昨天负责布置这所房子的十多个工人代表，花了不少的时间和心力。我决定将楼下一层作为开会和会客之用；总办公处设在二楼；财务则在三楼处理。

我于是召集群众在那里的工人们举行成立会。我以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主任的名义，宣告上海总工会的成立。在一片“庆祝总工会成立”、“拥护上海总工会”、“争取罢工胜利”和“为死难烈士复仇”的呼声中，我们挂起了新制的“上海总工会”的大招牌；升起了上书这五个大红字的会旗。所有留在总工会办事的工人们，立即依照自愿的原则，分总务、交际、会计和纠察四部分办公。从此，这里便是上海罢工运动的领导中心。

当天下午二时，上海总工会又假虬江路广东会馆，举行上海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到会的代表约六百人，挤满了那间大会堂。经过一番热烈演说之后，李立三被选为上海总工会会长，刘少奇为总务处长，杨剑虹(国民党籍)为交际处长（会计处长和纠察队长的姓名我已记不清楚了)；并一致通过要我以全国总工会的代表身份，驻会指导。这次大会正式通过加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并就此次运动所应提出的要求条件，尤其是有关工人方面者，详加商讨，拟订原则，授权本会代表，向工商学联合会提出。

同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也正式成立了。它是由工商学三方面推举代表组成的，为这次运动的总领导机构。六

月八日，工商学联合会提出了有名的十七条要求，作为解决五卅惨案的具体方案。

这些机构次第组成之后，反帝运动也就随之扩大。上海工人方面自六月一日起，首先由上海日、英各工厂的工人带头罢工，电车、公共汽车、电灯厂、电话局及外人雇用的男女佣工、清道夫等相继卷入。六月五日，公共租界一部分华捕也参加罢工，显然直接动摇了外国人的统治。到了六月中旬，罢工人数已达十五万六千余人了。商人方面，自六月一日起，公共租界内各商店均先后闭门停业；法租界的商店并于六月五日罢市一天，以示响应。因为这次运动的对象，主要在反对英日；而法租界当局这次并未直接参与压迫，所以罢市的范围，就未扩及于法租界。至于上海中国地区各商店则营业如故，使这一运动的反帝色彩，更为鲜明。学生方面，五卅惨案后，上海各校即大多实行罢课，外人所办各教会学校也逐渐卷入，学生甚至与外籍的学校当局发生冲突。上海圣约翰大学大批学生即因不满校方措施而离校。一般说来，在这次运动中，外国教会在华所办学校是大受打击的。

反帝的怒潮，迅即泛滥于全国。北京、天津、汉口、长沙、南京、济南、福州、青岛、郑州、开封、九江、南昌、镇江、汕头、广州、杭州等地都先后发生过盛大的学生市民的游行示威举动。抵制英日货和抵制外人的罢工风潮等。而各地的外人在这些风潮中也制造了不少枪杀中国人民的暴行。各地人民团体所提出的要求，大致是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驻华的外国海陆军、与英日经济绝交、为

死难同胞复仇等等。这种反帝的声浪，随着血的洗礼，响彻了全国各个角落。

香港、广州的省港大罢工，是这次运动中最突出的。六月十九日，香港和广州沙面的工人开始罢工，响应上海的五卅运动。六月二十三日，广州沙面英法军队隔着河沟，向示威游行的行列开枪，毙伤黄埔军官学校学生和市民五百余人，酿成有名的沙基惨案。香港居民因此大部卷入了这次的罢工风潮，人数激增至十万以上，其中多数且离港回粤，罢工坚持达十六个月之久。他们这次行动，不特给予香港经济以颇大的打击，而且对于广州初成立的国民政府的稳定，也发生了重要的支援作用。

五卅运动虽是如火如荼的热烈，但其发展仍要受中国当时客观的和主观的条件所限制。第一，它仍然只是和平的抵抗外力压迫的运动，无法作进一步的表现。第二，列强在中国势力强大，即以整个中国的力量，对之仍是无可如何。第三，老牌的英帝一向对中国民族运动采取高压政策，但也兼施以华制华的分化政策，在五卅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显明。第四，五卅运动之未能达到预期的反帝目的，不仅由于外力的强大，也由于中国的不统一。第五，五卅运动的积极作用，是使中国的反帝运动，由一般的宣传走进了实际行动的边缘。

五卅惨案发生后，以英国为首的公共租界当局立即宣布戒严；各国海军陆战队登陆，会同公共租界内由外人所组织的武装万国商团，布防各交通要道。上海市枢纽地区如南京路西段禁止华人通行；其他地区实施检查；特别禁

止华人携带印刷品、驻足街头观望，以及三人以上的结伴行走；晚上八时后，断绝交通。

在戒严的两个星期之内，恐怖笼罩住整个上海。街上行人被外国军队枪击殴打的事，日有所闻，死伤累累；巡捕更在各处大肆搜捕，至于被害者的确数，则迄未公布。租界内上海大学、大夏大学、南方大学、文治大学、同德医校及其附属医院等被军队所占领，学校被解散；教职员及学生均被逐离校。六月十二日西捕在北四川路越界进入华界，拘捕学生；日美水兵约二百人及装甲车随之出动，与中国地区的保卫团队形成对垒，几乎酿成武装冲突。

租界当局的这种高压手段，并不能稍遏中国人的反抗怒潮；总同盟罢业运动仍在继续发展之中。六月一日，公共租界内各商家罢市后，银行工会与钱业公会仍旧照常营业，仅致函工部局表示抗议，但工部局却置之不理；英人所办的《字林西报》反讥以不能团结一致；于是各银行与各钱庄也于六月三日罢业了。

英国的死硬殖民者还多方诬蔑这一运动是“排外”，企图造成列强联合一致对华的局面，但没有成功。固然所有中国人不分党派，都认为五卅运动所坚持的是正义。即外国侨民中，也有不少的人认为这一风潮，不能与义和团事件等量齐观。除俄、德以不同程度表示同情中国外，法、美在华外交官亦相继公开表示与英、日不同的态度；甚至日本方面，后来也有悬崖勒马的打算，企图让这股充满正义的反帝怒火，专向英国人燃烧。

以英国殖民者为首的外力，一开始就企图把中国民族

运动，在其刚出娘胎时加以扼杀，今既不能如愿；于是，继而实施反对赤化的分化政策。这种分化政策运用的时间很长，范围广泛；在当时主要是对北京政府作诱惑性的让步，分离大商人与工人、学生等的团结，在国共之间制造分裂的因素，并打击中共对工会的影响。这些手段虽能收效于一时，压住了五卅运动的波澜，其后对一九二七年的革命运动，也施以同样的手段，使之宣告分裂，但这些旧帐积累下来，也为促成中共后来能够顺利成功的因素之一。

当时的北京政府，在群情愤激之下（少数北方军人还有要与英日宣战的偏激表示），曾有利用民气，一致对外，借以稳固政权的企图；但它究竟是依赖外力生存的，硬不起来。它曾根据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出的要求，向外交团提出抗议；但外交团不是置之不理，就是一味拖延。而它又为它本身层出不穷的困难所困扰，只能听任外人一再作拖延性的调查，一筹莫展。后来，在外人允许召开关税会议协议修订税则的利诱之下，段政府也就乐于装聋作哑了。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国民党，正忙于广州国民政府的改组和肃清不可靠的军队。因此，在这一运动的领导上是相当脆弱的。广州国民党的首脑们虽对近在咫尺的省港罢工极力支持，但对其他各地的反帝运动，则似照顾不及。上海及其他各地的国民党人固然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但国民党的各地机构却没有充分发挥领导的力量，遇事往往先由中共组织暗中决定好了，再在国民党部内作形式上的决议。

中共在这次运动中确是一个主角；但也充分暴露了它的领导力的不足。在这次广大的反帝洪流中，中共即感人手十分缺乏。党员们忙着做这做那，往往顾此失彼；尤其是中共中央，也常不能专心研讨决策，而要去应付迫不及待的实际工作。中共中央虽能贯彻这一运动的初步计划，却不能提出适应新形势的进一步政策；结果，它只有听任这一运动的领导，脱离了自己的掌握。

上海总工会这个中共的主要阵地，便消耗了中共上海组织的大部人力。这机构成立于匆促之间，职员人数逾百，事务更属纷繁，要安排出一个秩序来，以维持工作效率，已是一件吃力的事，何况它属下还拥有一百多个分工会，且大多数是刚成立或才扩大起来的。干部不足，自然是捉襟见肘了。

李立三会长代表上海总工会忙于对外，成为工商学联合的一个要角，无暇兼顾总工会；而刘少奇则忙着在各工厂区指导分会的工作。这样，名义上负指导责任的我，事实上只有去主持总工会内部的事务，有时一刻也不能离开，甚至不能分身去参加中共中央的决策会议。如是忙了近两个星期，我的工作才由任总务处长的刘少奇来接替。

上海总工会在初成立的时候，真是门庭如市，每日捐款者总是成百上千，络绎不绝。捐款总数固然很大，但捐款人则多系一些小市民。成千上万的巨额捐款间或也有，但多数还是捐数百元乃至数十元者。其中有不少的人，背着装满大布袋的银角和铜板来捐献；还有不少苦力和穷苦的老太太，拿出他们多年积累起来的金银首饰或珍藏的银

角子，捐献给工人。我们有时婉词谢绝这些太穷苦的人们的捐献，反令他们生气，甚至有因此哭泣的，他们爱国的热忱，实是令人感动。

我们收了捐款，按时发放给罢工工人。办法是每三天分区分厂发放一次，每次每人发罢工救济费一元。由于这些工作的进行，罢工的阵容大为稳定。

租界当局视上海总工会为眼中钉，花了不少金钱，制造大批临时印刷品，中伤总工会及总工会的职员们。由于我们的反击，这些活动并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他们又进而收买流氓，多次企图捣毁总工会。这种诡计也未得逞。但后来在罢工接近尾声时，上海总工会卒被流氓捣毁了一次。据说，也是有外人在幕后操纵的。

我除了应付上述或明或暗的种种打击外，还要注意节制群众爱国热情的过分奔放。当时在群情激昂之下，随时有爆发报复性行动的可能，我估计到我们自身力量的不足，若群众失去控制，发生杀害外人的事件，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我舌蔽唇焦地劝告同事和一般工人，要他们的行动限于经济性的抵制；指出这种抵制，已足以使外人感受中国民族的威力；暂时不可再进一步，以免弄得不可收拾。

五卅惨案后，中国一般名流和有见识的商人，都觉得这个抵抗外力压迫的事件，必须由政府负责处理；单凭民众的消极抵抗是不够的。甚至左倾的学生，也主张由政府根据法律，展开有力的交涉。但北京的段政府如何能这样做？于是人们对北京政府的无能，感到不能容忍了。

中共中央认为不能对北京段政府有所期待，迷信实力

的外国殖民者也不会轻易对中国人让步的，只有增强民众的力量，用革命的方法，才能解决对外对内的根本问题。我们曾再三商讨，一时也提不出具体的方案。曾有人想到应依孙中山先生北上时的主张，从速召开国民会议，组织举国一致对外的政府，但我们也估计到，失去了孙先生的国民党，暂时不会有这样主动的气魄；而由幼龄的中共来单独号召，一时也难于获得人们的重视。如果勉强做了，反可能因内在的纠纷，影响一致对外的阵线。

六月五日，中共中央曾发表告民众书，除对帝国主义者的野蛮残暴，表示极端的愤慨外，并指出这次上海事变的性质既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法律的，完全是政治的。提醒民众"万不可依赖和信任政府的交涉"。告民众书反对调和与妥协，提出慎防帝国主义借口反共的离间和破坏；并号召坚持长期反抗和巩固反帝的联合战线；但它并未说明用政治解决此一事变的具体方案和可能的发展前途；反暗示毋宁光荣的失败。这个文件似清楚的说明了当时中共力量的局限性。

然而中共在五卅运动中，获得了组织上的发展，不少工人和学生相继参加了中共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这个时候，中共开始成批的招收党员。我曾主持过几次工人新党员入党的仪式，每次都有四十名左右的新党员。他们多是五卅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经过短期的主义训练，就成为正式党员。他们之入党多数因对中共在五卅运动中的领导表示敬佩；本人又充满了民族热情。

在事态演变之中，五卅运动的另一主角商人代表虞洽

卿的调和政策逐渐得势了。他是一个有势力的大商人；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凭借合法的上海总商会的地位，进行调和政策，获得上海一般大商人的支持。五卅惨案发生时，他恰在北京，负着北京段政府某种程度的调解使命赶回上海，施展出他在政治方面的解数。他采用两面的手法——一面是与工商学联合会建立友好关系，利用民气，逼使外人作些轻微的让步；一面以外人不能接受为理由，利用总商会的地位，修改了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出之十七条要求；终于达到了他那逐步妥协的目的。

上海总商会于六月十一日将六月八日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出的十七条要求，修改为较温和的十三条件。这件事最初工商学联合会是一致反对的，尤其不满虞洽卿的操纵手法。

中共中央最初反对最烈，尤其不同意将原十七条中之第六条（原文："优待工人。外人所设工厂，对于工作之华人，须由工部局会同纳税华人会订定工人保护法，不得虐待；并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自由；并不得因此次罢工，而开除工人。"）加以修改（总商会所修改提出之十三条中的第七、第八两条原文为"洋务职工、海员、工厂工人等，因悲愤罢业者，将来仍还原职，并不扣罢业期内薪资"、"优待工人，工人工作与否随其自便，不得因此处罚"），中共中央认为这是大商人为了本身的阶级利益，有意抹煞工人的要求。

但中共中央为了避免联合战线的破裂，终于让步了。它认为如果上海总商会所提出的十三条，均能实现，也就

是个奇迹。至于有关工人利益的条件，本不能希望大商人的忠诚支持，应由工人作长期不懈的斗争，方能达到目的。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维持这一反帝的联合战线，不可因工人方面的反对，趋于破裂。李立三本着中共中央的意旨，向虞洽卿表示，希望他能根据十三条，据理力争，坚持到底，并劝告工商学联合会不可与上海总商会分道扬镳。这样，虞洽卿便获得第一回合的胜利。

这件事曾引起上海总工会内部的严重纠纷。当李立三在总工会代表大会上报告这事的经过，并要求大会接纳总商会所提十三条时，引起了严重的反对。具有国民党籍的一些工人代表首先指责李立三事先并未经代表大会的同意，擅自接纳牺牲工人利益的条件。这种议论获得不少工人代表的支持；甚至一些具有中共党籍的代表也加以附和。于是，在情绪激昂之下，撤换李立三的呼声四起。李立三面临着这种不易卸责的局面，只好托故先行退席，要求我以全国总工会代表身份，代他主持这个重要的会议；并声言，他将接受大会的任何决定。

我在会众同意之下，走上主席台，继续领导讨论。我首先指出这样一件重要的事，事先没有代表大会的认可，即对外让步，手续上是极不合的。我要求代表们就这重要问题的本身，作平心静气的讨论。幸好我能凭借平日的信誉，使会场空气归于平静。讨论结果，六百几十位代表，一致决定：反对总商会的让步，但为了不损害工商学的联合战线，目前只表示抗议的态度，并希望总商会能与工商学联合会精诚合作，一致对外。至于原十七条中之第六条

所规定者，乃工人切身利益所关，应期之于本身的长期奋斗。

虞洽卿事实上排除了工商学联合会的反对，根据总商会的十三条，与外人交涉；但同样遭到外人的拒绝。于是，他便以此为借口，进而采取逐步收缩这一运动的办法。

他首先结束了商人的罢市。六月二十六日，全上海的商店宣告中止罢市。由上海总商会、工商学联合会和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联合发表一个沉痛的宣言，说明二十六日先行开市及三个持久的抵制方法，即：一、抵制英国货至五卅案解决为止；二、抵制日本货至日本纱厂案解决为止；三、以经济援助罢工工人等。

上海商人的复业，使上海的反帝运动开始低落。当时广州发生的沙基惨案和省港大罢工正轰动一时，国共两党都认为此时不可退缩，反应扩大；但这些主张并未能挽回大商人的妥协意向。同此，中共也从事实上体会到大商人是不可靠的；同时，深觉单凭上海总工会乃至整个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而广大的农民又不能很快的发动起来，只有徒呼奈何而已。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加重注意它在农民中的工作，也开始注意在军队中的宣传。我在这时根据中央的决定，摆脱了上海总工会的日常工作，集中精力去处理中共中央各项急待解决的事。

根据虞洽卿逐步收缩的政策，八月二十五日，日厂罢工渐次复工了。中日间屡经交涉的结果，日本厂方八月十二日应允撤换枪杀顾正红的原木、川村两个日籍职员、抚恤顾正红家属一万元，工厂中日人此后不得带武器入厂等

条件，还应允俟中国政府颁订工会条例后，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所以有这个有关工会代表权的条件，是由于中国立法方面的缺陷，才给予日人以借口，真有点使人啼笑皆非。然而商店早已复业了，工人单独罢工，业已旷日持久，损失重大；日厂工人乃在上海总工会劝导之下，于二十五日按照复工条件复工。

日厂复工之后，这一运动单独对英的色彩也就更为显明；而英人仍是不肯示弱。公共租界的电厂甚至断绝华资工厂的电力供应，逼使华资工厂无法开工。这一着正打中了中国工商界的要害，他们不得不表示屈服。乃由总商会与英厂商定，以恢复供给中国厂商电力，乃发给罢工期内一部分工资作为维持费等七条件；于九月三十日起，陆续复工。至此，英资工厂的罢工，也宣告结束。

在逐步退却之中，上海总工会即遭受层出不穷的压迫。九月初它被流氓捣毁；九月十八日又为上海戒严司令邢士廉下令封闭。后来，孙传芳在江浙一带撵走了奉系势力，总工会的副会长刘华被杀害。坚持这一运动最久的而最有力的上海总工会也因而转入了地下。

老练的英国殖民者用拖延分化手段，解决这个风潮。它只在十二月十三日宣布；准五月三十日在南京路老闸捕房下令开枪的英籍巡捕麦高云、爱活森二人辞职，并应允在公共租界工部局增加两名华董，抚恤五卅被杀害者之家属七万五千元（中国方拒绝接受）等条件②，就轻轻的结束了这一运动。但从此殖民者也不敢再藐视中国的民族运动。

至于中国人民，大多怀着沉重的心情，为五卅运动的失败而悲愤。五卅运动所掀起的反帝热力，确是保留在那里，在以后的革命运动中，起着重大的发酵作用。

① 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是根据一八六八年所订洋泾滨设官公审章程设立的。初时只限于华洋互讼事件，被告如为华人，须由华官审判。后来，外人逐渐侵权，至民国之际，便是华人互讼的事件，也归外人审理了。会审公廨不受中国法院统属，华人败诉者，无上诉可能。这种极不合理的制度，直到一九二七年一月才经交涉取消，改由中国司法机关在上海设立临时法院。

② 除了这几项而外，最重要的是撤销领事裁判权问题。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二日在北京举行的法权会议，列强用拖延手段，组织法权调查团，费了近一年的时间，于是年十一月提出报告书，反要求中国先改良司法，只应允将超越领事裁判权的上海会审公廨制度予以改善，而领事裁判权本身问题，则毫无变动。至于列强用以利诱北京政府让步的关税问题，列强代表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北京所召开的关税会议中，也采用敷衍手段，成立一个承认中国关税自主的议决案，但以中国先行裁撤厘金为条件；而这是北京政府当时力量所办不到的事。所以可以说北京政府在五卅事件的外交上，是毫无结果的。

# 第十篇

# 孙中山逝世后的国民党

# 第 一 章

# 国民政府建立的前夕

一九二五年五月间，我为了参加第二次劳动大会，在广州逗留了一个月，有机会了解广州的政治情况，孙中山逝世后，广州政府的改组势在必行，但也因此种下以后多种纠纷的根源。

我在该年四月底到达广州，首先会见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他是陈独秀的长子，留法时期加入中共，一九二四年下半年回国，即任此职；为人老成练达，长于思考。我和他第一次会面，就觉得他比在北京工作的赵世炎历世较深。

他向我叙述广州的情况，指出广东方面自解决商团事变和东征胜利后，局势经已好转。但广州政府的政令尚不能通达全省，因各军防区制在作祟；其中尤以杨希闵、刘震寰的滇桂军，控制着广州市区，包收烟赌税，无所不为。他对广东工农运动也不乐观；右派的机器总工会仍与左派的广州工人代表会彼此对立；各县地主势力远较农民协会的力量为强大，地主们到处都筑有碉堡，拥有武装，农民协会被压迫的事层出不穷。

我接着去看当时广州政府最高负责人胡汉民；他在孙

先生北上后以大本营秘书长身份，代理大元帅职务并兼任广东省长。他那时正患目疾，在我们一个多钟头的谈话中，始终没有深谈到广东的政治。我告诉他一些有关第二次劳动大会的情况，他曾允予协助。胡素喜高谈阔论，那天却不肯多谈政治，显出他似有郁抑之情。

当时中共中央一直将胡汉民视作中派的领袖，中共在广州的同志则多目他为右派。陈延年等曾向我指出，胡汉民在孙先生逝世后，即亟欲成为孙先生的正式继承人；但他政策右倾，拉拢一班落伍军人如杨希闵、刘震寰、范石生等以壮声势；同时与他接近的伍朝枢、古应芬、傅秉常等人则暗中向香港频送秋波。陈延年等不满意胡这种做法，认为汪精卫、廖仲恺、蒋介石等人才是支持联俄容共的左派。

汪精卫那时挂着好几个委员的头衔，却没有担任实际职务。他对于解决杨刘和改组国民政府的事，表现得很积极。我和他会面的时候，他总摆出曾亲受孙先生遗命的样子，向我说了一套秉承总理遗志继续革命的话。我也在鲍罗庭的寓所遇见他好几次，他老是挟着一个皮包，来去匆匆，谈到具体问题，又有些讳莫如深；这大概是因为他的大计能否实现，还在未定之数之故。

当时负担广州财政兼任黄埔军校党代表和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长的廖仲恺，是广州政府颇具实权的人，我和他接触较多。我们谈到第二次劳动大会的问题，他老是说他的秘书冯菊波比他知道得更清楚，他自己则应允对这次大会予以财力的支持。他谈吐坦率亲切，私下告诉我，他在运

用一些非常手段，征搜钱财以资助军需。并表示实在不忍坐视这种状态长期继续下去。

鲍罗庭在孙中山逝世后，权威日隆。他似是广东要人中最忙的一个，每天去见他的人很多，陈延年等因事去找鲍罗庭，也要等上一两个钟头。他的办公处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对面，我第一次去找他，也在他的秘书张太雷的办公室坐候了一阵，才见着他。

他向我指出广东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财政困难。要解决这个困难，必先统一广东；广东统一了，才能组织国民政府。国民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统一财政：禁止军队官吏劫截税收，厉行节约，充实公库，分配务求合理公平；以期全部收入足敷革命所需。鲍罗庭还谈笑风生的说，他所提倡的是“廉洁政治”，认为这是符合革命意义，革命与反革命，左派与右派都由此判然立分，即贪污者往往是不革命的，而“廉洁”又是天经地义，无人能反对的。

鲍罗庭从不肯事先吐露他的具体计划，对我也不例外。几天后，张太雷才对我说明鲍罗庭此一方案的内容。鲍罗庭鉴于多数将领反对杨刘垄断财源，也不满意胡汉民的敷衍政策，因此，以统一财政为号召，秘密策划解决杨刘，杨刘解决以后，再行组织国民政府。这个解决杨刘的军事计划，正在秘密进行；但杨刘的军队盘据在广州市内，稍一不慎，天机泄露，杨刘就会先下手为强。

当时广州是一个奇特的城市，它在落后与混乱的背景上，涂上了一层革命的彩色。长堤一带，烟馆赌馆林立，为滇桂军的税收财源所系。少数私人汽车多为军人所占有，

往往载着军人或军眷，车上站着两个或四个武装士兵，在马路上急驶而过。当地出版的书刊仍多具有旧文学的风格，黄色的读物，尤占多数。这些落后情景，即在北方城市也不多见。但在街头巷尾随处有五颜六色的革命标语；十字街口往往横挂起白布条，上书大红字的动人口号；在熙熙攘攘的行人道上，也有些系着红领带的黄埔军人和穿着中山装的革命人物。工会和其他民众机构的门面，多装饰得彩色缤纷，与多数商店住户相较，倒有如天上繁星。这种浓厚的革命气氛，向为北方城市所少见。凡此前进与落后的情景，任何人一眼看去，都会觉得绝不调和。

中共广东区委会设在文德路一所楼房的二楼上，可以说是一个半公开的机关，门口没有招牌；中共广东区委会也从未将这个地址对外正式公布过，但知道这里就是中共广东区委会的人却不少；所推行的种种活动，也似乎是公开的，并没有受到任何阻挠。这是中共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唯一能公开活动的机构。它在广州市所有各革命机构中，也可以说是最活跃的一个。

这个办公处虽不算宽大，但来往的人是川流不息的；并且常有几种会议在里面同时举行。当时广州市的中共党员共约三百人；他们自然要经常到这里来接受训令。还有并非中共党员的工人们，为了工会的事务，也常出入其间。甚至有些国民党左派人物，也间或到这里来访问。中共广东区委会还设有农民运动委员会和军事部，为中共中央尚未设置的单位。农民运动委员会由彭湃、罗绮园、阮啸仙等人负责，军事部由周恩来、聂荣臻等人负责。赤脚的农

民和斜挂着皮带的军人也常在办公处出现。

但中共广东区委会的工作效率并不算高，制度也颇混乱；这与办公地点狭隘，交通工具缺乏，气候炎热，设备简陋等等大有关系。更重要的是这里中共的负责人应付这个复杂的局势，究竟欠缺经验，又要尊重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朝夕相处的鲍罗庭的意见；有时这两个上司的说法往往有出入。但一般说来，广东区委会的工作，成绩仍是不错的。

国民党中央党部似是一个办理例行公事的机构；它外表固然远较中共广东区委会为堂皇，办事人员也多些；但工作并不显得紧张。我曾几次造访那里，也与那里的人员有些私人往来。我觉得他们多是奋发有为的人；有些也不安于这种办公室的生活。谭平山曾告诉我，他任国民党组织部长，也不过是办理一些例行公事而已；重要的政策问题，由国民党少数要人与鲍罗庭商谈取决。至于一般的人事和工作问题，包括国民党左派人物工作的分配，多由中共广东区委会预先商定。因此，他自己只须根据这些商定来执行而已。

这种种现象使我深深感到在孙先生逝世后，广州竟没有了领导重心。由鲍罗庭来填补这个空缺，是不妥当的。我曾就这个问题与张太雷恳谈。他认为现在的情形，国民党失去了孙先生，由一个外国人来负实际领导责任，能发生平衡作用，不能算是一个坏现象。

我也曾访问当时任广州政府军事顾问的加仑将军，商谈广州军事问题。这位身材魁梧态度诚恳的军人，非常尊

重中共中央的领导。他展开地图说明广东军队分布状况，向我暗示解决杨刘，在军事上是有把握的。他也说到解决杨刘以后，军事体系要实行改组，使某些可以改善的军队，都得到和黄埔一样的发展。他的这种意见与鲍罗庭侧重扶植黄埔的观点，是不尽相同的。

当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会委员兼军事部长的周恩来却鼓吹广东军事应采“黄埔中心主义”。他于一九二四年由法国归国后，即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事实上他一直担任政治部主任的职责。当时他随着蒋介石将军在潮汕一带工作。也曾跑回广州一趟来会我，表示对黄埔的前途极抱乐观。他和鲍罗庭相处无间，为鲍罗庭所奖掖；他们两人都主张抬高蒋介石将军的地位，使黄埔力量能够迅速发展。

原来一九二四年春国民党改组后第一个重要措施，便是成立黄埔军官学校①，以为建立党军的摇篮。孙中山先生即派定曾于一九二三年赴苏俄考察军事的蒋介石将军为校长。正当筹备成立的时候，受命任校长的蒋介石突然离粤赴沪，表示辞职；戴季陶曾因此赶往上海挽留，蒋始返回广州就职②。

蒋氏主持黄埔军校的初期，色彩是相当红的。第一期学生四百六十余人中③，中共党员及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占八十余人；蒋那时对他们一视同仁。苏俄教官为蒋氏所倚重，在校内更具权威；政治工作和政治教官多由中共党员担任；由具有中共党籍的学生们所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也获得蒋氏的支持。

黄埔成立后，曾受到广东各军队的压迫。在解决商团

的时候，握有实力的范石生军长就曾以轻藐的态度向蒋介石说："黄埔不是有新练成的党军吗？为什么不叫他们去打呢？"大概范认为新成立的党军人数很少，何能作战，因而要看看党军失败的笑话；然而事实上党军的这次行动是胜利了。一九二四年九、十月间，缴获的商团军械和由苏俄运来的军械都藏在黄埔的军械库里，各军将领曾要求将这些武器分发给他们，甚至风传他们将实行强抢，蒋氏曾督同全校学生，严密守护，以防万一。又广州政府的财源为各军所把持，黄埔经费一直短缺；幸有任党代表的廖仲恺为之多方罗掘，始能勉强维持。由于这种情势，使黄埔的全体师生，消除了国共界线而一致对外，成为一个新兴的不可侮的势力。

但这个新兴势力跟着就发生了裂痕。据黄埔政治部秘书聂荣臻告诉我，一九二四年春第一次东征时，黄埔教导第一团才成立三个月，人数不过一千多人，步枪只有八百余支，由何应钦任团长。教导第二团成立更晚，人数只八百多，说不上有什么战斗力。当教导第一团在惠来地区与陈炯明部林虎师八个团的优势兵力相遭遇的时候④，即陷入整日的苦战之中，那时蒋氏所亲率的教导第二团却在离前线六十里的地方，停留未进。加仑将军目击前线紧急，曾多次催促蒋校长率队迅速增援，而蒋氏却按兵未动。蒋氏当时兼任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的参谋长，似是希冀许部粤军去应援，以避免教导第二团的牺牲。加仑将军则认为蒋氏不亲往策应，无异使教导第一团陷于被消灭的险境。

聂荣臻还眉飞色舞的叙述那次战役的英勇过程：教导

第一团打了一个整天，连加仑将军等俄国顾问和他自己所率领的政治工作人员都加入了前线作战，终于一个接一个的冲破了林虎所部的阵地；迫使敌人于黄昏时向兴宁五华退却。但第一团也已打得筋疲力竭，伤亡达三百余人，连排级的干部都多数牺牲了；剩下来的也是弱卒残兵，连站立的气力都没有了。这时加仑将军却振臂高呼，用宏亮的声音，向队伍演说号召他们鼓起余勇，乘胜追击，并大喊"教导第一团万岁！""何应钦团长万岁！"正在加仑讲话的时候，蒋校长才带着第二团匆匆来到，颇有过意不去的样子，加仑将军不仅没有喊蒋校长万岁，并且面露不豫之色，接着队伍就乘夜出发追击去了。聂荣臻认为这件事不仅在蒋与加仑的关系上，留下裂痕，似也在黄埔内部，第一次布散了一层阴影。

当时我们的想法，不仅在于打倒杨刘，尤其是要在打倒杨刘以后，防止再有拥兵自重的人，希望广东政府能从此打开一个新局面。我们中少数知道内情的人，有的和加仑一样主张要建立一种妥善的政治军事制度，不要以某个人或某一系派为中心，以防患于未然；多数则支持鲍罗庭，认为黄埔势力已颇具基础，不会中途变质，而且如不培养黄埔势力，一切将成空谈。

我曾为这些事和鲍罗庭多次商谈，所涉及的有两个主要问题：一是调整广东的领导关系问题；二是解决杨刘以后国民政府的改组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鲍罗庭主张中共中央迁来广州。他素来是不看重北部各省的民众运动的，因而他认为中共中

央应集中力量，注重广东的工作。再则他似觉得中共广东区委会并不是可以与之讨论政策的对手，一切机密的政治问题，他只愿与中共中央的少数人商谈。根据这些观点，他曾向我谈论广东的重要性及其可以乐观的前途；用意即在证明中共中央搬到广州以后，即使放松了其在各省的领导，也是不足为虑的。

我曾告诉鲍罗庭，中共中央是不会搬来广州的；因为我们认为广东以外各省的工作，也很重要；即以广东的发展而论，也需要其他各省的有力支援，而这正是中共所应努力争取的。再则中共中央不愿与国民党中央设立在同一地点，以避免增加领导上的磨擦。

根据中共中央暂时不可能搬来广州的这一事实，我建议鲍罗庭应与中共广东区委会建立一种共同领导的制度。其内容是鲍罗庭与广东区委会主要委员陈延年、谭平山、周恩来等经常举行决策性的会议，并由广东区委会将这个会议决定的事项，报告中共中央。我认为这样做可以使广东区委会获得全盘领导的经验，在复杂的广东局势中，形成一个领导中心，而且可以免除中共中央和鲍罗庭以及广东区委会之间的隔阂。

中共广东区委会陈延年等是赞成我的主张的。陈延年曾向我表示以前老是要跑鲍公馆，才能获得一鳞半爪的政治消息，又不好不尊重鲍顾问的指示，这使工作上增加了不少困难。中共中央方面常觉得他们未将广东情况及时报告上去；其实，有些事连他们自己也是不知道的。如果有一个确定的政治会议，就不会再有这些流弊了。

但鲍罗庭是注重个人手腕的策略家，虽口头应允照我所提的办法去做，但后来并未兑现；一切还是由他独断独行。他的这种作风大概与他的特殊地位有因果关系。他有点像个“四不像”；他虽不是苏俄驻广州的大使或专使，但却是苏俄政府非正式的代表，而且真能代表政府发言；他在国民党中，既非党员，又是外国人，职位也不过是政府顾问，但其发言却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他是一个重要的共产党员，但又不受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的指挥。他利用他的地位，左右逢源，发挥他的个人手腕。他对中共广东区委会的关系仍是老样子，不仅遇事不与他们事先商量，事后甚至也不完全告诉他们。即使有时他与陈延年等举行会议，也不过是对于他的见解作必要的解释而已。

这时——列宁逝世已一年有半，在俄共内部，斯大林与托洛斯基之间的争论日益尖锐，鲍罗庭往往直接受到斯大林的指导，这点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是有着重要关系的。他能通天，加拉罕管他不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也不在他的眼里，因而广东的一切政务，鲍罗庭都是干了再说。中共中央及其属下的组织，在政治上不过是随着他所造成的既成事实，事后应付而已。

鲍罗庭对国民政府的建立问题避免谈论。他曾向我指出，国民政府建立问题现在不能讨论，因为解决杨刘，国民党各方意见大体可以一致；如果在解决杨刘以前，就和他们谈到建立国民政府问题，可能引起内部的分化。再则他也不赞成中共中央就这问题预先有所拟议，因为这是要根据解决杨刘后的实况来决定的。

虽然如此，鲍罗庭也曾向我吐露出一些关于国民政府建立的意向。我们谈到胡汉民的时候，他曾耸耸肩向我笑着说："胡汉民吗？他有一点毛病，如果什么事情让他知道了，他的亲信也便知道了；随着英国人也便知道了。这样，一切事情都弄糟了。"他这几句评语，表示他对胡并不信任，遇有机会，显然他是要贬抑胡的。

我们谈到汪精卫的时候，他表示遇事倒也可和汪商谈。他说汪还是和在北京时一样的谦逊，不会挺身出来硬干，如果抬他出来负责，似却不会退缩。我们谈到廖仲恺，他叹息着说："这样得力而实干的人，可惜太少了。"他还指出廖愿多做些实际工作，却不愿居领导地位。

鲍罗庭这些有关人事的话，暗示出他心目中的国民政府的轮廓；后来事实上也大致如此。我们还进而谈论到国民政府成立的宣言及大致方针等等。对于这些问题，鲍罗庭表现得有些茫然，也许他那时是采取走一步，算一步的态度。

他肯定的赞成国民政府采取委员制；但他也指出委员制是有利有弊的。委员会如果缺乏中心人物和实力来支持，那将一事无成。这些话预示他不相信委员会所包含的民主和联合战线等想法，一心在策划一个他所能领导的重心和更加扩张的黄埔实力，以便建立"革命的专政"。

我也曾向他指出根据孙先生的建国大纲，是要以党治国的；而根据孙先生的北上宣言和遗嘱，又是要召集国民会议的。这两者比较起来，中共中央自会赞成将未来的国民政府，建立在国民会议的基础之上。我还提醒他中共中

央是很注重争取国民党中派分子的。并视胡汉民为中派的代表人物，但要看他是否全心反对帝国主义，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至于他是否完全赞成联俄容共的政策，则不愿苛求。

鲍罗庭也认为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但应俟解决杨刘之后，再作决定；并要求我在广州多留一些时候，以便随时商讨，我也答应了。后来因为顾正红被杀事件，我不得不提早赶回上海，因此，鲍罗庭关于建立国民政府的杰作，我虽已预知其梗概，但究没有直接参与的机会；即中共中央也因忙于指导五卅运动，对建立国民政府这个首要问题，也从未表示意见，一切都听由鲍罗庭去处理了。

① 该校的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后又改称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因以黄埔海军学校旧址为校址，故通称为黄埔军官学校。初设筹备委员七人，由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令派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同年五月正式成立，规定校本部设总理、校长、党代表各一人，由孙兼任总理，蒋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

② 蒋这次辞职的内幕，据陈独秀面告我，蒋赴俄考察军事，印象不佳；回国后并不同意孙先生的联俄容共政策，因而不愿任黄埔校长；后经戴季陶劝说，以先掌握实力，暂不表示不同政见，俟羽毛丰满后再说；蒋始恍然大悟，欣然返粤就职。

③ 黄埔第一期正取生为三百五十名，于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入学，编为第一二三各队，备取生为一百二十名，继于五月十日入学，编为第四队，合计为四百七十名，实际到校的只四百六十余人。

④ 这就是第一次东征中有名的棉湖之役，时间是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三日。

# 第 二 章

# 革命阵容的分化

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内部发生了重大的分化；反抗广州政府领导的西山会议派这时形成了。中共中央为了减轻国民党内部分裂对国民革命所造成的危机，主张争取国民党中派，以孤立右派；扩大国民政府的基础。这种政策又与鲍罗庭的所谓“革命专政”发生抵触。

我由广州回到上海后，曾将在广东所知道的情形及我与鲍罗庭商谈的经过报告中共中央。我也说到在我离开广州以前，鲍罗庭曾表示中共中央一时既不能迁来广州，我又马上要回上海去，那就只有信托他会同广东区委会相机处理一切。当时中共中央正在全力应付五卅运动，对我的报告未详加讨论，就搁置下来了。

但深知国民党内情的陈独秀先生表示忧虑。他认为胡汉民是中派的代表人物，是国民党的正统，在党内的势力颇具根基；汪精卫不免软弱，虽有清誉，究无实力；如果硬将胡汉民从代帅的地位拉下来，是会出乱子的。他的看法虽然如此，不过当时鲍罗庭尚未明白表示，他的议论也没有进一步说下去。

一九二五年六月初，许崇智所率的粤军和蒋介石所率

的黄埔党军回师广州，于六月十三日解决了杨希闵、刘震寰这个心腹之患。据说这次战争进行很顺利，没有多少伤亡，也没有甚么重大的破坏，甚至有人说是由于俄顾问亲手向杨刘总部发射了几炮，敌军就溃散了。

六月十九日香港和广州沙面工人为响应上海五卅事件开始罢工，六月二十三日发生著名的沙基惨案。这使广州的革命气氛更为左倾，震动了全国，中共中央更在那里亟谋发动全国的反帝力量，以支援广东。

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国民政府在反帝浪潮弥蔓全国时悄悄的宣告成立了。中共中央仅于报纸上获知这个重要消息。国民政府委员会[1]是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组成的；汪精卫任主席，胡汉民由代帅降为无事可做的外交部长。我们——中共中央首脑们——中曾有人认为现在的国民政府只能算是临时性质的，正式的国民政府应由国民会议产生；这似是无可奈何的说法，借以减轻这件事在心理上的压力。

上海的国民党人对于国民政府的改组，很快就表现出他们不赞同的态度。最初他们都表示不尽明白广东的内情。不久，国民政府委员的人选径在政治会议自行决定，而未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同时邹鲁、邓泽如等人又持反对态度，于是，消息一传到了上海，他们就议论纷纭了。如戴季陶就认为贬撤胡汉民是一件应该避免的事。

当时，国民党的对外宣传缺乏效率。广东所发生的事情，大多没有适当的报导。加之省港罢工后，广州与香港间的交通受到阻隔，直接来往广州上海间的船只极少；因

此，广州的消息多是非正式的经由外国通讯社传发出来，其内容自多对广州当局不利。中共中央这时也以不能获得广东的正确消息为苦。

我们获知广东方面第一个不利消息，是加仑将军被调离广东。加仑将军是广东军事的支柱；而且是有过赫赫之功的。中共中央根据我的报告，认为这是鲍罗庭和加仑间发生歧见所致。后来据张太雷告诉我，果然是由于加仑主张支持许崇智为军事首脑，建立军事委员会制度；而鲍罗庭则主张支持蒋介石；结果由莫斯科裁定，否定了加仑的意见。

接着孙文主义学会在黄埔军校成立。据广东区委会的报告，孙文主义学会是专为对抗中共党员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而设立的；其组成分子多系右倾学生，如一期生曾扩情、贺衷寒等。教官中则有甘乃光等为之策划；事先并得到汪精卫、廖仲恺等的同意。

这件事使我们大为不满；认为广东工作发生了不可忽视的毛病。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有人指出汪精卫、廖仲恺都是著名的左派，为何竟会同意组织与中共相对抗的孙文主义学会；很可能是青年军人联合会为中共党员所包办，遇事又大出风头，引起了国民党人的妒忌，因而亲共的汪精卫、廖仲恺等人，也不得不准许他们搅这个新组织。

八月二十日，廖仲恺被刺事件震动了整个革命阵营。中共中央认为这是广州局面的危机，显系右派颠覆国民政府的阴谋；主张严厉镇压。稍加分析，中共中央即认为廖是国民党左派的真正重心，能团结汪蒋等人，不管在党员

中、军人中和民众团体以及一般人民心目中都有很好的信誉，因此右派选中他来谋害，是要去掉眼中钉，取消联俄容共，进而根本破坏国共合作和国民政府。但我们也觉得镇压只能制止右派继续破坏，根本之图，还是要注重团结国民党内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右派，使之不能为害，才能稳定革命的阵地。

廖案发生后，国民政府根据鲍罗庭的提议，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任委员，负责处理廖案。从此，广东政府的最高实权，也就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转移到这个特别委员会手上了。而且胡汉民的弟弟胡毅生及其亲信林直勉、朱卓文等均有刺杀廖的嫌疑，林直勉并因此被捕，胡汉民亦被软禁在黄埔。不久——十月二日胡并被派赴俄考察，实际等于放逐。

该年九月间，许崇智属下的郑润琦、莫雄等部队，涉嫌勾结陈炯明军，企图叛变，于同月二十日为蒋派军队包围缴械。许本人旋于二十三日辞职离粤；于是三人特别委员会再变为汪蒋合作的局面。

广东方面这些重要的变化，中共中央初因广东区委会缺少报告，并不详细知道其中内幕。而上海不少国民党人又纷纷谣传：这是中共分化和破坏国民党的行动；还有省港罢工委员会已成为第二政府；广州即将实行共产统治等等谣言。中共中央由于不明内情，苦于不能拿出反面事实加以辟谣。

直到九月间，胡汉民被派赴俄已成定局，中共中央才接到鲍罗庭方面的简单通知，说明为了稳定广东的政局，

胡汉民必须离开广州，已决定用国民党代表名义，派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的会议。他希望共产国际能留住胡汉民，不让其归国。我们看了这个通知，首先觉得鲍罗庭的用意，显然是要求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表示支持他的主张。

这件事曾使威金斯基大伤脑筋，他曾在中共中央会议席上表示，如果胡汉民真是刺廖的主谋者，就应在广州依法惩办；至少也要将他的阴谋公布出来，以揭穿他的真面目，否则就不应软禁他。现在鲍罗庭居然同意派他到莫斯科去，将使共产国际难于处理。

同时广东区委会来的报告中，描述广东的情况，也和鲍罗庭一样，称汪蒋合作之局为"革命的专政"。这个报告也说到右派的力量仍是很大的。戴季陶那本题名为《中国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在黄埔与一般国民党人士中，流行甚广，影响亦大，势将酿成新右派。广东省委否定国民党内有广大中派存在之说，要求中共只与国民党左派团结，共同推进革命向左发展。

鲍罗庭和广东区委会的这些观点，首先引起了陈独秀先生的强烈反应。他认为在广东的同志们忽视了整个反共阵线的力量；他们偏处广州一隅，企图以一部分革命军人、省港十几万罢工工人、和二十几万有组织的农民来对抗整个帝国主义、北方军阀和一般反共势力，显然是犯了低估敌人实力的错误。

广东问题在中共中央展开了讨论。有人讥讽所谓"革命的专政"是离开阶级观点的自我欺骗；有的说连胡汉民也无法处理。不得不求助于共产国际，还谈甚么"革命的

专政”；有的说如果在这个“革命的专政”的名词之下，将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套作风和中国的帝王思想以及军人骄横的恶习混为一体，那就糟糕了。

中共中央讨论的结果，认为无论广东发生了甚么事情，国民革命在基本上仍应建筑在广泛的民族战线上，因而不能忽视民族统一战线和联络中派的策略；绝不能因为五卅运动和广州的种种事变而改变初衷。事实上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如果强调革命专政，无异与统一战线的策略背道而驰。同时，就中共中央立场说，广东的左派领导能否站稳，亦端视乎能否实施统一战线的策略而定。

这样，中共中央与广东同志之间，就有了重大的歧见。十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会议（我个人因事留沪未参加），鉴于党员人数当时已发展到一万人，大家都强调应脱离国民党独立发展。陈独秀先生为了避免国共之间的磨擦更形尖锐，和保持中共一向的政治面目，建议应等待适当时机才退出国民党，但为当时多数出席者所反对。一叶知秋，国共合作的前途，荆棘丛生，势在必然。会中还批评了中共广东区委会忽视自身独立发展，甚至不自觉的自视为国民党左派，应予纠正过来。

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也更表面化了。十一月二十三日张继、谢持、林森、居正、邹鲁等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监委员在北京西山举行会议，形成“西山会议派”。他们以多数中央执监委员的名义，通过七个重要议案：一、取消共产党的国民党党籍；二、鲍罗庭顾问解聘；三、开除汪兆铭党籍；四、决定国民党此后对苏俄的态度；五、开除中央

执行委员之共产派李大钊等；六、取消政治会议；七、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上海。

在西山会议举行以前，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已通告全国，定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广州举行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西山会议之举行似是有意与广州唱对台戏。而且他们散布"联蒋倒汪"的说法，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的言论，也是尊蒋抑汪的；这对于汪蒋合作之局，可能引起分化的作用。

中共中央鉴于事态的严重，急起商讨挽救方策。我们根据所知道的情况，认为西山会议派的活动，将造成国民党的全面分裂；广州现在的局面可能因而垮台。西山会议派中也有一些中派人物，他们不愿广州革命局面的摧毁。因而我们决定采取具体步骤，争取他们，来分化西山会议派。

由于陈独秀先生的主动，并获得威金斯基的协助，我们约好孙科、叶楚伧、邵元冲在外白渡桥苏俄领事馆内，商谈国共关系问题。这三位先生或多或少与西山会议有关系，我们视为当时国民党中派的代表人物。中共中央方面则由陈独秀、蔡和森和我三人为代表。

那天上午九时，我们六个人都如约到达，围坐在领事馆楼下的大客厅里。领事馆职员没有出面招待，更没有人参加会议。我们见面时，仍和平常一样，互相寒暄，气氛却有些严肃。没有人谈到广东、上海、西山等地最近发生的事情，大致都很谨慎，避免说惹起是非的话。

会谈开始，先由陈独秀先生发言，他表示中共并没有

包办国民党事务的企图，而且反对这种企图。中共中央已通知各地党部，多推选国民党人士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共亦不希望在大会的中央委员改选中，增加中共方面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人数。中共主张国民党的事应由国民党员来负责。至于广东方面的情形，事实上并不如外间所谣传，要排斥某些人士参加；广东负责当局希望各位先生能步调一致，担负起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各项责任。陈表示了上述态度之后，进而征询他们的意见。

孙科、叶楚伧、邵元冲相继发表简单的声明。主旨是他们爱护广东的一切，只要情况许可，他们都愿去广东参加大会。

于是，双方在恳谈解释之下，达成了七点协议。内容大致是：号召团结，在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国民党改组以来的既定政策之下，大家都应支持广州国民党中央及其所领导的国民政府。中共以国民革命为中心任务，继续与国民党共同努力，但不包办国民党事务，不排斥国民党忠实党员等。这七条协议经双方一致同意签字；至于若干具体问题，双方都认为应由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解决，不愿详加计议，以免节外生枝。

此次会议有良好的效果，虽然有一部分西山会议派的顽固分子斥之为“对中共的妥协”，但多数国民党人确因而改变态度，不再强调广州政府实行共产统治，为中共所包办等等论调了。大家要求团结一致，共维广州的革命局面。西山会议派的分裂企图，似因此而给阻滞了。

中共中央是认真执行协议的。曾将协议方针再三向党

员训示，并决定派我到广州去，代表中央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指导中共党团的活动；极力纠正已往过左的偏差。此一亟谋中共独立发展不多干涉国民党内部事务的新政策，始终获得威金斯基的支持。他声言在中共仍留在国民党内的不变政策之下，为了避免国民党的分裂，共产国际是赞成联络中派，分化右派这些措施的。

国共关系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共中央；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总是反复议论，常感进退两难。根本问题是中共党员仍留在国民党内，抑或趁早退出，改采党外合作的政策。在这根本问题上，中共中央内部意见又不完全一致。我们中的多数确认中共党员仍留在国民党内已弊多于利，但也不能提出一致的改弦更张的具体办法，瞿秋白和别人一样对国共合作前途不表乐观，但常为共产国际及鲍罗庭辩护，更不赞成立即退出国民党。

当我受命派赴广州传达中共中央的意旨时，我曾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慎重提出要决定最后是否退出国民党。当时威金斯基根据共产国际的意旨，坚持中共仍应留在国民党，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我们因不愿与共产国际发生争执，而且时机迫促，也不容许我们作根本的改弦更张，只好接受了威金斯基的意见。因此中共中央的政策，较之鲍罗庭所执行的，也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结果，在国共关系问题上，我们处于进退两难之境，处处被动，只有听任国民党的实力派，用强制手段来摆布了。

① 国民政府采委员制，以汪精卫、胡汉民、孙科、许崇智、伍朝枢、徐谦、张继、谭延闿、戴季陶、林森、张静江、程潜、廖仲恺、古应芬、朱培德、于右任十六人为委员；由汪精卫任主席；国府委员会之下设外交军事财政三部，由胡汉民、许崇智、廖仲恺分任部长。

# 第 三 章

#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二六年一月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洋溢着使人乐观的左倾气氛，但事实上却忽视了实际问题的解决。这固然是汪精卫领导作风的特色，也是中共中央和鲍罗庭以及汪精卫等三方面意见不一致，而又不能获得适当的调协，有以致之。

我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中旬由上海乘轮绕过香港，直达广州(因省港罢工海轮不停香港)。我为了获得鲍罗庭的谅解，首先找他恳谈。他已知道了一些上海的消息，颇为不满。我将中共中央关于广州政策的决定和与国民党中派人物孙科等会谈的经过通知他；并且表示中共中央和我自己都认为应当首先和他交换意见，如果他赞成这些决定，据以对广州的现行政策有所修正，也应由他采取主动；我自己则不拟直接向外有所表示；以免予人以我们之间有意见分歧之感。

鲍罗庭对中共中央的政策表示甚大的反感。他说到广东在过去半年中，经历了一场艰苦的奋斗；如非他和广州的同志们紧急应变，也许革命早就夭折了。他接着质问我："为甚么广东方面将那些阴谋破坏革命的国民党右派分子

驱逐出去了，现在却又要将他们请回来?”他要求让他考虑几天再行讨论;但对我这次先和他商谈的步骤却表示欣慰。

鲍罗庭虽不赞成中共中央的政策及据此所采取的行动，但似觉得这是威金斯基，甚至共产国际所支持的政策，不能等闲视之。他表示要先问明莫斯科和加拉罕的意向，才能作具体决定。他对已往没有将广东情况详细报告中共中央，并承认对外的宣传解释工作做得不力，以致引起隔阂一点，表示歉意。我答应他先了解广东实况，过几天再行讨论。

当时广东局势的演变千头万绪，要在几天之内获得全面了解，谈何容易。中共广东区委会各负责人虽大都抱乐观看法；但也不得不承认当前局势潜伏着的危机。他们所谈的要点，大致如左：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廖仲恺被刺，是革命与反革命流血斗争的重要讯号。广东的中共同志，认为廖案的发生，不外两种因素：一是亲共与反共之争；二是国民党内部权利之争，无论如何，这表现了中国政治人物缺乏民主素养，动辄以暗杀手段对付反对者。

廖的被刺，胡汉民派涉嫌最大。一九二五年六月中旬杨刘问题解决后，七月一日国民政府成立，胡汉民因而失势。廖仲恺当时是扮演着“梁山泊豹子头林冲”的角色，支持汪精卫接替胡汉民负最高责任。廖系政府中的核心人物，与鲍罗庭以及中共人士来往密切，而且在厉行财政统一政策之下，开罪了一些与胡有关系的右派官僚。不少中共同志认为胡汉民本人及其亲信那时仍在政府中占有重要

地位，同时沙基惨案发生以后，大家都要求一致对外。但胡派居然刺杀多年战友，动摇了广东政府的基础，这是不能宽恕的。

廖案发生后广州骤然进入恐怖状态，广州要人中除谭平山、苏兆征仍照常在群众中露面外，其余的人不无草木皆兵之感；汪精卫并曾劝告谭平山要注意自身的安全。那时鲍罗廷却力持镇静，提出组织三人特别委员会①，局势才安定下来。

他们说到许崇智部之被整编，是因为许部分子复杂，其中高级将领缺乏明确原则与立场；有些有军阀思想，有些与胡派接近，至于指其与陈炯明勾结，则系莫须有的罪名。也有人说这是因为后起的蒋介石亟谋扩充实力，借此机会，将许部改编隶其麾下；由此确立他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

十月间，广州局势由于军事上的胜利，更形稳定了。当时重占东江惠州一带的陈炯明部，向广州进逼；南路邓本殷部进攻广州附近江门；中山县又为土匪袁带部所盘据。这些意图倾覆国民政府的反革命军事进攻，多有香港的奥援。香港当局那时是用“以华制华”的方法，对付反英中心的广州。蒋介石将军率部再度东征，消灭了陈炯明部。朱培德、李济琛、陈铭枢等部也肃清了邓本殷和袁带的叛乱。涉嫌勾结陈炯明的熊克武部又为谭延闿、朱培德解除武装。由于这些军事胜利，广东算是统一了（只琼崖一带尚有邓本殷的残部）。

这是广东多年动乱以来第一次的统一，国民党人额手称庆之余，总常常向我津津乐道广东当时的局势。军队已

编成了六个国民革命军，统由军事委员会指挥；国民政府的政令已能通达全省；税收月有增加；外交方面也有收获；国民革命的基础，可以说是奠定了。广州的中共同志也同样欣慰有加，觉得中共所领导的工农群众，曾在统一广东的工作上有过重大贡献；而且认为这是鲍罗庭政策的成功。

国民革命势力虽在扩展之中，但国共关系仍是一棘手问题。最明显的，是黄埔内部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对立。加入前者的黄埔学生多系政治工作人员，其领导分子多具有中共党籍，绝大部分左倾。后者的成员则多系国民党籍的军官，领导分子多持坚决的反共态度，又在黄埔以外发展组织，如广州大学的孙文主义学会自命为"斯梯克"党，显然是要用暴力手段，对付共产分子。

陈延年认为孙文主义学会的组成和扩大，与青年军人联合会之工作不力大有关系。青年军人联合会最初想包括全体黄埔学生，来对付黄埔以外的旧式军人；并且也得到蒋校长的支持。后来，这个组织在中共党员领导之下，发生了左倾的偏差，征求会员严加限制，有些黄埔学生没有加入，甚至有些申请加入者，竟未获得批准。这就引起了一部分国民党籍的学生的反感。陈延年又表示，孙文主义学会气焰如此高涨，背后也似获得蒋校长的支持。

戴季陶那本《中国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似是孙文主义学会的经典。陈延年告诉我这本小册子曾译成英文送给鲍罗庭看，鲍罗庭表示戴季陶站在国民党立场说话，未可厚非；鲍并指出他对甚么事都有办法，只有解决国共纠纷他无能为力。因而陈延年除了指斥戴季陶和孙文主义

学会为新右派之外，别无他法。

我听了陈延年上述这些话，不免有点生气。我指出鲍罗庭所说的是废话，解决国共纠纷为根本之途，对此问题无能为力则一切都属空谈。我还反问他："鲍罗庭这种避免接触根本问题，以不了了之的手段来拖延，是否由于对共产国际将国共两党混为一体的政策，根本失去了信心之故！"陈延年默不做声，似不愿参加讨论，但认为要想出办法来。

另一方面，中共正领导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活动，省港罢工委员会是一个声势赫赫的庞大组织；数以万计的罢工工人正集居在广州市那些被封闭的烟馆赌馆旧址里和一些公共建筑物内。委员会除干事局等正常的机构外，还设有会审处，审判破坏罢工、偷运粮食接济香港和私卖敌货的犯人；同时附设有监狱；对于敌货的处理，设有拍卖处。罢工委员会的纠察队水陆侦缉队的组织，拥有队员二千余人，步枪四百余支，小艇十二艘；他们分驻各港口，执行封锁香港的任务。此外还有法制局筑路委员会等机构。这些机构的做法自然多方侵越了政府的职权。

当时在广州的中共同志，多以能领导罢工机构而自傲；觉得较之一九一七年俄国工人苏维埃还更有效率；但确没有取国民政府而代之的企图。国民党右派人物却斥之为"第二政府"，认为它包藏着中共在广州实行共产制的野心。中共中央则本着国共合作、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的意向，亟谋对罢工委员会的活动有所调整。

我曾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与广州同志商讨这个问题。

当时省港罢工委员会向香港所提出的条件分为两大纲要：第一是拥护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对沪案所提出的十七条；第二是直接针对香港的六项要求。即：一、政治自由；二、法律平等；三、普遍选举；四、劳动立法；五、减低房租；六、居住自由等。我指出应依形势变化降低要求条件，与香港当局协商解决，尽早结束这次罢工。如果罢工结束，罢工委员会的组织，也就不必要了。所谓“第二政府”之说，也可不攻自破。

罢工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和主持委员会的中共党员邓中夏等人，都赞成我的主张。但他们都说香港方面始终对协商解决罢工一事，没有明确的表示。如果香港方面真愿意协商，他们随时准备谈判。自然，在条件方面也预备作若干让步。

他们还进而指出，由于省港罢工，加上罢工工人纠察队检查各港口，对香港实行经济封锁，不特使香港遭受经济上的重大损失，使广东的叛军，得不到外力的支援；而且由于罢工工人参加了肃清内奸、镇压反革命、支援作战和杜塞走私以裕税收等工作，更使广州革命政权日形巩固。因此，国民政府当局多认为罢工是有利的，即反对罢工的人，也只能说罢工委员会权力太大，却不能抹煞它对革命的贡献。罢工工人方面以曾获得政府和私人大批的捐款，生活也相当安定。不过对香港实行经济封锁，广州及其附近地区也得不到外货的供应，有些地方颇感不便；商人也受到损失；农民的农产品，无法出口销售，这些事都曾引起反感。

因此，九月初即实行出入口“特许证”办法。规定“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的船货，可准其直来广州”。特许证规定由国民政府外交部广东省政府商务厅公安局会同罢工委员会共同签字发出。这个办法实行以后，美日等国的商船相继要求领证直航广州。于是，上海广州间和暹罗广州间等航线，逐渐恢复。广州江面每日出入口船只多至四十余艘。这个办法在“孤立英国”、“增加政府税收”、“工商联合”、“工农联合”、“安定人心”等方面，都收到很大的效果。

其次，是农民协会与各地方政府和地主之间的纠纷。在发展中的农民协会，常因减租减息和一些其他的经济问题与地主发生争执；尤其重要的是农民协会属下的农民自卫队与各县地主所领导的民团，发生武装冲突。不是农民自卫队围攻地主的碉堡，便是民团杀害农民协会的负责人。各县政府处理这些纠纷事件，多偏袒地主方面；也常指斥农民协会简直成为第二政府，侵犯了各县政府的职权。

当时任广东省民政厅长的古应芬，或明或暗的支持各县地主民团势力。广东的中共同志将他视作眼中钉，认为非去掉这个右派古应芬，农民是不能翻身的。但张太雷告诉我，鲍罗庭近来也学得圆滑了；对古应芬支持反动分子事不愿过问。张太雷认为鲍顾问不说话，农村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可是鲍又似觉力有未逮，不愿卷入漩涡。因此，国民政府对农村既无一致的政策，若干乡村便成了两派势力的比武场所。

我原约定与鲍罗庭在几天后商谈双方歧见问题。鲍罗

庭似也已得到莫斯科方面的复电，可以表示意见了。因而由他主动约集我和广东区委会主要负责人陈延年等举行会议。

鲍罗庭首先发言，他对广东局面表示乐观。指出在对外关系方面，由于罢工委员会组织的严密，香港方面一切破坏的阴谋都没有成功。他预料香港当局不久将与广州当局谈判解决罢工问题；有恢复双方正常关系的可能。至于其他各国，如美、日等国的商船，早已直接开到广州，进行经常贸易；而且日本方面开始与国民政府商谈海南岛田独镇铁矿开采问题，国民政府并准备给予开采权。根据这些情况，他指出列强现在不得不承认国民政府业已稳固这一事实。

关于广东内部的状况，他认为基本上已经统一，不会再有叛乱发生；汪蒋合作的局面也不会因外间的挑拨，而产生破裂。广西军人对国民政府的关系正在改善之中，可望成为国民政府属下的另一省区。广东四周并没有甚么军事力量，足以危害广东的安全。现在政府税收月有增加，并可望大量增溢。他认为在这个稳定的基础上，民政的整理、各军训练等主要工作，都可望顺利进行。

根据这种乐观的看法，他认为国民党左派与中共仍应向右派势力进攻，以期广东局面获得进一步的巩固；此时决不应退让，因为退让政策会助长右派的气焰。他指斥中共中央“团结左派、联络中派、打击右派”的政策，是死板的公式。国民党左派本身是相当脆弱的，需要和中共合拢一块，才能形成一个雄厚的力量。他也承认摇摆不定的

中派占多数，但反对以向右派让步的方式，去联络中派。他主张强迫中派追随左派，要他们无条件的拥护国民政府和广州的国民党中央。他讥讽中共中央与孙科、叶楚伧、邵元冲等所成立的协议是要不得的安抚政策。

他还进而号召广州的中共同志，反抗上级的决定。他说不应当无疑问的遵守中共中央的决定。广东区委会负责人根据他们对广东情况的真实了解，是可以对这种决定，提出修改的意见的。

我当时觉得鲍罗庭这篇演说漏洞颇多，立即加以答辩。我首先承认广东的局势是稳定了，也说到中共中央并不抹煞广东同志促成这一局势的功劳；但对前途的展望不如在广东的同志这样的乐观。就是根据我这几天的考察，也证明广东内部有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

我指出中共中央与孙科等中派所取得的协议是合理与必要的；因为联络中派以搅垮西山会议派的组织，就是向右派势力进攻的一个主要方法。我曾反问鲍罗庭，除了这种分化的办法以外，所谓国民党左派与中共合为一体的说法，是否含有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应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包办国民党中央委员席位的意义在内？所谓强迫中派追随左派和进攻右派的说法，又应如何实行？

我的这些问题都是鲍罗庭难于置答的。因而我更说明中共还在幼龄时代，没有人参加国民政府，也还没有执掌政权的经验，更没有掌握军事实力。中共党员还没有任高级军官的，在国民革命军中，也多系负担政治工作，而政治工作被视为军中的附属品，未能直接掌握军队。在这种

情形下，即使我们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多占了一些席位，除了引起国民党人士的反感以外，我不信真能增强中共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接着我要求在广州的同志们不要将中共中央的政策，视为退让的政策；应认识到这是中共自谋独立发展和巩固国民革命阵线所必要的措施；不应要求修改，而应切实执行。而且在这次（第二次）国民党代表大会中，我们应一致主张建立一种国民政府的制度，不要老是以革命的非常手段来处理问题。最低限度要将汪蒋合作的领导重心，在制度的基础上巩固起来，便不受外间挑拨的影响。

我还提出了三个急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消除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对立的状态；这两个团体同时取消或合并为一；二是应主动的谋求省港罢工的结束；如果罢工委员会一时不能结束，也应在国民政府法律范围内活动；三是我们要求国民政府采取更明确的政策，支持农民运动的发展；改组各地地主民团的武装，使之成为各地地方政府的或农民的武装，以清除各地的武装冲突，并满足农民减租减息的经济要求。

我曾向鲍罗庭说："开除西山会议派和使中共党员增加在国民党中央的比重，并不算是甚么真正的革命进攻；如果能实现我上面所说的各点，特别是使农民势力在乡村中居于优势，才是实际的革命进攻。"

鲍罗庭并未答复我的问题。广东区委同志们似不愿卷入我和鲍罗庭之间的辩论，没有人多发言，就散会了。事实证明广东区委的多数负责同志是站在鲍罗庭一边的；他

们尤其反对中共中央与孙、叶、邵等人所取得的协议，认为是对右派退让的明证。他们虽不视我为退让政策的主要代表人，甚至觉得我多少对广东情况有所了解，并寄予同情的人。但总感觉我的意见，含有退让的气味。

张太雷向我所说的话，似刻画出鲍罗庭当时的处境。他指出鲍罗庭在这里与汪蒋等人一同奋斗，相处得水乳交融；在目前情况下，只有鲍才能平息国民党内部可能发生的矛盾，稳定现有的领导。不过近来鲍罗庭精神上颇感不安，在处理广东各项问题上，往往遭遇困难，又被右派所反对；而莫斯科和这里的一些俄国军事顾问，似也不完全同意其作法；现在中共中央的决定更使其大伤脑筋。他还进而说到鲍罗庭在这里花了两年工夫，才把广东的情形摸清楚，如果莫斯科要另找个人来接替这个顾问职务，是很难有适当人选的。

我曾向张太雷保证，中共中央并没有要撤换鲍罗庭的意思。我自己来广州一切首先就商于他，也是为了尊重他。中共和孙、叶、邵等人的协议，也强调要他们遵守孙先生联俄容共的既定政策。这些似乎都不致使鲍产生不安于位之感。但张太雷仍感不满足。他指出西山会议公然开除鲍罗庭、汪精卫和中共党员；因此，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应首先来一个示威性的反击；其中一项是应造成热烈拥护鲍顾问和汪蒋领导的气氛。他认为只空洞要求中派遵守孙先生的既定政策，而不具体的要求他们拥护广州现有的领导，是十分不够的。

这时，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即将开幕，而中共对此

所应持的政策，我们——中共中央与鲍罗庭及广东区委会之间——迄未取得协议。在中共中央方面，既已与国民党中派有所协议，自不能中途变更。在鲍罗庭方面，又认为这是退让，须予修正；而在时间上又已不容许往复协商。我这个当事者处在夹缝中，只有使这种歧见不过份暴露于外而已。

孙文主义学会的问题我认为可以从速解决。但陈延年等总觉得青年军人联合会是黄埔中合法而又成立较早的组织，而孙文主义学会却是未经正式许可的新右派的产物；如果这两个团体同时取消或合并，都不免是让步太大。他不直接反对我的主张，似采取拖延的办法。他曾向我解释，这件事要等在黄埔负责的周恩来回来后，才能处理。那时周恩来正在汕头兼任东江行政公署的主任，忙得不能来广州。陈延年认为他深得蒋介石将军的信任，两个团体的负责人对他都是敬重的；由他向蒋提出处理办法是较妥当的。

其他如结束省港罢工问题，这是广东方面不能单独解决的。果如鲍罗庭所说，那时香港方面曾派出非正式的代表，前来广州，试探解决的途径。这种谈判因双方意见距离甚远，拖延时间很久，到了三月二十日事件发生的时候，香港方面似觉得已无谈判之必要，便中断了这种接触。至于农民与地主间的冲突问题的解决，后来只是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通过了一个农民运动决议案，作为点缀而已。

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开始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由汪精卫所领导的；但实际上，他没有完成他所担

负的任务。在大会举行以前，我曾将我们与孙、叶、邵等商谈经过，和中共中央采取这种行动的意向，正式向汪说明。他除了和我亲切寒暄一番而外，对我所说到的，并不作具体的表示。他那时一切事多与鲍罗庭商谈，即对国共关系问题，也不例外；也许他觉得通过鲍罗庭较为妥当。

鲍罗庭对于这种现状也许是引以自傲的。当我向他说到要强化大会的领导重心的时候，他说大会有法定的主席团可以领导，重要的事由他在幕后说话，并没有甚么要顾虑的或要重新讨论的事。鲍罗庭那时仿佛是一艘失舵的船，抓不住航行的方向；他不同意中共中央的政策，认为有退出国民党的倾向；他坚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与左派亲密结合；但也看不见中共这样做的前途。他没有中共迳行夺取国民党领导的想法；只要求中共的势力做国民党左派的基础(他并明白说中共是命中注定了要做苦力的)。他虽进退两难，但对自己的政治手腕，却颇能孤芳自赏。他认为广州局势能由他调排，一切自有办法。

大会举行的前夕，莫斯科来了一个很长的电报；鲍罗庭将它翻译出来，乃是一篇反对帝国主义的大理论。正当我和鲍罗庭阅读这篇电文时，汪精卫来了。鲍罗庭不加解释，将电文交给他；他也没有等读完全文，就说内容很好，可作大会宣言的资料。后来，这篇文章果然成为这次大会宣言的第一段。

汪精卫走后，鲍罗庭很得意的向我夸耀，说一切事情经他安排，都能不费唇舌的顺利解决。我却感觉有点不满足，曾追问鲍罗庭，除了这个电报外，莫斯科是否还有别

的具体指示。他回答说："没有。"并说一些实际问题，莫斯科大致信任我们能够协商解决。这显示当时莫斯科对于中国局势并没有敏锐的感觉，只能听任于鲍罗庭的相机处理。

大会在汪精卫领导之下，发表了大会宣言，通过了党务报告，接受总理遗嘱，弹劾西山会议派，以及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商人运动等决议案。冠冕堂皇，似是第一次大会的改组精神再度表现。

汪精卫是位动人的演说家，表演得颇为精彩。他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虽然冗长，但他那充满热情的词藻语调，获得不少的掌声。尤其是他多次所强调的共产派与非共产派在历次战役中，热血流在一起，凝结成一块，早已不分彼此；既能为同一目的而死，更可为同一目的而共同生存下去等语句；为当时人们所乐道。

然而他并未以同样热情的口吻，号召广东以外的国民党员，不要走西山会议派的道路，共同团结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之下，一致合作。这似是他演说中的美中不足之处。

蒋介石将军是第一次参加这种盛会的；颇有自命不凡之态。一月一日新年的群众大会上，他穿着引人注目的斗篷大衣，在主席台上接受欢呼；军事领袖的姿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使汪精卫等为之失色。他在黄埔所举行的招待全体代表的茶会上，也显示出他自成一格的气派。他在大会上所发表的军事报告，指出国民革命军已近十万人，强调一年来军事上所获得的成就。他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和军事委员会的主席，确定了他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在一般代表心目中，他与汪精卫是两个重心；前者是军事的，

后者是政治的。有些人已经觉得汪蒋之间能否合作无间是有疑问的。

“尊蒋抑汪”是西山会议派破坏广东局势的重要策略；事实上似也有隙可乘；我也和鲍罗庭慎重讨论过这个问题。鲍罗庭曾含糊其词的表示汪蒋两人性格确有不同，汪善解人意，触类旁通；但要他负起责任的时候，常表谦逊和退缩。蒋则所知不广，但却勇于负责；目前两人还没有甚么芥蒂。在我们之间任翻译的张太雷，更进而说只有鲍罗庭折衷其间，才能维持汪蒋合作的平衡。

中共党员以国民党各地党部代表资格出席这次大会的，人数约占全体代表的四分之一②，但也不能有甚么积极贡献巩固左派的领导。任这次大会中共党团书记的是高语罕，他在黄埔任政治教官；这次在大会中是中共的主要发言人。他也是一位激动的演说家，堪与汪精卫的美妙词调唱和。他在言词中对国共双方不分彼此，使会众有一团和气之感。他知道中共内部对国共合作的根本问题，仍无明确的决策；因而对许多可能引起争论的问题，避而不谈。

在国民党内，居然存在着一个中国共产党，这是国民党人大感不安的；即所谓左派，亦不例外。这次大会中，大多数代表对中共都有或多或少的戒惧之心。开明的国民党代表，往往也要说几句话，表明其纯粹国民党员的立场。

我经常出席大会，但并非代表，而以第一届候补中央委员的身份到会，坐在大会的中央委员特别席上。坐在这个特别席上的人寥寥无几；我记得好像只有孙夫人宋庆龄女士。不过她并非中央委员，而是大会特别邀请的来宾。

第一届中央委员有的被放逐了，有的没来出席，有的担任了大会的职务。总之到会的第一届中委不及全体的一半，这一事实，似也引起过一些人的伤感。

我是负责指导中共党团的活动的。我采取民主的方式，尊重党团委员和中共广东区委会多数的意见。中共的同志们也和一般国民党人一样，多认为这次大会不过是一个热闹的场面，避免提出足以引起争论的问题。我自己着重对于国共关系作些必要的解释，如在国民党内存在着中共党团的问题，是最使国民党人不安的；我曾发表一件致国民党员书，指出中共党团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并非破坏国民党的团结，恰恰相反，是为促进国共之间的团结。

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以前，汪精卫曾约我在鲍罗庭那里会谈。他提出了一张他所预拟的二届中委名单，征求我们的同意。鲍罗庭一言不发，我细看了这张名单，是所谓左派和与汪有关系的人占多数。我觉得他并未尊重中共中央争取中派的意向，中派的人除孙科外，叶楚伧、邵元冲等均未列入，至于中共党员则除第一届者均列入外，还增加了在国民党内任重要职务的吴玉章、董必武、恽代英、杨匏庵等人。

我对于国民党内部的事，自然不便多说，只有根据中共中央的决议，对于提名中共党员为国民党中委者表示意见。我提出中共党员如瞿秋白和我自己没有在国民党内担任职务，不必再当选，其余中共党员也可以斟酌减少几个，以符中共中央不愿多占国民党中委名额的原旨。

汪精卫当即表示反对，他指出瞿秋白和我都是总理在

世时遴选出来的，应当继续当选。我向他委婉解释，指出现在的名单中，有些第一届中委的名字并不在内；那末中共党员也退出几个，是公平而合理的。汪精卫看见鲍罗庭仍不说甚么，也就不再说下去了。这样，第二届中委名单就算是商定了。

在大会选举中委的时候，被放逐了的胡汉民竟以最多的票数当选③。这事令人啼笑皆非；胡氏的当选固由于事先的安排，但他得到最多的票数，至少足以证明代表中并无坚决反胡的人。我的同志中即有人根据这一事实，说到左派是不能向中派退让的；因为左派失去了廖仲恺以后，本身更形脆弱，稍示退让，即有被瓦解的危险。汪之不能同意中共中央的意向，其原因即在于此。

大会刚要闭幕的时候，鲍罗庭告诉我，汪精卫对中共中央颇表不满；一则因为中共中央与孙、叶、邵等的会谈，无异对反对广州的人物讨好；再则中共在这次大会中采取消极态度，不愿卷入国民党的斗争，有不支持左派的倾向。鲍罗庭向我说这些话，显然是借汪的名义来打击我。

我承认我并未贯彻中共中央的主张；但我也指出，汪精卫并没有事先和我详细商谈，以取得协调。我还转而指责鲍罗庭，说他除了反对中共中央政策的意见外，并没有提出建设性的具体意见；对这次大会所持的态度，也不算是积极的。最后，我表示这里的一些问题，亟待解决，我要立即回到上海去，请求中共中央作最后决定。

鲍罗庭告诉我，他也快要回莫斯科去了，有些问题须先在莫斯科予以澄清，才能处理。他预料广东的工作在汪

蒋合作之下，可以正常进行，不会因他的暂时离开，发生甚么影响。他还说到这次大会已经获得良好的成绩，大体上与中共中央的主张也没有甚么重大的出入。至于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对立的问题、罢工结束问题和农民运动的问题等，一时都不会影响大局，等他从莫斯科回来后，那时莫斯科上海广州间的意见趋于一致，再行处理不迟。

谁知事态变化之速竟出乎鲍罗庭的预料，等他在三月二十日，再回到广州之后，一切都脱离了他的掌握，一切都变化了。其实，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举行的时候，蒋介石将军即对黄埔内两个团体对立的状态，发表过演说，表示出不能再容忍的态度；而鲍罗庭和中共的反应是太迟钝了；以致"三二〇"的不幸事件，终于上演。这些往事，即使现在看来，似也不能责备中共中央和我自己的处理不当，主要是由于鲍罗庭的太过自信，没有掌握时机，在这次大会上解决问题。

① 汪精卫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说这个特别委员会的组织，是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的。其实，这只是形式上的决定；实际是由鲍罗庭所主张。胡汉民所作《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载《东方杂志》三十周年纪念专号）一文说："其时精卫亦在汝为（即许崇智）处，力主邀鲍罗庭来，他说：'必须请鲍先生来，大家共同研究'，鲍罗庭来后，便说：'应该组织一个特别委员会办理此事'。于是开临时会议，由鲍罗庭提出汪兆铭、许崇智、蒋中正三人为特别委员，将当时党部政治委员会议国民政府各机关职权，一律交特别委员会统制。"这是可信的。

② 据杨幼炯著《中国政党史》（一六六页——商务印书馆出版）称："此次大会完全在共党操纵之下，全体代表二百五十六人，共产党员约占五分之三。"这不特与我所记忆的有很大的出入，而且也与当时中共中央的决策是相左的。

③ 胡汉民以全体代表的票数当选，汪蒋均较胡少一票，本应列为各中委之首；后经大会秘书长吴玉章商得汪精卫同意，将胡的排名改列在汪蒋之后。

# 第十一篇

# 三月二十日前后

# 第 一 章

# 中共中央的烦恼

一九二六年一月下旬，我回到上海后，深感中共中央在政治上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多半为留在国民党内这一政策所桎梏了。列宁曾说过“人不如鸡”，当鸡被置在一个粉笔所画的圈子内，它会自己跑出来；但人却往往会站在自己用粉笔所画的圈子里，跳不出来；以这个譬喻来形容当时中共中央的处境，实在贴切不过。

当中共中央讨论我“广州之行”的报告时，都觉得中共留在国民党内这一基本政策，与上海广州间的争论有直接关系。大多数中共中央人员，以陈独秀为首（包括我自己），都认为根据鲍罗庭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派合并为一的所谓进攻政策，发展下去，不外两个结果：一是中共霸占国民党中央的领导硬干下去，身居领导之衔，却无军事实力做后盾，国民党党员包括左派在内都会群起反对；终将因树敌太多，形单势孤，不在国共纷争中垮台，也会被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优厚势力所摧毁。二是中共软化下来再也不谈独立的政治面目，将自身也变为国民党左派的一分子，专为现在广东的左派领导捧场，但这是吃力不讨好的办法，降格之外还要自食苦果。如果否定鲍罗庭的意见，照中共

中央原定的政策进行下去，势将走到退出国民党之一途。何况在国民党以党治国的原则之下，改采党外合作的方针既不可能，又无多党组成的国民会议或联合政府这一套办法可资凭借。

在这种尴尬局面中，我们之间的意见也有分歧之处。彭述之曾斥鲍罗庭怂恿广东区委同志反对中央决议，是破坏中央领导的行为。他并且质问我为何不将中央决议公开发表出来，并命令广东区委同志遵照执行。这些话的用意，自然包含了对我的不满。瞿秋白则有相反的看法；他称许我在广州时，能持重视广东同志意见的态度，认为既能大体贯彻中央的主张，又能不暴露内部的分歧意见。

恰在这个时候，我们又接到广东区委会的一份文件，指责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前所采取的退让政策；主张改用向右派进攻的策略。中共中央认为这个文件是在我离开广州以后，他们根据鲍罗庭的意旨而作成的。我们多数人曾明白表示不能接纳这个文件的建议。

我们讨论的结果，决定等候共产国际指示；对广东区委会的文件，也暂不予以反驳。这时，威金斯基已在我返上海之前，就回莫斯科去了；鲍罗庭又将继之回国；他们显然要在莫斯科作一番彻底的商讨。中共中央没有派代表去莫斯科参加这种讨论，但又势必等候他们讨论后的指示；这使我们觉得是不合理的憾事。虽然如此，中共中央自始就有尊重莫斯科的传统，对此似也只好安之若素了。

中共中央不能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情况，独立自主的速决速行，而要听命于远在莫斯科、对中国实情又十分隔阂

的共产国际；这是一切困难的主要根源。而且一九二五年底，俄共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干部派和托洛茨基、季维诺夫、卡未尼夫的联合反对派，正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因而莫斯科对中国问题似未能全神贯注；我在上面所说过的广东方面的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莫斯科方面一直都没有明白指示。等到威金斯基和鲍罗庭等重来中国，已是三月二十日事变发生以后；一切都成为明日黄花了。

中共中央所面对的困扰，除了上述的这一主要政治问题之外，还有负责人之间情感上的隔阂问题。我们这些负责人，性格各别，生活情调也不尽同，例如当时彭述之的罗曼史，本是私生活的不检行为，却成为我们内部分歧达于表面化的始点。我在这里简略叙述一下，也许可以从中看出中共成长的一些波折。

在我回到上海后几天，由于蔡和森的主动，中共中央在他的寓所（亦即中央宣传部办公处，蔡和森夫妇、彭述之及其秘书郑超麟等均住在那里），举行了一次会议。在会议上蔡和森的太太向警予首先报告在其丈夫蔡和森离沪期间（蔡系在我离沪前几天到北京去的，大约与我同时返沪），她与彭述之发生了恋爱，其经过情形已在和森返沪的当天，就向他坦率说明了。她表明她陷于痛苦的境地，因为她与和森共患难多年，彼此互相敬爱，现在仍然爱他，不愿使和森受到创伤；但同时对彭述之也发生了不能抑制的感情，因为他的风趣确是动人的。她要求中央准她离沪，派她到莫斯科去进修。

这件有关私人生活的事，我们事前都不知道；大家一

时似不便表示意见。经过一度沉默之后，陈独秀先生开始赞许蔡向的结合，表示不愿见他们因此而离异。继而他批评彭述之不能自我约制，有伤同志的亲爱关系。他准许向警予的请求。不久向警予也就赴俄了。

这件事，就他们几个人的个性看来，也并不算是十分突然的。首先，蔡和森就不能算是一个能使妻子愉快的丈夫。他是中共初期一个工作特别艰苦的同志。一九二三年我曾和他同住一个短时期，我们两人的睡房只隔着一层木板(那时向警予到别的地方工作去了)。他会整天不讲话，埋头阅读和写作；当他接触到有趣味的文句时，就独自发出格格的笑声。他患有严重的气喘病；病发的时候，呼吸急促得像一座扇火的风箱，呼呼作响；但他从不听人劝告，中止工作，好好养病。他往往记不起吃饭，进膳的时间当然不规律，他室内的书刊报纸，堆得乱七八糟，没有秩序，甚至不够清洁。他疲倦了，会不解衣不脱鞋，倒在床上就睡；一会儿，又骨碌地爬起来继续工作。

每当我深夜回到寓所，蔡和森还在那里写文章看稿子。他常为了思索一个问题，在房里踱来踱去；他穿的那双粗劣的皮鞋，发出沉重的声音，吵得我这个疲倦不堪的人，也不能入睡。我有时因此索性起来帮同他工作，以便他能早点休息；有时我们两人工作竟一直到天亮。我们间的友谊是很深厚的，但我也觉得和他一起生活是一件苦事。我想他这种生活习惯，是会有损于伉俪乐趣的。

向警予原是一位活泼多情的女子，受中国礼教观念的束缚颇深，不苟言笑，表现得十分庄重。她养成了刻苦工

作的精神，似乎是在努力工作中谋求自己精神的寄托。她虽是较早期的妇女工作领袖，但论年龄还是不到三十岁的少妇。她老是一本正经，态度严肃，使那些同侪的妇女工作者望而生畏，给她封了一个“老祖母”的绰号。

她的这件桃色事件公开以后，她个人的声望和中共所领导的妇女工作都受到损失。多数的妇女同志们批评她的感情是关不住了，终于溃决了；也批评这种“老祖母”式的领导是不够自然而有些做作。事实上，她从此丧失了在妇女中的领导地位①。

彭述之则有类于风流才子，在处理工作和日常生活中，都是轻松而有节调的。但外表上常常一本正经的在进行说教，因而有“孔夫子”的绰号；有时也谈笑风生，引人入胜，流露出风流才子的本质。在共产党立场上所封的“孔夫子”绰号，是具有讥讽意味的；是指他这个有政治野心的青年，表现出的一种矜持的说教姿态。他主张提高党权，也有点孔夫子“尊王攘夷”的派头，他似以陈独秀先生为“天子”，中共其他老干部为“各路诸侯”，而他自己则负有“强干弱枝”的重责。在这个恋爱风波发生以后，他仍照常工作，若无其事地保持原有的态度。

彭述之的行为引起了瞿秋白对陈独秀先生公开地表示不满，认为他领导无方。恰巧那时我的快要临盆的太太为了安全分娩和进修起见，约于三个月前起程往莫斯科去了；我暂时成了单身汉；同时我在闸北的办公地点，颇不安全，不能再住；而瞿秋白当时住在法租界，是比较安全的地区，中央的机构也多迁往那里；因而我被安排暂与瞿秋白同住；

因此我有机会听他倾诉有关这方面的不满意见。

瞿秋白是一个将夜作昼的孜孜不倦的工作者；也是一个涉猎甚广的学者。他久患肺病，又患有失眠症。每当我午夜就寝，正是他读书开始的时候；直到第二天早晨八时，早报业已送来，他的阅读工作才告一结束。接着，他看完报纸，和我共进早餐；他往往爱谈起前夜阅读过的精采著作；他一夜读完整本的书，是常有的事。我早餐后出外工作，他才解衣睡觉。下午二时以后，是他处理工作和写稿的时间。我们一同共进晚餐时，他总要喝几杯老酒；餐后，他常笑容可掬的和我闲谈，谈得高兴时，他口沫横飞，时常会喷到我的脸上来；我常想到，我是陷在肺病细菌的浓雾里，我没有染上肺病，似也是个奇迹。

他的太太杨之华，饱经生活历练，性情温柔而活泼。她依照秋白的生活节奏来处理家务，井井有条，连他的女佣人也觉得这是一个安静的高贵之家。她是中共党员，虽然担任着妇女运动的部分领导工作，颇为忙碌，但她总是设法使秋白在整个上午睡得很安静。在我与秋白枯燥无味的政治性谈话中，她往往会说一些轻松风趣的话，使我这个短期住客，也有宾至如归之感。

瞿秋白是最不满意彭述之的。他批评彭述之理论修养和政治经验都不够，不配担任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尤其指责彭的宣传工作领导得不好。他认为由于彭述之的行为不检，使两个中共中央的要角——蔡和森与向警予——都受到痛苦和打击；并破坏了同志间的亲爱关系。他明白表示象彭述之这样的人，不应留在中共中央，应派到地方机

构，做些艰苦的实际工作，以资磨练。

瞿秋白也第一次表示对陈独秀领导的不满。他讥讽陈独秀的领导是“秀才”气味的“家长”制度，但为了袒护彭述之，又不能维持“清白家风”。他虽然佩服陈先生的经验和学识，但指责其政治领导，不够泼辣；既不能独行其是，坚持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又不愿迁就鲍罗庭的作法，表现得犹豫不定和软弱无力。

书生气味更甚于陈独秀的瞿秋白一向佩服鲍罗庭的作法。他认为鲍罗庭是在中国工作的苏俄人中最能干的一位；也能代表斯大林的意向。他指出中国不能走民主化的道路，不会有多党参加的国民会议的事实出现；深信共产国际不会变更中共留在国民党内这一基本政策。他虽不否认鲍罗庭在工作中有些缺点，但坚持中共中央不应采取反对鲍罗庭的态度。而现有的国共关系，实已势成骑虎，不容中途变更的。

瞿秋白的这些意向，似是他后来取陈独秀而代之的张本；但我当时并未觉察到这一点。我和他之间仍有政见上的不同，我认为如果不在适当时机，将国共关系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合作，泥足只会愈陷愈深。不过我同意他改善中央领导的主张，支持他明白表示出来，不要将问题埋在心里。瞿秋白却不肯直接与陈独秀先生商谈这些问题，要求我转达；我也答应了。

我向陈独秀先生委婉谈到瞿秋白的意见，并表示我自己也赞成将彭述之调离中央，加强中央的集体领导。陈独秀先生的反应不佳，他拒绝了我的建议；又说中共中央如

果要提高威信，就不能容许瞿秋白这类张牙舞爪的作风。他批评瞿秋白说话和做文章常是模棱两可，不如彭述之的明确坚定。他否认中央内部有甚么政见的分歧，也不愿因私生活上的事来贬抑彭述之。他仍主张一切听候共产国际的指示。

我并未因此与陈独秀先生展开争辩；我只请他多加考虑而已。但我确为这件事感觉不快。我想到陈先生的话也含有责备我的意思。我又不便将陈先生的话转告瞿秋白，以免加深彼此的裂痕。我相信这件事的解决，不必过于匆遽，假以时日，自会有转圜余地的。

可是彭述之似已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并采取了反击对策。中共中央内部在流传着谣言，说我和瞿秋白企图建立联合反对派。用意是将陈先生比作斯大林，将我和瞿秋白、蔡和森比作托洛茨基、季维洛夫、卡未尼夫的联合反对派。蔡和森对我与陈独秀先生谈话的内幕一无所知，也被牵涉在内，因为他确是对彭述之破坏他们夫妻关系之事深怀不满。

正当中共领导层发生困难的时候，整个革命形势也在激剧的逆转。首先是接近国民革命的国民军在北方遭受挫折，段祺瑞政府乘机于三月十八日在北京屠杀示威学生；继之是广州发生了三月二十日的事变。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奉军将领郭松龄得到冯玉祥的支援，发动了反张作霖的战争。十二月二十三日，张作霖得到日本的军事协助，歼灭了郭松龄的进攻。接着就是国民军与奉军的正面冲突，进而演变为张作霖与在鄂

的吴佩孚联合围攻国民军的局面。当冯玉祥的国民军驻兵天津大沽口，设置防御工事，以抗拒张作霖的海上进攻时，日本根据辛丑条约大沽口不得设防的规定，炮击大沽口的国民军，并会同签订辛丑条约的英、美、法、意、荷、比、西等七国，于三月十六日向北京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在四十八小时内拆除防御工事。

冯玉祥所领导的国民军渐渐不能支撑。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前后，国民军重要据点的天津已在三面包围中；由山海关进攻的奉军和由山东进逼的直鲁联军——李景林、张宗昌部——均抵达天津附近；沿京汉路北上的吴佩孚军于攻占河南之后，前锋也已达石家庄；同时国民军又遭受列强的干涉；因放弃天津，向北京退却。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各校学生在国共两党领导之下，因抗议列强干涉中国内战，要求取销辛丑条约，举行示威请愿运动。当学生队伍群集在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广场的时候，段祺瑞命令卫队开枪；击毙四十余人，伤百余人。当时北京是由国民军卫戍的，段祺瑞之敢于这样做，显然是鉴于正在退却的国民军大势已去，因而屠杀学生向奉系势力讨好；并迎合日本和其他列强的要求。这件事曾激起各地民众的愤怒。

中共中央讨论这个紧急局势之时，颇有手足失措之态。冯玉祥所领导的国民军虽有苏俄为其援掖，而反对冯玉祥的则不仅有张作霖、吴佩孚的优势军事实力，而且有日本及其他列强的支撑。这个联合的反动势力高唱“反赤”，而这个口号的作用是在于孤立和分化革命阵线，使反帝运动

不能抬头。国民党右派又在北京、上海等地迳指中共和国民党左派所领导的反帝、反北京政府的运动为赤化运动，到处诬蔑破坏。我们估计要重整五卅运动的精神，予反动势力以迎头打击，是有点形格势禁的。

紧接着广州又发生了三月二十日的事变。这件事对中共说来，无异是一个晴天霹雳。当时上海各报纸都用大字登载着："中山舰图谋不轨"，"蒋介石扣留俄顾问"，"逮捕共产党"，"解散省港罢工委员会"等消息。中共中央最初是不相信的；认为又是帝国主义者造谣。等到这些消息被证实了以后，我们深觉这件事发生在整个局势逆转的时期是十分严重的。

然而中共毕竟是成长了；我们精诚团结，一致对外的要求，使我们有排除万难的决心。我们无暇再谈鲍罗庭与中共中央间的歧见，也不再计较领导内部的分歧问题；大家都聚精会神商讨对策，来挽救这个局势。

我们商讨的结果，认为无论三月二十日的事变是由广州同志们的左倾错误所引起，或者由于国民党内部领导权的争夺，再或是由于蒋介石受了右派和反赤势力的影响，改变了他的政治态度，有以使然；但中共中央总应采取让步的妥协态度，来稳定广州的局势。具体的说，我们要维持汪蒋合作的局面，继续对蒋采取友好的态度，并纠正广州同志们的一些拖延未解决的左倾错误（我在第十篇中已提及过）。我们一致觉得现在蒋介石已先发制人；我们舍妥协政策而外，实无他途可循。

中共中央并决定派我赶赴广州，查明事实的真相，并

执行这一妥协政策。陈独秀先生在说明这个决定的时候，指出我是最适当的人选，并赋我以全权；似是为了冲淡我们之间所有过的芥蒂。彭述之也对我表示推崇，拥护我去相机处理一切。根据这个决定我又一次赴穗，担负着比前次更艰巨的任务。

① 向警予此后在党内再没有担任中央的领导工作，到了一九二七年或一九二八年初她就被国民党所害了。

# 第 二 章

# “三二〇”事变以后

中共中央认为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事变，是资产阶级图谋夺取国民革命领导权的公开表现。这一认定的内容大致是：这一事变包含着反抗苏俄控制的民族观念，要对中共加以压抑的反共意识，以及拿破仑主义等等重要内在因素所造成。领导这一事变的蒋介石将军所采取的手段，却是一种推翻原有领导的军事异动。再经过了五月十五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第二次全体会议，才确立了蒋介石的领导。中共也由拥护国民党领导逐渐走到反抗的方向去。

我于这一事变约十六天后到达广州。经过一次风暴扫荡的广州，在表面上看，似已恢复了宁静；事实上，由这次事变所引起的众多问题，都悬而未决。原任主席的汪精卫避不见客，我也见不着他；蒋介石将军则留守于黄埔和虎门，对外似不愿公开问事；国民政府主席的职务，那时尚由第二军军长谭延闿暂行看守，整个局势以及国共关系将如何发展，使人如坠五里雾中。

据我所知，三月二十日事变发生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最初是任海军局长兼中山舰长的李之龙在寓所被蒋介

石将军逮捕了。李之龙系中共党员，黄埔第一期生，中山舰舰长，直接受蒋介石将军的指挥。他被逮捕的理由是将中山舰擅自开往黄埔，似有异动。但据李之龙辩称，中山舰的调动，事前曾奉有海军学校副教育长欧阳格转来黄埔校长室的电话命令；他奉命行事，并无过失。中共在广州的同志们认为这是孙文主义学会所设的陷阱，李之龙不过因疏忽而误坠奸计罢了。不少的国民党人士也认为李之龙的异动嫌疑，不过是这一事变发动的藉口而已。

接着，在二十日凌晨三时左右，蒋氏所统率驻防广州市内的第一军第二师宣布戒严，出动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进行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纠察队遵令缴出枪械，故未发生冲突。东山一带俄顾问各住宅的卫队也同时被缴了械。在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工作的中共党员都奉命离开职守，集中黄埔军校，听候处置。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指出执行戒严任务的都是孙文主义学会会员，尤以完全为其控制的第六团，表现得最为积极。这件事显系蒋氏的主动；但不少人有意无意的说成仅是孙文主义学会的非法异动。

据说汪精卫事前确毫无所知，事变发生后才由电话中得到报告，他曾愤而将电话挂断，一言不发，并从此再不露面。据熟知内情的人说，三月二十日后，汪蒋曾几次商谈，都未获得怎样处理这件事的结果。汪曾表示这种举动是要不得的；为党国威信计，他不能再干下去了。蒋虽形式上自请处分①，但认为一切均由汪的领导错误所致，汪应首先表示悔改。

至于这一事变发生的具体原因，似有下列各点：

第一是苏俄在广州的军事顾问季山嘉等在军事工作上所采取的方针与态度是使蒋氏发生反感的重要因素。他们主管军事委员会、参谋通讯、后勤航空、海军等业务，无论在见解、态度和生活习惯上，都易引起一个自负不凡的中国军人的不快。尤其是苏俄的政策是很重视冯玉祥的实力的。一九二六年二月间，冯玉祥与张作霖、吴佩孚作战的时候，季山嘉等曾冒昧的向蒋氏建议将他所统率的军队，由海道运往天津，支援冯玉祥，甚至要求蒋氏到北方去为冯玉祥训练干部②。这些主张显系不了解中国军人的观念；蒋氏这样一个要独创局面的人物，那会愿意屈居冯玉祥之下；他之会有苏俄不重视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和有意贬抑他个人地位的反感，是不言而喻的。

苏俄是否真有抑制蒋的意图则是一个疑问。季山嘉等与我从未谋面；但据我所知，已往他们都是依照鲍罗庭的指示行事，对外并不作政治性的接触。中共广东区委负责同志并告诉我，鲍罗庭和苏俄军事顾问们对蒋氏的尊重，是有过于汪的；决不会有贬抑蒋的意向。不过苏俄人过于重视冯玉祥的“首都革命”，亟谋改变北京政府的现状；以期中国革命能迅速发展，对苏俄的外交形势有利；因而竟天真的要求蒋介石到北方去发挥不平凡的作用。苏俄这些土包子军人在鲍罗庭走后，一下要担起折衷的重任，政治手腕过于笨拙，以致引起了蒋氏的反感。

第二是汪蒋间权力的冲突。据在广州的中共同志们的观察，汪蒋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因历史籍贯以及人事关系等等因素影响，显然是各成一格的。汪自接替廖仲恺任黄

埔党代表后，有时要与闻黄埔的事务，这就触犯了蒋氏独揽军权的大忌；加之鲍罗庭走后，在对俄顾问的立场方面、对国共关系、和处理军事财政事务方面，他们间的歧见渐深。这些事在旁观者看来，固然各有是非；但其主因，仍在军政两雄之不能并立所致。

第三是国共关系的恶化。上面我已说过，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在黄埔内彼此对抗，双方磨擦有增无已，据中共广东区委会的检讨，认为孙文主义学会的幼稚和偏见，固毋待论；但青年军人联合会工作上也发生了不少的左倾蛮干的偏差。不过蒋氏心目中并不相信一向支持他的中共和青年军人联合会对他会有什么异动，可是他对中共军队在各地国民党部和在工农群众中的势力日渐膨胀一点，不免侧目。而且中共自成一组织，在军中的党员并不绝对听从蒋氏的支配，尤使他大为不安。中共同志们觉得蒋氏这次行动所要反对的主要对象即使并非中共；事实上中共却成了代罪羔羊。

三月二十日事变由于上述的原因，如此这般的发生了；使广州的政局大为震动，汪系的人物认为蒋氏的行动是违反孙先生的既定政策，破坏国民政府纪纲的；因而要求抑蒋以便使汪能继任艰巨。当时国民革命军的六个军，除第一军以外，对蒋似有或多或少的不满。客籍的第二第三第六军有些将领，觉得如果失去了汪的领导，他们更不能获得与第一军平等的待遇。实力较雄厚的第四军原系粤军系统一脉相传下来的，更有“浙江人外江佬排挤广东人”的反感。一般说来，受到打击的汪氏是获得较广泛的同情；但

因汪已不露面，群龙无首，支持汪的人多意存观望，仅仅发发牢骚而已。

在广州的中共同志们，对这一事变更是愤慨良多。不少人要求联络各方势力，予蒋氏以反击。也有人责备广东区委专支持蒋介石，视黄埔为军事建设的中心，忽略了各军的平均发展，以致酿成今日的局面；当时在广州的毛泽东就有这种看法。恽代英等更认为这一事变证明中共在国民党内合作的政策，已宣告破产；亟应改弦更张。但一谈到目前应如何做的时候，同志中则多觉得现在并无足以领导反蒋的人，也没有可以挺身而出的实力者。如果要中共采取主动来抑制蒋，则不特力有未逮，对国民革命的前途也并不是合算的。

而且在广州的苏俄军事顾问们事实上已对蒋采取了让步政策；为蒋氏所不满的季山嘉已离开广州。据熟悉内情的周恩来和张太雷告诉我，俄顾问们是要等鲍罗庭回广州来设法亡羊补牢；当时俄共派来广州考察的依文洛夫斯基等十余人也于三月二十四日离粤回国，他们行前曾向蒋氏表示继续合作的意向。留驻广州的俄顾问们对蒋更表示恭顺，似是顺水推舟，促成蒋氏成为中国的拿破仑。

在这动荡不定的局面中，我只有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法，提出一个简明的方针来应付。在中共广东区委会紧急会议上，我曾报告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政治形势，决定采取妥协的政策；要求同志们一致遵行。对蒋应表示让步，同志们对外的言论和行动不可再有参差。我的这种建议获得了他们一致的支持。

接着，我由周恩来陪同去看蒋介石将军（时间约在我抵广州后的第三天），与他直接谈判。黄埔是我多次到过的地方，也在那里向学生们讲演过。这次旧地重游，有点今非昔比之感。蒋氏很客气的接待我；我们一面谈话，一面共进午餐。

我首先告诉蒋氏，我是代表中共中央特来看望他的。说明中共始终支持他，希望彼此仍能精诚无间的合作；使广东局面更加稳定，进而达成统一全国的革命愿望。蒋氏也表示了类似的意向。我进而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外间都希望他能与汪继续合作，不知他对此有何意见；二是黄埔同学中的中共党员一向是爱戴和服从他的，他们犯有错误，不知道他将如何教导他们。蒋氏对第一个问题，没有具体的表示；对于第二个问题则说："黄埔学生中的中共党员都是我的好学生，我素来爱护他们，一定要重用他们的。"我们的谈话在轻松气氛中结束。

我向蒋氏所提出的两个问题，原系广东区委会上所共同决定的。蒋氏素不愿意多说话，总是保持着一种好像身负重任的严肃态度。他那次谈话，至少明白表示了并无彻底排斥中共的意向。至于他对汪精卫的态度，原系国民党内部事务，我们觉得对汪有一种道义上的责任，要向蒋公开提出来；但也预料他不会有具体的答复。

我对蒋氏这次亲善访问，使彼此间的关系趋于和缓。在那次谈话后，他下令在黄埔内组织一个高级训练班，收容前此被调离职守的五十多个在军中任职的中共党员，并委周恩来为班主任。当时周恩来的地位是很尴尬的，他被

免除了黄埔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声望大受损失；但仍要在黄埔工作，日与蒋氏周旋；而且他的中共同志们对他也多所责难；认为三月二十日事变的造成，他要负相当责任。但这种处境，使他第一次历练了他的忍耐力，也表现了他的处事手腕。对于已往的一切，他从不加解释和答辩；他根据我们的决定，若无其事的在黄埔实施训练，并处处表现尊重蒋氏的意见。

当时广东的领导陷入真空状态，一切隐隐然似都得看蒋氏的颜色行事。但蒋氏究竟要做些什么，做到什么地步，似是任何人所不能确切了解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任国民政府代主席的谭延闿氏充当沟通各方意见的角色。他似不受国民政府日常事务的拘束，大部分时间都在与各政要人物周旋。他的这种活动确曾对时局产生了稳定作用。

谭延闿氏与我经常保持接触。我们假鲍罗庭的办公处为会面地点，张太雷代任主人。谭的政治手腕老练圆滑，他常滔滔不绝的安坐漫谈，除斤斤以大局为重外，不大接触实际政治问题，但就在他这种谈笑风生的谈话中，产生了调协作用。

那时谭延闿与蒋氏过往甚密，他常花几个钟头水程，到虎门去看蒋。有一次他一清早就去了，直到晚间才如约赶回来和我晤面。他显得很疲劳，向我说他在蒋氏住所待了大半天，竟没有看见什么人去找蒋。如果不是他去聊天，告诉蒋一些各方实际情况，将不知道蒋又要胡思乱想到什么地步。这些话出自深沉老练的谭延闿之口，其中自然包含了耐人寻味的内幕。

我和谭氏多次的接触，谈论的问题牵涉很广。我们曾谈到联俄这一基本政策。谭曾指出广东如得不到苏俄军火的援助，国民革命将成空谈。蒋氏之不会放弃联俄政策，我们似也不难从谭的这句话中获知梗概。谭氏还进而说到鲍罗庭是善于处理这一问题的，各方都在等候鲍的到来。谭氏对于联俄政策所具多方面的意义，有淋漓尽致的发挥，我也曾向他表示，相信鲍罗庭对蒋的友谊是不会改变的。我们这种相互的阐明，似澄清了当时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猜测。

我们谈到国共关系问题时，我曾向谭表示不希望孙先生所定的联共政策会走样子。谭氏似乎要安慰我，说蒋氏在这个问题上，已在回心转意。他又坦率的说到也许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不免要吃一点亏；例如中共党员甚至左派人物不好再在第一军中工作，但仍旧可在其他各军中工作。各军均缺乏精干人员，一定会欢迎原在第一军的工作者来参加。他并向我保证，他所统率的第二军就能这样办。其他如党部工作，他认为如果蒋氏要换几个新人进来，也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中共和左派所领导的民众运动没有人能够代替。

谭氏在这个问题上，似也不愿多负责任。他用轻描淡写的口吻说："张静江是唯一能为蒋氏出主意的人，不妨找他谈谈。"但我为了尊重谭氏，并未照他的话去做。我们相约要求一般同志少发牢骚，以顾全大局。我向谭氏申述广州市内一切掀风作浪的事，都与中共无涉；中共党员是能遵守纪律的。谭氏在这些问题上向蒋氏及其他有关方面所

作的解释，对于当时误会的消除，不无相当作用。

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领导问题，也是我们谈论的另一主题。他曾指出汪蒋再合作是有困难的；汪既不愿再干下去，旁人也不好强人所难。我也向他说明我们在道义上是支持汪的，但并无拥汪抑蒋的意向，而且这是国民党内部的事，我们也不愿卷入漩涡。

谭氏对此问题十分关切。他坦率的说，广东这出戏，不能是军事独脚戏，总少不了一面政治招牌；现在有六个军，如果没有一面政治招牌，更是难于统率的；而且广东这个地方，也不好完全由外省人来掌握一切。他更进而具体说明：汪既不愿再干，有些人知道胡汉民快要回来了，有意要抬胡出来。提出这种主张的人想到胡是从莫斯科回来，对联俄容共的政策，自会有深一层的了解。

这是关于国民政府领导人的问题，我不便表示态度，以免惹是生非。我只问谭氏，他个人对于这些设想的意向如何？他曾指出这要看胡回来后所持的态度来决定。他预料胡系人物要抬胡再度出山，也是困难重重的。他引证蒋氏最近曾将孙先生生前所给他的信件，公开给人看，其中有“今之革命委员会……此固非汉民精卫之所宜也……”③一段；这就暗示出蒋也不满胡。谭氏所说的这些话，也许不过是传达胡派的意见，来试探我。我既不置一词，谭也就表示：他是局外人，不过谈谈而已。

敏感的谭延闿氏渐渐觉得蒋氏可能自觉羽毛已丰，要一不做二不休大权独揽。他曾以闲谈方式说到中国的拿破仑，究竟会做出一些什么来，对国民革命会有一些什么影

响，神态中颇表忧虑之态。任主人的张太雷也从旁说到，一九二三年他陪同蒋氏访俄，参观拿破仑攻俄的史迹时，蒋无意中曾流露出以拿破仑自况。“蒋介石与拿破仑”一时就成了我们间的有趣话题。谭延闿氏对于当时这种形势的发展，自然多少感到不快，但我想他决不会有逆水行舟的勇气。

今非昔比的蒋氏要扶摇直上的意向，最初似也未为张静江所觉察。张静江这个半身不遂的中年人，精于计谋，是蒋介石将军结拜金兰的大哥。三月二十日事变后，为蒋氏特别邀请来到广州，住在蒋氏东山住宅的对面。他虽从未对外露面，却是人所共知的幕后人物。我在谭延闿氏要我与他接触之前，曾登门作过一次礼貌上的访问。他曾向我说到第二次代表大会时，他来到广州。广州朋友向他所说的话，都是一派乐观的看法，使他这个从外省来的人摸不着头脑。他那时颇有疑虑，不料竟发生了三月二十日的事件。他进而指出，这就证明广州的领导并没有把事情办好，现在只有让我们从外省来的人，以客观公平的态度，来加以调整；从根本上来解决一切纠纷。从这些话表现出他颇有自命不凡的气慨，也许他还没有完全体会到蒋氏所企望于他的真意。

我照例对他表示推崇；并请教他所谓从根本上解决纠纷的方针将从何着手。他避而不答，像天机不可泄露似的，也许有些事他还没有与蒋氏商妥，不能随便表示；他以身体不好，作为他闪避答复的藉口。他究竟不是政治上的正式负责者，我也不便多找他。有时只托谭延闿氏向他转达

我的意向；不用说，大多是毫无下文的。谭氏曾告诉我张静江并不完全明了广东情形，而且城府很深。他的这些评语，似多少道出当时外间所传张氏乃属老朽之流，并曾受西山会议派的影响的真确性。

一般说来，几频破裂的国共关系终于渐渐缓和下来了。这固然由于反共时机尚未成熟，也由于我这个中共发言人坚守调协政策的立场，和其他中共同志们对外态度的一致，表现出一种不可轻侮的潜在势力，以及国民党内也有一部分人如谭延闿等因为不愿改变既定政策，从中疏解之故。三月二十日所造成的险恶局势，因之又现出柳暗花明的迹象。

当时蒋介石将军在黄埔所发表的演说④，除指斥任黄埔主任政治教官的高语罕曾影射他为新军阀之不当，以为他所采取过的行动辩护外；又说明整个事件与中共政策无涉；中山舰事件与中共无关。他也曾表示反对西山会议派，以示他的行动并未受右派的影响。此外，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同时被撤销，也似乎显示他并无偏袒任何一方的意思。

接着四月十四日，被视为事变主角的李之龙释放了；而在三月二十日曾积极行动并任海军临时总指挥的欧阳格，却被通缉；更似是洗刷了中共方面的责任。这一切的一切，最少证明蒋氏不愿再为已甚。

在广州的中共同志们，并未因退让措施而气馁；相反的，他们仍积极的展开活动。原定该年五月一日在广州举行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第二次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

均在积极筹备之中。省港罢工委员会及其所属的纠察队（其被缴之武装不久即已发还），仍照常执行封锁港口的任务。接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也认为罢工工人活动对政府的财政收入仍有积极贡献。各县的农民协会会员人数续有增加，与地主间的武装冲突，在中共约制之下，亦显得减少下来了。

在这种形势之下，国民党内领导权的争夺似成为时局发展的焦点。而胡汉民突于四月下旬由莫斯科回到广州；他恰于此时到达，谣言纷起。胡派人物纷传胡将再度出山，要造成胡蒋合作的局面；并扬言将大举反共。

可是蒋胡之间有过的裂痕似不易弥补。据说胡汉民曾在黄埔与蒋氏晤谈，其内容究属如何，不为外间所知；但胡迄未公开露面。这就使当时一般反共英雄，大失所望。

四月二十九日鲍罗庭回到广州（大约稍后于胡汉民的到达）。他在黄埔下船，首先与蒋氏晤谈。我知道了这个消息，就在他的办事处候驾。我和他又重新聚首。他以不安的神情，叹息着他离开此地不过三月，局面竟变得这样糟糕，真非他始料所及。

他告诉我，刚才蒋介石将军曾向他转述胡汉民的话，要蒋不再信任鲍罗庭，并将鲍扣留起来。他说完这些话，向我摇摇头耸耸肩。接着表示他固然不相信他真会被扣留，但他却觉得他的好朋友蒋介石将军居然藉胡的话，向他来一次下马威，这使他不无今非昔比之感。

鲍罗庭又向我指出，广州局面能否恢复旧观，他实在没有把握；只有做到那里算那里。不过这次莫斯科倒很尊

是他一贯的革命口吻，但三月二十日的阴影犹新，与会人员的情绪，并不如何热烈。

当时一切重要政治问题，都由蒋介石、张静江和鲍罗庭三巨头秘密商谈进行；即一向居间的谭延闿似也没有参预其事。鲍公馆门前的盛况，已大不如昔。从前各要人都来他这里求教，现在他却要移樽到半身不遂的张静江的行馆，向蒋介石、张静江请示。

大约是五月二日，鲍罗庭约我再度会谈。他称许我过去一段期间的言论和行动，认为是恰当的，同时收到了挽回时局的实效。他表示将遵循我的路线前进，并希望我多方面配合。

鲍罗庭口头虽然这样表示，但事实上他与我的想法并不相同。他的首要着眼点，是要弥补苏俄与蒋介石关系所曾造成的缺陷；至于国共关系和汪精卫的去留似都成为次要的了。他将三月二十日事变的责任，推在中共中央身上；以挽救他和莫斯科摇摇欲坠的威信。他的这种方针，支配了他此段时期的一切行动。

在我们那次会谈中，鲍罗庭曾分析三月二十日事变发生的原因。他表示蒋介石将军不过是一个中派，孙中山先生本人也只是一个中派；都同样具有强烈的反共意识。即使孙先生健在，也要采取某种步骤来限制中共的活动。他这种说法我觉得是有疑问的。我问他是否认为三月二十日事变，是绝对无可避免的？又是否认为中共在国民党内合作这一政策，必然要碰壁？他似乎无法自圆其说，因而改口说："孙中山先生在世，如果要限制中共的活动，大概不

会采取三月二十日那种方式。”

鲍罗庭转而向我直接表示：现在的中心问题是俄国人会不会被逼离开广州，他引证香港方面的宣传，如“广州当局要驱逐当地所有俄国人”、“实行分共”等等传闻。胡汉民也确正式提议过要将他扣留起来。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帝国主义者和右派人物，正处心积虑要将中、苏和国共之间的关系加以破坏。

鲍罗庭根据当时情况，认为如果我们的处境，并不象帝国主义者和右派分子所希望的那样恶劣，就应该设法弥补，即使是权宜之计，也算是我们的胜利。他坦白表示，莫斯科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支持中国国民革命，并已与国民党建立了友好关系；如果因三月二十日的事变而有所损害，莫斯科对内对外，都将无法交代。因此，莫斯科一直是在设法冲淡这一事变的严重性，期望我们能设法挽救。

鲍罗庭这些话道破了当时他自己和莫斯科处境的尴尬；他除了又一次大耍手腕之外，似乎再没有甚么真工夫了。我以同情的态度问他有甚么高明的办法，他想了一想回答说：“现在说空话是无补时艰的；惟一可以指望的东西，是我口袋里还有一些草。”我笑着问他：“请问鲍顾问口袋内这次带了多少草来？你这样措词，不怕引起人家的反感吗？”他对我笑笑，并不置答。

在我们那次谈话之后，鲍罗庭展开行动了。他首先采取打击中共中央来重建他个人威信的手法。他约集中共广东区委会全体委员举行会议，在会议上他发表了演说，指摘中共中央前此所采取的退让政策之不当。他说明一九二

五年底中共中央在上海与国民党孙、叶、邵等会谈所达成的协议产生了不良影响。这些行动给反共的国民党人士作了一种暗示，使他们觉得，即使他们对中共采取反对和压抑的措施，中共也会逆来顺受的。这间接鼓励了三月二十日事变的发生。

鲍罗庭这种分析，意图将酿成三月二十日事变的责任，归咎于中共中央的“退让政策”。至于现在他所要采取的退让步骤，则辩称是不得已和暂时性的。他还声明这只限于过去经验的检讨，并非根本反对中共中央的领导；并特别要求广东区委和我密切合作，以期一致应付当前的局势。

鲍罗庭的言论，获得广东区委多数同志的支持。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我曾当场重申中共中央联络中派孤立右派的一贯政策，并指出此一政策并非为导致三月二十日事变的真正原因。但广东的负责同志多以不宜广泛讨论为理由，将我所提出的问题搁置下来。会后，张太雷向我解释，道出了鲍罗庭在这一件公案上所运用的苦心。他说三月二十日事变的发生，不能说是绝对不能避免的，但我们自己（指共产派全体）至少也有部分责任。如果归咎于莫斯科的政策或者俄顾问的作为，在国际上将有极恶劣的影响。如果说是由于鲍罗庭的错误，他亦将无法继续工作。只有说成是由于中共中央某一短暂时期的措施有所偏差，才是牵动不大的交代。

鲍罗庭的手法，确收效于一时。原陷于动摇中的鲍罗庭的地位和广东区委的领导因而得以暂时稳定。

当时在黄埔任重要职务的周恩来是难于诿卸责任的；

他在会议上噤若寒蝉；现在有了鲍罗庭这种金蝉脱壳的解释，似是满身轻松了。毛泽东素不满意鲍罗庭和广东区委的做法；他在三月二十日事变后，摆脱了在国民党中央所任的宣传职务，专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也没有参加那次会议。他在获悉内情之后，曾向我说鲍罗庭这个洋鬼子居然玩弄这样的政治手腕。对于我和其他同志的任劳任怨，颇表同情。但他自己则始终不愿卷入漩涡，只是袖手旁观，似也从中吸取了不少经验。

我当时觉得鲍罗庭指摘中共中央的理由，不能成立；而且有乖道义。但我体念当前的艰巨，决定暂时容忍。不久中共中央知道了事情的经过，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这种不计是非迁就权势的做法，竟是遗患无穷。后来斯大林在武汉政府所招致的失败，居然又一古脑儿推到中共中央身上，真是所谓是“一以贯之”的“夫子之道”了。如果我们这些中共中央的负责人当时能有远见的话，不计成败，据理力争，也许以后的发展会为之改观。

除此之外，鲍罗庭当时对我所说的话，也是耐人寻味的。

我们谈到国民党领导问题，鲍罗庭表示汪的性格他已向我道破，现在汪既不露面，别人也无可如何（据说汪亟谋与鲍罗庭一谈，但他们是否会面，及其所谈内容如何，鲍罗庭迄未向我透露）；至于胡汉民的企图，他认为决计不会成功。从他这种口吻，不特可以看出国民党领导权的转移，似已确定了；而且转移谁属，也不难想像了。但他对领导权转移后的国民党的前途，则不愿作任何的推测。

果然，在五月十五日国民党中央会议举行的前夕（据说是五月九日），汪精卫与胡汉民都悄悄的离开了广州。最巧合的是他们两人竟不约而同的在一艘轮船上碰了头⑤，这件事一时成为广东要人们的话题。有的就说："冤家路窄，竟然同舟，不知他们在船上晤面，有何感想？"有的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两位大人物争着做主席，现在同时被人放逐，后起之秀，却能逐个击破，走上领导的宝座，真是活报应！"

鲍罗庭描述在广州的俄国人地位之时，也颇有洋洋自得之态。他直率的说："中国是一个无人地带。"并说历来外国人到中国活动，虽受到折磨，但凭他们的冒险精神和应付能力，收获颇为可观，为甚么俄国人不会有同样的机会呢？这些话触犯了我的民族自尊心，曾斥责鲍罗庭离开了革命的立场，瞧不起中国人，颇有殖民主义者的气味。他只是笑笑，不加答辩，言外之意似乎是他为了保全俄国的利益，顾不得中国国民革命的前途了。

苏俄一艘载运军火的轮船驶抵黄埔，立即轰动一时，苏俄的军火到了，蒋又将联共来压制反共派了，种种议论在各处流传着；甚至还有人说，五月十五日国民党的中央会议，将公布实行共产。此外，还有加仑将军再度来粤，重任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的消息，真是谣言满天飞。鲍罗庭当时之踌躇满志是不用说了，他口袋内的"草支票"似乎已经兑现了。

我深深觉得鲍罗庭当时的政策，将会陷中共于不利之境；因而我问他："国共关系会有怎样的变化？"他答道："坦

白说来，中共似乎是命中注定要做中国革命的苦力。”我又问他：“是不是你愿充当管理这些苦力的工头?”他回答：“有人确实如此希望，但我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不会担任这种不名誉职位。” 鲍罗庭的“中共是中国革命中的苦力”这一句话，从此成为人所共知的“名言”。

与当时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员一样，我不甘心只充当中国革命中的苦力，我向鲍罗庭郑重提议，苏俄政府既可以将大量军火供应不可靠的蒋介石，为何不直接供应一些给中国工农？如果苏俄政府愿意这样做的话，中共可以经过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所控制的港口，协助解决运输上的困难。我还进而鼓动鲍罗庭，说以他目前的退让措施，既自诩其本质与中共中央的退让政策有别，是暂时性的，同时也是进攻性的，是注重土地革命的；但如果不给农民以武装，则所谓暂时的、进攻的、土地革命的原则，都成了废话。鲍罗庭考虑了一阵，拒绝了我的提议；认为目前决不可能，等时机成熟，再作计议。

一般说来，共产党人不作无目的的退却。即使事实上在执行退却政策，也要坚称以退为进的借口；因为赤裸裸的退却，会被认为是机会主义者。鲍罗庭当时所做的，正是如此。这还不算，他竟将“不肯进攻”、“不注重土地革命”等大帽子，反扣到中共中央的头上。后来斯大林之批评陈独秀先生的机会主义，就是受鲍罗庭的影响。鲍罗庭在紧要关头，拒绝了我的武装农民这一建议，也足以证明斯大林的批评无论如何是过分了。

在此时期内（即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以前的五月上

旬），一切重要问题都在蒋、张、鲍三巨头秘密商谈之中。鲍罗庭遵守三巨头之约，不向我吐露实情；他向我说的话，大多是闪铄其词的。我为此深感不满，曾表示要先行返回上海，以示不与鲍共同负责之意。鲍罗庭总是要求我信任他，申言决不会把事情弄糟。

到了五月十四日下午五时左右，鲍罗庭找着我和谭平山，要我们立即去访问蒋介石和张静江。他说明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明天就要开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外间谣言甚多，主要是传说中共要发动示威游行，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决议。蒋介石对这些传说甚表关切。鲍罗庭希望我们向蒋、张表示，对次日的会议内容并不知情，所以也说不上赞成或反对；并表陈中共始终维护国共合作，亦决不会作公开反对之举，如果翌日广州市内发现有反对该次会议的传单标语或其他行动，完全与中共无关。

鲍罗庭此一建议，使我和谭平山都感尴尬。谭平山是任国民党组织部长的中共党员，一向是亲汪精卫等左派人物的。在三月二十日以后，并未与蒋有所接触，一直保持缄默。他听了鲍罗庭的话，苦笑不语。我则表示广州市确有破坏国共关系的谣传，人们早已知道与中共无关。现在我们只知道有个党务整理方案将提出讨论，但详细内容并未与闻，而反要我们先去向人表示决不反对，以示忠诚，未免太过抹煞中共的地位了。后来，经过鲍罗庭的再三劝说，我们终于应允了。

当时八时左右，我和谭平山驱车前往东山，访问蒋介石将军，我们依照鲍罗庭的要求，向蒋表示中共对国民党

这次会议所采的态度。蒋氏色然而喜，频频表示欣慰，当即陪同我们去看张静江。我们又把来意重述一遍，张静江也显得非常高兴，认为这样好极了，大家能够相忍为国，革命成功当指日可待。

那次晤谈，在和谐气氛中结束。但谭平山的心情颇为沉重，在归途中一言不发，他似已预感到他将在翌日讨论党务整理方案会议被整肃掉；而这个面临被整肃的命运的人，竟要先去拜会他的政敌，笑脸相向，这滋味究竟不是好受的。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国民党第二届第二次中央全会在戒备森严中揭幕。会议所要达成的任务，是在准备北伐的名义下，通过党务整理方案，调整国共关系；确立国民党的领导权。蒋介石从此步上了权力的极峰，军权高于党权的作法也由是开始。

党务整理方案⑥的主要内容规定：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员对三民主义不得怀疑和批评；跨党党员不得任党中央部长，任高级党部执行委员亦不得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设立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共产国际所给中共之指示和中共中央对在国民党内之中共党员所发的一切训令，均须交由联席会议通过；在国民党内共产党员的名单应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以及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等等。在中共看来，国民党所采取的这些办法，绝非如人们所说的由“容共”到“联共”⑦，其用意无宁是限制中共的发展，打击中共之独立存在。

会议上撤销了汪精卫的领导权，名义上是由张静江代

替，实权则落在蒋氏的掌握中。在蒋介石将军的提议之下，原任监察委员的张静江获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谭延闿接替汪精卫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国民政府主席，蒋氏本人则接替谭平山任中央组织部长。这些改革都是蒋氏一手促成的，也许形式上经过蒋、张、鲍三巨头的密商。

中共党员之出席会议者，如谭平山、林祖涵等采取了保留的容忍态度。他们声称自己不能作主，须待中共中央处理。

可是国民党内部的纠纷也在那次会议上暴露了出来。五月十九日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时候，第四军军长李济琛发问："没有到会的人也可以当选吗？"任会议主席的张静江只好答复："当然可以。"于是李济琛便在选票上写了苹果一样大的"胡汉民"三个大字，就退席了。这件事引起了广州要人们的各种议论，有的人说："李济琛不满蒋介石的跋扈，原想选汪精卫，但恐引起冲突，因改选胡汉民，以示不屈服。"有人说："第四军广东系统的人物不满浙江系⑧的横蛮，市上所发现的反对浙江系的标语都是他主使的；李济琛之选胡汉民，可予证实。"李济琛与蒋介石之间的芥蒂，大概也由此次事件开始表面化了。

党务整理方案公布以后，广州的中共同志无不万分激愤。有的说："鲍罗庭被绑票了，张国焘、谭平山做了投降代表。"有的说："为何不主动提出改变国共合作方式，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合作？为何不退出国民党？为何要被动的受处罚、被整理？"

鲍罗庭当时也不愉快；但他故作镇静，作种种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他说："我们没有被驱逐出广东，那就显示我们仍有胜利的机会。只此一点，就可证明我们的处理方针并不算是完全错误的。"

他还透露五月十五日会议那一天，居然有罢市的传言；中央银行曾发生挤兑事件；"实行共产"和"杀共产党"等类谣言，不胫而走。他认为这种情形反映出反革命派之蠢蠢欲动的迹象，军事当局（指蒋介石）似乎箭在弦上，说不定又会发生第二个"三二〇"事变了。幸而我们有先见之明，一直静观其变。事先又与蒋、张获得谅解，在会议中也未发表反对言论，是以我们并没有坠入敌人的陷阱里云云。

他又指出右派并没有占到便宜，他自己没有被扣留，而主张扣留他的胡汉民倒再被放逐了；阴谋捣乱的吴铁城也被拘禁了；和香港勾结的伍朝枢更自动离粤了；西山会议派的人物也不能插足于广东。这一切都证明受到重大打击的不是我们。他又透露，据他所知右派人物都对那次会议表示失望。又称，会议宣言中既明白规定要团结一切革命势力，与反动派奋斗，我们大可据此发挥一番，鼓动国民党继续往革命方向推进。

当时不仅国民党右派感到失望，国民党左派也是愤愤不平。但左派的观点与中共同志的看法究有若干距离；他们有人认为如果汪精卫能贯彻国共合作的精神，抢先提出完善的党务整理方案，也许不会闹到今天这个样子。他们多数人所注意的是党权问题，有的人说："汪精卫被撵走了，

党权也破产了，现在是军人天下。”鲍罗庭这个鲁仲连对于这些愤恨难平的左派，也是抚慰有加。

鲍罗庭不赞成多数中共同志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因有违共产国际之意旨。中共既然加入了国民党，现在决不能一无所得的撤退出来。他肯定地说：“国共是要分家的，不过分得愈迟愈好；北伐打到北京的时候，可能便要实行分家；现在应继续容忍合作。”

鲍罗庭认为中央不必重视此一党务整理方案，除了其中规定中共党员任国民党高级党部委员者，不得超过全数的三分之一，以及不得任中央部长等是中共所受的实际损失外；其他如交出名单和审查中共对党员的训令等，只是国民党的片面决定，中共中央可以在将来的联席会议中，提出异议。

鲍罗庭知道我快要回上海去，要我将他的建议转达中共中央。他主张用拖延手段来对付国民党所要求的联席会议，如果不能拖延，中共中央应派代表来广州参加。他还说：“广州的政情你多身历其境，不用说你将会是代表之一；如果是的话，不妨先来一步，先试探行情。如果国民党真要举行联席会议，其他的中共代表再行赶来不迟。”

谭平山当时愤慨的向我表示，他是老同盟会会员，蒋介石如此专横，中共又如此忍让，他不要干共产党了；他要用老同盟会会员的资格，联络实力派李济琛以及广东的老国民党员，公开与蒋介石和浙江系对抗。在谭平山的要求之下，我陪同他与鲍罗庭密商。鲍罗庭在谈话中，又无意中流露出他的另一意向。

鲍罗庭对于谭平山的意见，不特没有表示出任何反对，他问谭平山："你有甚么办法联络李济琛？"谭平山进而表示如果我们不反对他的主张，他可试探。鲍罗庭至此再也不掩饰他对蒋介石、张静江的反感；他指出国民党内部纠纷很多，尤其是顽固的张静江，的确使人厌恶；如果有人反对他，也是理所当然。

这表示鲍罗庭对于蒋、张，表面虽极尽忍让之能事，实际是企图利用国民党的内部矛盾；从反对张静江下手，来改变既成局面。从他此后一切行动来看，亦是如此。至于谭平山联络李济琛的工作，似未收到显著成效，也许是李济琛反蒋而不亲共之故。谭平山不久就离开广东，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举行的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斯大林倒很重视他，似有让他代替陈独秀领导之意，也许就是他这种"联甲倒乙"的主张为斯大林所欣赏的原故。

三月二十日到五月十五日这段期间广州的一切发展，是国民党削弱苏俄控制，打击中共气焰，强化资产阶级的领导的一种过程；中共似应改弦更张，另谋出路。

我向鲍罗庭表示，他的"中共命定要做国民革命的苦力"、"不能空手退出国民党"、"团结一切革命势力"和"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等等想法，不免吃力不讨好。我建议中共党员应逐渐退出国民党，转而注重工农群众工作的独立发展，不介入国民党内部纠纷。鲍罗庭讥笑我这些想法为"退却步骤"，他认为如果在五月十五日以后，即行退出国民党，是经不起打击的示弱表示。

我没有坚持我的意见，根本原因是我当时自信不够。我心目中仍相信鲍罗庭是比我见多识广的老手，有神通广大的共产国际做后盾，不好将他与马林等量齐观；只有回到上海中共中央去，再作详细的研究。同时广州一般的中共同志们也催促我从速返回上海，商讨今后发展的全盘政策；因而我于五月下旬又匆匆的告别了这个是非之地的广州。

①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蒋介石曾提出自请处分的呈文，全文见《革命文献》第九辑第八十六页至第八十七页——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民国四十四年版。

② 蒋介石在汪精卫将离粤时，曾致函汪精卫提及此事（原函见《中国五大伟人手札》第二四六页至第二五三页——上海大方书局民国二十八年再版）；后来，我记得陈独秀先生也向我这样说过。

③ 这是孙中山先生在民国十三年（未注明月日）自广州大本营致蒋介石的一封信里说的话，全文见《中山全书》，历年书札集第四十二页——上海光华图书公司版。

④ 蒋为这件事在黄埔的讲演全文，见《革命文献》第九辑第八十七页至第九十四页。

⑤ 据汪精卫在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八日覆林柏生的一封信说："鲍罗庭……胡汉民……于四月底始回到广州，那时我已离国了。"（全文见《中国五大伟人手札》第三〇八页至三二二页）这也许是他的记忆失实。汪与胡同船离粤的事，是曾经到船上送行的一位朋友告诉我的。《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十二号）也记载汪胡同在五月九日秘密离粤。

⑥ 党务整理案共成立了四个决议案，目前坊间书籍，很少录载全文，即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所编辑的《革命文献》，也只载了一部分，比较录载多一点的，要算《张溥泉先生全集》，札记栏第四二〇页至第四二二页——民国四十年台北文物供应社版。

⑦ 由于党务整理案中有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当时有些国民党人士就认为

这是“容共”变为“联共”的政策；其实这只是表面的浮泛之谈。

⑧ 蒋介石张静江均为浙江籍。

# 第 三 章

# 北 伐 的 前 奏

北伐原是孙中山先生的传统政策，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向北进军，削平军阀以统一中国。蒋介石将军继承总理遗志，以实行北伐相号召，虽一方面振奋了国民党的革命精神；但另一方面，因为没有像孙先生那样的人望，使人觉得他只是在乘势建立个人的军事独裁统治；这也就是后来革命阵营分裂的根源。

我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底返沪以后，即获悉中共中央已接到共产国际指示，明确训令不可退出国民党①。证明鲍罗庭的建议已获得斯大林的支持；那时的威金斯基只是奉令行事的人，不敢有任何异议。陈独秀先生和我虽曾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痛陈必须退出国民党的利害得失，但讨论结果，我们大多数人仍不得不主张遵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我们再三计议，决定了应付国民党的方针，即团结左派，抑制蒋介石和打击右派。我们认为经过三月二十日事变，国民党左派固然暴露出它的脆弱性，但仍拥有可观的潜势力。我们同情左派希望汪精卫能东山再起的愿望，而且事实上没有了汪精卫也无法团结左派。我们这种尊汪抑蒋的想法，也不过是在于使军权不致过份提高，避免右派

利用军人作怪，当时还没有根本反蒋的意思。

我们对国民党要求组设两党联席会议的事，接受鲍罗庭的建议，不予重视。如果国民党提出正式的邀请，我们决派代表前往广州出席，但主张会议必须有建设性，不必斤斤计较两党的利害得失，而应以两党今后如何密切合作为主题。中共中央并推选瞿秋白、谭平山和我三人为将来出席联席会议的代表。

跟着我们接到中共广东区委会的信，报告张静江已口头通知邀请中共代表前往出席联席会议。因而中共中央派我先到广州去，与国民党中央商谈联席会议举行的程序问题。我在上海仅仅停留了约一个星期，又匆匆的在广州市出现了。

小别后的广州，有了显著的变化。北伐的声浪在各处洋溢着，两党的联席会议似并不为人所关怀。据陈延年告诉我，除张静江曾口头提过以外，此后并未再接到国民党中央的书面邀请。鲍罗庭也说，没有人向他提过联席会议。我访问谭延闿，他表示："现在人们所注意的是北伐，联席会议的事没有人再提了；这个会议如果举行，那里会从两党积极合作方面去着手，必然又是为一些纠纷问题争吵一阵。"他并建议我不必为此事去找张静江。两党联席会议就这样胎死腹中了。我也乐得不再闻问，暂时住在东山那幢花木扶疏的住宅里，享享清闲旅客的清福了。

一般人对北伐寄予莫大希望。国民党人士尤为乐观，似乎革命成功指日可待；中下级军人更在那里磨拳擦掌，要在挥军北进中一显身手；工农群众也寄望藉此解脱多年

来北洋军阀的压迫；商人和市民也为北伐而高兴，因为广东的军队北上了，他们的负担将可减轻。

少数军事首脑对北伐却怀有不同的打算。也许广东人的排外心理是较浓厚的，使外籍的“英雄”总觉得广东并非用武之地，如果能回到长江下游的本土，或可建立霸业之基。有些广东籍将领则不免想到如果这些外省“英雄”，到省外去打江山，他们就可成为广东的真正主人了。大多数客籍将领都觉得到外省去打天下，可解除现在苦闷而获得发展机会。因此，“北伐”的代名词，是“向外发展”，向外发展此一政策，既可减轻内部矛盾，当时北方政局混乱也使人觉得北伐时机不可错过。

广东统一之时，蒋介石将军即不同意季山嘉派兵到北方去支援冯玉祥的主张，而提出了从速准备北伐的要求。是故国民党的领袖们一早就开始了准备工作。一九二五年冬，由于汪精卫与广西军事领袖李宗仁的联系，李宗仁于一九二六年二月间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从此不仅两广统一，也增加了北伐的资本。

前此孙中山先生北伐，赵恒惕所统治的湖南往往挡住他的去路。现在情形变了，湖南有一部分军事实力自愿为北伐开辟道路打先锋。驻扎在湖南的唐生智师（系赵恒惕部第四师师长），早与广西军人互相联络。一九二六年二月，唐生智进兵长沙，逐走了亲吴佩孚的赵恒惕，并继之为湖南省长。后因统一全省军事问题，原隶赵恒惕部第三师师长叶开鑫不愿就范，并勾结吴佩孚派兵入湘增援，战斗结果是唐部不支；于四月二十四日退守衡阳。唐向两广

告急，希望派兵援助。五月间李济琛的第四军和李宗仁的第七军各一部先后入湘应援，唐生智本人也于六月二日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的职位。这样，北伐在事实上已经是开始了。

与此同时，北方军阀的内部纷争，也使他们陷于强弩之末之境。冯玉祥的国民军虽被逼向张家口包头退却，北京的段祺瑞执政政府却于四月九日被国民军所推倒了②；盘据关外的张作霖和以京汉线为根据地的吴佩孚以及握有东南五省地盘的孙传芳正互相角逐。吴佩孚大部分的兵力北移，湖北防务顿显空虚；他本人驻在北京附近的长辛店；在政治上与张作霖争夺北京政府的操纵权；在军事上则以对付冯玉祥为第一目标；他当时似低估了两广的北伐力量，以为在赣闽有孙传芳的实力，在湖南有他所支援的叶开鑫，就足够应付了。

随着北伐准备工作的进展，蒋介石将军的权力也随之膨胀。六月五日，国民党中央通过了出师北伐案，并任令蒋氏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总司令的权力是高于一切的，甚至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事实上都成为总司令部的附属品。接着在七月五日，他被任为国民党军人部长，拥有代表国民党中央任免各级军事机关党代表的全权。六日，国民党中央全体会议推选蒋为中央常委会主席，在出师北伐期间，由张静江谭延闿分别代理中常会党务政治两会的主席③；七日又颁布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部机关，均须受总司令之指挥④。这样，他就成为名符其实的最高首脑。

蒋介石将军虽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但他究竟是个军人，他以指挥军队的方法来指挥一切；似未注意到政治经济外交司法以及社会等等问题，不是以命令方式所能完全解决的。军队的需求，还可以倚赖印刷机，多印制些军用票之类的纸币。其他政治、经济、外交等等则不如是简单。他似不重视北伐政纲的详细规划，以为一切听令行事就够了。这些事当时曾引起鲍罗庭的不快，认为是破坏了他前此所建立的一些成规；这也许就是蒋氏此后成败的一个主要因素。

蒋氏自三月二十日以来所倡导的风气，也使国民党开始变质。一般青年国民党员所抱的革命理想和信仰，似已开始低落；代之而起的是名利权的观念。上面的领导者强调服从；而服从个人的标准是无条件的，只要有人事关系或者经得起恩威并用的磨折，不管他对革命有无贡献和能否贡献，就都可以擢升的。风行草偃，个人前途的重要性就渐渐超过一切了。

蒋氏在准备北伐中，开始就与共产主义者发生了矛盾。重返广州任军事顾问的加仑将军，主张北伐有较长的准备时间。他根据敌我军事力量的对比，认为立即北伐，打到武汉或可操胜算；但要一气打到北京，似乎力有未逮。因此应有一准备时间，从各方面来充实自己的力量，在战略上是合算的。加仑将军的客观分析任何人也无法加以反驳。但蒋氏所注重的是北伐时机不可失，坚持从速挥师北上。

鲍罗庭对于蒋氏在此阶段中的所作所为，也有许多不

满。他那时已不再是甚么“导师”，而只是“顾问”了。他比较清闲，也有点苦闷。他曾向我说到，他除同意加仑的军事见解外，认为在政略上蒋氏也多欠考虑。他主张北伐应循粤汉京汉线北进，将当时被困潼关以内冯玉祥的力量接应出来，掩有西北和西南广大的领土，以便再与沿海一带帝国主义的势力相周旋。他不赞成蒋氏向长江下游东南各省发展的想法，认为会过早的与帝国主义发生直接冲突。鲍罗庭的这种观念，是他后来在武汉时期所提出的“西北主义”的张本。这似是利用了土耳其革命改都安格拉的经验，也含有为苏俄利益着想的成份。

北伐应循粤汉京汉线北进，抑或向沿海东南各省同时发展，是鲍罗庭与蒋氏间的主要冲突。当时蒋氏似已秘密委托他在广州和上海的朋友们，设法与英、日等列强接触，鲍罗庭对此已微有所闻，但蒋氏讳莫如深。蒋氏不重视鲍罗庭所谓避免过早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的意见，似也露出了他的外交政策将有转向的迹象。这在鲍罗庭看来，如果修改了或取销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那简直就不是国民革命了。中共在广州的同志，认为北伐不仅是军事行动，还应该是革命政纲的实现。他们认为巩固广东根据地和实行北伐应同时并重；仅株守广东，固非所宜；但因北伐而损及广东的巩固，也属不智。中共这些见解，国民党部分左派人士也有同感。

一般说来，广州的中共同志对北伐是积极支持的。五月初，中共党员叶挺所统率的第四军独立团出发入湘的时候，我曾极力予以鼓励。叶挺原系粤军系统的中级军官，

是当时中共党员唯一握有军队者，而其中共党籍又未为人所觉察。在三月二十日以后，中共曾秘密调了四十多名军人党员，去充任该团的中下级干部，因该独立团是中共可幕后控制的；也是后来中共军事的资本。我曾召集该团的中共党员举行会议，鼓舞他们英勇作战；筹了一笔可观的经费，为他们作补充弹药刺刀等军需之用；我还指示他们如何与各地中共党的组织联络，俾能帮助他们解决沿途兵源缺乏以及补给等问题。

六月间，广州的中共同志都在为争取北伐胜利而积极配合。由于他们一向领导工农民众团体，又握有军中政治工作的实权；因而他们的活动就偏于军民联欢、动员民众以人力物力去援助军队等方面的工作。当时北伐军标榜“不拉夫”、“不扰民”、“公平交易”等口号；但在广东境内，正在调动中的军队，仍发生过一些军人横蛮强拉民夫的个别事件。所以中共广东区委会觉得这次军事行动，已不如前此统一广东的战争那样受到人民的拥戴。他们强调北伐军应首先爱护人民，才能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削平军阀的任务。

我曾为此事访晤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将军，他担负实际筹划北伐工作之责。我向他提出，如要北方民众“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北伐军务须根据国民党中央的既定政纲，制定各项实施细则，并通令严格遵守。但他所关切的却是铁路工人，破坏敌军后方交通等与军事行动有关的实际工作。

上述这些对北伐的不同见解，是蒋氏与共产派的分歧

点。俄国顾问与中共同志之间，当时则没有意见上的参差。我们讥笑初出茅庐的蒋氏所做的一切，不免是粗枝大叶的“急就章”；而且这位自行加冕的拿破仑，似乎是向着反共的目标迈进了。在蒋氏眼中，共方的议论，只是不切实际的高调；甚至有共方“别具心肠”的疑虑。事实上，蒋氏当时抢尽了镜头，共产派已降格为无足轻重的啦啦队。但共产派是不甘示弱的；他们在北伐工作中，沉着坚定，颇有不屈不挠的气概。

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北伐动员令颁布以后（也许是七月九日举行盛大的北伐誓师典礼的前夕），我在广州已经居留了近四个星期，又匆匆返回上海。那时北伐已成定局了，国共两党的联席会议也确定暂行搁置了。我须返回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所举行的扩大会议；商讨对北伐的全盘政策。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中共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听取了我“广州之行”的报告；陈独秀彭述之等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对北伐的估计未免过低。他们认为北伐军能否打到武汉，大有疑问。这种看法较之老成的军事家加仑将军的估计，显然还要保守些。他们似是太重视了北伐工作中同床异梦的种种迹象，而忽视了传统的革命精神所能引起的作用。也许是受上海报纸言论的影响，因当时上海多数报纸对北伐很少作有利的报导。此外，主观上他们也许想到，北伐的进展无异是蒋介石反共气焰的高涨，无意中就有些抹煞事实，作接近主观要求的想法。会议所通过的政治议案，曾指出“国民政府之出兵，亦尚

只是防御反赤军攻入湘粤的防御战；而不是真正革命势力充实的北伐”⑤。这种看法，事实上使中共对北伐采取了消极的态度。

当时中共党员已增至三万人左右；湖南农民协会已拥有约二十万会员。中央这种消极性决议，与当时显然大有可为的形势是不相配合的。会议虽然也通过了团结左派、打击蒋介石派、强调民族联合战线、发动农民进行减租减息、夺取地方政权和渐次发展工农武装等等决议⑥，但不免流于纸上谈兵。中共中央并未抓紧时机，在北伐中增强自己的势力。

这曾引起谭平山、瞿秋白和我的公开表示不满。我们认为反对蒋介石和对北伐采取积极态度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我们认为北伐是进攻的，是可以夺取武汉的；而不是防御的。我们指斥彭述之等的书生之见笼罩了中央机构，只会做空洞文章，忽略了当前实际任务。我们要求对北伐采取积极行动；因为在北伐竞争中如果落后一步，后果将很坏。但我们这些主张，被视为“联合反对派的公开表现”。

同时，广东区委也对中共中央表示了不同意向。他们强调中央对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是不够彻底的；主张在北伐进展中要提出“分配土地给农民”的土地革命口号，以期动员广大农民完成北伐。这些争执，就是后来中共中央领导陷于分崩的伏线。

不久，事实证明中共中央多数的估计是错误了。北伐军于七月十一日攻克长沙之后，八月二十二日攻克岳州，以各别击破的策略，直指武汉。中共中央这才在这些剧变

中，逐渐改变对北伐的观点；采用较积极的政策，但已经是落后一步了。

在此时期，我是中共中央动员中共党员参加北伐战争的唯一负责人。前此，我往来沪粤之间，担负着紧急任务，自然没有时间去处理中共中央的经常工作。八月初，我才交卸了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委的职责，由李立三接替，我自己则专任中共中央军事部的工作。并确认它具有动员中共组织及工农民众团体参加战争的职能。可是，那时军事部等于一个空职，只有两个年轻同志，在那里做些从报纸上搜集军事情报的屑碎工作。

当时，中共中央还远不能说是一个战斗的指挥部。我们在工农群众运动的工作，虽积累相当的经验；但对指导战争，则仍是门外汉。在这一点上，我们当时万万比不上国民党。我们没有电讯等通讯设备，也没有可资运用的情报资料，一切只好从头做起。从领导民众运动的机构，转变为领导战争的组织，是需要较长时间的准备的。我所领导的军事部在北伐狂潮里，只开始调用少数有军事知识的同志，派他们到北伐所需要的地方去，作些动员工农群众的初步规划。

我记得我的军事部当时所做的一件重要工作，是组织了一个派到武昌去的暴动队。全队只有八个人，由黄埔第一期生余洒度同志领导。他们的任务是会同湖北方面的同志们，扰乱敌军的后方，发动兵变和暴动，夺取敌军的武器来武装我们自己。至于其他次要的地点，就只能派一两位同志去。当时中共的地方组织也是长于民众运动工作，

我要求他们依据广东的经验，动员工农民众，配合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行动。

一九二六年九月六日及七日，北伐军占领了汉阳和汉口，正围攻武昌；我率领中共中央军事部的班底，赶到汉口直接应付战争去了。不久周恩来从广东来，接替我任中央军事部长的职务；他带来了一批军事工作同志，才重整并扩大了这项工作。因此，可以说在北伐过程中，中共中央的机构在开始逐渐使自己适应于战争的状况；也是它后来能够发动多次暴动和从事游击战争的起点。

① 关于共产国际不赞成退出国民党政策的指示，陈独秀先生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发表的告全党同志书中曾加说明。他说："我在三月二十日事变后，对国际报告中陈述我个人的意见。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否则，其势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获得群众的信任。国际见了我的报告，一面在《真理报》上发表布哈林的论文，最严厉的批评中共有退出国民党的意见，说'主张退出黄色工会与退出英俄工委员会，已经是两个错误，现在又发生第三个错误——中共主张退出中国国民党'；一面派远东部长吴廷康到中国来，矫正中共退出国民党之倾向；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

② 段在国民军将失势时，曾暗中勾结京畿驻军唐之道部，作奉军的内应，以图取得奉张的支持；不料为国民党所窥破，乃有四月九日冯部鹿钟麟收缴执政政府卫队枪械之变。段逃匿东交民巷，通电报告政变；而执政政府也就此消灭了。

③ 见张其昀著《党史概要》第二册第五一九页——台北文物供应社民国四十年初版。

④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第八条的全文是："出征动员令下后，即为战事状态，为图军事便利起见，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部机关，

均须受总司令之指挥，秉承其意旨办理各事。”

⑤ 见《苏联阴谋文件汇编》第二册中国共产党类第六十三页。

⑥ 这次扩大会议决议案全文见《苏联阴谋文件汇编》第二册中国共产党类第六〇页至第一二一页。

# 第十二篇

# 武汉政府时期

# 第 一 章

# 军事占领下的武汉初期

一九二六年七月开始，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军事上节节胜利，先后击败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势力，次第占领了长江流域各省，而形成了以左倾赤化见称于世的武汉政府时期。但由于革命阵营内各派势力的相互倾轧冲突，结果，由迁都问题的分歧而演进到宁汉的对立，由宁粤的清共而演进到国共关系的全面破裂；内外交逼的武汉政府，卒亦随之瓦解，而造成向右转的蒋介石将军的胜利。中共在此一幕历史剧中，由于留在国民党内合作这一政策走到了绝路，也由于本身实力和经验的不足，更由于莫斯科历年来指示的错误，以致那时陷于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困境，而遭到惨重的失败。这些失败的事实，也许为中共后来之能够卷土重来提供了宝贵经验；但我今日追述往事，缅怀无数同志同胞牺牲的头颅热血，是不无余痛的。

汉阳汉口相继为北伐军攻克的消息传到上海以后，我曾在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提议中共中央应即准备，以便从速迁往武汉。我的理由是中共中央不能老在上海“亭子间”里，对各地的革命与战争，遥遥作书面的指导；应该移到中心地点的武汉去，抓紧时机，实地指挥。我指出这

与中共中央和鲍罗庭的北伐应以武汉为据点，沿京汉线向北发展的战略是相吻合的；而且武汉一经成为政治中心，则湖北区委的职责必随之加重；中央如仍留在上海，则前此上海广州间意见分歧的流弊，难免不重演于沪、鄂之间。但陈独秀先生等大多数同志，仍以上海是照顾全国的中枢、武汉局势尚未稳定为理由，搁置了我的提议。仅议决派我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赶往武汉，独当前线指挥的重任。

我于九月十一日到达汉口。我的使命是：指导湖北区委、发展工农势力、团结国民党左派、争取北伐胜利等。当时武汉还是处于军事占领的阶段，直到该年十二月间，鲍罗庭偕一些国府委员来到武汉，筹备建都，武汉政府时期才算真正开始。在此以前，中共在武汉的工作可以说都是由我直接负责的。

初被攻克的汉口，一片战时景象。吴佩孚所统率的刘玉春部困守武昌城，与围城的北伐军第四军相对峙；战斗时作时歇，枪声炮声在汉口清晰可闻；武汉间的水上交通，自然也断绝了。其他较远的地区，战事也正在进行中。北伐军虽有胜利的信心，但一般市民多意存观望。

汉口是我工作过的地方，从一九二三年春“二·七”罢工失败我潜行离开这里，到这次重来已是相隔三年零七个月了；不用说，有些地方已有人事沧桑，面目全非的更易。中共湖北区委会尚被困武昌城内，与外间隔绝；它设在汉口的办事处，座落在原来的后湖区靠近唐生智总指挥部的一个里弄里。那一带在一九二二年的时候，是一片绿波的后湖，我曾和“二·七”被杀的施洋律师，在湖上泛舟游览，

听那位“汉口通”的施律师滔滔不绝的叙述有关该湖的掌故。曾几何时，不仅施律师墓木已拱，后湖的大半亦已填成陆地，并新建了一些稀稀疏疏的西式房屋，湖北区委汉口办事处的房子，就是其中的一幢。

汉口，这个古老的城市，除静悄悄的租界外，正在披上革命的新装。吴佩孚衙门换了主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在各处飘扬，各军事单位和各级政治部所张贴的五颜六色的标语，随处可见；其中也夹杂着高级机关的正式布告。所有动人的主张，悦耳的词句，琳琅满目；革命的支票似乎可以任意签发，不必顾及能否兑现。各种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从地下钻出来；大街小巷常发现这类机关新挂起的招牌。中共湖北区委会多数负责人被困在武昌城内，汉口办事处的人手极感不足，一切工作是茫无头绪的；我这个初来者正忙于建立一个秩序出来。当时我所最注意的是争取军事胜利的工作；现在我就从这一点说起。

蒋介石的北伐比前此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北伐，力量既较雄厚，时机也较成熟。虽然北伐军在数量上仍居劣势，准备不算十分充分；但它的敌对方面——北洋军阀，已有土崩瓦解之势。北伐之初，北洋军阀系统中的杂牌部队，即多转向投靠革命。原驻湘西的贺龙部、贵州的袁祖铭部、湖北的刘佐龙部、江西的赖世璜部等，就继唐生智之后，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的番号。他们的转向不仅壮大了北伐军的声势，在事实上也为北伐军开了路。后来在北方，继之投靠革命的更是不胜枚举，如阎锡山的晋军，就是个例子。

北伐的进展，最初确如陈独秀先生的估计，是防御吴

佩孚、叶开鑫的进攻的；但等到北伐军集中湘南，向长沙进攻之时起，就转到了大踏步的进攻战。进攻的策略以及后来的发展，并不如鲍罗庭最初在广州所策划的一样，即在击败吴佩孚之后，不仅循京汉线北上，而且分兵入赣，再溯江而下，去解决盘据宁沪一带的孙传芳。这在当时军事情势上和北伐军内部的纷争上，似也是必要之举。

北伐军于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一日攻克长沙，蒋氏于八月十二日由广州赶到，与前方将领商决第二步军事计划。当时唐生智主张分两路进兵，一攻武汉，一攻江西①，唐氏这种主张，用意似乎是着重在分别占领地盘。即是他自己要占领两湖，作为发展的根据地，而希望蒋氏攻占江西，为进取东南各省的桥梁。蒋氏虽对攻取赣、闽，早已胸有成竹，但那时却主张集中兵力，先攻取武汉，将吴佩孚的势力驱逐到武胜关以北之后，再行东进。也许这是蒋氏不愿唐生智自成一个局面之故。讨论结果，蒋氏的意见虽然贯彻了，但此一军事见解上的差异，也是蒋、唐间后来纷争的起点。

北伐军于八月二十二日攻克岳州，乘胜向湖北进展，次第击败敌军在汀泗桥、贺胜桥的负隅顽抗之后，于八月三十一日进抵武昌城下。由于北伐军缺乏炮兵，担任攻城的第四军屡攻武昌城不克。渡过了长江的第八军唐生智部却于九月六日占领了汉阳，七日占领了汉口，乘胜沿京汉路追击败敌——吴佩孚残部；从此武昌成为被四面包围的孤城。

在我到达汉口之前，蒋介石将军鉴于武昌城之不易迅

即攻下，亟欲乘胜向江西发展，乃折回长沙，取道萍乡入赣。湖北境内的军事，交由唐生智指挥；政务则由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负责处理。

武昌的能否迅速攻下，成为当时各方注意的焦点。我到达汉口的第二天，即绕道武昌的上游地区，步行了整个上午，到前线去视察。叶挺的独立团担任围攻武昌城的任务，他的团部驻在武昌城南不数里的东湖，是武昌城内炮火射程所能达到的地点。我在火线上留连了一个下半天，并在叶挺的团部里住了一夜。叶团只有一门七五口径的山炮，据叶挺告诉我，如果他用这门炮向城内射击，敌军将会有更多的炮弹落在团部附近。北伐军那架唯一的侦察机常飞临武昌城上空，城内却有几门高射炮向这架飞机射击，在飞机的四周，出现着一朵朵的黑烟圈。

我曾和叶挺团部的一些中共同志们举行会议和分别谈话。据他们告诉我，独立团从五月间进到湘南以后，先后曾经过八次重要战役，虽有相当重大的伤亡，但每次都获得辉煌的战果②。该团与第四军第十师第十二师一直在右翼作战，担任着主攻的任务。他们以击败吴佩孚而自傲，觉得第四军较之其他各军出力最多，战斗成绩亦最好。在攻城战中所受损失，正在力谋补充之中。

他们一致称赞中共所领导的湖南工农运动。指出他们在进军途中，沿途都有农民欢迎他们，农民组织曾供给他们必要的运输队，协同他们作战，为他们带路和供给情报等等。所遭受的伤亡，很快就得到补充；安源矿工入团参军的就有约四百人，水口山的矿工和各县农民也成批的加

入；因此，战斗兵的数量有增无减；最难补充的倒是中下级的干部。他们还说到第四军的其他各团在湖南也得到工农群众的类似协助。

几天后，该独立团在一次武昌城下的肉搏战中，续有重大的伤亡；使叶挺团长大为激动。任独立团参谋长的周士第同志赶来汉口，惊惶失色的告诉我，叶团长并未报告师部私自到上海去了。他行前曾叹息着说："独立团伤亡如此重大，似乎无人爱惜；实在无法再干下去了。"我当即指出在战争紧张时期，私自离开部队是违犯军纪的；作为一个中共党员，有这种行动，也是违犯党纪的。不问这种行动基于甚么理由，都是不许可的。

中共党员能否避免承袭一般军队不守纪律的恶习，这件事是第一次的考验。我一面嘱咐周士第暂行代理团长职务，一面用种种方法去把叶团长追回来。约一个星期后，叶挺终于回来了。我要求他在独立团的中共党员会议上，公开承认违反纪律的错误。叶挺照这样做了。接着我在独立团约五十名中共党员的会议上讲话，着重指出军纪党纪的重要性，要求他们在这方面做一切军队的模范；愈是担任重要职务的同志，愈应以身作则。叶挺同志现在赶回来了，也承认错误了，一般同志仍应照常信任他，服从他的指挥。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对于当时具有中共党籍的军人同志的修养，自是重要的一课，而且中共对独立团的领导也因而加强了。

我们对于当时北伐军兵源的补充尽了一切力量。独立团的损失固然迅即得到补充，对其他各军，两湖的中共组

织，亦不断的动员工农群众予以接济。这些表现增加了中共在北伐中的份量。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国庆那一天，武昌城终于克服了。守将刘玉春被俘，他的部队全部被缴械。这个久攻未下的孤城，因粮食日尽，外援已绝，而革命党人在城内外的种种活动，又使敌人失去坚守的信心。当日清晨，敌军一部开城投降，因而没有发生严重的战斗，这个辛亥革命的名城，即被收复了。以武汉为革命中心的局面由是形成。

我在当天跟着部队进到武昌城内，会见了陈潭秋等中共湖北区委同志以及我在上海时所派来做暴动工作的余洒度等那一组人。战后聚首，欢欣逾恒。据他们告诉我，他们被困在城内约四十日，做了许多秘密散发传单、粘贴标语布告、传布北伐军胜利等等消息，又曾策动军警投降。余洒度等还投过几次炸弹，扰乱人心。守军为内外交逼的革命声势所慑，遑遑无主；即对于城内的国共两党人士的破坏行动，也不敢过分镇压。因此，只有少数人被捕且均在收复的当天就安然出狱了。同志们多以能在武昌城内为北伐尽了一臂之力而自傲。

中共湖北区委会于武昌克复后，仍集中到武昌城内办公。当时，武昌是由第四军卫戍的；汉口则由唐生智部驻守。中共与第四军比较接近，觉得他们是老牌的革命军，湖北区委能设在他们所卫戍的区城之内，心理上总觉得较为放心。湖北区委办公处设在一条被没收了的遗产的弄堂内，街名我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弄堂中有几所房屋，都是由独立团支配的；区委办公处就占用其中最大的一幢，

我分配到一所较小的，作为我和随我同来的军事人员办公之用。叶挺的家眷就住在我对面的一所房子里，区委属下的几个机关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也都分设在弄堂里及其附近。

我在改任湖北区委书记以前，大部时间还是从事军事方面的接洽。原任总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兼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又是总司令武汉行营的主任，在名义上他在武汉代行总司令的职权。他于武昌克复后，也从汉口移到武昌办公。湖北省政府、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总司令部的总政治部等主要机关也都设在武昌城内。邓演达一时成了最高负责人，也是我接触的主要对象。

我和邓演达相处，是相当融洽的。我虽在广州即与他相识，但到武汉后，才与他共同处理事务。他是农家子出身，在保定军校第八期毕业以后，任过团长职务；并曾到德国考察军事。北伐前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时，即任总政治部主任。他是一个自命不凡的军人，说话时常带武断的口吻；但也有点心慈面软。他虽以做孙先生的忠实信徒而自傲，但又颇倾向于社会主义思想；而他所统率的政治部的主要干部，又多系中共党员和左倾人物。他与第四军的关系，一向密切，但他对第八军的唐生智则无好感。当时他似乎要抑制唐生智，不无集武汉的军政大权于一身的雄心。

唐生智的实力相当雄厚，他当时的地位似高出于北伐军其他各部队的首脑。武昌克复以后，他的军队事实上未直接卷入战斗，因而能有机会从事扩充。他的部队数量大

为增加，而且在长沙自办了一间规模颇大的军官分校，来充实军事干部人才。刘佐龙等新投靠的军队也都由他指挥。他控制着湖南全省和湖北的大部分；湖南省政府主席由他兼任；汉口市长是由他的部属刘文岛担任；此外，他还能在湖北的各县直接间接搜集些税收。因此，他军队的供应和人力的补充都是不虞缺乏的。

他颇有与蒋氏竞争的雄心，正在运用他的灵活手腕，在各方面有所布置。他和他的部属标榜佛教，以示与广东的三民主义有别。他团结保定系，企图与黄埔系争一日之短长。他与汉口的日本领事馆来往甚密，其目的似在经由日本方面获得有利于他的情报。同时，他对俄顾问也优礼有加。他的部属虽多系守旧人物，但他对中共又极力表示亲善。他这种四面八方拉拢的政策，被人认为是以对付蒋氏为主要目标。

他拉拢中共的手腕也是独出心裁的。他的政治部主任刘文岛改任汉口市长以后，即接纳由当时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的彭泽湘同志去继任这个遗缺。他无条件支持工农运动，与湖南方面中共负责人以及汉口工会领袖，也维持着经常的接触和友善的关系。他还郑重其事的要求加入中共为党员，并请陈独秀到武汉来指导他的工作。他对我也是很客气的，甚至表示在他因事到前线去的时候，他的部队可由我全权指挥。

中共方面，认为唐生智的军队仍是以守旧军人为其主要支柱。他这种友善姿态，都不过是拉拢的做作之态。中共中央曾拒绝了他入党的要求，指出这对于他暂不适宜。

我也觉得他只愿个人与中共友好，并不愿中共的影响达到他的队伍中去。因此，我们觉得无论在那方面来说，他都比不上邓演达对革命那样的真诚。

在武汉，除了邓演达、唐生智的势力而外，就要算中共的势力了。中共所能控制的军事实力，虽然微小，但对各军的政治工作和国民党两湖的省党部等，却具有甚大的潜力。在工农和青年群众组织中，更居独占的领导地位。在北伐军各实力派互相竞争之中，中共一时是举足轻重的。我这个中共在湖北的发言人，当时所持的政策是为了北伐的彻底胜利，不能加深各派的裂痕；只能积极增加工农势力的比重。

邓演达对中共与唐生智之间的友善，颇有疑忌之心。他有一次以代表革命正统者自居的姿态问我，为甚么彭泽湘没有将第八军的情况报告给他？我向他解释，彭泽湘初去第八军工作，一切都很生疏，因而我也没有接到他的报告，我想他决无不尊重总政治部领导的意向。我还进而向他说到，中共方面是一切事都要和他商谈取决的；但同时也重视唐生智的友谊，不拒绝唐的为善的倾向；我以为这也就是我们所应共同采取的态度。

邓演达对我的意见，似颇以为然。而且他后来在处理财政问题上、汉阳兵工厂的人事问题上，以及军械的分配上，为了要应付蒋氏在江西前线的需要，本与唐生智要发生龃龉的；也似乎因受了我这种态度的影响，大多能以折衷的方法，获得暂时的解决。一般说来，革命内部的矛盾，那时还不算十分尖锐。

我根据广东的经验，谨慎的处理这些与军事有关的问题。当时，我尚是一个幕后人物，未担任任何公开的职务。但一些向革命找门径的人，嗅觉特别灵敏，往往直接找到我这里来。我接见过驻扎武汉四周许多亟谋投靠革命的部队的代表们，也阅读过许多有关这类事的文件；我都转给邓演达去处理；至多有时提供一些处理的意见，给他参考。那时由德归国的朱德和由四川来的刘伯诚同志，都是由我居间介绍，奉着邓演达的正式使命到四川等地去，运动杨森、邓锡侯等部队。这些事使邓演达感觉这是尊重他的职权的明证。

蒋氏于九月二十二日即到达江西境内，南昌是于十一月七日克复的，在此时期中，他的处境相当困难。在革命军进抵武昌城下的时候，李宗仁的第七军即沿江东下；对付孙传芳进至黄石港的先头部队，并向九江方面进展。第二第三第六各军全部和第一军的第二师分路向南昌逼进，第五军的一部则由广东进驻赣州。程潜（第六军）于九月十九日第一次攻占南昌，但旋即为孙传芳的优势兵力所压迫，不得不撤退出来。当时蒋氏尚在赴赣途中；任指挥责任的程潜曾指摘南昌之得而复失，是由于蒋氏亲率的第一军未能如期接应所致。

此后，南昌九江间附近地区的战局由蒋亲自指挥，一时形成拉锯的形势。孙传芳的主力集中到了南浔线，蒋氏遇到了劲敌了。他的指挥似也表现得不很得力，各军有些抱着观望态度，行动也未能一致；因而在战斗上受到一些挫折。第一军军长何应钦所率第一军的第一第三两师经由

福建向浙江前进，进展亦较迟缓，这使蒋氏的声望为之减色。

武汉的革命英雄们在讥笑这位不可一世的总司令，唐生智曾以讥笑的口吻表示：总司令亲率着这许多大军，竟会败于南昌城下，真是怪事！第四军有些将领们更觉得没有他们铁军出马，就不济事！有些人以隔岸观火的态度，等待着看蒋氏闹笑话。少数人则以南昌久攻未下，为之焦急。蒋氏本人也表现得有点一筹莫展，他的顾问加仑将军却奔走前线各地，联络各军，以期彼此行动一致。

十月中旬，加仑将军为江西战事来到武汉求援。他向我痛陈江西前线的实况；指出症结所在是各军行动不能一致。他警告万一孙传芳获胜，湖南广东都要受到威胁，整个北伐甚至要因此垮台了。我支持他的这种看法，予以有力的协助。我觉得现在还不是由于内部矛盾与蒋分清泾渭的时候；如果江西前线受到挫败，是真会影响北伐大局的。当年太平天国的革命，也因内部的勾心斗角而致失败，可为殷鉴。

由于素著声望的加仑将军在武汉的疏解，获得了各方的诚意协助。第四军开往南浔线的侧面，协同原在那里的李宗仁部进行主攻。唐生智的一部也东下应援，武汉是在动员人力物力来支援江西的战争。加仑兴高采烈的驰回前线，要求各军务必要严格的一致行动。当时武汉方面传说，江西战局的实际指挥，不是甚么总司令，而是客卿的加仑将军。果然，十一月二日李宗仁等部在南浔线击溃了孙传芳的主力，四日占领九江，七日占领南昌，孙传芳才遭受

了第一回合的重大打击。

由于蒋氏的受困于南昌城下，便诱发了反对他的浪潮。十月间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各省市党部代表的联席会议③，显然是左派势力的抬头。他们造成直接反对张静江的昏庸老朽和迎汪回国复职的空气，间接就是打击蒋介石。蒋氏占领南昌九江之后，也就开始了他的反击。后来他坚持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暂驻南昌，也就是当时的内部矛盾之故。

中共的工作随着北伐军事的胜利而急剧发展起来。中共湖北区委会一向长期处于地下活动状态，一切工作都惟谨惟慎，无法施展。如今一朝获得公开活动的机会，便因积习以及人手不足，显得手忙脚乱。幸各地的得力党员，陆续荟集到武汉来。如工运方面，有李立三、刘少奇，是中共中央继我之后派来的人员。军事工作方面则多是广州随军来的，如在总政治部任重要工作的有李和林、章柏钧、朱代杰等，实际指挥军队的有叶挺以下的军人同志们，以及后来任武汉军官分校主任政治教官的恽代英等。不久，毛泽东也由湖南来到武汉，筹办另一个农民运动讲习所。其他众多的工作，则多系就地取材。总之，湖北区委会当时正忙着充实它的组织，扩大党员数量，训练党员提高工作能力等等。

等到武昌克服以后，中共湖北区委会的阵容极一时之盛。彭泽湘虽担任第八军政治部的工作，仍兼着湖北区委的书记；陈潭秋主管组织部；林育南主管宣传部；董必武、钱介盘、刘伯垂等任国民党工作委员会委员；李立三、刘

少奇、项英、许白昊任工运委员；陆沉、陈荫林、刘子谷等任农运委员；蔡畅、黄木兰等任妇运委员；李求实、李书渠等任共产青年团委员并负责学生运动工作；我则以中共中央代表资格，经常参加湖北区委会议并兼管军事工作。

不用说，中共湖北区委会在武汉是中共一切活动的中枢。它每星期开会两次，一次讨论政策，一次讨论日常工作。出席人数往往是二十人左右，议案是十分纷繁的；尤以临时动议的紧急案件为最多。这就使任书记的彭泽湘有点应付不下了。他虽是一个能干的青年，但究竟太忙，经验也嫌不足。书记在会议上，特别要依据各项问题的缓急轻重，临时能调整一个秩序出来；有些重要问题还要预拟出解决的方案，提出讨论通过，才能把握时机。这些事往往非彭泽湘所能胜任愉快，常引起不必要的争议。我这个中央代表有时就弄得不得不起而代庖；甚至遇着我因事没有参加会议时，会议就不能获致圆满结果。

湖北区委会领导不够健全的现状，曾引起一些区委委员的不满；资深望重而又以正直著称的陈潭秋就曾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他不满陈独秀派些经验不足的留学生来任象湖北区委书记这样繁重的职务，认为这是不信任老干部的表示。他要直接要求中共中央改派我为湖北区委书记。我虽告以我正在要求中共中央搬到武汉来，自然可以弥补这个缺陷，现在在人事上似乎不必多此一举。但陈潭秋仍径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他的建议，而被中央接纳了。因此，我于十一月间又兼任了湖北区委书记的职务。这项工作占了

我最大部分的时间，我不仅要注意政策问题，而且要处理繁杂的日常工作。

当时武汉的要人们，开会忙，宴会忙，演说忙，蔚为一种风气，中共的干部们也不例外。众多的革命机构和民众团体的主要人员，不仅各有它本身开不完的会议，而且有各种各样的联席会议；有些要人们几乎终日就只够忙着开会了。“普海春”这个座落在汉口江汉路的大酒店，是当时要人们宴会最多的地方。一位要人每天往往要在那里参加两三次乃至五六次的宴会。他们于酒醉饭饱之后，高谈阔论一番；有些重要问题，也就在这种场合交换意见，自然不免有草率的流弊。演说不仅成为风尚，而且内容是愈左愈好；连工商界的老板们演说时，也会高呼“世界革命万岁”！但这些会议宴会演说等，不免多系空谈自误，缺乏实际内容。我参加这场合算是较少的；一般说来，中共湖北区委会的工作较之其他的革命机构，效率是要高些。

在武汉占领后的初期，中共所领导的农民运动，只是开始阶段，还不为人所注意。至于当时的职工运动，则极为出色。九月十四日，北伐军占领汉口后的一个星期，一个工界恳亲会即假国民党汉口市党部举行。到了工人代表四百余人，代表一百多个工会。北伐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前敌总指挥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市党部等重要机构，都派有代表参加。会议决定了三项重要议案：一、惩办工贼；二、催促各工厂从速开工；三、组织湖北全省总工会。又决定第一二两项请总政治部负责办理，第三项则由各工会负责进行。中共方面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项英、

许白昊等重要工会领袖，发挥着领导作用。

上述三点决议，确也是当时职工运动的当务之急。湖北的职工运动经过吴佩孚的“二·七”镇压，工会组织业已破碎，从前的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事实上也不存在了。继之而起的只有中共所领导的一些工会秘密小组。有些过去的工运领袖在吴佩孚威迫利诱之下屈服了，其中还有些为吴佩孚做破坏工会的工作，即所谓“工贼”。当时最著名的一个工贼是郭聘帛，他有国民党党籍，为右派分子，也曾是湖北工团联合会的一个重要职员，在“二·七”罢工后，纷传他已成为吴佩孚的鹰犬；因他的告密，使若干工人领袖受到杀害。众怨所积，郭聘帛终由总政治部逮捕了。惩办工贼是工会方面极重视的事，当初总政治部根据蒋氏的意旨主张宽大；可是不少工会领袖曾向总政治部力争，郭聘帛因而卒被处死判④。

催促各工厂迅速开工，更是不容易解决的事。当时武汉的工厂企业，有的已经停工，有的减产，有的勉强维持；这种经济不景气，确也是战时所难免的状况。工人一方面要各工厂复工，才不致失业；另一方面又要提出一些迫不及待的经济要求，使工厂企业更难经营。总政治部除了运用政治压力，催促各工厂开工外，也不能有其他良好的方法。当时军需浩繁，财政当局只能设法增加一些收益，那里顾得到工商业的复苏。一般说来，只知要钱的军人们，既不懂甚么财政经济政策，更不会有甚么贷款帮助工商业的打算，而他们的意见又有决定性的作用。

我曾强调国民政府应确立战时财政经济政策。所需收

益可求之于各县地主富人的捐献；对大城市工业生产的奖励，市场的活跃，以及贷款救济等项，都是应当认真考虑的措施。李立三则主张工人参加管理生产；他认为这样做，才能使工厂复工，也可以使工人重视劳动纪律，认真进行生产。这些建议又为当时实际条件所限制，难于实行。因此，当时一般热心革命的人物，多觉得军事上确有进展，在政治和经济上则毫无办法。

组织总工会是工会内部一件复杂的工作。武汉不过是中国腹地一个商业中心，近代企业并不发达；因此，工人中仍以手工业者和苦力占最大多数，自然，这样的工人群众也会富有行会观念和受着秘密会社的流氓观念所影响。他们已往的处境的恶劣，是毋待费词的，汉口租界巡捕曾发生打死人力车夫的事件，“吃洋火腿”更是司空见惯。在革命浪潮汹涌到武汉的时候，自然激起一般工人“报复”、“泄愤”、“翻身”等情绪；如“发洋财”这一句话，就是很流行的。这句话的含义固然很复杂，主要却与“铲富济贫”的观念一脉相通，不过所要铲的是洋资本家罢了。他们虽经过“二·七”罢工的洗礼，但要组成近代的工会，按照当时的经济条件，来维护工人的利益，还是困难重重。

湖北全省总工会于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正式成立。当天广大的工人群众首先参加盛大的国庆纪念会；接着举行总工会成立会；发布成立宣言；选举向忠发为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刘少奇、项英为副委员长，分任总务组织宣传处长，许白昊为秘书长。总工会之下，还设有工人纠察队，其盛况不亚于广州的省港罢工委员会。那天又适逢武

昌克复，消息传来，会场工人群众更是欢欣若狂。

工会的组织在激剧扩大之中，并向武汉以外的各县市发展。到一九二六年底，总工会会员人数多达三十万⑤。中共虽能完全控制总工会，但对其属下的各分工会，则尚不能作有力的掌握；以致发生若干左倾蛮干偏差。中共职工运动的负责者，主要是在那里加强各分工会的组织，挑选适当干部，分担各分工会的领导职务；并征求中共党员，形成各工会和各工厂企业的中共支部；以及训练这些新手，使他们能了解当前的责任。

劳资争议和罢工浪潮，随着工会组织的发展而汹涌起来⑥。当时总工会除认为资方应承认工会的团体契约权外，关于劳作条件，规定一个工人最低限度的工资每月应以十三元为标准，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十小时，加上额外加工不得过十二小时，每星期应有二十四小时的休息等⑦。这些要求，从国际水准来看，固是可怜的；即以当时的武汉实际情形而论，也不算是过高。而各分工会在劳资争议中所提出的实际要求，有时还低于这个标准。在增加工资上，有些企业的工人要求每月增加两元或三元，连原有工资计算，尚不足十三元的标准。在休假问题上，有些也仅要求两星期休息一天。这显然顾到了当时实际条件所能做到的。

不少的劳资争议用仲裁的方式解决。十一月间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湖北全省总工会、武汉商会、湖北省政务委员会、总政治部和武汉卫戍司令部等机构，共同组织了一个劳资争议仲裁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处置争议的方针，大

致是要求劳资双方服从它的仲裁权力，主张资方应大体接受湖北全省总工会所规定的劳作条件，工人在工作时间内则应遵守劳动纪律。

但工商界的老板们总觉得工人方面的这些要求难于实行。他们怨恨自己的处境困难，战争使他们陷于经济不景气中，政府当局只知问他们要钱，无异是杀鸡取卵；工会又在不断捣乱，提出种种要求。这种上下交迫的困境，将使他们的前途为之断送。他们不敢开罪政府当局，政府方面的要求，多少勉强承担下来；但也利用当局向他们要钱的机会，将他们的怨气，向工会方面发泄。

引起工商业老板们最大反感的是工会方面的一些直接行动。在劳资争议中，工人方面常采取加强压力的办法，强迫资方接受他们的条件，有时也发生一些侮辱资方的事件。在资方不遵守劳资协议或有某种破坏工会的行动时，工人方面常予以反击；有时会发生拘捕资方人员，戴高帽子游街的事。在资方看来，工人纠察队的这些活动，是不可饶恕的⑧。此外，更普遍的是工人们不遵守劳动纪律，工会的负责人往往因工会的活动，妨碍了自身在工厂内应有的工作；其他工人店员在工作时间内，工作不力和不遵从资方指示等等，都是常事。

工人事件震动了武汉市，“实行共产”的谣言在各处广泛流传；“反共”的声浪也跟着抬头。当时威金斯基曾根据这种情况，在《向导》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主张严惩反革命。事实上这种主张是当时所不能实行的。主要是国民革命的内容太过复杂了。当权的军人实力派，事实上有求

于工商界老板；他们甚至包庇反革命，那里说得上甚么惩办。中共却陷于一种微妙的地位，它既要顾全大局，要争取北伐的胜利，不能仅顾着自己的政纲；又要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不愿使自己成为约束工人行动的工具。左右两难，顾此失彼。如果真要严惩反革命，那就要如托洛斯基所说的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并在事实上在国民革命阵营中，来一个共产革命；但这又是共产国际所不允许的。

如果我们对当时国民革命的对外关系以及内部混乱的情形稍加说明，便更易于看出若干症结所在。

国民革命的民族阵线是以对付帝国主义为大前题；帝国主义的势力确构成国民革命的最大障碍。湖北全省虽大致已为北伐军所占领，但帝国主义的威胁依然存在。武汉江面上，经常停泊着成群的外国军舰；最多的时候，达到三十六艘。兵舰的炮口，指向武汉的中心区；兵舰上的水兵，以租界为据点，或明或暗的在戒备着。此外，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境内，无论在政治、经济，和制造舆论上，都有雄厚的实力；使我们常觉得有一只强劲的手，在阻挡着我们的前进。

一般革命人士以现实策略着眼，都觉得北伐战争是以分别解决反动军阀为主题。他们赞成进行各种各样的反帝国主义的宣传，但极图避免与帝国主义者发生过早的冲突；因而不愿有侵犯外人生命财产等事件发生，以免外人借口干涉。但在群情愤激之下，需要冷静的头脑，耐心的解释，才能防患于未然。不少工人对租界或个别外人有报复的行动，中共负责人员常向工人群众解释。我们指出帝国主义

是要反对的，但现在外国军舰的炮口正指着我们，不难于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毁灭我们这个革命中心。而我方军事势力还不够雄厚，工人的组织还未健全，广大的农民也尚未发动，因而此时决不可轻举妄动，而自陷困境。

至于革命内部的领导，简直可以说是一片混乱。众多的机构和一般要人们，除了忙于集会演说以外，做起事来，总是同床异梦，左右掣肘。他们中有各军之争；有军权党权之争；有国民党内部派系之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而且农民与地主之争也正在方兴未艾，其政治重要性与日俱涨。

总司令的职权超越一切，也日渐为人所不满。一些有实力的军事领袖们，站在他们本身的立场，暗中实行对抗。各省当局都是以总司令的命令指派的。在南昌克复以后，我本人便被蒋氏指派为江西省政治会议和省政府的委员（我因武汉的职务，从未去就职）。他的命令是包罗一切的，不管怎样细微的事，都要干涉到；而又无制度法律可循。在武汉方面，反映总司令职权的邓演达，在这一点上也有类似的作风。

军权超越了党权，使国民党党部的负责人觉得不应该，他们怀念着孙中山先生“以党治国”的原则。湖北国民党省党部和省政府的各项重要职务，由湖北籍的要人们分担，其中多系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党员，董必武就是其中要角之一。他们除强调提高党权外，也侧重维护湖北人民的切身利益；这与一切以军事为前提的邓演达发生若干争执。

我当时调解这些争端，也曾为了劝告董必武暂时需要

抑制一下湖北人的地方观念一事，而彼此争得面红耳赤。在我看来，邓演达与蒋氏不能相提并论，他可能心向着我们这方面，若将他逼往蒋氏那边去，诚属不智。

工会方面的活动更能体现中共方面的政策。九月二十日，当武汉第二次工人代表大会举行的时候，总政治部的代表曾声明对工会民众组织，采取赞助态度；但要求工会服从总政治部的领导。工会领袖也声明愿促进工会与国民党党部的关系，接受总政治部和国民党党部的领导；同时提出了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

在中共方面想来，它在工会方面的领导地位是无可争议的；表面上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并不等于牺牲中共的领导，反可以避免与象邓演达这样的人发生直接的争执。我们之所以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用意就是要增加工人在政治上的地位。

国民会议的问题，在孙先生逝世以后，国民党的文件中虽间或提到过，但事实上早已烟消云散了。蒋氏的个人军事中心主义，不用说，是更不愿有甚么国民会议的。中共方面在一九二六年七月的扩大会议中，对此问题十分强调，湖北的中共领导方面更重视此一问题，因而在工人代表会上，有召集国民会议主张的提出。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开幕的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曾通过关于召开省民会议的决议，其内容是："为实现民主政治，稳固革命基础起见，本代表大会特别向政府建议，迅即召集湖北省民会议。省民会议成立以后，省政府应遵守和实行省民会议之一切决议。湖北工人团体将来

应在湖北全省总工会领导之下，参加省民会议⑨。当时，我们的政策确是想利用国民会议省民会议一套制度，作为压抑军权和国民党党权以及解决国共纠纷的一个途径。

中共中央是支持此一政策的；鲍罗庭却等闲视之；因而未形成一个广泛的运动。在上海暴动的时候，中共中央曾直接主张组织上海市民会议⑩，成立市政府。湖南总工会也曾通过召集湖南省民会议的决议⑪。这都是当时在此问题上的一些积极表现。后来，鲍罗庭到达武汉，仍主张在提高国民党党权名义之下，来反对蒋的跋扈；他以为国民会议的途径是不切实际的。

在国民政府正式迁到武汉的时候，共产国际的电令，对国民会议的问题，一字未提；只令中共中央采取在国民党内参加国民政府和各省政府的政策，谭平山、苏兆征参加国民政府，分任农政劳工两部长，就是由此而来。我至今仍觉得不管那时国民会议能否实现，中共中央当时没有坚持这一政策，是一件最失算的事。

在军事占领的武汉初期，一切重要事项的处理，我们各方面的负责人曾广泛利用协商的方式，寻求协调；大体做到了减轻内部矛盾，为北伐铺设前进的基地。当时，革命方面的最高机构，没有一个是在武汉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仍在广州；总司令部设在江西境内；中共中央在上海；而在战争状况之下，赣粤沪汉间的联系相当困难。因此，武汉的人们曾以武汉地理位置为理由，要求国民政府从速迁来，以期作直接之领导。这一迁都问题和我

在上面所说到的种种情况，都为“武汉时期”的后来发展，埋下了伏线。

① 唐生智的这一主张，且曾提出于七月二十四日在长沙举行的第四第七第八各军将领会议，获得通过。

② 独立团的辉煌战绩，后来周士第所作《回忆叶挺同志》一文，有较详确的描述；周文见华应申编《中国共产党烈士传》第一七五页至第一八二页——香港新民主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

③ 这个联席会议举行的期间是自该年的十月十五日到二十八日。

④ 关于处置郭聘帛的问题，总政治部内部就曾发生过争执，详见郭沫若著《革命春秋》第三八三页至第三九二页——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一年新一版。

⑤ 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也说：“……为时不及三月，湖北工人之有组织者，遂由十万增至三十万……”（见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编辑出版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四百页）。这里所谓“为时不及三月”，即指一九二六年双十节前至该年年底而言。

⑥ 自革命军占领武汉到这年年底止，武汉各工厂罢工次数甚多，其中重要的罢工而有记载可考者，即达三十六次之多（见陈达著《中国劳工问题》，第二一九页。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八年初版）。

⑦ 这是根据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经济斗争决议案》（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四一六页）所规定的。

⑧ 武汉总商会曾因此于十二月三日举行大会，议决三案：一、工人因生活费之增高而要求加资，实出于理所当然；但提出不正当之要求而罢工者，则实不能予以赞成。且如加资问题，劳工者与资本家可以直接交涉，无受第三者干涉之必要。二、最近纠察队之横暴已达极点，此种暴行宜从严禁止。三、政务委员会对于此二事究有何办法，若十二月六日以前尚无善后办法，商界将罢市以自卫（见陈达著前书第二二五页）。

⑨ 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四二四页。

⑩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为上海总罢工告民众书里，就曾

提出“一切权力归市民代表大会”的主张（见《向导》周报第一八九期）。

⑪ 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三六四页。

# 第 二 章

# 鲍罗庭到达武汉以后

武汉的反蒋运动，是鲍罗庭到达武汉以后才开始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鲍罗庭不满蒋氏在三月二十日以后的种种安排，但他大体上对蒋还表示容忍让步，以弥补国共之间几濒破裂的关系。但一到十月间，在广州举行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各省市党部代表联席会议之时，反蒋的锋芒开始显露出来，这似乎得到鲍罗庭的支持。等到鲍罗庭到达武汉以后，认为反蒋时机业已成熟，不再隐藏他的反蒋决心了。这一反蒋运动，自然是以各方反蒋的倾向为基础而决定的，由限制和削减蒋氏权力开始，进到武汉政府与蒋氏正式对立。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日左右，鲍罗庭偕同宋庆龄、徐谦、孙科、宋子文、陈友仁等，以国民党中央暨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的名义，到达了武汉，筹备迁都事宜。国府主席谭延闿等则正率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全体人员随后迁来武汉。

当我到汉口旧德租界一所精致的洋房，去访问鲍罗庭时，他正在客厅接见宾客，我便在他的办公室内先与随同他一道来的张太雷同志晤谈。张太雷首先向我说："鲍罗庭

真有几手，一席话便把唐生智收服了。”他接着说明，鲍罗庭在下船后，即偕同欢迎他们的唐生智，同车驰至唐的总指挥部。他们开始谈话，由他从旁任翻译。鲍罗庭劈头便向唐生智说：“谁能忠实履行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就能成为中国最伟大的人物。”唐生智听了这句话，似乎喜出望外，将身体扭动了几下，欣然回答道：“我愿意这样做。”鲍罗庭接着说了一些如何忠实履行孙中山先生主张的话，不着痕迹的将他已不信任蒋，转而将信任唐的意向表示出来。唐生智因而向鲍罗庭恳切表示：“一切愿听指挥。”

张太雷认为鲍罗庭对唐生智这篇不平凡的谈话，不是甚么外交词令，而是具有联唐反蒋的决心的表示。他还指出鲍罗庭此一行动是否已征得莫斯科的同意，他虽然毫无所知，但他确实知道鲍罗庭对蒋的不满有增无已；此次他们路经江西，曾于当月七日在庐山与蒋会商，看鲍的神情，可以推测谈话结果必然是不圆满的。他对一个初见面的唐生智，就有这种露骨的表示，足见他对蒋氏是如何深恶痛绝了。

不一会，鲍罗庭踱到办公室来了。他亲切的和我握手，嘘了一口气说：“好了，我们又在一个新地方晤面了。我们要开始新的生活，做一篇新的文章！”在我们谈到武汉一般情况时，他说：“广州我已住腻了，我对武汉很感兴趣。但最使我刺目的，就是武汉仍处在外国兵舰的炮口威胁之下。”

我们的话题因而转到有关外人在武汉的动态问题上。鲍罗庭表示对武汉的一切，都感满意；但对外人的动态，

今后则应加强注意。我于是向他推荐一位懂英文的中共青年李君(我已记不起他的名字了)，做他的办事人员。后来这位青年便替他做调查外人动态的工作；而中共湖北区委方面也因经费不足,乐得把这项工作推由鲍罗庭直接负责。

在此期间，不仅鲍罗庭等新来的人，在从事布置班底的工作，中共湖北区委会也在忙着部署这类的事；并且从武昌搬到了汉口。鲍罗庭认为湖北区委的工作范围，因为国民党的中枢移到了汉口，已经不仅是湖北一省的事务，他要求我们立即搬到汉口来，以便和新来的国民党中枢要人，能经常保持接触，把握整个局势的发展。我们接纳了鲍罗庭这个建议，作了一番新的布置。

鲍罗庭和我讨论一般政策问题，是在十二月十三日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组成以后。联席会议为何要急于组成，职权为何，已否得到蒋的同意等等，鲍罗庭事先都未和我提过。等到联席会议举行之后，鲍罗庭才向我表示：在广州时，他曾说过北伐打到北京，国共便要分家；现在看来，分家之事已经大为提早了。我问他为甚么有这种看法，他说是凭他的嗅觉，而他的嗅觉是特别灵敏的。

他向我指出下列各点：一、蒋氏占领了江西之后，正锐意经营东南，以夺取南京、上海为目标；这种东进方针，将与苏俄日渐疏远，而与帝国主义列强和浙江一带的买办资产阶级，寻求妥协。蒋的这些活动，是经由黄郛钮永建等人从中拉线的。二、蒋氏一直要建立他个人的军事独裁，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完全置于掌握之中，反对汪精卫

回国复职；这些已引起国民党大多数中委的反对，这次和他同来的国民党中委，一致不赞成蒋的这种野心，因而成立了一个联席会议，俾中枢大权不致为蒋个人所操纵。三、蒋氏如果取得了南京上海，很可能就要发动一个反共运动，以取悦于帝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

鲍罗庭很注重军事实力。他说到大多数的军队也都对蒋不满。唐生智的反蒋态度，固不待说；邓演达和第四军的多数将领，将积极支持汪精卫；谭延闿的第二军，朱培德的第三军，程潜的第六军也都是一向不满蒋的；第七军在军事发展上，与蒋也有许多矛盾；而且冯玉祥已解西安之围①，他的军队一出潼关，又是蒋的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因此，从军事实力上看来，蒋的独裁前途，自是荆棘丛生的。

鲍罗庭这些看法，是他反蒋的出发点。我觉得这是我们在政策上的大转变。反蒋的基本政策，固然如箭在弦上，不容有所踌躇；但在力量的对比上，我倒觉得鲍罗庭的看法，有点过于乐观。我曾向他指出，就武汉一般人眼中看来，唐生智应更不如蒋介石，唐是一个投靠革命的军阀，他的部属多是一些旧军人，蒋究竟是一个老国民党员，而且有黄埔的革命青年军官做基础。蒋与其他各军的关系，固然不好，但唐与其他各军的关系，也是有缺陷的。他与二、六两军早有夙怨，与第四军又有门户之见，假若由他出来团结反蒋军人，恐怕将事倍功半的。其次在党部和民众方面，虽然左派声势浩大，但毕竟缺乏有力的领袖。汪精卫能否回国，回国后能否硬干，都有问题。反蒋运动定

要做到甚么程度，以及应采急进抑或缓进步骤，也都值得研究。

鲍罗庭对于我所提出的疑问，似乎无法解答。他只是强调现在问题的中心所在，是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我们既然看清楚了蒋的反革命的意图，总不能袖手旁观。他为联唐政策解释，说唐较优于蒋的一点，是唐同情于工农运动。他预料汪精卫在适当时机就会回国，在大致上他不会像过去那样的软弱。至于团结反蒋势力一点，他自信他的灵活手腕，必然奏效。

鲍罗庭的个性很强，他在广州时，遇事不与广东区委商量，独断独行。他到汉口来后，态度总算客气了一些。他把握着最高的决策，很少迁就我们的意见；至多也只是礼貌上征求我们的同意而已。但他对湖北区委所领导的工农运动，却没有妄加干涉。他之所以如此，也许是他只长于运用策略，其他则似非他之所长。而且事实上武汉的情况也不是他这个初来者一时所能了解清楚的。

在鲍罗庭的政策之下，武汉局势将有重大的变化，这是很显然的。我只有将这些实况，报告中共中央，请求郑重考虑，以期步调能够一致。我说明我不能抽身到上海去，要求中央速来武汉。但中共中央在反蒋可能发生的后果上，似未予以充分的注意。它所给予我的指示，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意见，只是赞成而已。可是后来，中共中央在上海所做的，显然又与武汉方面的步调，并不完全一致。

联席会议在成立之初，主要任务是筹备在武汉建都事宜，并非以反蒋为重点。不过它多多少少有以中枢自居的

倾向，因为联席会议的委员们，觉得在迁都的过程中，不能使中枢的职权一时中断，应把握时机，于筹备建都的任务之外，暂行负担起中枢的临时责任。但在蒋氏看来，这无异是与他的权力对抗。

徐谦被选为联席会议的主席。他是个基督徒，以能代表冯玉祥的身份而当选为国民党政府委员。他与国民党并无深厚渊源。他是一位热情的演说家，似不是一位特出的政治家。联席会议的工作最初表现得茫无头绪，委员们大多忙于参加会议，发表动人的演说。

委员们的许多演说，大都说明国民政府迁都武汉的意义，要求人们拥护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在这种气氛之下，党部和民众团体方面根据十月间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市党部代表在广州举行的联席会议的决议，进而提出了“欢迎汪精卫回国”、“要求汪蒋合作”、“提高党权”等口号。这些声浪意在对蒋氏过份庞大的权力，稍予抑压，但在蒋氏看来，迎汪回国复职，就无异是直接反对他。

邓演达在武汉行使总司令职权，采取了拥护联席会议的态度。他是总司令武汉行营的主任，原应奉蒋氏之命行事，但他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并非蒋氏所能完全支配。他和谭延闿一样，认为国民党革命不能是军人所唱的独脚戏。也许他对蒋氏已往的一些命令，有过一些反感。他尊重联席会议的决议；于是，总政治部所做的一些宣传工作，有了一些改变，如“拥护蒋总司令”的口号已改为“拥护中央的领导”。因此，蒋氏的怒火，首先指向邓演达所主持的总政治部，开始指摘总政治部的宣传不当。

鲍罗庭所曾向我表示的反蒋意向，那时似还未对外公开出来。他在忙着协助联席会议建立政治秩序和政治权威。他所最注意的是外交和财政等类问题，而且负财政责任的宋子文，和负外交责任的陈友仁又都是他的好朋友，他们之间可以无所不谈。财政混乱状况的解除和外交困难的应付，确也是联席会议急待解决的问题，鲍罗庭从这些工作下手，意在使联席会议有积极的表现，俾能提高其职权；事实上也就是削减总司令的权力。

收回汉口英租界一幕，是联席会议第一次遇到的严重考验。国民政府的对英外交，原是最为棘手的。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曾发生英舰炮击万县，死伤以千计的中国人的事件，激起武汉方面的反英情绪。英国的政策一向是反对国民政府的，而国民革命的反帝运动也就是以英国为主要对象。“外国人有好有坏，苏俄最好，德国次之，英国最可恶”这句话，成了当时武汉人们的口头禅；在“集中目标反英”的口号之下，连反日情绪也显得松懈了，武汉方面就没有发生过抵制日货的运动。

十二月二十六日，汉口曾举行反英市民大会。此次大会是因天津上海两地的英租界发生压迫国民党的事件所引起。天津英租界当局曾封闭那里的国民党市党部，逮捕了国民党员十七人，转交给张作霖，其中七人并为张作霖枪毙了。上海英租界当局又封闭了《民国日报》——国民党机关报。此外，总税务司英人安格仑借款给张作霖作对付北伐军之用的消息，正在盛传着。因此，那次武汉市民大会曾通过反英决议和反英宣言。

一九二七年一月最初的三天，武汉举行庆祝国民政府北迁和北伐胜利的大会。武汉市到处都有宣传队在活动，反英宣传也是其中之一种。三日下午左右，总政治部所辖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宣传队，在江汉关附近，毗连英租界的广场上，集合了不少的民众，举行讲演会。驻扎汇丰银行的英水兵出动干涉，死伤民众多人。这事件立即震动了武汉。

我于事件发生后约一小时，到达肇事地点。那时冲突已告停止，英水兵已退到英租界防御工事后面。我目击一群英水兵凭着工事，持枪对着那些麇集在广场的群众，作射击姿态。徐谦立在一张临时安置在广场中的桌子上，背向着英租界的防御工事，不理会英军枪口的威胁，向群众激昂慷慨的演说，宣布国民政府反帝反英的决心，吁请民众分别离去，静候政府循外交途径来解决。当时群情愤激，“向租界冲去！”的呼声在高喊着，眼看更严重的冲突就要发生。我深知此时决不可与英租界发生冲突，便立即在广场上找着一些群众团体的负责人，劝他们遵照徐谦的指示，领导民众离开广场，情势才逐渐缓和下来。愤激的民众高喊着口号，结队向国民政府大厦请愿去了。

当时，我们为了避免再发生意外事件，特分别通知各民众团体，以后宣传活动，暂时不可进入租界。不料四日上午九时左右，我就接到一位同志的电话报告，谓工会的宣传队已有几队人冲入了租界，大批市民正从各路口涌到租界去。我即以电话询问李立三，他和其他工会负责人对此还全不知情，他说总工会的负责人将立刻赶到租界去，

阻止任何意外的发生。我又以电话通知联席会议的一位委员，告以情况，当时，并表示我将采取的处理方针。他赞同我的做法，并派员赶到现场维持秩序。

我放下电话，立即驱车赴英租界。此时街道上已挤满了人群，正向英领事馆行进，但还没有发生甚么激烈举动。等到我赶到英领事馆门前时，聚集在那里的群众已经不少了。我找着在场的一些首脑人物，嘱咐他们要约束群众，不可有任何暴动，不得损害外人生命财产，不得与巡捕冲突等等。我旋即进入英领事馆，看见一二十个民众团体的首脑人物聚集在楼下的大厅里，似乎是在等候上级的指示，我同样告诉他们要严守秩序。英领事馆的职员们都已退避到二楼，在楼梯口上立着一个英籍职员，态度倒也不显得惊慌。我走上楼梯，和他握手为礼；告以不会有甚么意外事件发生。他就将我的意见转告在二楼的他的同事们。这样，一触即发的紧张场面，似是缓和下来了。

不一会，李立三等人也赶来了。他们告诉我英租界内并无激烈的骚动，沿途只看见有几处玻璃窗被打碎了。他们已分别通知各工会负责人，劝告市民退出租界。他们也听说驻在汇丰银行的英水兵，已退回兵舰。因此，估计大致不会发生严重的问题。紧接着，孙科等国民政府委员也来到了，我把适才的经过情况，简略的告诉了他们，他们就上二楼和英领事谈话去了。

这就是武汉民众直接行动，收回英租界的最初一幕；此后，便开始了中英谈判的阶段。在民族怒火燃烧之下，武汉民众竟能严守秩序，对英作坚强的表示，使帝国主义

者不得不括目相看；这证明中国民族运动已进入了更有组织的形态。英国的外交本是很灵活的，他们从上海的五卅运动和广东的省港罢工中所获得的教训，似觉得一味采取高压政策，将造成中英间的深仇大恨，这对英国是不利的。也许他们觉得尽可以利用国民革命内部的矛盾，来瓦解这个民族阵线，用不着承袭已往的政策。

我目击事态业已在我们掌握之中，便离开英领事馆，驱车去找鲍罗庭。他获知了事件的经过情形之后，很欣慰的向我说："幸好避免了一场冲突。"他还指出虽然现在并无向日租界作同样示威的迹象，但仍应通知各民众团体，严格约束群众，不可有侵犯日租界的任何行动。鲍罗庭的这些话，原系我们的既定政策，用不着再有甚么讨论。此后，武汉民众对日没有甚么激昂的表示，就是我们这种政策的结果。

这次外交的胜利，也提高了联席会议的声望。一月四日，联席会议接受了各民众团体所提出的收回租界等对英四条件②，安抚了民众的激昂情绪；同时展开对英的谈判。外交部长陈友仁与英领事交涉结果，协议组织汉口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派中国军警维持英租界秩序等。

汉口收回英租界的举动，振奋了全国的民心。一月六日，九江英租界附近发生了工人与英水兵冲突的事件，邓演达由汉口赶程往九江，与九江英领事交涉的结果，照汉口的前例，派少数中国军警，于一月八日起接管九江英租界。后来，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二十两天，陈友仁与英国驻华公使代表欧玛利，先后签订收回汉口英租界协定

和收回九江英租界协定及照会。至此，汉口九江两地英租界才宣告正式收回。这也可以说是联席会议一个重大的成就。

对英外交的紧张，并没有缓和当时革命内部的纠纷。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五日，广州的国民政府宣布停止办公，实行北迁。十二月三十一日，谭延闿、张静江等率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职员，到达南昌。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告迁都武汉；立即开始办公。可是一月三日，蒋氏忽电武汉，主张国民政府暂设南昌。因之便爆发了著名的南昌与武汉间的建都之争。

建都之争和汉口收回租界的行动，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当时武汉联席会议的要人们对于蒋氏的主张，大大不以为然。他们奔走相告，迁都武汉是早已决定了的事，何况外交如此紧张，武汉又是筹款中心，如何能将国民政府改设南昌。联席会议讨论的结果，曾电覆蒋氏，表示不赞成有这种骤然的改变。

一月十日到十八日，蒋氏曾到武汉，意图说服在武汉的要人，但不得要领，失望地返回南昌去了。蒋氏所持的理由是定都问题应以战略与军事发展来决定，此时长江下游的军事正在进行，国民政府应暂设南昌。俟南京光复后，再依孙中山先生生前的意见，建都南京。并且声言，这是南昌举行的国民中央政治会议所一致决定了的；要求联席会议的要人们遵行。

联席会议的要人们则认为建都武汉原系根据蒋氏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二日的提议，经过国民党中央与国民党政

府委员们一致同意决定，并经正式公布了的。现在无论在外交上，在财政上，在军事上，乃至在人民心理上都不宜有这个改变；即使迁都南京的话，将来也可以经过一次中央全体会议的决定，再行由武汉迁往不迟。

由于这个争执相持不下，也由于蒋氏这次到武汉来，欢迎的场面虽然盛大，但一般情绪总不能算是热烈的；所有“拥护国民党中央领导！”“欢迎汪精卫回国复职！”等呼声，都使蒋氏感觉刺耳。蒋氏怀着怅惘的情绪回到南昌以后，便专对武汉的要人出些难题，向宋子文索款的电报，如雪片飞来。这样一来，更使双方的距离愈趋愈远了。

建都的争执发展成为双方非正式的互相攻讦，武汉方面有种种谣传，如谭延闿被蒋扣留在南昌，不让他到武汉执行职务；张静江则因害怕武汉革命气氛之高涨，所以留恋南昌，阴谋破坏建都武汉的既定政策；蒋氏则志在独裁，企图对国府置之于自己肘腋之下，等等。南昌方面则纷传武汉的联席会议组织之不合法，不过是共产党藉之以作为反蒋反革命的手段。革命内部纠纷至此已达危险边缘了。

一月下旬，上海中共中央派汪寿华同志为代表来到武汉，与我举行重要会谈。他的目的是要知道武汉方面的内情和我们的做法。我将武汉南昌间争执的内幕及其严重性详细的告诉他，要求他转达中央，速谋应付方略。

我向他指出，武汉南昌间的争执可能发展成为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国共的分裂，甚至发生武装冲突。目前双方已各走极端，征之已往史实，蒋氏是会不顾一切蛮干下去的，鲍罗庭也不会再行采取妥协步骤。现在是中共中央急

起应变的重要时机了。

我向他说明，现在仍有两途可循：一是中共自居超然的调人地位，以缓和武汉南昌间的争执，使问题局限于谈判范围之内。就目前实情观察，这点恐不易做到；即使试行，最少也要整个中共中央速来武汉，先与鲍罗庭商谈，才能进行。二是中共中央完全赞同鲍罗庭的既定政策，积极准备力量，坚决予以贯彻。在我看来，不管中共中央愿意与否，事实上恐非走第二条路不可了。

我向他解释目前中共的步骤是相当凌乱的，武汉方面已有许多问题不易解决。湖南方面农民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已引起武汉内部的不安；这与鲍罗庭缓和武汉内部矛盾一致对蒋的方针，又是不相配合的。江西中共的组织处于对蒋斗争的前线，领导力薄弱，我无法照顾。广东更是一个重要据点，我在这里却无法与之取得密切联系。在冯玉祥方面工作的中共党员我又一直无法联络。要解决这些问题，都非中共中央速来武汉不可。

我建议中共中央不必过份重视上海方面的工作，因为上海究竟是帝国主义的坚强基地，如果蒋氏占领了上海，可能要屠杀中共党员的；至少中共中央在那里不可能有多大的作为。中共中央如果搬来武汉，可以加强湖南、湖北、江西、广东至西北等区域工作的领导，积极武装工农群众，来应付这场生死交关的斗争。

汪寿华这个青年同志（原名何金亮）系留俄学生，曾在海参威华工中做了几年的工会工作。一九二六年十月间回到上海，接替李立三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的主委，

直接领导上海工运。他虽然很能干，但不免少年气盛，将事情看得太简单。他曾向我夸耀上海八十万有组织的工人的重要性以及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上海工人第一次暴动的经过等等。

他又向我描述上海的国民党员钮永建、吴稚晖等对中共的态度良好，已组成一个国共联席会议；一切工作都在联席会议协商解决。上海的青帮首领杜月笙等与中共关系也很密切，他几乎每天都要与杜月笙见面；上海没有流氓捣乱工会的事件发生。他说明中共中央对于上海工作寄予很大希望，认为如果北伐军打到上海，上海必将在中共掌握之中。他这些话，显然没有充份了解武汉与南昌间争执的严重性和上海社会的实际情形。我曾严重的警告他，这是一种极有害的幻想；既没有觉察帝国主义的利害，也为蒋介石的假面具所欺骗了。

汪寿华应允将我的意见转达中央，他个人并极力予以支持。在他行前我还向他说到许多事是不能用通讯方法解决的。上海武汉间几次来往的人，都没有达成任务；这次我希望他能不虚此行。谁知汪寿华到达上海之后，我的建议又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而最可痛的是这位天真的汪寿华本人在该年四月十二日清党的前夕，在杜月笙的客厅中，被绑走断送了性命。

二月间，威金斯基继汪寿华之后，由上海来到了武汉；这似是我从上海方面得到的仅有答覆。他此行目的，是来和我与鲍罗庭商谈对蒋政策。但他除与鲍罗庭争吵了一场之外，不能有甚么成就；他那次往返商讨，不仅没有澄清

中共内部的混乱，甚至是贻误了时机。

威金斯基在武汉考察了一般情况，似乎特别受到俄顾问加仑等人的影响，提出了与鲍罗庭不同的意见。他向我表示革命阵营内部不宜分化太快；否则，将无以对付北方军阀及帝国主义的雄厚势力。对中共与工农运动，也是不利的。他说到在武汉的俄顾问中有些不同意鲍罗庭的作法，并且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蒋介石究竟不是陈炯明，鲍罗庭更不是孙中山。"他提议让他去南昌一趟，与蒋寻求谅解，以避免革命内部的过早分化。

我向威金斯基表示，他的主意能否收到成效，大有疑问，但不妨一试。我着重指出反蒋阵线包括一些不可靠的旧军人和动摇不定的左派政客，即使胜利了，局势也未可乐观的。如果他的南昌之行，能够使目前武汉南昌间的对立状况，稍微缓和一下，让中共能够多一点准备的机会，也是值得的。不过事态发展到了今天，要想挽救也不能存过高的希望。

几天之后，从南昌回来的威金斯基，果然向我简单的说："事态已无法挽救了。"在鲍罗庭的办公室中，他们两人又展开了争论。鲍罗庭似是以列宁自况，指斥威金斯基充当了反对十月革命的卡米涅夫和李洛维夫那种工贼的角色。他说到威金斯基南昌之行，既未达到预期目的，反动摇了反蒋阵线，增长了蒋的气焰，损伤了我们自己的威信。威金斯基也反唇相讥，指出鲍罗庭的做法并不是甚么布尔什维克的路线，而是玩弄手腕的政客行为；其结果将不利于中国革命和苏俄在中国革命的地位。

鲍罗庭知道我是支持威金斯基此一行动的，因而特别指出我与威金斯基主张的不同，以减少贯彻他的主张的阻力。他说明他明白我虽也不愿革命内部分化太快，但清楚知道反蒋已势成骑虎，不能退缩；所以我老早就要求中共中央迁来武汉，集中力量来应付这场斗争。而威金斯基却一味在那里唱反调和摇摆不定。鲍罗庭最后还是劝告威金斯基，说他的调子事实证明是唱得已经迟了，现在是不能有所选择了，如果大家同心协力照他的政策做下去，结局也许不会如威金斯基想像的那样恶劣。

威金斯基终于无法扭转鲍罗庭的做法，快快的返回上海。他行前曾向我表示，中共中央不在这里，是无法限制鲍罗庭的行动的。他确认中共中央有迅速搬来武汉和立即筹备召开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必要。他后悔他这次确实来迟了，以致无能为力。他应允回上海与中共中央商讨，以谋妥善解决。

可是后来事实证明，威金斯基回到上海以后，也不能很快的改正中共中央所抱"上海第一"的倾向。它依然留恋着上海，等到它后来搬到武汉时，已在四月十二日上海遭受了大灾难之后；同时，武汉也已到了"夕阳无限好"的时期，难于有所施展了。总之，在后来国共这一幕大打斗的闹剧中，共方领导上的无力和内部的纷歧，暴露无遗；而蒋介石将军却在那里采取主动，独断独行的干下去；胜负之数是毋待龟卜的。

① 冯玉祥的国民军自一九二六年春为奉直联军所败，便向西北退去，冯本人赴苏俄考察。他的第二军之李虎部和三军之杨虎部则退守西安，为吴佩孚部所包围；一直等到冯玉祥带着苏俄顾问，自俄归国，决心参加国民革命，于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在五原誓师，西安被围已达八月之久。据冯玉祥说，当时他的作战方略，本有“由南口攻北京”和“解西安之围而出潼关”两条路线，后因李大钊先生的建议，他才决定采用往西安出潼关的计划，卒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解西安之围。（见冯著《我的生活》第六一九页，上海教育书局民国三十六年初版。）

② 条件全文见宋云彬著《中国近百年史》，第二四七页——第二四八页，新知书店，民国三十七年港版。

# 第 三 章

# 清党与宁汉对立

武汉南昌间建都之争迅即转化为军权与党权之争；接着又激荡成为蒋氏所领导的反共阵线，与武汉所领导的反蒋阵线的对垒。这个剧烈的斗争形势演变的结果，是蒋氏逐渐占了上风，武汉则相形见绌。因为蒋氏不仅握了兵权，而且获得旧社会保守势力的支持；南昌克服之后，显然又得着外力的支援。而武汉的反蒋阵线却具有先天的不稳定性，意志又不统一，因而易为蒋氏的反共旗帜所击败。

武汉方面因建都问题展开反蒋攻势时，声势原是颇为浩大的。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四日，武汉三镇国民党组织举行代表大会，董必武任大会主席，致开幕词。联席会议主席徐谦莅会发表演说，强调维护党员，军事领袖必须服从党的领导等等言论。会议通过下列决议：一、加强中央权力；二、统一党的领导机构；三、立即召集中央全会解决党的问题；四、欢迎汪精卫复职；五、昏庸老朽之辈站开；六、拥护国府外交政策，反对党内反动分子与帝国主义妥协的企图。会场并高呼“打倒张静江！”“反对军事独裁！”“反对反动派！”等口号。这一动人的举措，不用说，自然是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协同进行的杰作。

武汉南昌双方，都曾主张召集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以解决党内纠纷；但对会议的地点，则各坚持要在本身势力范围内举行。换句话说，蒋氏主张在南昌，联席会议则主张在武汉。此外，双方又都标榜着以“救党”为己任，互责对方违反党纪。蒋氏曾指徐谦窃据党权，漠视他的国民党中常会主席的职权。

对于会议地点的争执，胜利属于武汉。因为当时大多数国民党中央委员都荟集在武汉，而且一致主张在武汉举行；使蒋氏觉得如果坚持己见，无异自招独裁之讥；同时，他正锐意经营东南，已有实力第一的想法，根本就瞧不起甚么会议的决定；而且南昌的国府主席谭延闿从中百般疏解，力劝蒋氏不必走向极端。因此，这一次争执乃告解决。谭延闿终于在三月七日偕陈果夫等到达武汉，蒋与张静江则留驻南昌，未出席这次大会。

从莫斯科回来的谭平山于二月底到达武汉①，他积极支持鲍罗庭的反蒋政策，并成为中共参加国民党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他对中共与国民党左派的合作，抱乐观态度。他曾描述斯大林对于中共中央那种脱离国民党自谋独立发展的倾向，是不赞成的；而对于他与国民党左派的友好合作关系，则极为重视。他拥护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党员参加国民政府工作的主张。因此，在这一阶段中，他与鲍罗庭是志同道合的。

三月十日到十七日举行的国民党三中全会②，很明显是左派胜利了。会议中曾首先根据徐谦的报告，批准联席会议的工作；追认该会议一切决议的效力。这无异是对蒋

氏否认联席会议的一个直接答复。会议又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案》和《中执委会下的军事组织大纲》等重要决议。根据这些决议，选举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顾孟余、孙科、谭平山（中共党员）、陈公博、徐谦、吴玉章（中共党员）等九人组织中央常务委员会；汪精卫、顾孟余、邓演达、陈公博、陈其瑗③、何香凝、彭泽民分任国民党中央组织之宣传、农民、工人、商民、妇女、海外各部部长；这样一来，蒋介石、张静江、陈果夫等人在国民党中央的原任职务就被取消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增加了宋子文、陈友仁、邓演达、林祖涵（中共党员）、王法勤、宋庆龄等六个左派人物；并选汪精卫、谭延闿、孙科、顾孟余、徐谦、宋子文、谭平山七人为政治会议的主席团。军事委员会委员定为十五人，蒋介石等当选为委员，蒋介石与邓演达等为该会主席团主席。国民政府委员定为二十八人，汪精卫等当选为委员；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宋子文、徐谦五人当选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

这些决议显然是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的翻案文章。主要是打破了蒋氏所培植起来的个人军事独裁的局面。除上面所说到的这些人事更易之外，还制定了一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组织条例，其中规定总司令应对国民党中央负责，这是将军权置于党权之下的重要表示。蒋氏虽仍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之一，但与过去他所建立起来的权力相较，是大为削减了。

国共关系的调整，也是这次会议主题之一。这次会议

所通过的《统一革命势力案》，其决议内容是：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组织开联席会议，讨论合作办法；并应第三国际的邀请，派代表三人，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商洽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④。这与过去蒋氏一味限制中共党员活动的办法，有了显著的不同；不过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部长职务，仍是没有中共党员参加，多少还是不能摆脱国民党二中全会党务整理方案的羁绊。

国共关系由国民党党内的合作，进展到了在国民政府中的合作；这似是鲍罗庭首先提出来的。他在到达武汉之初，即曾向我提到；后来共产国际便有中共党员应参加国民政府工作的指示，用意是要加强中共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国民党的左派同意这种主张，徐谦在二月二十四日的演说中，即曾提到这一点。会议又决定国民政府增设劳工、农政、教育、实业、卫生五部，中共党员苏兆徵和谭平山因而被任为劳工农政两部部长。此外，会议也决定容纳中共党员参加各省政府工作，并批准湖南民众团体所提召开省民会议的提案。

这都显然是国共关系的重要演变。在国民党左派要人们看来，为了巩固反蒋阵线，这些措施都是必要的。在中共中央方面看来，这是国共合作的进展。中共中央的一些文件中，有时说到“团结”左派，有时又说到“领导”左派；实际上仍将中共党员参加国民政府工作一事，看作是实际支持左派的行动。中共的作法是要捧着左派去反蒋，并没有逐渐代替左派的意向。也可以说，这些办法是使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合作，演化为两党在政权中的合作；同时，中

共历来为国共关系伤透脑筋，似乎也可以借此得到一个解决办法。

毫无疑问，导演这一幕的人是鲍罗庭。他的目的是要将国民党左派和各军首领以及中共的工农势力，组合成一个反蒋阵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是煞费苦心的。如中共党员参加国民政府工作这一点，他曾向国民党领袖们反复解释，强调中共党员担任劳工农政两部，可以将工农势力纳入国民党领导的正轨之内，也可以达到纠正工农运动的过激发展。但当他向中共的负责人方面解释时，却着重说明中共党员参加国民政府工作，可以逐渐增加中共在政权中的份量，以影响国民政府左倾，并且是无产阶级获得领导权的一个途径；从此，中共可以不再做革命的苦力了。

国民党三中全会是武汉反蒋运动最精彩的一幕。可是，事情也并不可能仅凭会议解决，还须有实力作后盾。做漂亮文章似乎是武汉的特长，会议的决议案固然是多彩多姿，宣传工作也是做得有声有色，但不免空言多于实际。实力的不够充足和意志的纷歧，都不是一时所能弥补的。因此，在三中全会以后，武汉方面就表现出力不从心的迹象了。

蒋百里⑤誉为“有决心的军人”的蒋介石将军，却是最重视实干的；他的独裁意志甚为坚强；对于如何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也是胸有成竹。在他行动的时机未成熟以前，他多少还能忍耐；譬如，他曾否认反对汪精卫；也根本不反对联俄容共政策；更否认他有联奉⑥联日⑦等等意图。他还是以秉承孙中山先生遗志的国民党正统自居，并表示他

所反对的只是武汉的异端。这些姿态，显然是为了维系他当时在革命阵营中的威望。

到了国民党三中全会举行的时候，蒋氏便开始他的行动了。他再也不掩饰他的反共决心；而且一起始就用非常手段来对付中共和鲍罗庭。“反共”这一面旗帜，确是他在这次斗争中，获得胜利的重要关键。他不仅借此团聚了国民党内外的保守势力，也对武汉阵营起着重要的分化作用；更能由此而争取到列强的援助。反之，武汉的“党权”旗帜，却是黯然失色的。在一般人看来，这只是国民党党内之争，与他们并无切身利害关系。在一般国民党员看来，武汉的反蒋救党运动，无论是否正确，总是受着共方势力的影响。

蒋氏的反共行动由江西开始。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一日，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被枪决了；这是中共党员在反蒋运动中被牺牲的第一个人。三月十六日，蒋氏命令解散拥护武汉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另行由他指派亲信重新组织党部。三月十九日，蒋氏又以武力解散左倾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九江总工会。此外，福州安庆等地蒋氏势力所及的地方，都先后发生过杀害中共党员的事件。蒋氏反武汉赤化的旗帜，就这样由他以命令和铁血公开举起来了。

革命阵营内部起了激剧的分化。不赞成反蒋的人们纷纷离开武汉，左倾的人们也因长江下游难于立足，开始向武汉集中。譬如，第十师师长陈铭枢就因不赞成反蒋，在三中全会举行的时候，辞职走了。他后来在上海一带活动，对于拉拢蒋介石、李济琛、李宗仁等实力派共同清共的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邓演达属下在长江下游的政治工作

人员和一些被驱逐的党部工作人员，又纷纷逃来武汉，在那里诉说他们本身被蹂躏的经历。

双方对垒的形势已成，再也没有转圜的余地了。和蒋氏一起工作的加仑将军那时也带着他的助手离开了蒋氏的总司令部，来到武汉，继续任国民党政府军事顾问的职务。中共方面在蒋氏身边工作的蒋先云同志也于辞职后，由南昌返回武汉。原随谭延闿来汉参加会议的陈果夫等则于会议结束后，返回南昌向蒋氏复命去了。这样，武汉南昌间的各种联系宣告断绝。

蒋先云这位青年军人值得在这里特别提一下。他的苦闷心情，似乎是当时一般青年所共有的。他是黄埔第一期的高材生；在他就读黄埔以前，在湖南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成为中共的正式党员，领导过湖南水口山矿工罢工运动。他为当时我们一般同志所敬爱，也与我有很深的友谊。他又是蒋氏所喜欢的学生，被任为总司令部秘书，在蒋氏身边工作。蒋氏与中共间的联系，往往都是经由他办理的。

蒋先云同志是一个真诚的共产党员，爱护中共的一切；同时，是一个有抱负的青年军人，敬佩他的蒋校长，并爱护黄埔的一切。他一直有一种天真的想法，认为中共与黄埔都是革命的精华，如果彼此间能够消除误会，合作下去，中国革命前途是灿烂的，否则将不堪设想。他那时曾多次奔走南昌与武汉之间，企图挽救双方的破裂。他不仅曾多次向我说明与蒋氏合作的重要性，也曾多次向蒋氏进言，要求他继续联俄容共。但他究竟太天真了，没有深切了解

蒋氏的意向所在，同时，毕竟是人微言轻，敌不过张静江等人将蒋的包围。

剧烈斗争的火花使蒋先云同志陷于苦恼的境地，他由南昌回到武汉以后，总是表现得有些怅惘若失。他要求实地作战，决心以鲜血来贡献于革命。不久，他被任为第四军的团长。后来在河南与奉军的激烈战斗中，奋勇冲杀，对那次战役的胜利，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可是，他自己就在那次火线上，怀着怅惘的心情阵亡了。

蒋氏的反共行动立即引起了武汉方面的反击。三月十五日，湖北全省总工会为了抗议陈赞贤的被杀害，发表宣言，指摘蒋氏的行为为反革命。三月十六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发表支持三中全会的决议的通电，强调党权不容为蒋氏所篡窃。三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机关报武汉《民国日报》，发表题为《民众联合起来，推翻蒋介石》的社论，宣告蒋氏再不是总理的忠实信徒，而是反革命；并列举他的种种罪状，要求罢免其职务，并予以惩处。

武汉南昌间的破裂，与当时的军事发展是密切关联着的。在南昌克复以后，蒋氏在浙江各省的军事行动获得了可观的成绩，这也是他坚决反共的一个有力凭借。蒋氏一一直不理会鲍罗庭加仑等人的反对意见，全力向东南各省进军。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浙江省长夏超宣布浙江独立，保境安民。这是蒋氏分化孙传芳势力所收到的初步效果。第一军军长何应钦所统率的东路军于十二月十八日攻克福州，继续向浙江进兵；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又占领了杭州。该年一月间，第二、六、七等军沿长江东进，直指

南京。孙传芳所辖安徽督办陈调元宣布投靠革命，这又减轻了北伐军东进的阻力。

国民党三中全会举行的时候，北伐军正由浙江和安徽两路向上海南京挺进，这是依照蒋氏军事上计划的行动。当北伐军进攻到上海附近的龙华时，上海工人于三月二十一日发动了总罢工，与驻在上海的直鲁联军进行巷战。二十二日直鲁联军狼狈退出上海。北伐军因于三月二十三日顺利的占领了上海。同日，程潜所统率的二六两军攻占了南京城外的雨花台等高地；城内的敌军向长江以北的蒲口退却。二十四日清晨，革命军进占了南京。革命内部斗争的中心也就随着转到上海南京去了。

武汉当局深信蒋氏以南京上海为据点，展开反武汉的行动，因而决定不让蒋氏有完全支配上海南京的机会。具体办法是派宋子文为中共财政特派员，赶往上海，直接掌握上海这个经济中心的财权；并命令程潜所部巩卫南京，阻止蒋氏在那里建立反武汉的中心。

三中全会结束后的一两天，林祖涵告诉我，国民政府已有一个俟机逮捕蒋介石的秘密命令，交给程潜执行。他向我说明连日少数要人集议的结果，决定责成二六两军控制南京地区，不使蒋氏在南京另建中心的阴谋得逞。如蒋氏违抗，江右军总指挥程潜便可根据国民政府的密令，将蒋氏逮捕起来。

林祖涵还说到这个重要措施，似是鲍罗庭所授意，为各主要人物所一致同意的。他因为是程潜军的党代表，才知道了这个机密。他认为程潜即将出发前线，对反蒋颇具

诚意，表面上虽然满口答应要完成这个重大任务，但暗中也流露出身当其冲、踌躇为难的神情；所以将来能否执行这个密令，还是有问题的。我虽事先未与闻其事，但对于即将偕同程潜驰赴军旅、肩负重责的林祖涵同志，仍予以鼓励。并立即用机密方法，通知上海中共中央，请就近予程潜以协助。

程潜这个江右军总指挥，指挥他本人的第六军和鲁涤平的第二军（军长系谭延闿，因任国府主席留驻武汉，由副军长鲁涤平代理），配合江左军李宗仁部和苏杭右翼蒋氏第一军的一部份，向南京挺进。结果，攻占南京的任务是达到了，控制南京的任务却失败了。

三月二十四日凌晨，直鲁联军褚玉璞部向长江以北退却，北伐军前锋开进南京城内的关头，敌军的一些残部，乘机抢劫，城内秩序大乱，并发生了袭击外国领事馆及外人住宅的情事。英领事等一些外人受伤，泊在南京江面的英日兵舰乃开炮轰击南京城，死伤多人。程潜部大队进城后，忙着重建秩序，镇压抢犯，并护送外国领事及外侨出城，安全登上兵舰。

外舰炮轰南京事件的发生，使程潜陷于不利的地位。当时列强的政策，正利用蒋介石以反对武汉的赤化，日本在这一政策中，起着主导的作用。三月二十六日，蒋氏乘舰由安庆抵达上海后，立即得到在上海的国民党一部份中央执监委员的支持，江浙财阀经济上的援助⑧和外人方面的助力；同时他与李宗仁李济琛等实力派的反共联合阵线也在酝酿成熟之中。他利用了这些优势和一七两军的实

力，压迫程潜部退出南京。四月上旬，程潜部不得不向南京上游撤退。从此，南京便在蒋氏控制之下，武汉的反蒋计划也就受了第一次的大打击。

这些演变，彭述之有一段曾亲历其境，他向我作过清楚的叙述。在程潜向南京进军时，他就奉着上海中共中央的使命，于三月二十四日赶到南京，协同林祖涵李富春（当时任第二军政治部主任）等同志，主持那方面的工作，以期实现控制南京的目的，后因程潜部撤出南京，他便于四月上旬来到武汉。他向我追述他在南京的经历时，首先说到南京发生的侵犯外人住宅和领事馆的行为，是尚未退却的敌军残部，在抢劫混乱中所干的。

他描述南京惨案发生后，立即引起反帝的怒火。北伐军和南京民众，原受着历次反帝运动的洗礼和汉口收回英租界的鼓舞，现在复目击外舰轰击的暴行，反帝情绪自然有如波涛汹涌，随时都可能招致外人干涉。他一心忙着鼓励反帝运动，同时又要防止侵犯外人生命财产的行动之继续发生。其他的同志们和二六两军的首脑们的注意力，亦大都侧重在这一方面。

他又说到，几天以后，他发觉南京周围的军事要地，都已为蒋介石的亲信部队所占领及设防了。二六军的大部却散处在南京城内执行着维持秩序的任务，显然，在对蒋的军事上已处于不利的地位。后来蒋氏又续调部队向南京周围集结，加以压迫，程潜部就不得不退出南京。他也因南京的大势已去，只好来到武汉，再作计较。

彭述之叙述这些经历的时候，曾面带愧色的自承对于

处理军事斗争缺乏经验。我也曾怒斥他的无能，指出一着之差，影响了全局；为何反帝的偶发事件，放松了控制南京地区的军事布署。其实，我当时对他的责备，不免是过分了，因为处理的权力完全握在程潜的手上。

程潜之所以失去南京，踌躇不决是一个重要因素。他究竟不是中共党员，不能和中共党员一样的坚决反蒋；而且二六两军的军人们多系湖南籍，他们的家属受到湖南农运的威胁，也有不满武汉左倾作法的情绪；再说他们与唐生智是不和的，对蒋又并无深仇大怨，那里肯替人火中取栗，守着南京与蒋硬拚起来呢？鲍罗庭没有充分估计到这些情况，以致铸成大错。林祖涵也就因程潜反蒋的不够坚决，从此离开了第六军。据说他们这两位老朋友，还曾因此拍桌子对骂了一阵才分手的。

当时在武汉方面看来，失去了对南京的控制，是十分丧气的事，这是反蒋计划第一回合的失败。鲍罗庭对这一点尤为伤透脑筋。其实，形势比人强，双方的胜负，也并不是决之于南京的得失。

三月二十六日到达上海的蒋介石氏，展开了反共的激烈行动。他开始以恐怖手段来摧毁中共。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由上海发动了国民党清党运动，大规模屠杀中共党员，并迅即普及蒋氏势力所及的区域。同时他扫除武汉政府在长江下游的势力据点：如四月初，二六两军之被逼撤离南京；四月二十日，宋子文的财政部上海办事处，被蒋氏下令撤销等。他更进而在南京另建一个对抗武汉国民政府的中心。四月九日蒋氏由上海移驻南京，召集国民党中央会议，四月十八日正式在南京成立另一个国民政府。

革命阵营内深刻的分裂，乃以宁汉的对立著称于世。

从中共的角度来看这些演变，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确是太缺乏经验和应有的警惕了。它天真的执行着国共合作的政策，对民族统一战线怀有过高的幻想。其实，军人们的独裁气质、封建保守势力的顽固性、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和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都是中国社会结构的特征，在反帝的立场上，这些成份也可能表现出民族革命的意识，但在社会改革问题上，却是革命的阻力。而且中共不免从有利于革命方面来看问题，陷于自我陶醉的境界；既看不清甚么是国民革命所能容纳的限度，也没有深刻觉察蒋氏势力的本质。

在上海克复以前，中共曾领导上海工人举行过三次暴动。第一次是为了响应夏超在浙江的独立，发生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旋因夏超的失败而中止。第二次又为了响应北伐军的占领杭州，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举行暴动，惟以北伐军未能即时向上海挺进，再告失败。到了三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北伐军占领上海的前夕，中共才成功的组织了第三次由工人暂时占领上海的大暴动⑨。

上海工人的这些暴动都是国共合作政策的产品。暴动的时间是由蒋氏的代表钮永建根据军事进展情况所决定的，实际组织暴动则完全由中共负责。当时，国共双方在上海所组织的联席会议的参加人，国民党方面是钮永建、吴稚晖等，中共方面是罗觉、汪寿华等。他们合作得很圆满，因为国民党需要得着上海工人的助力，极力对中共和上海工人表示好感。中共则以为上海工人多卖一分气力，将来就可多获一分权力，中共所企求的是克复上海后，能由上海市民大会，选举出一个市政府；而工人在市政府中

能获得适当的地位。在这个问题上，钮永建、吴稚晖等欣然同意，并曾予以保证。

上海被占领后，市民大会是召开了，市政府的委员也选举出来了，可是国民党的态度也改变了。首先是国民党方面的主要负责人钮永建称病不与中共代表见面，拒绝任何协商。接着上海工商界选举出来参加市政府的代表，也托词不参加市政府的会议。中共则仍根据联合战线的想法，在敦促那些不出席的代表们，积极参加市政的工作。谁知蒋氏到达上海以后，不问国共双方联席会议的协议，声言市政府并未经过他的委派和批准，是不合法的，并禁止市民会议的集会。

这些事并未使中共发生足够的警惕。武汉方面反蒋的作法是中共中央所已知道的；同时共产国际也曾电令上海中共中央将工人的武装埋藏起来，当然是料定蒋氏将有压迫上海工人的举动，而工人是无法抵抗正规军的压迫的。可是，中共似是认为事情还不致恶化到这样的地步，因而不仅没有遵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也没有足够的戒备。

恰恰相反，蒋氏的反共行动迅速而坚决。四月二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在上海集会，由吴稚晖提出检举中共案，要求各地军事领袖，采取非常紧急处置办法，将中共党员分别看押监视。同时，蒋介石、李济琛、李宗仁、黄绍雄等在上海总司令部举行军事会议，商讨具体办法，以实现吴稚晖所提出的清共方案。三日，福州便有拥党大会的举行，通电主张肃清跨党分子等十六条。五日，蒋氏下令封闭总政治部的上海办事处，并逮捕其中工作人员多名。

八日，蒋氏所任命的国民党上海政治委员会正式成立，掌握了上海市的统治权。九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等发表救国救党通电，公开反对武汉。同日，国民党南京市党部被捣毁；市党部委员侯绍裘等同志被捕。在在都证明，蒋的反共攻势是剑及履及的全面展开了。

当时，汪精卫与陈独秀联合发表的宣言，对中共中央还发挥了一些催眠作用。原在法国养病的汪精卫经由莫斯科回国，恰于四月一日抵达上海。他曾与蒋氏及其老友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协商；蒋坚持立即驱逐鲍罗庭和清共。汪则主张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解决一切纠纷⑩。汪的此一主张，曾被吴稚晖等斥为拘泥于党的法统，不能认清反共应采非常手段的立场。汪乃与陈独秀晤谈，企图获取中共方面的支持，以增厚他的政治资本。因而由他们两人发布了一个联合宣言。

四月五日，汪精卫与陈独秀以国共两党领袖的身份，发表联合告两党同志书。其中内容阐明：中共一直坦诚而忠实的承认国民党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国民革命的基础，号召两党同志，继续密切合作，须鉴于敌人之武力压迫及流言离间，抛弃彼此间的疑忌，事事开诚布公的协商进行，政见即不尽同，亦无须强求一致。但此一宣言并未能缓和蒋氏的反共决心，吴稚晖还斥之为“汪的谬论”。

可是，此一文件却引起了中共的错觉，陈独秀等似在回味着过去与钮永建、吴稚晖等合作的好日子。蒋氏初到上海也曾嘉奖上海工人协助克复上海的功绩，并赠送上海总工会一面“共同奋斗”的旌旗。这使中共中央觉得蒋不会

有什么压迫上海工人的异动。而且驻在上海的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薛岳⑪等人对上海工人种种同情的表示，也使中共中央抱有幻想；现在又有了汪陈联合宣言，中共中央更认为紧张的时局必将因之而缓和下来。

其实，汪的回国和汪陈宣言，不仅没有缓和局势，反而加速了蒋氏的行动。蒋氏到上海之初，表面上虽对上海工会表示友好，暗中却在积极准备消灭这个眼中钉。他一开始就联络上海帮会领袖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织中华共进会，将帮会人物编成蓝色制服的队伍，准备采取破坏工会的行动。四月十二日凌晨，当中华共进会的蓝衣队向上海总工会进攻时，驻在工会里的工人纠察队尚在睡梦之中，仓卒起而应战。总工会的委员长汪寿华却在几个钟头以前，被骗在中华共进会主要负责人杜月笙家中，进行友谊协商，而堕入了陷阱。同时，上海警备司令白崇禧受蒋氏密令，以平息工人内哄，解除双方武装为藉口，派出大批军队，将正在应战的工人纠察队全部缴械并逮捕多人。顷刻之间，上海号称八十万工人的组织和五千工人的纠察队就被摧毁了。这也就是有名的"四·一二"国民党清党的开始⑫。

事态发展到这样严重的地步，中共中央似仍未完全觉醒过来。当时在上海任工人纠察队副总队长的周恩来还奉命凭藉他在黄埔的旧有关系，奔走于军事当局之门，企图保释那些被捕的工人们；他也因此一度被软禁，几乎丧失了生命。四月十三日中共领导上海工人在闸北举行群众大会，准备向上海警备司令部请愿，释放被捕工人。当这个

队伍行至鸿兴路口时，军警即以机关枪向他们扫射，不少的徒手工人，顿时纵横倒毙于街头。这样，那些曾以热血贡献于北伐的上海工人们，转眼之间，竟又作了北伐军射击的对象。

至此，中共中央才认识到整个世界确实变了，可是已经太迟了。“四·一二”这一幕后果的严重性，是无法精确估计的。即以蒋氏而论，他在这一幕中，固已获得胜利；但从远处来看，究竟是获利抑或负债，尚有待于历史的判断；至少，这次事件激起了共方对他们的刻骨铭心的仇视。再以共方而论，共产国际的中共留在国民党内的国共合作政策，亦为血的教训所否定。而中共中央陈独秀先生的领导，威望从此失坠，造成了他后来的垮台。

上海南京一带所发生的突变，立刻引起了我们——武汉的共产同志和一些国民党左派——的各种不同程度的愤慨，纷纷研究对策。鲍罗庭显得十分焦急，他主张中共应更加约束工农运动的过激行动，以期减轻武汉内部的矛盾，同时强调用武力实行讨伐蒋介石。可是，鲍罗庭究竟力不从心，事实上无法贯彻他的主张。四月十日，汪精卫由上海到达武汉（正是“四·一二”清党的前两天），他在盛大的欢呼声中，和过去一样发表激昂动人的演说。他曾向我表示：过去一年来紧张的革命时期，他竟出国养病去了，这次回来当负起责任，为党国效劳，不使总理遗训遭到破坏。他并未将上海方面的严重形势尽情告诉我，但显得有点神色不安，已不如从前那样的容光焕发了。

汪精卫的回国似是太迟了，消弥冲突的机会业已失去，

也不能掌握当时局势的发展，无力挽狂澜于既倒。在他没有回国以前，人们都对他寄予莫大的希望，到达武汉的最初两天，也曾发生过振奋人心的作用。可是几天以后，他也和其他的人一样，陷于一筹莫展的苦恼境地了。总括的说，他的作用是降低了，并不能发挥团结左派的力量，甚至使武汉的阵营更加动摇。其症结所在，很显然，在刀光剑影之下，空言毕竟是无补于实际的。

上海南京的恶劣消息传到武汉以后，“讨伐蒋介石”和“革命的站到左边来”等等呼声，从汪精卫的口中，四向传播，响彻云霄。四月十七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蒋介石的党籍，罢免蒋氏总司令的军职。同时，反蒋的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等等行动盛极一时，但涉及到真正的行动如东征讨蒋之议，则仍是议论纷纭，莫衷一是。

武汉的国民党人士和一般社会知名人物对蒋氏行动的观感极不一致。有的认为蒋的行动根本破坏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确是一个叛徒。有的认为蒋氏不择手段，杀害战友，并波及自己的同志，无异摧毁革命的基础。有的侧重于反对蒋氏的另建中心，认为这是分裂国民党的行为。有的认为蒋氏与中共的冲突，是各有是非的。甚至还有些人在暗中赞许蒋氏反共的果决。可见在当时反蒋阵营内，人心也不一致。

蒋氏的反共行动在上海发动以后，迅即普及于其势力所及的区域。四月十五日，广东李济琛的清共手段，较之蒋氏尤为残酷。当天他在广州，调遣军警，宣布戒严，逮捕了约两千名的中共党员及其同情者，封闭了二百多个工

会等团体；黄埔政治教官熊雄等著名中共党员就是在那次镇压中被杀的。其他浙江福建等地的清党工作，手段的残酷也表演得淋漓尽致。而且受害的不只是中共党员，也有不少是所谓国民党左派⑬。

武汉方面唯一差强人意的事，是江西当局采取了支持武汉的态度。蒋氏的反共行动，首先原是江西开始的，但不久他离开了江西，由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以江西省政府主席名义，掌握了统治江西的实权。那时，朱培德是比较接近于汪精卫而不满蒋氏的跋扈的。因而他在蒋氏离开江西以后，改采支持武汉左派，打击蒋派的政策。但朱培德将军这种态度，也只是暂时性的；敌不过当时弥漫于湘、鄂、赣三省"反工农运动"过火的声势。

蒋氏的反共行动似乎"得道多助"。三月一日俄轮"巴来亚列宁那"号，从上海开赴武汉，道经浦口时，被张宗昌部所搜查，乘客鲍罗庭太太及其他几位俄籍旅客，均被拘押，苏俄与武汉间的交通由是被截断了。四月六日，张作霖得到北京外国使团的允许，派军警进入东交民巷，搜查俄大使馆及苏俄的远东银行和中东铁路办事处，逮捕藏匿在俄大使馆内的李大钊等六十余人。四月二十八日，李大钊、路友予等二十个北方国共领袖，被处绞刑。这件事对武汉有重大影响。在俄顾问方面说来，是丧失了联系他们的总机构；在国共两党说来，是毁灭了它们在北方活动的首脑部；也予人心以沉重的打击。不用说，武汉方面的不利情势，使蒋如虎添翼。

武汉方面在财政经济上也有困难。武汉一直因军事的

供应浩繁，税捐的加重，经济不景和工农运动的兴起等等，早已发生了资金外逃，物价高涨等现象。四月十七日，武汉政府不得已颁布《现金集中条例》，走上了靠发行纸币来维持开支的道路。武汉不仅不能从上海获得经济上的支援，北京上海银行界并于四月二十一日共同宣布与汉口各银行断绝来往。蒋氏所盘据的长江下游，对武汉又实施经济封锁。五月三日，南京当局明令禁止武汉中央纸币的流通。这一连串的手段，使武汉物价高涨，纸币贬值，经济财政陷于极度混乱，无法作有效的挽救。上述情况，使武汉处于极度艰难的地位。在武汉方面看来，这都是帝国主义的毒手所直接间接造成的。武汉的一些要人们认为蒋介石、张作霖乃至北京外交使团，在那里互相配合，一致行动。蒋介石、李济琛、李宗仁等实力派之能够联合反共，不仅有帝国主义者在后面撮合，而且予以实力支援。至于武汉内部的动摇和经济困难等等，也都是帝国主义者在那里作怪。

四面楚歌中的武汉，亟图予蒋氏以实力打击以求取出路。鲍罗庭在那几天的态度似近于疯狂，他曾向我表示，历史上任何一个革命，都要先肃清内部，现在我们内部已产生了第二个陈炯明，怎样谈到北伐？目前，应乘蒋介石立足未稳，迅速东征，除去这个心腹之患，武汉才能立足得住。鲍罗庭这种议论，至少在表面上得着了武汉要人们的热烈支持；这些支持似也鼓励了鲍罗庭的勇气。

加仑将军在这个问题上却抱有不同的见解。四月下旬有一天，他曾约我在他的寓所晤谈。他对着地图向我指出，

现在中国有三个力量：一是北京的张作霖；二是南京的蒋介石；三是武汉。在外人眼中看来，张的势力最强，蒋次之，武汉最弱，奉张正在河南增兵准备南下，如果我们能首先消灭张作霖，武汉的实力地位就要跑到第一了。加仑这些话是表示他主张暂时放下东征讨蒋的计划，实行继续北伐。

我根据所知道的情况，不得不赞成加仑的看法。我曾向他说："先东征讨伐革命内部的叛逆，在原则上是对的；但现在的问题，不是应当与否，而是能否做得到的问题。现在武汉的要人表面上虽赞成先东征，但是否表里一致，颇成问题，最主要的是谁去打硬仗。二六两军退出南京，已表现出反蒋的不够坚决，第三军守在江西，力量有限，他们会去打先锋吗？听说第四军一些将领们，认为主要的敌人究竟是张作霖，已表示不愿先行东征。唐生智口头虽硬，也不见得会与蒋硬拚起来。因此，东征难免在事实上流产，甚或会引起内部的瓦解，反给张作霖进袭武汉的机会……"

加仑听了我这些话，紧紧的握着我的手说："大家都在激动的时候，你还能保持冷静，真是了不得！"他进而告诉我，昨天他会见四军的将领们，大家果然是主张先北伐，打倒张作霖再说。他们甚至说到先东征讨伐蒋介石，在一般中下级的军官看来，是自家人打自家人，士气是不易振作的。加仑继而表示他虽痛恨蒋介石，但认为东征是冒险的行动，北伐则可操胜算，且能将潜伏在潼关内的冯玉祥的势力接应出来。他要求我去说服鲍罗庭等人。

我走出加仑的寓所，便去访问鲍罗庭。他仍是坚持先行东征。我以轻松的口吻向他说："先东征吗？这要看事实上能否做到，恐怕还要仔细考虑一下各军的实际情况才好。否则，二六两军退出南京的事难免不再重演。"鲍罗庭听了我这话，若有所失的不再说什么了。似是他要重新考虑一番。

几天之后，鲍罗庭的主意显然已经转向。他在一次中共中央（当时中央委员多数已来武汉）的会议上曾表示，现在奉张的军队正沿京汉路向信阳南下，如果此时东征，武汉有受奉张侵袭的危险。因此，武汉的军队应先配合冯玉祥部，消灭河南方面的奉军，再定第二步办法。东征之议因而暂被搁置了。武汉各报也立即大肆宣传奉张南下的威胁和继续北伐的重要。接着唐生智、张发奎等便沿京汉路向信阳集中，进行北伐。

四月底，南京武汉两方面同时受到张作霖的军事压迫。孙传芳及张宗昌部经由徐州向浦口挺进，张学良部则由京汉路南下威胁武汉；似是乘革命内部分裂之危，企图予以分别击破。南京方面讨伐武汉的论调虽不算得激烈，但在实际对付武汉的行动上则相当积极。四月二十五日，南京派的李宗仁军与驻在九江的朱培德军相互设防；原在津浦路南段的二六两军表示服从武汉，移师向安庆方面转进。在南京附近的程潜部第二十九师且被蒋氏缴械。这些事就给予孙传芳张宗昌部进至浦口杨州一带的有利机会。南京近在咫尺，自然受到威胁；因而蒋氏不得不高唱继续北伐。五月十四日，李宗仁在湖口与朱培德会晤，商决互不侵犯，分路北伐。至此，南京武汉间军事对垒的形势，才告缓和

下来。

武汉方面先行东征之议，一时成为泡影。这是鲍罗庭的反蒋计划的第二次重要的失败；也表现出武汉对蒋的反共攻势，无力还手。鲍罗庭正处逆境，外表虽仍强自支持，但论调已不如前此的乐观了。他似乎已料想到，此次既不能先行去掉蒋氏这个心腹之患，将必贻害无穷，何况对奉张的作战，胜败又还是一个未知之数。

五月初，鲍罗庭重新提到他的西北计划，但显然已有退却的意味。他说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太大了，西北却是帝国主义势力所不及的地方。那里不会有像武汉这样的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又接近苏俄和外蒙，便于获得援助，因而西北是最好的革命根据地。他当时所提出的西北计划，其着眼点显系移到了陕甘一带，与在广东时所说到的沿京汉路北进，掩有西北西南的大西北主义是有分别的。这自然也有寄希望于冯玉祥之意。谁知天下事真是不可逆料，后来冯玉祥除了供给他个人假道返回苏俄的便利而外，竟做了摧毁武汉的帮凶。

① 谭平山是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六日自俄返抵广州，再转道来武汉的。

② 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第二次全体会议，开幕的那一天到了三十三人，由谭延闿任主席。

③ 何其瑗在三月十一日当选为商民部长，继于三月十七日（即三中全会闭幕之日）被会议罢职，改选王法勤继任。

④ 这个决议原文见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之《东方杂志》第二十四卷第九号第九十一页。

⑤ 蒋百里为中国近代杰出的军事学家，曾任保定军校及陆军大学校长。其生平事迹可参阅陶菊隐著《蒋百里先生传》——上海中华书局，民国

三十七年初版。

⑥ 一九二七年二三月间南北各大报及通讯社均盛传蒋与奉张妥协的事，奔走其间的主要人物，蒋方为李石曾，奉方为杨宇霆。当时，彭述之曾搜集南北各大报所载这类消息，汇集起来写了一篇为《南北妥协问题》的文章，登载《向导》第一九一期。此外，梁士贻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曾与英驻华公使Sir Miles Wedderburn Lampson 谈话，也曾说到这件事——见《梁燕孙年谱》下册，第五〇二页至第五〇六页。

⑦ 一九二七年初吴铁城由南昌赴日本，向日本币原外相有所活动，又戴季陶也于二月间奉蒋命赴日，而日本的清浦佐分利等则仆仆风尘于南昌广州之间，并公开对记者发表谈话，声言日本与中国南方稳健分子已有相当的谅解。

⑧ 据董显光著《蒋总统传》（上册，第九十页，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民国四十一年初版）说，蒋抵上海后，商人与银行家多愿支持清共，一个三百万元的借款旋即成立，以供蒋的迫切需要。

⑨ 关于上海工人三次暴动的详情，可参看瞿景白作《上海工人第一次起义》及施英作《上海工人第二次起义》、《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三文，载北京，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一九五四年第一版。

⑩ 汪精卫抵港后与蒋、吴、李、蔡等协商情形，汪精卫在广州中山大学所作《武汉分共的经过》的讲演（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五日）中有相当详细的叙述，可供参考，原讲词载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出版的《贡献旬刊》第一期第三页至第十三页。

⑪ 上海清党时蒋突令其亲信刘峙继薛岳任第一师师长。

⑫ “四·一二”收缴工人武装及翌日屠杀工人的经过，上海总工会将经过实情，汇编了《四·一二大屠杀纪实》一文（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四九一页至第五三三页），可以参阅。

⑬ 陈立夫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在一次会议上追述清党的一幕。他说到清党时最大的困难，是分不清谁是共产党，谁又不是共产党，他的办法是在各地召集国民党大会，要左倾的站在左边，其余的站在右边；然后要他们相互打起来，这样站左边的受到了应得的惩罚……陈立夫的这些话当系事实。但当时站在左边的不一定是中共党员，站在右边的也不一定没有左倾分子。还有不少徘徊于左右之间，红帽子便被戴上了。

# 第四章

# 农民运动

武汉时期，中共在农村中的活动，是自下而上的，燃起了农民斗争的烈火，其中以湖南的火势为最猛烈。中共因为缺乏这一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在发动之初，领导的步骤颇不一致，运动开展以后，也无力予以控制。因而农民运动，竟成了摧毁国共合作、瓦解武汉政权的一个主要因素。

中共内部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点，并不在农民斗争应采取激进或缓进方式的问题，而是农民运动发动后如何维系国共合作的问题。如果中共坚持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的政策，特别是要维持反蒋阵线，支持武汉左派政府，就应该将农民斗争，局限在组成武汉阵营的主要势力所容许的范围以内。如果超过这个限度，中共就应如托洛茨基所主张的一样，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当时共方——从莫斯科到中共各级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大都支持前者。不过有的主张纠正这一运动的过激行动，以维系武汉的阵营；有的认为不算过激，对国共合作不会有重大的妨碍。

所谓农民运动过激，本是指农民运动发生了左倾的蛮干行为而言的，可是当时这个名词的含义相当复杂。其中

因素之一，是反对者有意夸大其词；其实，这些“过激”行动也包括了农民的正当要求在内，根本不能说是过激行动；不过，在实行上亦确有过左偏差倾向。又由于农民的狭隘意识所引致的不应有或者可以避免的举动，当时我们的错误，就是没有将这些事态严格的分别出来，一一予以具体解决。当时中共在武汉政府中的微妙地位，也未能及时调整这一运动，因为不少中共同志觉得农政部长虽由共产党员担任，但政权还是国民党的，我们并不要以在朝的身份来约束群众的行动，可是中共的整个政策，又使自己的命运与武汉政府休戚相关，如果这一运动使武汉政府蒙受不利的影响，同样也就打击了中共。

大多数中共领导人，虽然认为农民运动的过激行为是应当予以纠正的；但一直以能组织这样广大的农民群众而自傲。我们大致有这样的一种错觉，以为农民组织起来了，农民斗争发展起来了，中共的势力就可以深植在各个乡村的基础上，既具有不易摧毁的力量，又可以进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其实，这是不对的。农民势力要能稳固，土地问题要获得解决，最主要的还是要有拥护农民利益的政权为之保障。至少也要农民的组织极为坚强，有足够的武装力量为后盾，才能逼使政府当局向农民的要求让步。否则舍本逐末，徒具轰轰烈烈的形势的农民运动，终归要遭到失败的命运。

中共所领导的农民运动，较之中国历史上所发生过的农民暴动自然远为进步。过去的农民暴动大致都受了迷信、封建、帮会等等落后意识的影响，往往为野心家所利

用，来实现他们的成王败寇的个人抱负。中共则受着共产党国际无产阶级领导广大农民这种理论的影响，并有近代思想的薰陶，其组织办法，也不是已往的宗法传统，而是近代的民主方式。中共的目的固然也在夺取政权，却也具有真正改良农民生活的坚强意识。武汉时期的农民运动是中共发展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尝试，这个运动当时虽然失败了，但后来事实证明中共确能在这个失败的教训中，获得了不少的宝贵经验。

为了便于说明武汉时期的农民运动，首先追溯一下在国民党革命中农民运动史的发展，实有必要。在中共方面说来，陈独秀先生是首先注意农民问题的人，他在五四时期的著作中，就曾指出义和团式的运动，是守旧落后而含有迷信观念的①。后来，他一直坚持这种观点，不愿中共圣洁而近代化的理想，受到那些反动观念所影响。可是中共的领导者们，包括陈独秀先生在内，对于国际和国内农民运动史的发展，没有深入的研究，因而中共没能及时形成一个明确的农民运动与土地革命的政纲。

中共同志中最先从事农民运动的是彭湃，这个出身于世家的知识青年，在陈独秀先生思想影响之下，于一九二一年首在广东的海陆丰，从事组织农会，他的初步理想，不是甚么土地革命，也没有农民暴动的想法，而只是要解除一些农民的切身痛苦，从此，广东的农民运动，日渐发展起来，跟着也发现了不少的新问题。

直到北伐的前夕，中共中央一九二六年七月间扩大会议，根据农民运动在广东已有较大规模的发展的事实，制

订了农民运动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的要点在经济方面是减租减息，要求农民所得不少于收获量的百分之五十，借款年利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反对预征钱粮及苛捐杂税等。在政治方面，农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县长民选，民团不得逮捕审判农民等。在组织方面，强调农村联合战线，规定农民协会的组织不准大地主和高利贷者参加，但应团结雇农、佃农、自耕农与中小地主，对并非作恶多端的大地主保持中立关系，对劣绅土豪大地主则予以反对，等等②，这些决议，是中共意图发动农民，成为国民革命中一项重要势力的现实想法。

中共在广州的同志们对中共中央七月间这种农运政策表示了反对意见。广东区委根据在广东积累起来的国共合作和农民运动的经验，主张不应因国共合作而阻碍了农民斗争，应不顾一切使之发展，以求土地问题的更高阶段的解决。他们强调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认为国民党内赞成土地革命的才算是左派（这样的左派固然很少）。这种见解，意味着将革命的重心由国民革命转移到土地革命。但中共中央则以国民革命仍是当前的中心任务为基本理由，否定了广东区委的这种较激进的主张。

共产国际很重视农民土地问题，这是列宁主义的特色。在共产国际的好汉们看来，似乎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真实而又神秘的内涵。沙法诺夫在一九二一年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上所发表的演说，就曾强调这一点。但莫斯科对于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具体情况及其与国民革命的关系，一直没有弄清楚。苏俄土地问题专家们曾先后在广东武汉等地

从事实际的考察研究，直到武汉政府垮台，也还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

鲍罗庭对农民土地问题所表现的主张，大体是以中国的政治气候为转移。一九二四年初，他曾向孙中山先生提出没收地主土地和土地国有等主张，未为孙先生所采纳。一九二五年，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鲍罗庭的全部注意力就集中在中共与国民党左派密切合作，巩固广东的革命专政这一问题上。再也没有提过甚么土地革命了。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国民党二中全会以后，他对国共合作前途已不感乐观，又从新强调土地革命。上述广东区委的主张，就曾获得他的支持。一九二六年底，他到达武汉以后，他所注意的是反蒋阵线的形成，因而又不重视农民土地问题了。

鲍罗庭在中国最能代表斯大林的意旨。他到达武汉以后，和我谈到农民问题，曾表示现在革命的危机，是有人要抛弃孙先生的三大政策，如果这种企图实现了，一切都将完蛋。他还肯定的说："现在土地革命的时机没有成熟，要先形成土地革命的必要条件。"他专心在策划反蒋，因而主张纠正农民运动的过激行动。从鲍罗庭的这些态度看，不仅他个人修正了他前此在广东时（一九二六年下半年）的态度，而且莫斯科对中共的指导一直也是以完成国民革命为重点，土地革命的政策就显得动摇不定了。

国民党重视农民问题有过于工人问题。孙中山先生早就在他的三民主义中，提出了平均地权的温和主张。一九二四年改组的时候，孙中山虽没有接纳鲍罗庭那种激进的

土地革命政策，但却制定了拥护农工利益的政纲，并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不少国民党人觉得他们应向农民争取广泛的支持，而且多少有些重农轻工的观念。（例如：国民党的文件中总是先“农”后“工”的称为“农工运动”；中共的文件中，则先工后农的称为“工农运动”，即为一例。）

国民党重视农民运动的政策，颇有表现。农民协会组织章程的要点，是孙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春核定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早有农部的组织（远在中共中央有农民部组织之前），各级党部也先后建立同样的机构，国民党中央曾陆续拨出可观的经费，办理农民运动讲习所，派遣许多农运特派员，分赴各地推进农运等等工作。不过事实上国民党的农运工作多委派中共党员实际执行，尤以基层工作为然。

国民党在农民运动上与中共一直处于竞争的地位。两党在农民政纲上，基本上虽没有多大出入；但国民党人总认为农民运动应由国民党名副其实的加以领导；而中共表面虽然推重国民党的领导权，但实际上则有当仁不让的气概。在手段上，国民党侧重由政府自上而下，以法令来改善农民的生活；中共则着重自下而上，发动农民斗争，直接争取农民生活的改善。一般说来，国民党人包括左派在内，畏惧农民斗争，对于土地革命，更视为过激行动，这与国民党人多出身于小康之家大有关系。

上述一切，是中共内部和国共之间，为国民革命和土地革命这一纠缠不清的问题争论不休的一般概况。这也就

是武汉时期的农民运动，不能获得适当解决的暗礁。

湖南农民运动发展得最快，规模也最大。农协组织是由各乡各区各县市以至全省，自下而上的递层发动起来的。北伐前夕，湖南的农协会员已有约二十多万人。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日，湖南全省农民协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全省七十九个县市中，已建立了五十四个县市农民协会的组织，会员人数达一百卅六万余人之众③。一九二七年二月间，会员人数又增至二百万人，据后来武汉国民政府农政部的核计，湖南农协会员最高人数（是五月间的数字）达四百五十一万人④。这些数字虽不一定精确，但农协会在湖南之被视为庞大组织，则为当时人们共有的感觉。

湖南农运较之广东湖北各省尤为热烈，其中原因颇多。例如湖南历经南北战乱，农民所受的痛苦极深；地主的民团势力多为军队所收编，因而发展农民协会所遇到的阻力较为薄弱，而且国共两党在湖南的组织相当得势，左倾气氛又极浓厚。中共湖南区委，又能以大部分精力注重农运工作；湖南中共组织的创始人毛泽东一直重视农运，曾多次进行农村调查，并为湖南的农运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湖南农运也多少承袭着太平天国起义的经验。一位同情革命的湖南老学者在一九二七年春，曾向我描述湖南农运的概况。他指出湖南农民在近代史上有过两次大翻身，一次是太平天国，一次便是现在的运动；而这两次大翻身，颇有类似的地方，但其凶猛的程度则前者远逊于后者，目前已闹得天翻地覆。他希望不再蹈太平天国的覆辙，真能为农民解决些问题。

这个省份的农运是紧随着北伐军进展的优良时机而发展起来的。国共两党在湖南各县乡的分支组织，为了支援北伐，积极扩大农协。而农民对于北伐确也有过显著的贡献，一时获得各方面的好评。各县政府多系依靠农协的支持，来完成战时动员人力物力的任务。各县乡的地主民团势力多转移到了农协的手里，它们不仅拥有少数的枪支，而且有以十万计的梭镖队，于是农运也就随着这种组织力量的增强而汹涌起来。等到北伐军进到湖北以后，湖南恢复平时状态，农协斗争的目标，就集中到了土豪劣绅的头上去了。一九二六年底湖南农民运动过激之说，乃开始在武汉流传着。

湖南农运代言人毛泽东，首先起来反对这种认为湖南农民打击土豪劣绅为过激手段的言论，他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间参加湖南农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到武汉，即提出了两句“名言”：“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矫枉必须过正”。这显然是湖南农民广泛打击土豪劣绅的辩护词。他虽承认湖南农运有些“过正”，但认为这是为了“矫枉”而不得不然。他的这种说法代表了湖南同志一般的左倾情绪。后来他的湖南农运报告，也是根据这种观念写成的。

我当时曾提出一连串的问题来讥讽他的这种说法。我向他说到的大意是，所谓“有土皆豪”，难道有一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也算是“豪”吗？他自己也算得是湖南一位绅士，难道也“劣”吗？所谓“矫枉必须过正”，为甚么必须“过正”？要“过正”多少？是暂时的“过正”，抑是永久的“过正”？等等。他是个不肯认输的人，只是大笑一阵，说这不过是为

了当前实况的需要，才说出这些话的。

湖南的中共同志们，多和毛泽东相似，随着农运的进展，颇有左倾急进的见解。他们之中，有些人根本就抱着“矫枉必须过正”的心理和“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愤慨，极力将农运推向左面去，更多的人觉得开始时必须用较急进的方法，才能推动农民的斗争。但等到斗争已经大规模的发展了，他们又不愿为了国共合作，而把左倾趋势扭转过来。此外，中共同志们还有一种传统的想法：“右倾最要不得，左倾总是不坏的。”他们不会想到，在激烈的革命浪潮中，防止左倾蛮干，并不容易，又为必要。等到这种左倾蛮干，已经蔚为一时风气以后，要纠正它就戛戛乎难矣。更何况中共的湖南同志们，事实上无力完全控制全省农协的活动。

湖南农运之所以过激，主要表现在“反对土豪劣绅”、“减租减息”、“谷米阻禁”和“破除旧习俗”等各方面行动上。

湖南农协运动最有声有色的一幕，首推“打土豪劣绅”的工作。打土豪劣绅的办法包括“逮捕、监禁、审判、算账、罚款、戴高帽游乡、杀猪、枭谷”等等。

枪毙土豪劣绅，也是常有的事，其中最著名的一桩，就是以旧学著称的湖南清末遗老叶德辉之被处决。其它如砸毁轿子，剪掉长衫等带侮辱性的行为，更是不胜枚举。审判土豪劣绅的方式，多系举行群众大会进行。在大会中，只要有一个人认定被审判者是土豪劣绅，往往无人敢加以反对。惩罚的方法，愈激烈就愈容易通过。这与法国大革命时，国民会议审判贵族的情景，大同而小异。

反对土豪劣绅原系国共两党的共同政策，农民运动的

兴起，也必须以压抑土豪劣绅的势力为前提。但如果由农民自下而上广泛的自动的执行起来，那就不仅如毛泽东所说的“有点儿乱来”了⑤。而且，也形成了无政府的恐怖状态。我只要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证明。

李立三的父亲被一个乡农民协会当作土豪劣绅处决了。一九二七年一月间，李立三的上了年纪的（看来是六十多岁）父亲来到了武汉。我曾和那位老人在李家几次一同进餐，也谈过他的遭遇。我所得到的印象，他是一位温文尔雅、态度严肃、心地善良的老人。他不否认他是逃到武汉来避难的。他也表示他愿跟着他儿子的主张走，不反对农协会的一切。不久，他拿着他儿子亲笔致湖南负责同志的信，担保这位老人不会有反对农协的态度和行为。高高兴兴的回湖南去了，不料后来消息传来，李立三的保证并无任何效力，这位老人仍被他本乡的农协“乱干”掉了。

李立三的父亲的遭遇，尚且如此，其他不问可知了。李立三是一个湖南籍的著名共产党员，他担保他父亲的信，似也由湖南区委转到了澧陵县的农协会去了，而竟不发生效力，这不特显示出中共湖南区委会对于农协控制力的薄弱，也证明反土豪劣绅的风气已到了疯狂的程度。李立三遭逢了这个变故，一时显得甚为难过，但他咬紧牙关，再也没提过这件事。我也曾为之伤感良久，并曾设想过，如果这种遭遇是落在一位国民党员或者一位北伐军的军官的身上，他对于农协的愤恨将是不共戴天的。

在农协势力膨胀之下，以不交租不还债来代替减租减息，成为普遍的现象。国共两党和农协的原来政策并不是

不交租不还债，而只是主张减租减息，规定租额，佃农所得至少应占收获额的百分之五十，银钱借贷年息不得超过二分或三分，借谷年息不得超过一成⑥。这种减租减息要求的实现，是农民生活实质的改善；按照当时的情况也是合情合理的。可是，事情的发展，往往不会就在适当的地方止步，何况并没有人强调交租交息的必要。因此，减租减息就逐渐激化成为不交租不还债了。

不交租，使农村中的租佃关系陷于混乱状况。地主们自然觉得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出了问题，佃户们也会觉得他们所没有交付的租额，将来究竟怎样处理也不能确定，这对于生产准备和生产情绪都会有影响，这种状况在个别地区，如长沙附近的霞凝乡，竟发展到"丈田插标"准备重新分配土地的地步了。这显然超越了武汉政府当时权力所能做到的范围以外。不还债，更使农村金融陷于窒息的状态，农村中有钱出借的人，带着他们的资金外逃了，剩下一些小有产者，也因为失去保障不肯再借放款项，这样，在资金极度短绌的湖南农村中，许多穷苦的农民，就失掉了流通资金以维生产的机会了。

"谷米阻禁"是乡村中缺乏粮食的穷苦人民压抑粮价的一种传统愿望。他们的狭隘心理是希望本乡的粮食不外流，因而能够买着贱价的食粮，并不懂得照顾到保持商品流通的正常状态。这种"阻禁"也并不是中共的湖南同志们所赞成的，不过他们最初没有加以阻止这种"阻禁"的发展，等到"阻禁"的恶果已经表现出来了，才设法纠正，已经不免贻人以口实了。

“谷米阻禁”办法是为了阻止地主们将粮食外运，是阻止资金外逃的有效手段。当时，县与县之间，区与区之间，乃至乡与乡之间，多不准粮食出境。至于运出省境以外，则须经省农民协会的许可。可是湖南这个产米之区，需要输出粮食来交换各种日用必需品，如食盐、布匹之类，乡村的农民在粮食不能出境的情况之下，也就无力购进其他的东西，这无异自己切断了经济的动脉。而且城市的商业，军队的粮食供应，乃至军人们的粮食走私都在受到这种办法的阻碍。其结果不仅军官官吏和商人们对于这个办法深恶痛绝，连乡村中也有不少的农民抱怨不已。

破除乡村旧习俗，是中共认为必要的事，但也知道这是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说服和教育，才能奏效的。湖南各乡农协在执行破除旧习俗的政策时，则不免流于强迫蛮干了。当时毁庙宇、打菩萨、拆祠堂和推翻族长制度，鼓动妇女反对夫权，逼寡妇改嫁，强迫妇女剪发，禁止抬轿子等等，都当作是革命的必要表现，雷厉风行的执行着，甚至还发生过为了节省粮食而禁止喂鸡、节省靡费而禁止演戏等不合理的现象。

以上这些激进的强迫办法，曾引起不少农民的不满，更予反对农民运动的人们以有力的借口。他们高唱农民协会是不孝祖宗、欺神灭道、主张公妻等等的组织。这与曾国藩以破坏中国道统来攻击洪秀全的法门，如出一辙。中共方面也未料到农民意识的激进主义，在湖南竟闹到火势燎原的地步，一时显得手忙脚乱。

湖南农民运动最为激进，其他各省都较缓和⑦。湖北

农协组织的发展，虽比江西等省较为先进、但仍远落于湖南之后。湖北农协会员人数在一九二六年底为二十八万余人。一九二七年三月为八十万人，五月增至二百五十万人。从这个数字看来，不仅会员在数量上比不上湖南，而且发展的时间也较迟。湖北国共两党的组织，对于纠正农民的过火行为颇为注重，各县区乡的农协虽也发生过不少反土豪劣绅的行动，但多交由国民党部所组织的土豪劣绅审判委员会处理，很少径自加以处罚。其他如减租减息、谷米阻禁，以及破除旧习俗等项，做得也不如湖南那样激烈。因此，当时农运过激之说，主要是指湖南而言。

土豪劣绅和遭到农运打击的人们纷纷逃到武汉及其他较大城市，诉说他们的遭遇和见闻。农运行动过激的声浪逐渐高于反蒋的呼声，到了一九二七年三月间，党政的上层人物虽仍侧重于谈论反蒋问题，但街谈巷议则多流传着农运过火的故事。有的认为农运既然过火，那末农运就根本要不得。这种议论，中共认为是土豪劣绅在从中作怪，可是不少国民党人物受到这种传说所影响，或多或少的对农运产生了反感。中共的同志们和一些革命意识较坚定的人，虽不否认农运做得太过分了，但认为不能因此就根本反对农运。

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唐生智，面对农运的高潮，显得左右为难。他在湖南的僚属告诉他农协简直成了第二政府，干涉各级政府的行政和司法。在湖南境内，如得不到农协的同意，就寸步难行。有人诉说他所需要的军粮因农协的阻拦运不出来，所需要的军饷因为县税收受农运的影

响锐减而无法筹措。更多的军官和官吏们，向他诉说他们在乡间的家属曾遭到农协这样和那样的打击，不用说，唐生智对农运的反感与日俱增。但他是反蒋的支柱，为了维持反蒋阵线，也只好暂时忍耐。他常表示，他相信农运的激进行为可以由国共两党党部设法纠正。

军官们因为家属受到农运的打击，对农运乃产生反感。北伐军官们多系湖南籍，也有出自乡村的殷实之家；有的因身为军官，有钱有势，便在乡村买田置地，成为暴发的地主。有些军官的亲属，因为家中有人带兵，也就倚势在乡村中作威作福。所谓“国民革命军，士兵多数是农民，军官多数是地主”这句当时在武汉流行的话，确是切合当时的实情。军官们不仅从乡间接到许多坏消息，而且他们的亲属也有从乡间逃到军队里来，担任军中的文职工作，也就使军人的反感更为火上加油了。军官的反农运的呼声，一时陡然高涨起来。

鲍罗庭为了团结反蒋势力，不得不重视军官们的情绪。他强调农运和土地革命应不侵犯革命军人家属及其土地财产为前提。各有关方面对鲍罗庭这种主张，也纷纷表示赞成。但在进一步研究下，又是所涉甚广，困难多端。譬如革命军人家属就有狭义的与广义的解释之不同，狭义的解释，只包括革命军人的直系亲属；至于广义的，则要求将亲属范围扩大到旁系姻亲。这又引起了从事农运的积极分子的不满，他们认为如果将军人家属算在土豪劣绅以外，而且又采用广义的解释，则在湖南就根本没有土豪劣绅可以反对了。尤其重要的是有些军人家属已经被农协侵犯

了，要想补救更为棘手。农协的负责人觉得如果一一翻案，农协将要垮台。

事态在议论纷纭之中，没有一种力量能作有效的扭转或控制。

一九二七年初，我和因公来到武汉的中共湖南区委委员夏曦、郭亮等人商量过这些问题。我向他们指出湖南农运虽然轰轰烈烈，可是没有武力做后盾，也没有组织农民苏维埃政权的计划，现在唐生智的部下，因受着农运的威胁，日渐右倾，农运却在左倾，在这种各走极端的情势下，是会出乱子的。如果要维持农协与军人合作的话，在农运方面就要采取行动，缩小土豪劣绅的范围，并纠正其中的偏差。他们当时虽赞成我的建议，但回去以后也没有力量或者没有尽力去促使这些建议的实现。

一九二七年四月间，中共中央迁到武汉以后，对于这个问题也是议论纷纭。大致可分两说，一是主张深入革命，乘势将农运推到土地革命的阶段去，不应受农运行动过激之说的影响；二是认为为了农运本身的顺利发展，纠正某些偏激行动有其必要。中共中央终于通过决议，采取行动，纠正其中的过激行动；指令湖南区委实施。但它并未采取迅速而有效的步骤，如派遣得力的代表或代表团去湖南督促执行，因而这个决议案收效很微。

中共既没有主动的扭转向左发展的农运趋势，任何人都显得无能为力了。新成立的农政部在谭平山主持之下，忙着调查农运状况，草拟一些有关条例。国民政府所设置的土地委员会却在那里讨论没收土地的办法，对于所谓经

济的没收——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抑或是政治的没收——限于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等类的问题议论不休。国共两党的联席会议，除了谈论一些农运偏激情况以外，也没有人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因而一切纠正农运的设想，都显得缓不济急，或者只是纸上谈兵。

武汉人民由于对农运的反感，各种传说一直不胫而走，有人说国府主席谭延闿在乡间的亲属被农协侵害了，有人说唐生智部的师长何键的父亲被农协拘捕了。这些传说，用意是要证明农协是在"革"这些革命者的"命"。在此情势下，农民激进主义的代言人毛泽东，却在写他那篇著名的《湖南农运调查报告》，并埋头在那里训练农运干部，筹备全国农民代表大会⑧。他是一意要将全国农运循着湖南的路子推进，走到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的道路上。

中共湖南区委毕竟受了毛泽东的影响。他们虽曾对我表示过要纠正偏差，而事实上他们一直是追随农运的左倾方向前进。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二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民部长刘岳峙曾在报上发表一个农运计划，主张以和平建设来解决农村的纠纷，要求各地农协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倾全力于农产物的增加和农业的改进。刘岳峙是当时的著名左派人物，曾在国民党内组织了左派小团体名为"左社"，与中共的湖南同志们一向合作无间，因而他能担任农民部长这个职务。他的这种主张自然含有不满中共农运方针的意味，可是农业增产和农业改良确也是湖南中共农运政策所忽略的地方，照理应该予以善意的加以采纳，可是中共湖南区委对刘岳峙这种主张，都斥之为右派的言论，予以

严重的打击。并利用他们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属于多数派的地位，公开开除刘岳峙等人的国民党籍⑨。这件事证明了他们是粗暴的违反了中共中央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的政策，他们在领导农民斗争中，忽视了增加生产的重要性。

中共湖南同志们否定了像刘岳峙这样的缓和农村斗争的主张，仍捧着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继续发展农民斗争，他们和其他地方的中共同志一样，是革命的空想主义者，是群众运动的爱好者。他们拥护所谓国共合作，支持唐生智在湖南的统治，但似乎绝未想到，农运既然动摇了唐生智在湖南的统治基础，将会产生一些甚么样的后果，他们既没有取唐生智而代之的意图，也缺乏万一唐生智或者他们的部下以武力反对农运，又须如何应付的预计。只是在那里沾沾自喜，以为自己人多势大，认为反对者决不敢轻举妄动。

湖南农协并无武装斗争的准备。它虽拥有以万计的挨户团，以十万计的梭镖队，但武器落后，组织也不符合军事需要。农民武装本是富于地方性的，当时湖南一般农协的工作者，只着眼于利用这些单薄的武装来保卫他本乡本土的农协，无论在物质基础上或训练指挥上，都没有形成战斗部队的打算。中共湖南区委也不重视强化农民武装的工作，没有尽力动员军事同志去掌握这些农民武装和形成有效的指挥系统。所以后来在中共内部检讨工作时，湖南农协的工作，常受到以下的批评："斗争确是激进的，武装准备却是落后的。"

这个拥有全省人口半数以上的农协所掀起的惊天动地

的农民运动，竟受到了驻守长沙的许克祥团长所辖约一千枪杆发动的马日事变的打击，就开始土崩瓦解了。这股农运激流在湖南象山洪暴发似的奔腾而来，转瞬之间又顿告消沉，其间的因果关系，实非偶然。中共从这个惨痛经验中，学习了"唯有武力才能对付武力"的教训。所以中共此后锐意建立红军，坚持游击战争政策，而湖南和其他各省的农运基础，也就转化为后来游击战争的基础了。

① 见陈独秀先生作《克林德碑》载《新青年》第五卷第五期，第四四九页至四五八页。

② 农民运动决议等全文见《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第二册，中国共产党类第九十六页至一一五页。

③ 详细数字见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编辑出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二五八页至二六二页。

④ 见前书第十八页。

⑤ 见毛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十八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

⑥ 这是中国共产党湖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六年）宣言声明决定的（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三二三页）。

⑦ 湖南周围各省的农运不若湖南的发达，可从邻近几省参加农协的农民数量看出一个轮廓。依据农政部一九二七年六月调查编制的全国农民协会会员统计，全国会员的总数是九，一五三，〇九三人，而湖南一省有四，五一七，一四〇人，再加上湖北的二，五〇二，六〇〇人，已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而广东只有七十万人，江西只有三十八万二千六百十七人，广西只有八千一百四十四人，其他可见一斑了。

⑧ 全国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是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汉举行的。

⑨ 关于开除刘岳峙国民党籍一案的经过，李锐作《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见注三引同书第二八六页——二八七页）一文所记，虽因立场关系，有些歪曲事实，但可供参考。

# 第 五 章

# 中共内部的混乱

武汉时期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参加者，意见纷歧，陷于极度混乱的状态。我一直主张中共中央迅速迁来武汉，集中到一个主要地点来，也许较易于求得内部意见的一致，借此可以强化中共的领导。不料后来事实证明绝非如此，从莫斯科以及从上海来的那些共产要人们，竟是各有一套想法，这就走到“梢公多了会翻船”的境地了。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一些关于鲍罗庭与威金斯基之间的争执，以及鲍罗庭与加仑意见的不同等等情形，但还不只如此，要人们集中到武汉后，意见之纷纭更是愈来愈尖锐了。

从实际政治角度去看这些纷歧，大别之可分为两类，即对共产国际所定的中共留在国民党内这一正统政策，分为拥护与怀疑两种态度。但拥护论者的主张又不完全一致，有的主张既要维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局面和反蒋阵线，就不能谈加深革命，应即纠正工农运动的过火；有的则认为只有加深革命，进而解决土地问题，才能巩固国共合作，实行反蒋。至于怀疑论者，其中有的主张不要幻想甚么国共合作，中共应建立苏维埃政权；有的则主张中共不必留在国民党内，但仍以贯彻国民革命和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

为主旨，为将来建设苏维埃铺平道路。

当时少共国际驻中国的代表达林就是支持托洛茨基主张的一个；他在中国指导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是从一九二二年开始的，他是一个学者型的人物，对于实际政治还有些隔阂。他执行的虽是斯大林的政策，但在观念上则同情托洛茨基的主张。他于一九二七年三月间由上海来到武汉，有一天与我在汉口江边散步闲谈，曾尽情吐露他胸中的积愫。

他曾向我表示，他赞成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认为运用之于中国革命也是很恰当的。他认定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是甚么工农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他批评鲍罗庭的联唐反蒋政策，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独立发展工农运动，使之成为工农苏维埃，到适当时期取武汉的左派政权而代之；决不要做那些纠正工农运动过火这种不名誉的勾当。

达林知道我素不赞同中共留在国民党内，因而向我说了上面这些话，可是我的答复也许使他颇感失望。我曾向他指出，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只要看看江面上停泊的那些外国军舰，就知道革命的主要对象还是帝国主义，无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现在都不能谈工农苏维埃政权。我不赞成中共留在国民党内，卷入国民党的内部纠纷，也不赞成拿着国民党的招牌去反蒋；却主张两党党外合作，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争取民族独立，和经由国民会议，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在这个民主革命的发展中，增强工农势力，才能谈得到土地革命与社会革命。达林听了我

这些话，似很失望的向我说："那你还是一个革命的阶段论者！"我当时没有否认这种说法，而且肯定表示革命是应该分清阶段的；但无论如何，中共留在国民党内总是不合理的，这已经成了中共的桎梏。

达林这种言论，毫无疑义是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在莫斯科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反应到中国来了。他还告诉我："在武汉的俄国顾问中，也有人赞成托洛茨基主张。"他也说到他们俄国人中，也曾为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而争辩过。后来，任中国少共书记的任弼时，常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发表一些左倾的言论，也许是受了达林的影响。托洛茨基的主张虽为中共多数领导人所不赞同，但其暗影却是我们间意见纷歧的一个因素。

鲁易的光临武汉，使中共的各种会议流于冗长的理论的辩论。他是偕同谭平山约于二月底抵达武汉的，他参加共产国际最早，是一颗久负盛誉的"亚洲明星"，他的出来指导实际政治恐怕是以此次为最重要，最初也受着当时在武汉的中俄各要人的尊重，可是他的特长只是在于理论的检讨，有时使人觉得他是在背诵他读得烂熟的教条。

在我看来，鲁易的见解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两种不同主张的混合体。他赞成巩固武汉左派政权，支持中共党员参加武汉政府，这是与斯大林的见解相符合的。他特别重视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对象汪精卫这样的国民党左派人物，寄予较高的期望，似乎土地革命可以通过这些人来实现。至于唐生智这样的军人，则被他视为封建的军阀，不应属于国民党左派之列。他不受革命阶段论的约束，强调加深

革命，主张将农民运动推向土地革命。这种观点显然系出自托洛茨基的理论。他的加深革命的详细内涵，虽未清楚的说明过，但却没有说到要将中国革命推到苏维埃的轨道上去。

鲁易这些见解与鲍罗庭的作法是相冲突的，因而他们相互间一直是没有止境的争论着，鲍罗庭从实际政治的观点出发，注重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力量的对比，策划具体措施，以争取胜利为目标，鲁易则从理论的分析出发，往往着重于原则上应否这样做，似不多计较实际得失。他们两人并无统属的关系，鲁易是共产国际的执委，那时任驻中国的最高代表，鲍罗庭则有斯大林和苏俄政府的支持，所以往往弄得相持不下，不过鲍罗庭究已久任国民党的顾问，驾轻就熟，是易于自行其是的，但他也得花许多时间与鲁易作无休止的辩难。

莫斯科领导的混乱和斯大林、托洛茨基意见的冲突，在在影响到武汉，而且也与中共内部的意见纷歧纠缠在一起。失败往往又会助长内部的分歧，在“四一二”以后，中共中央的分歧，就更形激化起来了。瞿秋白首先提出了反陈独秀领导的主张，当时虽没有见诸行动，但确已引起了中共中央同志们心理上的不安。在中共中央迁来武汉的过程中，瞿秋白和威金斯基是较早到达的。在“四一二”后的几天(陈先生尚未到达)，由于瞿秋白的主动，约集鲁易、威金斯基和我四人有过一次重要的会谈。谈话时，瞿秋白曾以愤怒的语气，表示中共中央存在着严重的危机；武汉的同志们积极反蒋，中央却对蒋存有幻想，因而招致“四一

二”的严重打击，广东同志们早已主张土地革命，中央却不赞成，这些都是丧失了中央领导威信的严重危机。但这种危机是被人（他指的是威金斯基）掩盖了，莫斯科因而无法知道详情，也压抑了党内的自我批评。这些话主要是针对陈独秀先生而言的，也联带的指责威金斯基。威金斯基那时已屡遭挫折，尤以新近上海的惨败，似令他有点负咎良深的丧气心情，只轻轻答辩说，看不出中共中央存在过严重危险，以往也不知道中共中央内部意见有甚么重要分歧。

我虽在某种程度上支持瞿秋白的意见，认为不仅要讨论中共中央内部的危机，更要广泛的检讨中国革命的危机。但我当时却劝告他应该着眼于大局的发展，分清先后缓急，目前暂不宜提出中央改组的问题。会后，我知道鲍罗庭也曾以时局严重为理由劝告瞿秋白，认为现在讨论内部问题绝非适宜，这件事就这样给搁置了。但瞿秋白召集我们谈话的这一着，在当时却留下了显著的痕迹。

过了几天，陈独秀先生也到达武汉，他比任何人都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他从上海锻羽而来，对于上海广州北京一带大批同志的遭受惨杀，是十分痛心的。中共内部的种种责难，纷至沓来，猬集于他的一身；尤其是瞿秋白的这种不愿共同负责的批评，使他更多一层苦闷。他对同志们的责难，如指他缺乏警觉性，预防无方，领导无能，思想右倾等等都没有心情置辩，他极力想找寻一个补救方案，但又力不从心，奇迹没有从天而降。他终日在那里苦思焦虑，勤劳工作，但苦恼之魔总是纠缠着他的。

我鉴于时局的严重，也觉得一切失败的责任不应由陈独秀先生单独负担，曾企图冲淡他心情的懊丧，暗示他应该振作应变，陈先生对于这次的打击是不愿推卸他所应负的责任的。他表示中共各地工作受到摧毁，中央不能辞其咎，譬如，上海的"四一二"事变中，中央确是缺乏警觉，不仅身任书记的他自己是如此，其他中委如瞿秋白等也有同样的疏忽。他指出当时中央委员中没有人着重提出要严防蒋介石的翻脸，只是重视上海市民会议和市政府的组成。如果当时中委中有人提醒这一点，也许可以减少一些牺牲。陈先生接着表示，事态发展到了现在，中共的前途困难多端。他指出共产国际一直要我们留在国民党内，那就只有维持与左派合作的现行做法，不能谈甚么工农苏维埃之建立。如果我们违反共产国际的意旨，积极发展土地革命，迳行组织工农苏维埃，势必形单势孤，遭受巴黎公社同样的失败。反之，如果要维持武汉的局面，就应纠正工农运动之过火行动，以免加深左派的反感，而这样做能否收到反蒋的实效，推进国民革命，也是未可逆料的。陈先生这些话不仅道出了他个人的苦恼所在，也说明中共当时已面临左右为难的歧途。

在陈独秀等中委陆续到达武汉以后，中共中央的会议才正常的举行，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中。参加中共中央会议的人员，是陈独秀、瞿秋白、谭平山、蔡和森、李立三、周恩来和我共七人；任弼时则以少共中央书记的身份经常参加会议。我这时已解除湖北区委书记职务（由张太雷接任），专参预中央的决策工作，

彭述之因受到多数人的批评，不再参加中央的会议，只专任宣传部的一部分工作（宣传部长已由蔡和森担任）。此外，鲁易、鲍罗庭、威金斯基三人也经常参加中共会议，这个中央会议的组织，后来经过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通过，正式定名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人选仍旧。

新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阵容，固属一时之选，但工作效能却是不如人意的，它变成了一个谈话会，不能名副其实肩起决策的任务，担任主席的陈独秀先生，显得更"民主化"了，对于预拟决议案的事，固不愿做，就是议事程序，也常不愿事先确定，会议开始时，往往是由鲁易大发一番议论，接着便是鲍罗庭起而反驳；于是陈独秀、瞿秋白、威金斯基等也就卷入了这个争辩的漩涡，相互辩难，喋喋不休。而众多的具体问题，反是在为理论争辩了几个钟头之后，出席的人们也已听得倦态毕露之时，才草草的作出决定。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开始举行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未改善中共内部的混乱状况。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约八十人，代表党员五万七千九百六十七人，这是一次盛况空前的大会，国民党要人汪精卫、谭延闿、徐谦等都曾出席大会致祝词，显得国共两党的合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但这些热闹的场面，也不能掩盖我们内心的痛苦。就在大会开幕以前，我们损失了上海广州北京三个重要的区委组织。那些地区的首脑部多被摧毁，大批同志被屠杀。剩下的组织不是失去联络，就是在极端困难状况之下为自

己的生存而挣扎。几乎所有出席的代表都为此心情十分沉痛。对时局不抱乐观又无法打开困局，无形中湮没了进取的雄图。

我们之中不少的人觉得要彻底检讨过去，才能开展未来的生机；但一触及具体问题，又觉难于下手。陈独秀先生的地位是动摇了，但谁能在这个紧急关头继承其事，又大成问题，尤其是想到继任人选所能够组织新中央的阵容以及他们将能够做出一些甚么事情，则更难逆料。而且大敌当前，我们自身检讨又可能降低自信，反而增加困难。再说检讨过去，也会涉及到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是否正确的问题。当时共产国际领导的威信是在低降之中，我自己和其他一些同志就觉得共产国际所坚持的中共留在国民党内这一基本政策是错误的，一切不应单独诿过于陈独秀先生。更多的人则不满意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譬如当时的瞿秋白就觉得鲁易的空谈误事，其为害是有过于陈独秀先生的。不多过问中共内部事务的鲍罗庭，则以不应动摇现有领导为理由，主张少检讨一些过去，多策划一些未来，瞿秋白原拟对陈独秀先生发动检讨攻势，在鲍罗庭这种意见影响之下，也暂时止步了。

大会于是花了许多时间听取各代表那些冗长的报告，枝枝节节的提出一些这样或那样的检讨和主张。真正紧急的问题仍在经常假座鲍公馆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里争论不休，大会似反成了无关重要的装饰品。人们多觉得这样一些带机密性的紧急问题是不宜在人多口杂的大会中讨论的，也有人觉得在这紧急关头，一切应该当机立断，才能

应付非常，这时举行大会从容讨论，在时机上根本就不适宜。所以向重现实的鲍罗庭就从不参加大会，也不予以重视。因此，在大会中，既没有对过去作彻底的检讨，也没有对未来提出坚定不移的主张。

大会通过了政治问题决议，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指示和土地问题等决议，并发表宣言。这些是鲁易、威金斯基、沃林（当时在武汉的一位苏俄籍的土地问题专家）、陈独秀、瞿秋白等人花了许多时间的作品。在政治问题上，大会强调无产阶级应领导武汉这个代表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左派政权，对抗资产阶级的代表人蒋介石的叛变。但中共事实上所做的是随着那些国民党左派政客（所谓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的动摇态度而摇摆不定。在土地问题上，大会决议，没收大地主土地，平均分配给贫苦农民。但中共事实上所做的，却是纠正工农运动过火。这些与大会不符的做法，却出自鲍罗庭的意旨，而他那时是最能影响中共中央行动的一个人。

制造革命气氛，似乎一直是共党的拿手好戏。当年五月二十日，在汉口举行的泛太平洋劳动会①和六月十九日在同地举行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②，一时确也振奋了人们的革命精神。外国的贵宾们也有不少光临武汉的，如赤色职工国际主席罗卓夫斯基以及英美法日俄朝鲜爪哇等工会的代表，他们受到武汉工会等团体的盛大欢迎，“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空气，在各处弥漫着。

但作为联系这些活动的中心机构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却日益陷于瘫痪的状态之中。鲁易所主张的加深革命，巩

固武汉路线和土地革命，与鲍罗庭所主张的广泛联合，向西北发展路线和纠正工农运动过火的主张，互相对立。鲁易的空谈是为我们所厌恶的，但他的主张有第五次大会的决议为护符，是不易否定的。鲍罗庭在理论上虽难于自圆其说，但他抓住了现实，往往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易于为人信服。陈独秀、瞿秋白在这一点上倒互相接近起来，他们往往以鲁易不懂中国实情为理由，采纳鲍罗庭的具体建议。我和其他多数委员则多少避开这种争论，只就其所主管的业务，寻找个别的解决方案，惟有代表少共中央的任弼时，则认为中共所做的与第五次大会决议的原则不相符合，是要不得的。这样，理论与实际大相径庭，决议与行动又不符合，我们当时都说"中共中央是在十字街头徘徊着"的，这句话确能刻划出当时的实况。

中共中央就在议论纷纭之中，忽视了采取各种具体步骤，以增强自身的战斗力量，等到逆流的浪花从武汉内部汹涌而来的时候，中共就逐渐无法作有效的应付了。

① 泛太平洋劳动大会之召集，系由澳洲新南威尔士工人代表大会开会时（一九二六年二月）所决定，日期原定为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地点即在澳洲雪梨。迨至七月一日，只有澳洲、新西兰、苏联、赤色职工国际等少数工会之代表到会，乃改为预备会议，并决定将会期及会议地点，改为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在广州举行。继又因故改于同年五月二十日在汉口举行，各国代表出席者，除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外，有日本六人，朝鲜一人，法国一人，苏联五人，中国十五人，美国二人，英国一人，爪哇一人。共开会七日，五月二十六日闭幕。

② 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原订于一九二七年五一节举行，嗣因筹备不及，

改于六月十九日举行，到会代表四百余人，二十八日闭幕。通过关于工会组织问题等决议案（详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五四五至五五二页）。

# 第六章
# 分裂

武汉，在蒋介石和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围攻之下，内部又矛盾百出。如我在上面所说到的劳资间的冲突，地主与农民间的斗争，中共与国民党左派以及军人间的意见分歧，和中共内部的混乱等等，逐渐走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于是，国共全面分裂，工农运动普遍遭受镇压，所谓武汉左派政权不久也在宁汉合流的运动中，宣告瓦解。这一切在中共看来，是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国国民革命，因蒋介石的叛变而遭受失败。中共从此也就走上了以武装暴动来反对蒋介石统治的道路。

武汉的左派政权，本极脆弱；作为左派领袖的汪精卫，更是一直动摇不定的。他反对蒋介石的军人独裁，也畏惧中共的革命锋芒。他愿遵守孙先生的遗教，但自欧游归来以后，似又觉得苏联在国际上的势力，究竟脆弱，不足以凭借取胜。他也许对鲍罗庭和中共在"三二〇"事变中，没有坚决支持他一事未能忘怀。他的这些心境虽未向我透露过，但我的同志中确有人是如此推测的。他自己后来所说他"一直陷于左右派的夹攻之中"这句话，似乎就是这种心情的写照。

汪精卫自该年四月十日到达武汉以后，态度逐渐右转的迹象，是非常显明的。最初他确也高举过“党权”的旗帜，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异动。四月十七日开除蒋介石党籍的决议，就是由他任主席的会议所通过的。他在陈独秀先生到达武汉之后（约在四月二十日左右），积极促成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的举行。国民党方面参加这个会议的是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徐谦、顾孟余五人。中共方面是陈独秀、谭平山和我三人。由汪任主席。汪那时似是热心团结国共两党，解决武汉内部纠纷，以稳定此反蒋阵线。可是，不到几天，他在两党联席会议上的言论，就开始有了变化。这大概是由于他了解了武汉的情况以后，觉得反蒋的前途未可乐观，不能不预留地步。因而他的论调，已不是甚么“东征讨蒋”，而是倡言“纠正工农运动的过火”了。这样一来，此一会议同样也流于谈话会的性质，往往是汪精卫在那里叙述一些工农运动过火的事实，再由健谈的陈独秀先生起而唱和一番，加以若干轻描淡写的答辩而已。

中共方面最初确实希望联席会议能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我在会议上曾提出要确定工农运动的方针，分辩何种行为谓之过火，何种行为则否，以便国共两党在领导与纠正两方面，有共同的步骤。但汪精卫对之颇为冷淡，认为具体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详细拟定；而所谓有关机关又是始终没有提出过具体的规定。当时我们就觉得汪不是要认真解决问题，也不能负起责任领导一切；相反，他根本反对工农运动的意向，却逐渐表现出来了。

国共两党联席会议，“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行不

行”的恶劣情况，自然不能收稳定局势的效果。等到马日事变发生以后，汪的论调便转而专门指摘和讥讽中共了。两党联席会议的举行，也就由逐渐减少而终于停顿下来。汪精卫态度的转变，在中共看来，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的表现，根本不能领导革命的。可是，当时所谓武汉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权，并不是由中共领导，根本就是由动摇的小资产阶级领导的。中共当时既明知小资产阶级具有动摇性，另一方面又想凭借小资产阶级的领导，而追随莫斯科的意旨，美其名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这似有点欺人自欺了。

其实，所谓武汉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左派政权，就是建筑在地主资产阶级和工农势力相互冲击的基础上，并以地主们所领导的军队为其主要支柱。这些军人，有些为了某种原因，能够暂时容忍工农势力的兴起，但多数则早已对之有不安之感。那些特别厌恶工农势力的军人，则早有俟机推翻这个政权的企图；同时，他们也看出了这个政府缺乏重心，软弱无能，一切机构和会议，都像两党联席会议一样，是议论多而少效率的；他们以为假若有所行动，这个政府亦是无力应付的。

夏斗寅的军事叛乱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发生。他所统率的国民革命独立第十四师，原驻在长江上游宜昌一带；军官们多系湖北籍的地主出身；也是当时湘鄂一带地主土劣们受了农运打击的一个避难所。他在唐生智、张发奎的主力正在与奉军苦战、胜负未分的关头，以为武汉防务空虚，潜师径袭武昌，企图一举推翻武汉政府。

夏斗寅的行动，无疑的也是蒋介石瓦解武汉内部的杰作。宁汉双方虽在分途北伐的原则上有所协议，暂时各不相犯①；但蒋介石从武汉内部来倾覆武汉政府的工作，一直是在加紧进行。当时武汉盛传夏斗寅接受了蒋的委任和经济上的支持。五月十三日，南京方面又曾兴高采烈的宣布夏斗寅反共讨伐武汉的通电，表示寄予莫大的期望。

夏斗寅所发动的行动自然不是单独事件，而是背后有较广泛支持的。湖北境内的杂牌军队，如驻在沙市的第十五军刘佐龙部，驻在鄂北的张联升、于学忠等部都为之暗中助威；四川的二十军杨森部更向宜昌移动，为其后盾。他和唐生智的部属也有联系，譬如与在河南前线作战的唐部师长何键以及驻守长沙的唐部许克祥团长等，似早有共同反共的密谋。不过他的行动，似尚未为唐生智所预知，因为这与唐生智那时维持武汉局面，贯彻反蒋目的的政策是相违背的。夏斗寅大概是想以他所造成的既成事实，来逼唐让步。至于张发奎的第四军则被夏斗寅视为支持武汉的基本部队，是他要打击的目标。

五月十七日，夏斗寅部占领了武昌以南汀泗桥一带的险要阵地，向武昌附近的纸坊进兵，负责防守武昌的叶挺同志，正在作应战的初步准备，他于当日下午二时左右，匆促的来到汉口找我，告诉我国民政府要他立即去参加会议，商讨讨伐夏斗寅的事。他那时已升任第四军第二十四师师长。这个师成立还不满两个月，四分之三以上是新兵，装备尚不齐全，中下级干部尤感不足（我曾协助他办了一个教导营，调集一些工农积极分子，在那里受班排长的训

练)。当张发奎军长率领第四军主力，包括原由叶挺率领的独立团在内（团长已由周士第同志继任)，出发到河南前线的时候，叶挺这个新成立的师则以战斗力尚待充实，而留驻武昌。

我当即向叶挺表示，他应坚决的担负起反击夏斗寅的任务。因为夏斗寅的叛变是整个反动派阴谋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能将夏部迅速消灭，其他的同谋者也许不敢轻于响应。现在潜伏武汉三镇的地主土劣们，都为夏斗寅而欢呼，他们散布谣言，说夏斗寅的占领武汉，不过是指顾间事。国民政府的要人们已有些张惶失措，他们想到驻守汉口的唐部李品仙师，是否与夏已有默契，固不能断言，但似不能指望他去抵抗夏斗寅的进攻。而且二、六两军远在九江安庆一带，救不了近火。只有他能负担这个作战的任务。所以我鼓励他应向国民政府要人们表示有削平夏的叛变的信心。

五时，叶挺又来将国府会议的结果告诉我。国府已任命他为讨伐夏斗寅的前敌总指挥，立即率第二十四师全部和驻在武昌的军校学生约一千五百人，开赴前线作战，并急电调二、六军回师武汉靖乱。他还说到出席会议的要人们多感忧虑，大概是想到夏斗寅的兵力较为优厚，甚至有人说到万一不胜，后果如何的问题。我告以现在有进无退，非打垮夏斗寅不可，我将动员一切力量，为他作后盾。

叶挺旋即过江去执行作战任务。我即往陈独秀先生寓所，找到我所能找着的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告以这种紧急情况。我指出我已通知在汉口的一些同志，从速动员工人

纠察队应变，请他们立即查明湘鄂赣等省的情况，通知各地的同志，严防各地反动势力乘机蠢动，并要求中央派我到武昌去负起支援叶挺的责任。我这些建议为他们无异议接受了。

我在六时左右到达江边，发现过渡的小轮已经停航了，所有江边的小轮电驳一只也看不见了。查询之下，我才知道一部分被军队征用，一部分则被某些机关和要人们扣留为逃难之用，不知藏在那里去了。这种情况大概就是近两三个钟头内，因前线紧急的谣传所造成的。我和一位随从同志只好找着一艘小舢舨，在广阔湍急的江面上，好不容易摆渡到了武昌的下游，舍舟登岸，急步赶进武昌城，已是下午八时。武昌城内商店纷纷关门，街头行人毫无顾忌的在说："夏斗寅明天就要进城了。"

我决定以湖上园为我的临时指挥所，立即驰往那里发号施令。湖上园，是面临着一个大池塘的园林，周围绕着高墙，建筑类似城堡，原为俄军事顾问的办公处所，军事通讯设备，相当齐全。那时俄顾问都分往河南前线和各部队去了，园内只有一排卫兵驻守；而这卫队排长又是一位中共同志，可以由我指挥的。我得到当时代理邓演达总政治部主任职务的章伯钧（邓到河南前线去了，章系总政治部组织科长）和湖北省政府属下各机构中的中共同志们的协助，立即实施戒严。我向我的同志们指出，现在军队正纷纷开往前线，武昌防务空虚，人心动摇；据说还有不少夏斗寅的策应者，因此，设法巩固武昌后方，是当务之急。我要求武昌城内各党政军机构和民众团体，一律听我指挥，

分区严防夏斗寅的同路人的破坏活动。我的这些话立即为我的同志们所采纳而严格执行起来。

留驻在武昌城内一支最大的武装部队，是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生队伍，共有学生四百余人，每人都有步枪。我立即去找任这个讲习所主任的毛泽东，要求他的协助。我向他指出他所掌握的部队在武昌城内是人数最多的，应以一小部分担戒严任务，大部集结为策应各方的机动部队。毛泽东最初还以农运学生的枪支破旧，子弹缺乏，训练不足为虑。等我告诉他，现在战事紧急，不特农运学生要参加战斗，连我们自己在必要时都要到前线去拚命。他知道事态严重，也就欣然负担起我所交给他的任务。

接着，我还和他谈起夏斗寅的叛变，对湖南有甚么影响的问题；据他看如果夏斗寅能够迅速的被解决，湖南大致不会出甚么岔子的。后来，事实竟出乎这个以熟知湖南情况自命的毛泽东的意料之外，而有马日事变的上演。即此一端，足见当时我的那些青年朋友，聪明如毛泽东者，看法都是何等的天真？

我一整夜都在不停的工作，情绪的紧张，使我忘了疲倦。我对那些连夜赶往前线的军官们和政工人员们予以鼓励；我要求他们将能调动的力量，都集中到前线去，不必顾虑武昌后方防务，并要求他们一致听从叶挺的指挥，争取全面的胜利。我率领着那个湖上园的卫队排和一些临时给我调动的少数部队，利用着汽车，亲自巡逻各处，考察各要道的戒备情况。这样，秩序渐告安定下来了。风声鹤唳笼罩下的武昌之夜，也就渐趋于安静。

十八日，我继续忙碌着，不停的利用军用电话分别与在前线指挥的叶挺等人密切联络。我告诉他们武昌城及周围戒备坚强，土豪劣绅们已不敢乘机蠢动，其他各方的情况，也是与我们有利的。借以鼓励他们坚决作战。通往前线的各交通线，我也督促着工农群众，竭力维持其畅通无阻。所以前线所需要的供应和人力，因得着源源不绝的接济，是不虞缺乏的。

十九日清晨，叶挺在武昌以南二十余公里的地方，用全力击溃了夏斗寅部。夏部狼狈向鄂东逃窜。叶挺部因武汉防务空虚，遵国府命令，停止追击，集结在武昌以南的要地，准备应付其他可能发生的叛乱。由于夏斗寅部的迅被击溃，他的同路者均暂时偃旗息鼓。武汉又恢复了兴高采烈的气氛。

我这个并无任何名义的自动投效者，一时被武昌的同志们认为是武昌的临时总司令，对这次战事有过重大的贡献。十九日傍晚，有些国民党籍的军官从前线归来，向我祝贺；认为如果没有我居中策应，前线的胜利，也许不会这样迅速的。我结束了我在武昌所建立起来的战时布署，中共中央也催我返回汉口出席政治局会议；恰巧此时，我的太太带着我们的第一个男孩子，由莫斯科取道海参威，经过恐怖的上海，回到了汉口，我也需去照料一下。二十日上午，我就离开了湖上园到汉口去了。

我首先到国府大厦去访汪精卫，想将我在武昌的措施向他补报一番，以了手续。他没等我开口，就问："这几天为何不见你，上那里去了？"我觉得他的语气可能含有责备

我越权行事的意味，因而向他说明："我在来不及请示的状况之下，到武昌去协助同志们作战，现在那里实施过的权宜办法，都告结束恢复常态了，今天就是特地来向你报告的。"他这才很高兴的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的努力，你似几天没有好好睡眠，等你休息好了，我们再详谈罢！"当天下午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鲍公馆举行会议。我的同志们大致都为我这几天在武昌城的努力表示高兴。我们商谈到夏部并未被歼灭，可能还有续发事件，我们可以利用这次在武昌作战经验，通知各地同志，提高警觉应变。但这样大的一个刺激，也并没有抑制住鲁易的空论。他仍是大谈他的那一套陈腔滥调，对于现实的战斗，轻轻搁置一旁，说不上有甚么乘机扩大自身实力，继续打击反动派的实际想法。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长沙发生了有名的"马日事变"；这是湖南军队镇压工农运动获得成功的行动。在河南前线作战的唐生智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曾于五月十九日通电指摘湖南工农运动捣乱北伐后方；而临湘益阳等县的团防局及驻军也已开始行动，占领工农团体的会所，逮捕和杀害其负责人，解除工农的武装②。二十一日凌晨，驻守长沙的何键部许克祥团采取军事行动。长沙城内的湖南全省总工会和全省农民协会及其他重要民众团体均被军队占领，上千的工农武装尽被缴械，中共党员和工农团体的负责人被杀害者达百余人。

许克祥等军人的行动，是地主们的反击。据说许克祥在发难之初，曾感自身兵力单薄，以之对付有雄厚势力的

工农团体，不免惶恐。中共湖南区委事先也曾听到许克祥即将行动的风声，但未严加戒备。他们似认为唐生智是不会破坏他自己所支持的反蒋阵线的；而唐生智的部下许克祥等也不会违反唐的意旨而行事；因而不相信这种风声的真实性。这些天真想法使许克祥轻而易举的获得意外成功。

长沙所发生的事，立即震动了武汉。当时许克祥曾截断湘鄂边境岳州一带的交通，使我们在武汉的人得不着真实的消息；而陷于混乱中的湖南区委在被封锁的情况下，也无法立即向中共中央报告。武汉纷纷传出消息，都说许克祥如何节节胜利，甚至说湖南给他全部控制了；工农势力虚有其表，不堪一击云云。这些夸大性的风传，使武汉当局不敢贸然有所决定，我们这些中共同志们也不敢对扭转湖南的局势存有甚么奢望。

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这件事感到十分悲愤，有的捶胸蹬足的说，湖南有四百多万有组织的农民，三十多万有组织的工人，五千支枪以上的工农武装，还有几十万的农民梭镖队，竟会束手待毙。难道湖南区委这样缺乏警觉性，没有想到夏斗寅的叛乱给予湖南的影响吗？难道他们没有接到中央要他们提高警觉的通知吗？长沙城内也有上千支枪的工农武装，只要有戒备，还可乘势解决许克祥，现在应严令湖南区委迅速削平许克祥部。有的则觉得在许克祥先发制人的举动以后，反击恐已难操胜算；不如先弄清情况，再决定行动的步骤。

国民党的人士，从汪精卫一直到下层的干部，多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甚至不少人认为这是中共闯出来的祸。

他们埋怨中共，不及早切实纠正工农运动的过火行为，不约束他们侵犯军人家属的行动，以致激成这次的事变。他们批评湖南工农组织虽然庞大，究竟是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他们不赞成国民政府出而制裁许克祥，以免失去军人的支持。这确是一个关键所在，使所谓国民党左派暴露出其向右的倾向；他们似觉得除随着代表地主利益的军人们走以外，是别无选择的。

对于鲍罗庭，马日事变无异是一颗正中要害的炸弹。他十分震惊，而又无可奈何。他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表示，现在事情是弄糟了，许克祥已经占了上风；如果我们发动反攻，这将是一场战争；既无胜利的把握，又将增加武汉局势的危机。幸好唐生智还不赞成许克祥的行动，许也表示仍然服从唐生智，因此还有转圜的余地。他提议由他会同国民政府的代表，前往长沙先行调查，以期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俾能维持武汉的大局。我们的中央在无办法中，也就只好接受了鲍罗庭这个建议。

鲍罗庭大约是在事变发生后的翌日，向国府要人们表示，长沙的事变不过是一个地方事件，国府似乎要派大员前往调查，他愿偕同前往，设法平息双方的争执。国府要人们在无办法中，认为这是一个差强人意的办法。于是武汉各报大肆宣传，“鲍顾问愿亲往湖南，调查长沙事件”，成了安定人心的一帖药。可是许克祥表示拒绝，使鲍的长沙之行，也无法实现。不到几天，武汉政府派往长沙去的调查团谭平山陈公博等，行至岳州，也被许克祥挡驾了。

许克祥这个实干军人，不理武汉政府那一套；以一不

干二不休的精神，继续展开他的攻势。他乘势联络了留驻湖南的五个团，一致反共。他进而占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另行组织了一个“护党委员会”，实行清共③；其做法与蒋介石在上海等地的行动如出一辙。他指派大批土豪劣绅为清乡委员，协同军队，分赴各县，实行清乡，用比农民协会对付土劣还较残酷的手段，来实行报复。

中共湖南区委在马日事变后，曾通令各县农民协会率领农民武装，向长沙反攻，声讨许克祥；后因接到中共中央“应由国民政府和平解决”的命令，临时又发出停止进攻的指示。平江浏阳一带的农民队伍因没有接到停止进攻的命令，依原计划向长沙逼进；但因步调不一致，致被许克祥部所击溃。这件事后来成为中共内部的一个大争论。湖南区委说他们原持坚决斗争的原则，但为中共的命令所阻止。而中央有些同志则指摘湖南区委书记李维汉等，没有事先防范马日事变，是机会主义的表现。

五月二十九日，唐生智公开发表了转变态度的通电。他表示反共，电文中指出“湘省党务悉为跨党暴徒及本党不良分子所操纵”。他一改向来容忍中共在湖南活动的态度，表面上是受部属要求的压力和马日事变既成事实的影响；实际上似是大势所趋，他个人蕴藏于内心的真意，到了可以表面化的时候。他仍希望捧着汪精卫反蒋，他的反共态度的表明，是否事先得到汪的同意固是疑问；但汪从此采取向右转的态度，则是明显的事实。武汉整个局势的转变，也以此为标志。唐生智再不是鲍罗庭的支持者，而是汪精卫门下“被夹攻中”的健将了。

正当中共遭受到严重的打击陷于被围攻的时候，共产国际的一份有名的电令，于六月一日到达武汉了。这个电报是根据斯大林的意旨，打给鲁易和鲍罗庭的。其内容是：一、实行土地革命，从下而上又从上而下的来没收和分配土地，但不要侵犯军官的土地；二、由党的权力机关，纠正工农运动的过火；三、消灭现有的不可靠的将领，武装两万共产党员，和从两湖挑选出来的五万工农分子，组织新军队；四、将新的工农分子安排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去代替原有的委员；五、组织革命法庭，由一位著名的国民党员任主席，来审判反动官吏④。

这份电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读的时候，所有到会者都有啼笑皆非之感；一致觉得这是无法执行的。有的表示莫斯科太不懂武汉的情形了；现在如何谈得上制裁不可靠的将领和武装工农？有的表示要实现这个电令中所说各节，那就非中共单独干起苏维埃不可。可是莫斯科仍希望国民党左派和国民政府能干这些事。有的表示这个电报是太迟了，是在“放马后炮”，为推卸共产国际的责任预留余地，其实，莫斯科对于湖南农民正在流血一事是应当知道了的。我也曾表示现在武汉局势整个在右倾，国共合作的政策快要完蛋了，还幻想武汉政府能干出这些伟迹出来，真是海外奇谈。鲍罗庭和威金斯基都曾确切表示，这个指示一时无法执行。鲁易也在这个会议上表示了难于实现的看法。因此，会议一致决议，回电莫斯科，告以无法立即付诸实施。

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想法，大致是依据共产国际维

持与国民党左派合作的政策之下，企图挽救已经笼罩着武汉的右倾危机。唐生智那时还采取两面派的态度，一面通电反共，一面又向武汉国共两党要人表示不满许克祥的越轨行为；他自己要继续遵守孙总理的三大政策。冯玉祥的态度还没有明朗化，我们还希望冯玉祥能支持武汉的左倾路线，汪精卫等人似也还未完全走到反共方面去。因此，我们觉得莫斯科的调子唱得不合时宜，现在如果能做到维持反蒋阵线，武汉不致公开分共，中共就只有在工农运动不继续受到摧残的条件之下，付出相当让步的代价；来维持这个国共合作的局面。否则，只有根本改变这个政策，中共单独干起来；不仅反蒋，而且反对武汉的动摇分子。

不料正在这个紧急关头，鲁易的一个不可理解的行动，使时局更形恶化。他事先没有与任何人商议，将共产国际的机密电报，交给汪精卫看；并依汪的要求，送给他一个副本。莫斯科这个电报似是没有明了马日事变已使中共处于四面受敌的地位，以为鲍罗廷等还能左右时局，所以电令鲁易和鲍罗廷指导中共奋起反击，以夺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不用说，这个电报是不能向外公开的。鲁易本人并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电报，明知已复电暂不执行，竟反而将这个电报交汪阅看，使人殊难理解其用意所在。

究竟鲁易为甚么这样做，当时我们觉得他是太过于“书生”了。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一直无法贯彻他的主张，不免使他苦闷。可是汪精卫老是敷衍他，同时汪的诚诚恳恳的外貌和慷慨激昂的革命言词又是具有吸引作用的。鲁易本着他贯彻共产国际指示的天真愿望，很可能没有看出

汪的态度的转变，因而希望在汪的身上创造一些奇迹出来。他似也想在这个单独的行动中，证明他主张的正确和鲍罗庭等人看法的错误。

可是汪精卫的反应却出乎鲁易意料之外。汪曾向他指出这个电报的内容违反当年的“孙越宣言”；因为孙越宣言明确指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而这个电报却是要中国走向共产。汪并将他所持有的副本，交给他周围的要人们传阅，并表示这证明不是国民党不联俄容共，而是共产国际违反它的诺言，别具“消灭国民党之阴谋”。

鲁易这种异动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时候，我们都非常愤慨。有的责备共产国际，为甚么派鲁易这样不懂事的人来指导中国革命。有的指出一切事都被鲁易弄糟了。有的认为鲁易这种行动不是极端糊涂，便是有意的叛行。我们觉得如果我们对外为这个电令作辩护，那将是猝不及防的决裂；这决不是共产国际所希望发生的事。

自此事件后，鲁易和威金斯基等人立即在武汉消失了。大概是莫斯科急电他们迅速离开武汉，一切交由鲍罗庭应付。可是鲍罗庭也显得垂头丧气，声言要到庐山去休养；并告诉我们莫斯科将另派代表来指导中共工作。

中共中央受到这个打击，实在穷于应付；悲观失望的情绪随着增长起来，莫斯科对于我们暂缓执行六月一日电令的要求，并未置答；对于鲁易的异动如何向外解释，也无任何指示；似乎明白了它所寄望于武汉左派者，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实践上，都成为笑料；它的代表鲁易更幼稚得

可怜的授人以柄，以致一切都难于措词了。中共中央既摸不清共产国际作何决定，又不好贸然对外作何主张，显然处于动辄得咎的窘境。当时瞿秋白以健康为理由，也表示要到庐山去休养。陈独秀先生认为莫斯科把事情弄糟，又无法善后；露出了消极的意向。其他委员也有“屋漏偏逢连夜雨”之感。

至此，国共的分裂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了。马日事变和唐生智等人的态度使汪精卫等倾向于分共，鲁易的怪行又供给了分共一个很好的借口。那时汪精卫虽尚未喊出分共的口号，但文章的路数已是显明了；事实上也在逐步布置。他抓着真凭实据，振振有词；他似乎不是蒋介石的尾巴，也不是唐生智的应声虫，而是为了挽救国民党而奋斗。

冯玉祥表明他联蒋反共的态度，使武汉政府的地位，更形不利；也逼使武汉的要人们步蒋介石的后尘，实行分共。汪所标榜的和平分共和蒋的清共，在作法上与解释上虽有不同，但其为反共则一。国共关系的破裂，在国民党看来，是对中共篡窃国民党的一种制裁；在中共看来，是国民党人违反孙中山先生的遗训，背叛国民革命的行为。无论双方的看法如何，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后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至此是已成尾声了。

国共关系的全面破裂，紧随着军事形势的演变而发生。这个时候，南京武汉和由陕西出动的冯玉祥军三方面对奉联合作战，节节胜利。五月十六日，张发奎部铁军首先在河南上蔡击溃奉军的左翼，奉军向黄河以北败退。五月二十七日，冯玉祥部占领洛阳。六月一日，唐生智部占领郑

州，张发奎部占领开封。六月二日，蒋介石部占领徐州。

在对奉作战中，武汉的军队唐生智张发奎部出力最多，尤以张发奎的第四军，冲锋陷阵，以极大的牺牲，开创出对奉战争胜利的形势。张部中共党员较多，在这次战役中牺牲甚大。受张发奎指挥的贺龙部因有中共党员周逸群等从事政治工作的协助，也在这次战役中卖了相当的气力。可是，战争果实的收获者，竟出乎鲍罗廷和加仑的预料，不是武汉，而是反武汉的蒋介石。

河南战役的作用主要是将冯玉祥军从潼关接应出来，而冯玉祥这注珐码此后竟然加在蒋介石那方面，使宁汉这架天秤更失去了平衡。曾在北京煊赫一时的冯玉祥，原视奉张为寇仇；主张革命内部合作，继续北伐，消灭张作霖。等到他已出潼关，握有河南等省地盘；他就觉得赤化之嫌，会不利于他的政治前途；军事实力，才是可靠的凭借。因此，他在政治上的选择乃偏向于蒋介石，这是意料中事。

在冯玉祥看来武汉已是一个朝不保夕的穷亲戚。六月一日，四川军阀中实力最雄厚的刘湘，宣布就任蒋介石所任命的第五路总指挥之职，以杨森为前敌总指挥，声言出师讨伐武汉；并获得贵州军阀周西成等的支持。而武汉方面自夏斗寅叛变后，长江上游的防务已是非常空虚，现在又受着刘湘的军事威胁。六月六日，江西的朱培德因蒋介石的压力和汪精卫态度转向的影响，实行遣送中共党员出境。在中共影响下的南昌国民党市党部、总工会、农民协会、学生会等团体均遭军队检查；中共党员主办的南昌《民国日报》亦被封闭。武汉政府和中共遭受这些纷至沓来

的打击，更使善观风向的冯玉祥觉得，没有为人分担痛苦的必要。

反之，蒋介石的势力却如日方中。譬如盘据山西多年的阎锡山一向在北方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北伐军光复武汉以后，他的代表即奔走于宁汉一带，接洽投靠革命的事。六月六日，阎锡山接受南京政府的任命，就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职，通电服从三民主义，这自然大大增加了蒋的声势。而且阎锡山在冯玉祥看来，是一个最具实力的邻舍，如果他与他的邻舍唱起反调，可能会有严重的后果。

冯玉祥在未出潼关以前，并未表明他的态度，他在武汉和南京都派有代表，一视同仁的进行联系。他在武汉的代表是熊斌，在南京的代表是李鸣钟。当时熊斌在武汉就向人表示过："我们同南京要甚么有甚么，可是向武汉要甚么就没有甚么。"他的用意主要是指蒋能供给冯所需要的金钱，而武汉则无力供应。

冯玉祥在出潼关以后，口里喊的间或仍有"共产国际万岁！"的口号，但实际上则已倾向于反共了。他曾到过莫斯科求援；也在困难中直接得到了苏俄的实际帮助；这自然是为了实现他个人抱负之故。但时移势易，他又觉得苏俄的帮助，不仅已非必要，且将因此对外受到打击，对内自讨苦吃。抛弃革命理想，改弦更张，是现实主义者必然的归趋。在这一点上，蒋介石是先进，他和汪精卫不过步其后尘罢了。

河南战役胜利之后，武汉政府要人们与冯玉祥约定于六月十日在郑州举行会议。会议结果又促进了武汉的分

共。汪精卫的反共理论与冯玉祥的反共需要，就在这次会议上汇成一股洪流，冲垮了国共合作。再由冯玉祥与蒋介石接触，形成了宁汉合流的趋势。那时，中共中央鉴于形势险恶，对郑州会议已不感乐观。汪精卫等人的趋向已经显明了；冯玉祥的动向如何则还没有表明。因而我自己仍想作一次最后的努力，试图挽救。我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求，准我到郑州去。我说明："我的任务是到河南去布置一下，使中共的河南组织能在地下生存，并设法查明郑州会议的情形；如有可能，希望能影响郑州会议，不致过分损及我们。"政治局认为我的任务是艰巨的，但不妨一试。

六月八日，我搭上了京汉铁路总工会为我特备的专车。京汉路当时受着战火的破坏，沿途阻碍甚多。但我因与京汉路工人们是"二七"罢工的老战友，得着他们的特别协助，以较快的速度，于九日下午到达了郑州。铁路工人们预先借妥陇海路的办公大楼，作我的临时行馆，并为我布置警卫。

我的专车和冯玉祥的重要将领所乘由洛阳来的列车，同时到达郑州车站。在只有一张长台子的郑州车站的大厅中，张之江、鹿钟麟、孙良诚、韩复渠等十余将领都围着坐在这张台子上，从武汉来的却只有我一个人。冯部将领中有人说到："咱们总司令真有办法，你瞧，我们在西北受够了苦，现在又到了郑州，看来，准可打到北京过年！"也有人特别向我提到冯总司令是国民党的忠实信徒，遵行孙先生的联俄容共政策和服从武汉政府。看来，他们似还不知道冯玉祥葫芦里卖的是甚么药。

我在行馆里，忙着设法找寻中共郑州组织负责人，了解当地的情况。很快我就见到中共河南区委中新由洛阳来的同志。他转来刘伯坚同志（那时任冯的政治部主任）的口信；大致是说，冯玉祥对武汉的态度不好，倾向于南京的蒋介石；并说到冯玉祥禁止他的部属（包括刘伯坚等人）对外作任何单独活动。因此，刘伯坚等不便与中共河南组织经常接触，托他将这些情形转告汉口中共中央。

刘伯坚的情报证明情势已十分不妙了。我估计如果我径去访问向未谋面的冯玉祥，不会有甚么好结果。如果我去找刘伯坚邓小平（任冯的政治部副主任），对他们又有不便。我乃设法托人转告加仑邓演达等人，要他们和我联系。

十日上午，我访问汪精卫，适逢来郑州参加会议的谭延闿孙科等人在座。谭孙看见我进来，就托故走开了，这也表示出当时国共人士之间的关系，已经有点不自然。汪精卫仍是客客气气的接待我；他告诉我冯玉祥尚在从洛阳来郑州的途中，他们准备到车站去接他。

我径向汪说明我的来意，指出郑州会议关系党国安危和他个人的政治前途。我主张极力争取冯玉祥对武汉的支持，否则前途将不堪设想。至于武汉内部问题如国共关系工农运动等，都是可以获得适当解决的，似不必多所顾虑。如果冯有甚么要求，我们应当适当的满足他。希望汪能作有力的发言，使冯玉祥明白支持武汉政府的正统；其方式，可由郑州会议发表文告，或者由汪召集国民党四中全会，请冯到武汉参加；表示他支持武汉政府的诚意。

汪对我的提议表面上热烈赞成，尤其是关于争取冯玉

祥的支持一点。我向他重新保证中共支持武汉政府，他似也颇感兴趣。不过他的措词有些地方模棱两可；他不敢相信冯会支持武汉，曾说到不少俄顾问长期在冯左右，应该可以影响冯的态度；假若俄顾问不能影响冯，那就表示冯已另有打算，他再多说些话，恐怕也是徒然。但他明白答应我，他还是愿意试试，并允将我的意见与谭孙等人商谈。

郑州会议的参加者，除冯玉祥外，由武汉来的有汪精卫、谭延闿、徐谦、孙科、顾孟余等；前方将领有唐生智、张发奎、邓演达和俄顾问加仑将军等。会议一开始，情形就不可乐观。武汉的要人们，包括汪精卫在内，都在向冯诉苦，无非是诉说一些武汉财政困难，中共和工农"捣乱"等类故事；无形中就把冯推到了仲裁人的地位，似乎武汉这群苦孩子在请求这位冯大帅解救他们的苦难。这那里是在争取冯来支持武汉政府的表现呢。

当时在河南前线各处奔走的邓演达，是国民党内一位杰出的左派人物，他不满汪的最近言论，认为汪指共产国际六月一日的电令是意在消灭国民党，未免小题大做了。他极力想维持武汉现存的局面；曾向汪进言，要求维护孙总理的三大政策；但未为汪所重视。他目击郑州会议的情势，更感失望。十一日，他的一位亲信秘书告诉我，邓说到汪精卫在会议上为了迎合冯玉祥的意旨，大发其反共的议论，只希望冯能尊重武汉和他个人的地位；可是，冯除欣赏那些反共议论而外，对武汉则意存轻视。至此，分共是必然的了。邓就要回武汉去料理后事。

我与汪精卫最后一次的政治谈判是失败了，我对郑州

会议已无任何期望。我除了为中共河南区委工作略作紧急安排以外，在郑州已无事可做了，因而我没有等到郑州会议闭幕，十一日晚，便匆匆赶回武汉。我在归途中，回味着我与孙中山先生的接触和这几年国共合作所遭遇的悲喜经历；我更惋惜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已为号称孙先生的忠实信徒的人们所唾弃。

我回到武汉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席上根据我在郑州所知道的情况，指出现在是退出国民党的时候了。所应考虑的是和平式的退出，抑或是决裂式的退出。我觉得对于左派的上层分子，我们再不能存有幻想；对于众多的左派中下层分子，仍应设法联络，以赢得他们的支持。鲍罗庭和其他委员们，对于我的这种主张，虽未表示反对，但认为应俟郑州会议结果完全判明和征得莫斯科同意以后，再作决定。

汪精卫等一行约于六月十三日返回武汉。他们散布乐观的空气，说郑州会议的结果很好，冯玉祥支持武汉政府等等。所公布出来的是唐生智张发奎部回师武汉，河南由冯玉祥部接防，河南陕西甘肃等省省政府组织和人选，经武汉政府明令发表，统由冯玉祥以豫陕甘北方政治分会主席名义节制。至于这次会议的详细内情，则秘而不宣，我们也无法洞悉全貌。但事实上汪精卫等的分共工作在暗中积极进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解除鲍罗庭顾问职务的消息传出来了⑤。自该年三月间蒋氏明白表示要驱逐鲍罗庭以后，鲍罗庭将被解雇或者他将辞职等等传说，至此见诸事实。鲍罗庭对这件事倒也处之泰然，他对外以营救

其尚被扣押在北京的夫人为理由，声明不能立即离开中国；实则他是以莫斯科代理人的地位，在作一些最后的安排并等候另一位莫斯科代理人的到来。

我们知道了冯玉祥与蒋介石将于六月十九日在徐州举行会议，就觉得这也许是郑州会议所秘密谅解的项目之一；很可能汪精卫等是经由冯玉祥这个仲裁人与蒋谋妥协，至少汪精卫等事先是知道这件事的。可是汪精卫等却讳莫如深，甚至说到冯玉祥竟与蒋介石会议，是想不到的事。

不到几天，徐州会议的实情传到了武汉，冯玉祥给武汉政府的电报，也隐约为外间所知悉；后来证实冯在二十一日有一个电报致武汉政府的要人们⑥，其内容大致是：综合郑州会议时之意见，极不满意于武汉共产派之行动，经决定令已解职之鲍罗庭归国，在武汉之国民政府委员除愿出洋休息者外，余均可合而为一，此情已告之南京方面诸人，一致赞同，请汪谭诸人速决大计。并请唐生智将所部调郑州，协力北伐等语。这是蒋氏的胜利，武汉的投降，也是冯的反共态度的明显表示。

莫斯科获悉了郑州会议的经过以后，曾电令鲍罗庭采取适当的退让步骤，来挽救武汉的分共危机。六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曾发表一个包括十一点的政治声明⑦。其中要点是：承认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中共党员参加各级政府工作者，都是本着国民党员的身份；为了减轻政局的困难，中共党员可以随时退出政府；工农组织应受国民党的领导和管理；工农要求不得超出国民党的决定和法令范围之外，但国民党仍应保护工农组织及其利益；根据

国民党的原则，民众得有武装，但工农武装应由政府训练和管理；武汉纠察队可以减少或编入军队；工人纠察队不可干涉司法和行政，对任何人都不得擅自逮捕审判与处罚游街等等。这个声明就是由鲍罗庭根据莫斯科的电令所草拟，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这是莫斯科纠正六月一日电令的表示，似也是退让政策的最后限度。中共中央要求党员切实执行这个声明，并劝告工农群众遵守革命纪律。但这些努力并不能扭转国共破裂的命运。

汪精卫忙着召集军政要人们会议商讨分共的具体步骤。孙科等人发表言论，径行攻击工农运动侵犯工商界的利益，是反革命的行为，似乎工农群众任何一个改良要求都是不应当的。武汉政府对于湖南工农被摧残的事，除交由唐生智全权处理外，采不闻不问的态度，并严禁工农的不法行为。唐生智部由河南回师武汉以后，军队将径行制裁中共和武汉工农团体的声浪，也愈唱愈高起来了。

六月二十八日，汉口汉阳酝酿着另一个马日事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上，鲍罗庭首先指出，现在局势万分严重，武汉工人纠察队是自动缴械抑或准备抵抗，必须择一而行。而他的意向倾向于自动缴械。蔡和森发言，反对工人自动缴械；认为这不是共产主义者所应做的。周恩来则认为武汉工人纠察队的一千多条破旧枪支值不得过分重视，主张自动缴械。其他委员也觉得除自动缴械外，别无良策，因而成为定案。

周恩来旋即指导工人纠察队总队长陈赓将队里的武器缴交汉口卫戍司令李品仙；于是李品仙的部队便和平占领

了汉口各重要工会的会所。这件事后来中共中央被共产国际斥为“可耻的机会主义”。其实这是莫斯科代理人鲍罗庭的提议，而他又是根据莫斯科要他尽量应付这个指示原则而行事的；中共中央的多数委员当时对此举的不满，虽不若蔡和森那样愤慨，但为势所逼，内心的沉痛则很显然。

七月初，鲍罗庭又转告中共中央，谓共产国际要苏兆征谭平山二人以示威的姿态，退出国民政府。这似是莫斯科觉得，在武汉政府摧残工农运动日甚一日的情况下，中共党员再留在这样的政府里，和摧残者负联带的责任，未免太不成话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接受了这个指示；我们大多觉得这样做，才是差强人意的表现。

至于这两个人退出政府所应采取的方式，中共中央并未详加讨论；以为退出行为的本身即足以对国民党表示抗议。不料谭苏二人的辞呈在措词上竟发生了参差。谭是称病辞职的，在辞呈并提到“未能纳农运于正轨”的话；而苏兆征则坦率表示是未能为工人谋福利，因而不愿再干。我们当时即觉得谭的措词未免过于软弱；后来共产国际也指摘谭没有完全遵照指示去做，是机会主义的表现。

七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⑧，指斥武汉当局。这是中共的退让政策走到了穷途，转而奋起反抗的信号。这个宣言指出：“最近数月来的政局，使中国一切革命人士大为失望了！……国民党中央暨国民政府只是服从那些由土劣出身的反动军官……反对中国人民最大多数利益与孙中山的根本主义和政策。”因而郑重声明中共“永远为工农兵学小资产阶级的广大民众利益而奋斗，对于国民党中央

现在这种政策绝对不负责任。”

中共发表这个宣言的另一原因，也是由于共产国际曾责备过谭平山的辞呈未能表达中共的真正意向；所以发表这一宣言，以资补救。其实，这个宣言所起的实际作用，只是提早了国共全面破裂的到来。

七月十五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召集中央全会，讨论分共，同时通过制裁中共党员违反国民党主义之言论和行动。七月十六日，国民党中央发表声明⑨。指六月一日共产国际的电令“不啻对本党生命，予以根本之危害。”并谓中共党员退出国民政府和中共在七月十三日发表的宣言是破坏国民党的“容共政策”。十八日宋庆龄宣言，反对武汉排斥中共的举动，认为违反孙总理的主义与政策，声明不负联带责任；宋的这种表示，对于以后中国政局的发展，也许不无作用，但当时却未发生缓和分共的效果。

接着，国共分裂之幕，便由汪精卫揭开了。二十三日，武汉国民党发表政治委员会之决议案：(一) 凡列名本党之共产党员，在本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及国民革命军有职务者，应自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二) 在国民革命时期以内，共产党员不得有妨碍国民革命之活动，并不得以本党名义作共产党之工作；(三) 本党党员未经本党中央许可，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二十四日，汪精卫复电冯玉祥，大意是“中共与鲍罗庭已加处置，愿意迁都南京实行宁汉合一。”

这一连串的事实，是以郑州会议为发展的关键，国共关系趋于全面破裂的主要经过，也是汪精卫投靠蒋介石，

武汉左派政权丧失其存在的原委。

在武汉国民党分共的剧变中，中共内部受了沉重打击，顿呈分崩离析之状，几频瓦解。六月一日共产国际的电令被鲁易向汪精卫公开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鉴于事态严重，不愿内部稍有参差；无论事之大小，概遵共产国际之指示进行。但我们又都是各有所见的人物，在国际的约束之下，殊不无郁抑难伸的痛苦；于是，有人消极失望，有人积极挣扎，有人另找出路等等，都表现出来了。

在国共关系频于破裂的关头，共产国际却一直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六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所发表的声明，只说中共党员可以随时退出政府，并未提到退出国民党的事。七月初，中共党员实行退出国民政府时，共产国际还是坚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但对于万一国民党径行分共，中共应如何应付，则并未有任何指示。共产国际为甚么要如此？是要中共伙同一些剩余的左派打着国民党和孙中山的旗帜，反对汪精卫等叛徒？抑或是要中共付出更多的让步代价，以阻止汪精卫的分共行动？亦从未加以说明。

我们觉得共产国际这些指示，其用意是要中共不计成败留在国民党内，使汪精卫等不便立即分共。但我们认为这只是单相思，汪精卫决不会因此而罢手。我们中有人觉得共产国际要中共这样做，是为了使苏俄人不致完全退出中国，避免苏俄的国际地位更加恶化，此一目的即使办不到，也不要使那些俄顾问不能够安全回国。由这种推测出发，就会觉得莫斯科主要是在为苏俄的处境着想，而不是单纯为着中共前途的利益着想。

当中共中央不得已于七月十三日发表宣言的时候，我们都预感到暴风雨即将降临。汪精卫那时虽已放任那些反动军官，到处摧残中共和工农团体，但他口头上的调子，还是“和平分共”。中共现在发表这个反抗的表示，汪很可能立即改采公开的压迫手段。因此，我们采取紧急步骤，使中共中央组织能安全的转到地下去。至于此后应当采取何种方针的问题，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鲍罗庭已不肯贸然有所主张，这就增加了中共中央的徬徨。

七月十三日晚，鲍罗庭和瞿秋白悄然由武汉到庐山去了。他们这次的行动，我事先不知道；他们似也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十四日早上，我到鲍的寓所，见着铁罗里，才知道鲍罗庭和瞿秋白已经走了。这时铁罗里正为鲍罗庭收拾各种文件，结束这个顾问办事处。铁罗里原是我很熟识的，他一直任总政治部邓演达的顾问，也是鲍罗庭和加仑将军的主要助手；因此，在此紧急时期，他能为鲍罗庭料理未了事务。

铁罗里是个富有文人气质的军人，这时也显得有些意乱心烦，六神无主了。他以急躁的口吻说到他个人的看法，他主张现在应该拥护邓演达做国民党左派的领袖，公开反对出卖革命的汪精卫。我告以我已好几天没见着邓演达了，据说他要离开武汉；因此，我觉得他此时似不会挺身出来硬干。我还说明从策略角度来看，我们正在转入地下，能影响第四军的，已不是邓演达，而是汪精卫；如果我们立即公开反汪，不仅我们的安全有问题，在第四军中的中共党员更可能遭受到猝不及防的打击。

铁罗里听了我们的话，很不耐烦，竟质问我："你还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只得向他解释：邓演达是我们公认的一个有作为的左派人物，汪精卫也是我们所共同唾弃的。现在的问题是奋斗的步骤，换句话说，是中共独立的干，还是拥着一个国民党左派领袖来干的问题。但无论环境如何险恶，邓演达愿不愿出面硬干，有没有国民党左派人物和我们一同奋斗，中共总是要继续奋斗的。铁罗里这才没有话说了。但他的这种表示对我当时的情绪，确是相当重大的刺激。我在设想：我们已往这一段披荆斩棘的努力，因莫斯科的政策以及其他主观和客观的因素，而致失败；难道领导我们的莫斯科，会将这一失败的责任，一古脑儿套在我们的头上吗？我有些怅惘！

鲍罗庭的匆促离去，是表示他已不能影响武汉的政局，要去办理返国的各种手续；似也是有意避开国共分家的风潮。与鲍关系最密切的瞿秋白，是为了健康不佳，需要休养，而偕同前往庐山。但人们总觉得他在紧急关头，不辞而去，不免有逃避责任之嫌。后来事实证明，他主要是与鲍罗庭计议今后中共领导的改组问题。

鲍罗庭在鲁易、威金斯基等人走后，对莫斯科的指示特别显得奉命唯谨。他在这一段时间里，联络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企图形成新的左派，来阻挡汪精卫等的分共行为。他也明知这时要邓演达等取汪精卫的地位而代之是不可能的，如果有此可能，他也许不惜再来一次冒险，所以他联络宋邓陈等的目的还是偏于消极性的。他显得心情苦闷，没有已往放言高论的豪气。他的走，也使中共和

莫斯科的关系一时中断了。

七月十四日，陈独秀先生也在一个秘密寓所躲藏起来，不再露面了。我和铁罗里分手以后，曾去看陈先生，也已找不着了。他的秘书任同志（恕我已记不得他的名字）告诉我，陈先生不宜再出面，一切可由他联络。这种曲终人散的景况，使我难过万分。我曾愤慨的说："难道中共就这样散伙了吗？我是绝不甘心的！"

七月十五日，陈独秀先生曾有一封简单的信，向中共中央表示无法继续工作，要求解除他的书记职务⑩。据任同志告诉我，陈先生认为国共分裂已使国民革命完蛋；共产国际一直不准中共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他个人心力交悴，只得引咎辞职，希望我和其他的同志继续奋斗下去。我曾托任同志转告陈先生，在这危急关头，他采取消极态度，是十分不宜的。

我们觉得陈先生这种行动，无异是临阵脱逃，但也多少同情他的痛苦。在六月二十日我们讨论发表那个十一点声明的时候，陈先生即提出了中共党员不仅要退出国民政府，而且要退出国民党的主张。鲍罗庭曾表示他个人非常赞成，但恐共产国际不会允许。瞿秋白根据鲍的这种看法，表示与其自动退出，不如让国民党开除我们⑪。因此，陈先生的主张，虽能代表我和多数中共同志的想法，但仍不能贯彻。

中共自动退出国民党，应采何种方针，从未详加讨论。陈先生所提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并非与托洛斯基一样论调，要中共径行组织苏维埃；也不等于说退出国民党，就是退

出国民革命。那个时候，也没有改采党外合作的想法。主要是他鉴于国共分裂已不可避免，如果自己作有步骤的退出，可以留下自由活动的地步，不致完全听人宰割。

从陈先生当时及以后的一些表示看来，在七月十三日前后，他的苦恼已达顶点⑫。他鉴于国民党那些所谓左倾的军政领袖，一个接一个的反起共来；工农群众和同志们大批的被杀害了；中共内部意见的分歧，愈演愈烈；这一切的一切，似都是中共留在国民党内以期集中国民革命力量这一错误政策所酿成。现在中共在忍受许多屈辱以后，除了发表一个宣言泄泄积愤以外，并无实际办法来挽救被摧残的厄运。这无疑的使他觉得中国革命是完了，中共是难于翻身了，他的前面是一片漆黑。因而他个人只有出之于让贤的一途了。

当陈独秀、瞿秋白、鲍罗庭等几乎同时离开他们的工作岗位的时候，我觉得责无旁贷的应该支撑这个危局。我召集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等中委，举行政治局会议。我沉痛的宣称：在此生死关头，让那些不能支撑的人们去休息一下；我们应当继续奋斗；即使共产国际没有代表参加我们的会议，或者不再理会我们，我们也不要灰心，依然要独立干下去。我的这些话激起了所有参加者的同感。我们立即决定：中央政治局暂时移到武昌办公，因为武昌是左倾的第四军的防地，办理紧急疏散。当时我们的首要工作是使各级组织加速转入地下，加紧党员的撤离工作，将群集在武汉的同志们分别派到各地去，掌握工农力量，准备对抗国民党的反动压迫。

当时武汉的政局十分微妙。在徐州会议以后，蒋介石一面经由冯玉祥向武汉施压力，一面从南京调集部队溯江而上，表示武力解决武汉的姿态。汪精卫面对这种形势，除了锐意分共以外，又为了维护自身在国民党内的法统地位，乃高唱东征讨蒋。因此，武汉的军队向长江下游移动，第四军（包括叶挺部）任讨蒋军的江右军，正向南昌集中。武汉各军执行汪精卫所标榜的和平分共政策，也是宽严不一的。唐生智部属多用残酷手段反共，第三军朱培德实行"欢送共产党员出境"，第二六两军表示不危害中共党员的安全，至于第四军则有保护中共党员不使受害的暗示。

七月十五日的武汉分共，使国共两党内部发生更显著的分化。汪精卫企图瓦解中共：用和平分共的调子来发挥分化中共的作用。国民党左派多与汪精卫同调，他们利用平日与中共党员的友谊关系，极力劝诱中共党员脱离中共，做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员。左派中也有少数人觉得抛弃总理遗教，实行分共，究竟是不利于革命的，因而表示消极失望，其中甚至有愿意以个人身份仍与中共继续合作革命者。至于中共方面，中央的领导既已动摇，于是有些党员就显得惶惶无主，有消极者，有逃避者，也有投靠国民党者。

然而中共究竟是经过锻炼的。多数党员，尤其是党中的骨干分子，不会在压力之下低头。他们鄙视汪精卫的行径，斥之为出卖革命的伪君子。他们早已不满共产国际的政策，也埋怨中共中央的无能，他们是真诚的革命者，以能为国民革命卖过一番气力而自傲，也为吃力不讨好而自伤。他们并没有气馁，不少的人还要求不计成败，必须硬

干一番。我和周恩来等当时之所以能够在组织业已支离破碎之际，置安危成败于度外，继续奋斗，维持中共中央的命脉，也就是受着这种精神鼓励所致。后来，瞿秋白的盲动主义也是渊源于这种硬干的精神。

我们策划如何继续革命的方法。武汉的工人运动是被摧毁了，发动总同盟罢工已不可能，更说不上在武汉领导起一个足以推翻汪政权的政变。湘鄂赣等省农民运动受着反动军队和土劣地主的联合进攻，也已支离破碎。剩下的农民武装，都向较偏僻的地区集结，从事微弱的反抗。我们剩下的可靠资本只是叶挺所统率的一师和周士第的独立团，这个部队正开往南昌。我们很珍视这点资本，希望以此为主干再配合各地的农民武装，竖起反抗的旗帜。

暂时移到武昌办公的中共中央，因人手的分散，显得相当零落。实际主持工作只有我和周恩来两人。蔡和森是病了，不能任繁重的工作，而且准备潜赴上海。李立三、谭平山、林伯渠、恽代英、吴玉章等重要党员先后到南昌去了。大批的中共党员乃至一些仍与中共合作的国民党左派，都向南昌汇集。他们有的是借着第四军的掩护，由南昌转地潜伏工作；有的是暗藏在叶挺部队中，准备必要时实行反抗。

我们的工作紧张而繁重，困难重重。当时经费缺乏，我们在忙着督促那些在政府任职务的同志们，不择手段，张罗一些款子来，作为我们疏散党员之用。众多的中共同志们都要在几天之内，依据他们的自己选择、工作的需要，和他们自己能在地下生存的条件，分别驰赴各地。这些人

的任务和交通问题，都要一一具体为之解决。

毛泽东当时表现了他的奋斗精神，自动选择回湖南去，担负领导农民武装的任务。我们原分配他到四川去，这是为了他的安全着想，亦由于四川也是大有可为的地方，尤其是关于农运的发动。他这个湖南籍的"共产要犯"却要冒险到湖南去，不甘心让他所领导起来的农运就此完蛋。我们当时很高兴的接受了他这个到湖南去的要求。这也许就是他后来被逼上井冈山的起点了。

周恩来是一个不多发表议论而孜孜不倦的努力工作者。他很镇静的夜以继日的处理纷繁的事务，任劳任怨，不惹是非。所有同志们的疏散工作，多半由他经手。他之获得一般同志的敬重，地位的日形重要，也是从此开始的。

我的大部分时间则花费在与一般同志的谈话方面。当时，紧急疏散，不免使一般同志有逃亡的感觉。振奋他们的精神，乃属十分必要。我分别向我的同志们指出，中共虽然暂时挫败，仍有胜利的前途。国民党抛弃了孙先生的革命理想，将会四分五裂；将来可能有汪记胡记蒋记等国民党出现，国民党的军人仍将如北洋军阀一样，混战如故；统一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解除人民痛苦等革命任务，他们是负担不起的。我们只要接受失败的教训，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继续努力，是可以肩起革命的重任，而底于成的。

就由于我们这几天不懈的努力，党内的一般情绪逐渐趋于安定；中共的生机似乎又蓬蓬勃勃起来了。两三天之后，中共中央的工作更有秩序；一切都可以顺序推进。

于是周恩来提出了一个进取的建议。他指出现在大批同志都随第四军行动，万一第四军的将领张发奎等受环境所逼，转而反共，那我们在四军中的同志们将被一网打尽。他觉得与其受人宰割，不如先发制人。他说刚才接到李立三等由九江来信，主张在南昌九江地区发起暴动。周恩来因而赞成在南昌由叶挺部等首先发难，联络湘鄂赣一带工农群众，形成反武汉反南京的中心。他估计南昌为四战之地，不易立足，主张移师广东东江。以广东东江为根据地是周恩来提议中的要点，这一点也是他始终坚持的。他曾在潮汕一带工作过，对那里情况较为熟悉。他认为那里敌军军力较少，海陆丰一带农运又很得力，而且有汕头这个海口，可以与苏俄联络。他要求中央，从速确定南昌暴动的名义、政纲和一些重要策略，特别是获致友军和国民党左派合作的策略，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要求共产国际经由汕头迅速予以军火和物质的接济等等。所有这些似都是争取胜利的必要条件，在周恩来看来，尤以莫斯科的接济最为重要。

时机紧迫，不能多所讨论；我们两人因以中常委名义决定周恩来迅即赶往九江南昌，组织一个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叶挺等为委员，根据周恩来同志提出的上述计划，相机处理一切。周恩来约于二十日起程到南昌去了，中共中央由我看守。这也是中共中央没有事先取得莫斯科同意所采取的一个重要行动。

当时的局势，微妙而不易捉摸。大约在二次北伐胜利后，唐生智、张发奎等由河南回师武汉的时候，左派人物

中，特别属于广东籍的，就暗中酝酿返回广东去的想法。以第四军中一班将领而论，心情大都苦闷，有点类似当年太平天国内哄时的石达开。这班将领大多是广东籍，参加革命较早，深受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传统影响。他们在两次北伐中出力最多，战功最大，因而使第四军获得铁军的称号。他们目击革命阵营闹得四分五裂，冯玉祥、唐生智等军阀气味很重，蒋介石、李济琛等的作为又太离谱，一切的一切他们都有点看不顺眼。他们自己好像是革命中的孤臣孽子，飘流在外，无所依托，抑郁难申。返回广东的想法，除了思乡和消极情绪外，还有脱离污浊气氛，先将广东情况改善，再图发展之意。这也就是当时南伐之说的根源。

第四军是否会反共，说来似乎也是多余的。第四军将领中有一小部分人有共产党籍，如叶挺、周士第等，大多数是老四军出身，置身其间，与众多的国民党籍将领，同系老战友，一向并肩作战，从未显露出他们共产党人的特殊色彩。第四军一向都获得两湖工农运动的协助，工农运动的过火，又与广东籍的军人家属毫无关系。因而第四军并不热心分共，甚至有些人会觉得分共只是削弱革命势力，特别会损害第四军的战斗力，实无平地搅起风波的必要。

张发奎氏为第四军首领，他对时局的态度，极受一般人的重视。北伐前，他原任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第一次北伐后，即升任第四军军长，第二次北伐后，又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他那时年轻有为，没有军阀气味，当得起模范军人，既是革命正统，又英勇善战。因此

人们崇拜他为铁军英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对他都甚为敬爱。他爱护他的袍泽，不分共产党员或非共产党员。他曾明白表示，第四军将保护中共党员，在武汉分共的紧急关头，他表明拥护汪精卫，并因此与仍然主张容共的邓演达疏远下去。这似是时势所迫，不得不赞成和平分共，但反对或不愿纵容那种杀害共党的行为，因强调保护之说。可是汪精卫虽标榜和平反共，人们都觉得和平其名，纵容杀害则为其实。因而人们纷纷猜测张氏究竟会追随汪精卫到甚么地步。当时与张氏关系较密的俄顾问们，如加仑将军，即对这位难得的革命军人颇为信任，认为中共可以而且应该与之保持友谊，不应彼此闹翻。

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等所策划的南昌起事，是由叶挺的第二十四师，周士第的独立团从四军系统中分裂出来为骨干的，这就意味着与张发奎氏直接冲突。周恩来所持的先发制人之说，也是不计成败，不顾后果的孤注一掷，铤而走险的做法。加仑将军对之虽没有正面反对，但他总觉得与张发奎氏所统率的整个第四军一同返回广东，或进一步实行所谓“南伐”⑬，胜算将会多些。我和瞿秋白等对于加仑的意见也从未反对过，只对能否实现一点颇有疑问，并认为叶挺等部能和整个四军一同返粤是上策，在南昌起事是中策(如果能减轻与张发奎氏的冲突更好)，束手待毙，将是下策。这就是南昌暴动一触即发时，加仑将军还向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和张发奎的整个第四军一同返粤的由来。

七月二十一日，瞿秋白从庐山回到武汉，立即提出了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的问题。在汉口法租界他的那所新布置

的秘密寓所内，他告诉我鲍罗庭可以经过冯玉祥的西北区回莫斯科去，共产国际派了一位新代表来，名叫罗明那滋，一两天内就要到达。据罗鲍庭告诉他，罗明那滋是少共国际出身，不懂中国情形，素以左倾著称，要我们好好的和他打交道。

接着瞿秋白又表示他这几天在庐山与鲍罗庭冷静的研讨，认为中国革命是失败了，责任问题要有交代。中共一切，虽然事实上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这个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斯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为了使共产国际今后能够领导世界革命，中共中央只有挺身出来负担起这个责任，才是避重就轻的办法。

瞿秋白更具体的表示，如果这一失败责任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来担负，中央的领导就会破产，损失也太大了。陈独秀在这次失败中，原有重大过失；现在又采取了不正确的消极态度，那我们不如把全部的失败责任，推在他一人身上。而我们自己应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的立场上，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他还告诉我，鲍罗庭希望他和我能继续领导中共中央，由他主持理论的研究，要我主持实际工作。

瞿秋白这些话引起了我极大的反感。我觉得在这个紧急关头，不去实际努力挽救中共的危亡，却在责任问题上勾心斗角，未免太不成话。因而我向他愤怒表示，共产国际的政策是这次失败的主因，不真诚的去检讨，反而推卸

失败责任，是不足为训的。中共中央全体本应负联带的责任，如果我们推在陈独秀一人身上，是不公道的；且将被一般同志们视为违背道义，那里还有甚么威信来继续领导。

我们就这一问题作竟夕之谈，除了大事发泄积愤外，今后究竟怎样办是急待解决的大事。我确是显得激动，大有不再理会共产国际，中共自行其是的想法，秋白则较为冷静，往往乘机提出些难题，指出我们力不从心，不可能脱离或疏远共产国际。秋白强调他和鲍罗庭的协议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不能拘泥于道义。我则不以为然，主张实际政治需要与真理和道义同时兼顾。

我似难于自我抑制，积愫不吐不快，也顾不得说出的话会产生甚么后果。我们当时所谈及的事是很广泛的，不好听的话自然也不少，事隔多年，我所能大致记忆的，约有下列各要点：

共产国际的指导错误无论如何是洗刷不掉的。中共同志们常说："共产国际不懂中国情形，"这句话对极了；本来整国共产主义乃至社会主义圈子内，从马克思直至现在，对于遥远的亚洲，一向就感生疏。莫斯科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是急功近利，投机冒险的急就章。它从世界革命的观点出发，总想在中国拚揍起一个大革命，打击帝国主义，声援苏联，自然不易恰如其分的了解中国，甚至忽略了中国革命所需要的是甚么，所能做到的又是甚么。因此"盲人瞎马"、"闭门造车"、"削足适履"和"揠苗助长"等等毛病就都发生了。

共产国际这种错误指导，主要表现在中共加入国民党

这一政策上。我们不满共产国际的指导，向来不愿多所牵涉。共产国际不应当轻率的废弃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因为这决定是既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原则而又富于中国情调的。其次不应当利用孙中山先生笼罩和统率中共的意图，乘势强迫中共全面加入到国民党去，企图混水摸鱼。等到这个政策之实行发生了毛病后，仍然一而再，再而三的不顾一切，硬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因而弄到不可收拾。

国民党的领导人物汪蒋胡诸人，大致说来，干国民革命都颇起劲，而且是有深厚传统的。他们和苏联做朋友，甚至"以俄为师"都可以，但不会让莫斯科牵着鼻子走。在国民革命道路上，他们抱着提携后进心理，大概会容许中共党员为革命卖力，但不会容许中共在国民党内兴风作浪。这些道理，说穿了，是极其明显的。可是莫斯科的好汉们硬是不安分，抹杀一切，一厢情愿的企图使"国民党革命化"、"联左反右"，进到"拥汪倒胡"，"黄埔中心"，"革命专政"，事情弄糟了，还要"迎汪反蒋"。这一切不是自讨苦吃的画蛇添足之举，便是损人不利己的胡闹行为。

这些错误的性质从实行的角度看是左倾蛮干，大都源自莫斯科，它派赴中国的代理人，更是先后做了许多笨拙和胡闹的事。错误的结果是牺牲了中国革命，整个国民党都先后反了，国内外反动势力气焰万丈，中共是血肉模糊一片，而且处在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形势下，要图重振，还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何日！而且图穷而匕现，反动派的反击已打到苏联身上去了。这就是瞻前不顾后，一味左倾蛮干的报应。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如果还不光明磊落的自

我检讨，寻找出错误的根源作为鲜血换来的教训，真是没有天理!

我们不能说共产国际指导错了，似乎中共中央就没有错，更不可有推卸责任的想法。主要之点是幼稚的中共无论那一方面也不够成熟，它一直是从错误中学习而长大起来。由于幼稚，发生了错误是不能过分原谅的，因为这会妨碍学习；不能正确的学习失败教训，那是错误之尤。有人说过，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导，中共根本就干不起来，中国革命不会这样轰轰烈烈，而且错误也会更多些。这种说法也对，但不能因此就不去检讨共产国际的错误。应站在国际立场上，严正检讨共产国际和中共的错误，注视在中国所获得的教训，不再重蹈覆辙，而走向成熟之途。

中共中央的错误领导，同样是严重而又是多方面的，我们身历其境，知道得更清楚。它同样对中国革命认识不够，不能提出自己的主张，更不能影响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定，在奉命唯谨的执行指示时，也不能迅速发现错误；即使我们自己有了独立主张，也不敢自信，更不能据理力争，老是服从指导。在国民革命和工农运动中，我们犯过很多左倾幼稚病，中央老是多少予以原谅，马马虎虎，积累下来，酿成武汉时期工农运动的过火。在紧急关头，即是上海清共和武汉反共的时候，又表现软弱无能，形成凌乱溃退之局，以至不能支撑，这确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充分暴露。

我们尚可引以自豪的是中共一般党员对党和革命的忠

诚以及英勇奋斗的表现。这是我们重整旗鼓的资本，应当珍视和爱护。譬如陈独秀，表现出的错误最多，不能执掌中共的领导，而且应当受到指责；但他那种奋斗精神和对中共的劳绩，却是不可抹杀的。我们严格检讨中共领导错误的时候，决不可损伤中共的光荣。轻微的不辨是非，玩弄手段都会大大危害中共。中共是部队，共产国际是司令部，如果牺牲了部队，保留了司令部又有甚么用处，因此，牺牲中共是最大的损失，决不是甚么避重就轻。

环绕着上述论点，我作了一次尽情奔放的谈话，瞿秋白虽并不完全赞成我的主张，但也觉得理直气壮，颇有义愤难当之感。他那阴沉而惨白的脸上有时虽现出一些勉强的神色，但大致仍似同意我的说法，有时也说到他自己的某些错误。我们议论激越，不免有情绪作用，但由于局势危急，无形中对我们有所约束，走回到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上来。

我们首先决定将中共中央极度秘密的迁回上海，在适当时机，召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当时，中共中央在武昌的党员之紧急疏散工作，已经渐次就绪，第四军正向长江下游开拔，城防即将让给积极反共的唐生智部，因再无留驻武昌的必要。我们决定此时将中共中央搬回汉口，既可乱人耳目，又便于向上海搬迁。先作紧急布置，随即举行中央紧急会议，因为改组中央的事是刻不容缓了。

我们两人在主要政治问题上，也获得一些谅解。我曾声明革命失败的责任由中共中央挺身出来负担，决不要损伤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良好关系，在中共党员中维持共产国

际的领导威信。瞿秋白也曾保证共同要求共产国际在检讨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时，说明在国共合作的具体政策上发生了偏差，策略运用也不够灵活。这样，既减轻中共中央的责任，也可鼓励中国同志的英勇奋斗精神。关于中共中央改组问题，我们都认为陈独秀确是消极了，不能再任书记。其余中央委员应沉重的引咎自责，誓愿戴罪图功，才能继续担负领导的职责，才能汲取失败的教训。我们觉得这样的态度和决定，才能兼顾到道义和现实。这也是我们和即将到来的罗明那滋打交道的共同立场。

不料这次谈话竟掀起了极大波涛，影响我和秋白的政治生涯，以及中共此后的一些动向。后来罗明那滋从秋白口中知道了我的意见，因而我被他视作眼中钉——即是除陈独秀以外的中共第二号右倾机会主义者。瞿秋白是应当将我的意见翻译转知罗明那滋的，但他究竟如何说法则不得而知，至少他没有表明和我共同负责之意。更有甚者，我和瞿秋白的关系从此恶化了。瞿秋白在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上，一向与我意见相左，也许我那强调道义的说法妨碍他的现实作为，因而他主动的和我背道而驰。从此中共这两位仅次于陈独秀的人物大倒其霉，我成为共产国际最不放心的反对派，接连不断的受着打击，被逼不得不脱离出来。瞿秋白虽然一时得势，究竟有点出处不清白，何况又被逼盲动起来，不仅不能赢得信任，也从未解脱掉被人怀疑的眼光，即此一端，也可见独裁确是害尽苍生的。

七月二十三日，罗明那滋来到了汉口。当晚他和我及瞿秋白晤谈，这是我有生以来印象最坏的一次谈话。罗明

那滋首先表示他是共产国际的全权代表，奉命来纠正过去共产国际人员和中共中央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种种错误，并指导中共工作。接着他并不询问我们目前的实际情况，立即宣称：中共中央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现在共产国际决定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陈独秀不能再任书记，甚至要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你们两人如能摆脱机会主义，仍可参加领导工作。现在如不首先反对机会主义，别的事情是谈不上的。

我问他中共中央究竟犯了那些错误，他大致是这样回答的：中共中央主要是放弃了在中国革命中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例如它否定了共产国际六月一日武装工农的指示，又自动解除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这种错误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共中央为一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所盘据，缺乏阶级意识和革命的坚定性，对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很久以来都是机会主义的加以曲解。现在共产国际不能信赖那些动摇的知识分子，要大胆的提拔一些坚定的工人同志，担负中共的领导工作，并使他们在中共中央占多数。

罗明那滋这番话，激起了我胸中的怒火。我觉得他的指责是与事实不符的。至少这种错误的责任，不应当完全落在中共中央身上，共产国际和它的代表也应分任其咎。在我看来，也许是他太年轻了，他的气质似是十月革命后的纨袴子弟，态度有类于沙皇的钦差大臣。他太轻视中共的知识分子，我们这些人并非完全经不起革命的考验，更不能被看作是沙皇治下的农奴。

我抑制住我的愤怒，向他说：这样说来，机会主义的

错误应由整个中央政治局负责，我们这些委员都应引咎辞职，或者推出辕门斩首，另行物色一批新的人物，来组织一个新的中央。我们的谈话陷于僵局。瞿秋白在那里说些调解性的话，似乎是希望我们不各走极端。

于是我撇开这个问题，另提出一个须要紧急处理的事件，请立即讨论。我向他们报告，据刚才从九江来的人密报，周恩来同志等认为我和他所拟议的在南昌举行暴动的计划可以实现。参加暴动的，预计为叶挺部贺龙部和第三军中的朱德的教导团等。他们要求我们立即指示暴动的方针，如领导暴动机构的名义、政纲、组织和应采取的策略；并要求中央动员各地工农力量，响应南昌的行动。他们要知道苏俄是否会予南昌暴动以实际的支持，他们急需苏俄军事顾问们的协助，和一笔大数目的款项，以及到达东江后希望获得苏俄方面军火和物质的支援。

罗明那滋那个青年（据说那时是二十九岁）对这个实际问题却显得茫然了。他在那里记录我的报告，声言一切要请示莫斯科。经我再三说明这是不能等待而要立即决定的事。我们不妨预拟出一些办法，一面告知周恩来，一面请示共产国际。他才简略的说到可以叫周恩来等积极筹备，各地工农力量的发动则由你们根据实际情况处理；至于其他各点，则须请示莫斯科作最后的决定。

谈话结束后，瞿秋白也颇感失望。他曾向我表示，共产国际为甚么派这样一个少不更事的人来当代表，只会反机会主义，提起南昌暴动就没有主意了。我也向他表示：看来中共的厄运未已，在受到蒋介石汪精卫的摧残之后，

现在又要受罗明那滋的摧残。我的这句话，后来证明不幸而言中；罗明那滋的盲动作风，几乎把我们艰难缔造的中共，整个断送了。

罗明那滋与瞿秋白单独长谈之后，他似对中共情形有了一些了解。瞿秋白曾将我的意向告诉他，并劝告他不要与我闹翻。第二天我们会晤，他虽仍不满我的见解，但态度已较客气了。他重提要绝对拥护共产国际，立即召集会议，改组中央；其口吻已不似昨天那种"宣读上谕"的神情。我则主张先解决目前纷然杂乱的紧急问题，特别是南昌暴动的问题，至于反机会主义与中央改组的事，可稍迟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来解决。罗明那滋对我的主张，莫可如何，也不再作声了。

由于罗明那滋的发动，中共常委会于二十六日下午四时在汉口一所住宅里秘密举行会议，参加的有中常委我和瞿秋白二人，李维汉、张太雷两中委，罗明那滋和另一少共国际代表，俄顾问加仑及范克，另外还有两位翻译人员。

会议开始后，由加仑将军首先报告，他大致说今天他会见张发奎将军，与他研讨军事问题。张氏已同意将他所统率的第四军，第十一军和第二十军三个军集结在南昌和南浔线上，不再东进，逐渐转移，返回广东。加仑认为张如同意回师广东，并不强迫叶挺等退出ＣＰ，在此两条件下，我们可以和张氏一同回师广东。他根据军事情况说明，指出与张同返广东，在军事上极为有利，如在南昌与张氏分家，参加暴动的兵力不过五千至八千，在优势敌军阻击之下，恐难到达东江。除非张氏不同意上述两条件，那就

只有在南昌行动起来。

接着罗明那滋发言，首先说到目前没有经费可供南昌暴动使用，莫斯科已有电令禁止俄顾问们在任何情形之下参加南昌暴动。除了这两件不如意的事外，他更进而报告共产国际的回电，其内容是：倘若这暴动无成功希望，最好不要发动，张发奎部的共产党人可全部退出，并派他们到农民中工作。

罗明那滋那个蛮干的小伙子，也学会了一些官僚手法。他说：看来这两件事及国际电令不能用信件通知在前线的同志们，我们只有派一位得力同志去当面告知。他说话时望着我，并问是否可以派我去。罗明那滋说这些话时态度有些尴尬，大概他想到从来没有人以为南昌暴动会获得成功，大都认为是不得已的和不计成败的反抗行为。这是汉口南昌间的负责同志们都赞成的，他也明白表示过支持。现在莫斯科不准俄顾问参加又不给经费，这些都是前线同志们等得发急的事，还来电阻止，更令人为之丧气。这位素来反机会主义的英雄，现在又要阻止暴动的举行，究竟有点不够味。因而含混其词，不肯明白说出前线同志们须遵从国际电令立即停止发动的话。

我看清当时情况，立即回答：这任务既然是送封信，那就不必派我去。何况中央扩大会议快要举行，我离不开，最好也不要让我舍弃中央工作而去，王一飞同志可以负担这一使命，请他去好了。（王一飞当时在中央秘书处担任重要工作）。罗明那滋有点着急的说：派去的人今晚就要动身，如何能找到一飞同志。即使找到他，并使他了解使

命，立刻起程，仓促间是不易做到的。罗明那滋这种口气是要催促我去。于是瞿秋白与李维汉都向我说，还是你去好，这个责任不只是送封信，而是考察情况并参与决策。他们两人这种轻描淡写的语调，与罗明那滋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当时的心情异常尴尬，首先，我觉得现在要奉命去停止我赞成过的事，究竟有点不合适，再者我实不愿此时离开中央和不能参加中央扩大会议。我一直认为南昌暴动没有成功的希望并为此苦思焦虑，现在共产国际显然欲置身事外，不仅要俄人勿卷入漩涡，而且不肯暗中在经济上有任何支援，这就使南昌暴动陷入绝境。何况莫斯科还有此一阻止的电令，将来南昌暴动惨败了，中国同志还要负担违令蛮干的罪名。如此一想，我深为中共前途和在南昌九江一带苦干的多数同志们耽忧。我又想到加仑将军的提议大致是行得通的，也只有照加仑的提议做，才能多方面关顾到。老实说如果我当时辞绝任务，实在也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负担此一重任。因而我又觉得义不容辞。

为弄清我去的任务，我曾向罗明那滋以质问式的口吻说到，共产国际老说我们是机会主义，不能坚决革命，现在南昌暴动准备成熟了，又来电阻止，这是甚么意思，是不是对国民党左派还抱有希望，或者幻想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陈友仁等还能表演出一些新花样。

罗明那滋听了，显得有点丧气的说：这的确是一封阻止南昌暴动的电报，是一个严重的训令，是斯大林亲自决定的电报由布哈林具名拍来的。我们如何能不遵行，我个

人也认为事出意外，不过即使这个指示错了，我们还是要执行的。他又语峰一转，扳起脸孔说：我们在汉口是根据我们这一地方的情况来看问题，共产国际是根据全部国际情况来决定行动。它所考虑的，有国际关系，中苏关系，以至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因素。如果我们不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不仅会遭受失败，我们还有违反纪律的罪名。过去中共中央的错误，就是对这一点认识不够，今后不可再如此了。

罗明那滋明白表示了遵令阻止南昌暴动的意向以后，瞿秋白和所有到会者都表示对他支持。在讨论中又一致认为，加仑的提议是可行的，应尽量争取其实现，如果做不到，那就只有将第四军中的同志们和聚集在南昌九江一带的同志们分派到农村中和各地方去工作。会议当即决定一切由我会同前敌委员会相机处理，处理好后，我仍须尽快赶回中央。这样我才答应当晚赶赴前线。我并提出万一因时间或其他原因来不及阻止南昌暴动，又应如何。罗明那滋等除表示应坚决阻止外，不愿对这一问题作负责的表示。

后来南昌暴动并没有被阻止住，而终于爆发了。在共产圈子里，谁也不好再说南昌暴动不应当举行，更不愿提到曾经被阻止过的事。共产国际和其代理人以及中共中央的首脑瞿秋白等，都觉得曾经阻止过南昌暴动，究竟是不够体面的事，如果在共产国际各支部中宣扬出去，更要引起许多是非。因此他们再不愿提起这件事了。笨拙的瞿秋白等还曾颠倒是非，予以否认和强词夺理的予以曲解，硬将我这个奉命行事的人陷害一番，诬指我假传圣旨，私自

阻止南昌暴动的举行。这是中共内部从未有过的一次大黑幕，下文我还要说到的。

我于七月二十六日晚（即会后）匆促搭上了长江轮，离开了这个有过“赤都”之称的武汉，这也正是武汉政府快要落幕的时候了。“分”共已进到“驱”共的阶段。各级党政军机关里的中共党员都已陆续退出，中共的组织也已转到地下去了。这个“赤都”的街头，仍有一些中共秘密散发的传单和工农群众一些抗议性的零星行动，在那里点缀着革命的余波。

曾是武汉时期主角之一的鲍罗庭，迟我一日在武汉要人们有礼貌的欢送声中，从大智门车站搭上了京汉车，向西北驰去。他这次从庐山经武汉西行，并未与中共要人谋面，似也未再与闻武汉政府和中共的事。其心情恐怕是够凄凉的。他这个锋芒毕露的策略家，在中国革命中确曾煊赫一时，但他口袋里的“草”究竟有限，莫斯科的“紧箍咒”不容他自由施展，中国人又把他看作是一个身份不明的“洋鬼子”，这一切就使他有些形格势禁，终于不能不锻羽而去。

此外，国民党左派中几位佼佼者，如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也都悄悄的离开了这个褪了色的城市。其中尤以邓演达，为了安全起见，化装汽车司机，随着铁罗里，偷过冯玉祥的辖区，是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幕。他们事先并未预闻南昌暴动，他们的名字都被列入南昌暴动中的革命委员会，事先未征得他们的同意。不过他们在政治上很显然已是南京和武汉的反对派。

国共合作至此宣告结束，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大浪，就在分裂声中退潮了。当这艘江轮载着我离开汉口的时候，我站在船头，回首这个城市的灯火，不竟感慨万端，我在默念着："黄鹤一去不复返，此处空留黄鹤楼！"这诗句。

① 宁汉双方在这一点上早有通电表示，五月十四日李宗仁并曾由芜湖亲赴江西湖口，与朱培德会晤，商决互不侵犯，一致北伐。

② 直荀《马日事变回忆》有较详细记载。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三八一至三八四页。

③ 许克祥等五团长于五月二十七在长沙推选所谓真正国民党仇亦山等从新组织省市党部，通令改组。

④ 这个文件大部分原文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问题》，什之译，第一七二页，上海时代出版社，一九四九年。

⑤ 鲍罗庭被解职的时间，多数书刊记载是六月五日，但东方杂志第廿四卷十六号记载，南京方面到六月十七日才传出"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免鲍罗庭及各俄顾问职"的消息，我也记不清楚正确日期。

⑥ 冯玉祥《我的生活》中说，这个调停纷争的电报是吴稚晖自告奋勇替他拟的稿子，经他修改后发出。

⑦ 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曾引用这个声明的一部分。告党员书见胡华主编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一九一、二二三页，不过八七告党员书说这个声明是在六月三十日中央扩大会议所通过的，这又与我所记忆的日子——六月二十日——有出入。

⑧⑨ 宣言全文见雷啸岑著《卅年动乱中国》。

⑩ 陈先生辞职书的理由是："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工作。"

⑪ 陈独秀先生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发表的"告全党同志书"中也曾提到这次会议的情形。

⑫ 见前注。

⑬ "南伐"似从未有过具体计划。因为事属秘密策划，其大要是第四军回师广东，首先进到广东北江东江一带地区，再驱逐驻在广州的李济琛，形成另一左派中心，与南京武汉相对抗。

# 第十三篇

# 从机会主义到盲动主义

# 第一章

# 南昌暴动

从上文的叙述，读者已经明白国共合作终于完全破产了，中共也濒于支离破碎了；但问题的中心，是此后中共何去何从，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中共经由南昌暴动，竟转入到苏维埃运动时期。更不幸的是整个苏维埃运动的思想和实际都不适合于中国革命的需要，中共也从此堕入了左倾的歧途。

总结国共合作时期的历史教训，许我这样说，国民革命确是中国革命的迫切需要，也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国共合作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国民党整体是代表了中国人民的自强独立的普遍情绪和要求，中共确是这种革命势力中的左翼，它偏于体现工农利益。可是国共合作的实际政策是错了，中共废弃其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不安于少数派的地位，一心想投机取巧，混进国民党内去，企图混水摸鱼。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根本就是机会主义。

国共虽然分裂了，但国民革命的任务并没有完结。一九二七年夏季，武汉政府快告结束的时候，国民革命还只是在初步发展时期。当时，北伐尚未完成，军阀和反动势

力还以各种形式到处猖獗，中国统一的任务，还差得很远，不平等条约并未废除，列强在中国不仅保有上海等地的租界，破坏中国领土主权，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而且它们还可以运用其驻在中国境内的军队和炮舰，干涉中国内政，反对中国革命；愈到中国北部，日本的侵略势力，更是不肯轻易退让。蒋介石汪精卫等虽然是相继清共分共，但还在与奉系军阀作战，并未有与日本等列强势力勾结起来。中共最主要的错误，就是没有看清楚这一点，即是国共闹翻了，大批共产党人受到了杀害，但国民革命还未成功。如果中共当时仍能向国人号召国民革命，一致继续努力，反对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和军阀，也反对那些清共分共的反动行为。循此前进，大可以开辟中国历史的新途径。

可是共产国际的死公式，危害了中共，也损伤了中国革命。这种死公式就是：国共合作完蛋了，继之而来的便应当走苏维埃之路；民族解放运动解体了，继之而来的应当是进行土地革命；蒋介石反动了，似乎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完结了，继之而来的只有由无产阶级领导。由这些思想出发，于是自欺欺人的飘飘然起来，运用所谓辩证法，强调土地革命与苏维埃，强调反对蒋介石政权，认为这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最主要工作。谁知这个革命目标的转移（由对外转到对内），竟帮助了日本的侵略势力，也几乎完全断送了中共。直到不可收拾之时才放弃苏维埃，要求蒋介石容许它“一致抗日”。所谓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也就是苏维埃运动破产的明证，这些事我在下文要详细说到。

现在让我从南昌暴动说起。“八一”南昌暴动，是中共

对国民党分共的武力反抗；名义上虽仍以传统的国共合作相号召，实际则纯由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这一暴动，由中共政策转变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是一个过渡阶段，因为暴动失败之后，中共也就走上了苏维埃运动的新时期。中共暴动政策，也是由这一次开始，而且一开始就充满了冒险色彩。由此发展下去的秋收暴动，广州暴动等等，更走到了可怕的盲动路线上去。这在中共的记载中，是由右倾机会主义这个极端，走到了左倾盲动主义的另一极端。但我要修正一下这句话，中共加入国民党这一实际政策，根本是右倾机会主义，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不承认这一点，只枝枝节节的批评过这一政策实行方面的一些错误罢了；苏维埃整个政策，根本就是盲动主义，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也不承认这一点，同样只是枝枝节节的批评过某一些明显的盲动错误。

上面这些批判之词，并非自诩我有先见之明，而是在痛苦的经历中体验出来的，而且相信这是公平而合理的。当我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晚踏上长江下行船，由汉口往九江时，我的心情很不愉快。我痛恨大批共产党人的被杀害，觉得非奋起反抗不可，但又认为南昌暴动并无成功的希望，不免有进退两难之感。我本来不满共产国际的领导，但又无法脱离共产国际。我深刻体会中共混在国民党内的政策是大错特错，但现在改弦更张，对未来的局势发展如何，实在有点茫然。共产国际，对南昌暴动采取置身事外和阻止的态度，罗明那滋的左倾蛮干，瞿秋白的取巧作风，无一不增加我心情的不安。总括的说，愤慨、反抗

和苦闷、思想模糊不清，以及对暴动失败后可能引致的严重后果的顾虑，各种复杂心情交织在一块。在无可奈何之中，只有加仑将军的那种苦心孤诣的建议，给我一些解脱。我总在设想，中共的军事势力与张发奎所率领的第四方面军，全部共同回师广东，是比较可行的，应当争取其实现。

二十七日早晨我到达九江，当时九江码头很为拥挤，大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物都由武汉来到这里，大部分候车转赴南昌，也有些正设法潜往长江下流上海等地。他们大都在那儿对时局发展交换意见，中共的要人们也乘机拉拢国民党左派人物，企图为南昌暴动增加声势。这里也是一个军事转运站，第四军正由武汉经九江转赴南昌。我很快在九江找着了贺昌（少共中央委员）、高语罕（武汉军校的政治教官）、恽代英（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廖乾五（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和关向应（少共中央委员）等同志举行会议。简略告诉他们二十六日中央常委会议的经过和决定，他们都表示南昌暴动势在必行，已无讨论的余地，尤其是恽代英表现得最为激昂。

当我追问恽代英为甚么不能重新讨论时，他表示没有必要等候我的来到再行讨论，因为事情已经决定了；并进而怒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他曾说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害死了中国革命，葬送了成千上万的同志；它们的领导完全破产了。现在南昌暴动一切准备好了，忽然又来了甚么国际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我是誓死反对的。他强调不理会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按照已经决定了的计划往前直干。他也曾威胁过我说，如果我再动摇人心，就要打

倒我。

恽代英这种愤怒的发言，曾使我为之变色。他平时是一个正直而有礼貌的人，对我一直很友善，对人没有私怨，没有与人竞争的野心，在共产党人中素有“甘地”之称。我听了他这些话，当时百感交集。他坚持暴动，显然积压已久的愤慨到此时才坦白发泄出来。我也佩服他这种坚毅精神，自愧没有能够用他的蛮劲去对付罗明那滋。我也感觉到，中共中央和我自己的领导威信，已经丧失了。我当时在难过的心情中，不愿作任何解释，只说这件事等到达南昌后再行讨论。

我为了等候火车，在九江停留了两天，直到二十九日才和恽代英结伴前往南昌。当时落后的南浔铁路显得破烂不堪，而且军运繁忙。少得可怜的车辆都被军队占用去了，没有客货车经常开行；又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可资利用，只有耐着性子，等候火车。在这两天内，我和恽代英紧张的工作，例如遣散一些同志秘密前往上海等地，策划反对汪精卫分共的宣传和行动，布置当地的地下工作等等。这一切，都是按照南昌暴动将如期举行为前提而处理的。

三十日早晨，我到达南昌后，立即与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叶挺、周逸群等举行会议。会议一开始，我详细的报告了二十六日中央的会议情形，并要求了解南昌的情况。我说话的要点，大致是共产国际和它在汉口的代理人对南昌暴动的看法，都着重能否成功这一点上；我们不能期待有苏俄军事顾问的帮助和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共产国际的电令显然是要阻止这一暴动，加仑

将军主张与张发奎将军一同回师广州的建议是值得重视的；我奉命来考查这里的实况，并和大家重新讨论这一问题。

当时情势紧迫，一部分到会者要赶着去与贺龙等举行另一特别委员会会议，另一部分人又有要事急待处理，大家都心情紧张急躁，根本不愿谈到“成功希望”和“改变计划”等等说法，谁说一句松劲的话，怒火就会向他喷来。

我的话刚说完，李立三即站起来急剧而简短的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哈哈！为甚么我们现在还需要重新讨论？叶挺是唯一表示不同看法的，他大致认为南昌暴动不易获得成功，如果能和张发奎一同回师广东较为合算；中共同志们隐藏在第四军中，也不会遭到暗算；他与贺龙相处总是有些格格不相入。因而他继李立三发言后，就平静的说：将分裂行动推迟一些时间，也许是好的。握有兵权的叶挺抢先说出这样的话，这使谭平山大为焦急，因而他用威胁的口吻说：如果我们在军队中的同志，此时不能行动起来，那末，以前的所有军事工作都很难认为是我们党的军事工作。周恩来目击此种情况，也就急剧的说：我们最好行动起来。

在这种不平常的讨论气氛中，我重新提到我还不知道这里的情况，也再次说起共产国际那种有无成功希望的说法和加仑将军企图推迟这一行动的设想。这使周恩来听了大为着急，他似不愿意陷于冗长的讨论，因而愤怒的说：这个意思与中央派我来时的想法不相吻合，如果我们此时不行动，我只有辞职，也不再出席今天的特别委员会会议。

周恩来愤而辞职的表示，使这个极度紧张的会议达到了沸腾点。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除叶挺和我外，都不愿对已有的决定作任何的改变，这是极为明显的。他们都好像骑上了虎背，抱有义无反顾的气概。我当时只是要求重新讨论，并没有坚决阻止和一定要改变计划的决意，自不愿闹到不易收拾的境地，除批评了几句周恩来那种要挟式的辞职表示外，也就到此止步。会议旋即转而讨论一些紧急事项，我则改与个别同志谈话，了解情况。

最先与我长谈的是李立三，他最坚强的论点是一切都准备好了，时间上已来不及作任何改变。李立三认为不能停止暴动，要点有二：第一不能违反与贺龙所订定的密约；第二如果改变计划，我们原来发动暴动的意图已无法保持秘密。李立三和其他的中共要角一样，都根本不愿涉及是否成功的问题，好像这是阻拦他们行动的魔鬼似的。因而他的语峰总是环绕着“来不及阻止了，来不及有任何改变了”，其他同志与李立三也大致抱同一态度。

中共与贺龙的关系，最先是李立三对我详细说明了一番。他曾指出，贺龙这个土匪出身的军人，以往与中共的关系不算很密切，现在决心追随中共一块儿干，我们不能令他失望；我们与贺龙已经信誓旦旦，在形势上说彼此都已骑上虎背，在决心上说彼此都已表示破釜沉舟；任何改变都易引起严重的误解。李立三更进而警告说，贺龙不得志，疑忌甚多；他不满张发奎，也自觉他这个土匪出身的人，在国民革命军中无出头之日，迟早要被缴械的，现在如果我们改变计划，联络张发奎，那他可能认为是被出卖

了；也可能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向张发奎告密，洗脱自己，反过头咬我们一口。在这一点上当天周恩来也曾有重要的补充，他指出，贺龙决心参加暴动，并且秘密征得他部下各师长的一致同意，他们都认为这样做才有出头之日；整个暴动计划和发动时间，他们都已经知道了；因此不好再改变了。最先运动贺龙参加暴动的谭平山，也曾向我说明，贺龙内心有恐惧也有野心，企图取张发奎的地位而代之，我们正要利用他的这种野心，捧他做总指挥，而且任何联络张发奎的做法都易引起他的疑忌。

李立三也曾对我详细的说明，深恐暴动计划的秘密泄露，知道这机密的人已经很多；在人员的调动上，宣传的语气上，和若干人表示出的态度上在在都易使人觉察。他曾警告说，即使张发奎真诚愿意与我们合作，一同回师广东，决心在那里重建国民革命根据地，依现在的情势看也是没有指望了；因为张发奎到达南昌后知道了我们曾策划暴动反对他，那有不反脸对付我们的道理。后来周恩来参加讨论，我们具体检查这一秘密可能泄漏的情形，获知暴动机密的人，已经超过一百人，除中共的重要干部外，还有张曙时等十多位国民党左派人物和贺龙部的重要将领。在通信联络方面也相当广泛，除南昌、九江、汉口之间每天都有函电和人员的来往外，而且还与驻在抚州的第三军教导团团长朱德和在湖南平江的工农武装领导人余洒度等通讯，约他们按时举事。因此检查结果，我们一致认为这个秘密已无法保持或掩盖，甚至有些行动都来不及停止了。

根据上面所说过的实际情况，我曾宣告暴动计划不能改变，表示支持前敌委员会的原有决定，至于不能根据国际指示办事和如何向中共中央复命，完全由我负责。叶挺也曾表示过根据实况只有不顾一切的干下去。我素来是责任感很浓厚的，我觉得我要严格的执行中共中央给予我的使命，更重要的是我应当替南昌暴动找寻一些成功的希望；因而我倒不很重视我在九江和南昌所遇到的同志的反抗。我虽然一直表明并不根本反对暴动，现在又明白表示支持，但我的同志们仍然不完全谅解我。

三十一日上午，中共前敌委员会的紧急会议，再也没有讨论改变计划的事，决定照原计划执行。到会者知道了张发奎偕同汪精卫孙科等已经到达庐山举行会议，而且颇有针对着南昌的迹象，大家都在研讨对策。南昌暴动原决定在三十一日清晨举行，由于我的要求而改期，现在又重新确定，在八月一号清晨举行。而且根据这个决定，到会者部分担着紧急工作，分头活动去了。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暴动终于成为中共斗争史上一次重大事件。

要了解南昌暴动的发展，首先需要探讨一下中共的领导能力如何，而中共领导的无能与混乱，似乎是预定了南昌暴动失败的命运。在这一点上，我要先说说谭平山；他在没有得到中共中央同意之下，即在南昌九江一带展开活动。他曾标榜要在南昌开创一个新的局面，这句话的意思，具体的说，大致是由他策划出一个南昌暴动，并由他自己名符其实的领导起来，不再理会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直到有了相当成就之后再说。

谭平山的野心与他的才能相较，似乎是不甚配合的。他从国共合作，国民党改组的时候起，一直担任重要的职位，在中共内他始终是个要角，在国民党内他又是中委兼组织部长。就由于这种地位使他有点飘飘然，常夸耀他是老同盟会，与国民党左派有广泛的联络，在中共又是最先参加者之一，而且是中共中央少数重要领导人之一，并为斯大林所赏识，这样他似乎是左派革命势力最好的代表人物。可是国民党左派或共产党人，似乎对他都不敢寄予甚大的期望，这一点，也许他自己并未完全觉察到。

在武汉末期，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于谭平山向国民政府提出辞去农政部长的辞呈，认为太过软弱，表示不满，也有过指责。这件事，也许就促发了他单独行动的决心。南昌暴动的前夕，他的言词和态度都不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放在眼内，他把我视为中共中央的正统，一股怨气曾向我发泄过。他所提出的暴动宣言有许多不妥之处，须我代他修改，他曾横加阻止，并很不客气的指责我企图包办。可是他这种露骨的表示，不仅没有得到一般同志的支持，反而引起过不少的反感。

南昌暴动发动后，谭平山被推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长，而且贺龙是他提携起来的，中共的前敌委员会似乎也可由他领导，通过前敌委员会更可指挥叶挺等重要军人，一切似都如愿以偿，是以他曾摆过领袖的架子。可是他所得到的，是人们对他的不够热忱，更没有人高兴去捧他。当他想到处境甚危，不易获致成功，不应露骨反对中共中央的时候，也曾主动企图和我及其他同志改善关系，

对外也曾摆出“礼贤下士”的姿态，但这都收效甚微。根本原因，是一般重要干部都不相信他能够成为对内对外的重心。

当时叶贺这一支暴动军队，不待说，是极需一面政治旗帜的，对内需要团结和鼓励军心，对外需要有响亮的发言和号召。这点我也曾向我的战友们提起过，但他想不出解决的办法。南昌暴动没有得力的发言人，这就使中共的领导为之黯然失色。

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是可以负起政治领导责任的，但他并没有这样做。他不多谈政治问题，甚至很少召集前敌委员会会议，即使举行会议，也没有讨论过重要的政策。兼任革命委员会属下参谋团主任的周恩来，一心注意军事问题，大概他是以获致军事胜利，使这支暴动军能在广东东江地区立下脚根为第一要义。也许他以为一切要等到军事胜利后再说，如果过早奢谈政治领导，不是空论，便是自讨麻烦。多数的中共重要人物如李立三等，与周恩来都有相似的心境，而且大致都强调暴动是天经地义，谁要是怀疑或提出异议，谁就是动摇和不够坚决。这种不计成败的唯心观点，也就是盲动主义的根源。

我当时的处境相当尴尬，也有些无能为力之感。我是应当返回汉口中央去复命的，只因交通阻隔，无法成行，惟有随军前进。我不仅遭受过谭平山的反对，而且李立三、周恩来、恽代英等同志无形中认为我对暴动不够坚决，对张发奎存有幻想。我自觉我的领导信用是受到打击了，除了照常参加前敌委员会会议，做些我所能做的事外，也无

法挽救中共领导的凌乱局面。

暴动前夕，参加暴动的军队，都急速向南昌集中，中共的人员，也由九江一带向南昌涌进。中共将有暴动，似为张发奎所觉察。三十一日，张发奎从九江乘南浔车赶往南昌，但他到达马回岭站附近，即被阻隔。据在当地指挥暴动的负责人聂荣臻向我描述当时的情形说，张发奎赶到马回岭时因为交通已断，即下车向正在移动的部队警言："你们向何处开动？奉了何人命令？"并宣称："我是张总指挥，我命令你们停止前进！"这时聂荣臻深恐军心动摇，便指挥同志，架起机关枪，向张来的方向作示威式的扫射。张见情形不对，便被逼不再指挥他的部队了。因而聂等也就指挥军队破坏铁路，将马回岭以次的沿线部队，都依计划移向牛行车站及南昌附近，并布置警戒。

南昌暴动，决于八月一日上午三时发动。第一步的目的是先行解除城内不参加这次暴动的军队的武装。三十一日叶挺贺龙等部队，都已按计划集中到南昌城内及四郊各军事要地。这一军事行动的指挥，是由叶挺负责的。那时，我也在叶挺的师部。还不到三时，枪声便响了。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留驻在南昌城内的朱培德部队约三千人，一下子就全部被缴械了。当行动开始时，叶挺曾接到好几次电话，都是他的部属向他报告：被包围的部队表示愿意投降一同参加行动。叶挺却一一以坚决的语气回答：先缴械再说，天亮前，南昌城内的各机关，都已被全部占领。

八月一日清晨，占领南昌的军事行动结束以后，建立政府和今后应采取的军事策略是急待解决的问题。

关于建立政权这一问题，我和谭平山等所考虑的是成立正式的国民政府或成立临时性质的政权机构，我们没有提到要建立苏维埃政权。当时一般的看法，以为一个正式政权的建立，须有稳定的地盘；而又必需有继续的军事胜利，才能获致。同时，共产国际一向的政策，又是主张建立一个有力的国民政府，并反对托洛斯基建立苏维埃的主张。所以讨论的结果，便决定了组织一个临时政府，名之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是：一、号召国人拥护孙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二、在适当时机，召集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成立国民政府，讨伐南京武汉一带的叛逆。当时，我们在南昌所发表的宣言文告，大体就是根据这两点作成的。

革命委员会由二十五人所组成，包括谭平山、宋庆龄、吴玉章、邓演达、何香凝、恽代英、张曙时、郭沫若、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张发奎、贺龙、彭湃、林祖涵、朱德等。这个名单由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后，即由谭平山在一次包括国民党左派人物的会议上，提出予以通过。委员们立即宣誓就职，旋又推举谭平山为委员长，吴玉章为秘书长。这名单中的国民党左派人物，除张曙时以外，其余如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并未到场。他们的名字被列进去，这是利用国民党招牌所必需的。至于张发奎那时已与南昌暴动处于对立的地位，中共仍将他的名字列入，一面表示拉拢，一面想借此维系第四军军心。参加南昌暴动的国民党左派人物，只有张曙时、姜济寰、萧炳章，和

一些国民党中下级干部。因此，这个革命委员会，用的是国民党的招牌，事实上是完全由中共所操纵。

军事行动策略更是紧逼的问题，当时张发奎所率领的第二方面军一部分，正由九江向南昌逼近，声言讨伐叛逆。朱培德也正在吉安樟树等地调集他的部队，作反攻南昌的部署，武汉南京两方，都可迅速集结其他部队入赣增援，对付我军。根据这种种情况，我们认为南昌处在四面受敌之中，显然不易立足。当时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南下占领广东东江一带地区①，以潮汕为据点，再行统一广东，出师北伐；一是主张西向进攻湖南②配合湖南的农军，占领一部分地区，以为根据，再图大举。贺龙对于第二种主张很感兴趣，因为湘西一带，原是他的老巢。但讨论的结果，大多数赞成南下的主张。理由是东江一带防务空虚，易于占领，且不至四面受敌，东江的农民运动，早有基础，力量易于扩张，又因占领汕头海口，可望获得苏联的接济。当时大多数人不愿往湖南，对于苏维埃，打游击，土地革命等等，还是疑虑多端。毛泽东自愿到湖南去，也是铤而走险，当初也曾企图带着农民武装赶来南昌，参加暴动，只因时间上来不及而作罢。

如何扩充军事实力，也是煞费脑筋的问题。贺龙的第二十军战斗力不算充足。他的第一师师长贺敬斋，第二师师长秦光远，每师虽有三个团，但人数并不足额，枪支更陈旧不堪。周逸群所率的第三师，那时还只有一个团人。所以第二十军急须加以充实。叶挺的第二十四师和周士第所带的七十三团（原系独立团）是这次暴动中的主力。中

共当时决定再成立一团，与独立团合并，编为第二十五师，再加上蔡廷锴的第十师，合并成为十一军，由叶挺、蔡廷锴任正副军长。当时驻在南昌附近的第十师师长蔡廷锴（他接替陈铭枢的职位），对于南昌暴动，原采取中立态度，经中共极力拉拢，他才表示附和。朱德原任杨森军的党代表，在杨森背叛武汉时，离开杨部来到江西，他的老朋友朱培德便任他为教导团团长。后来朱培德遣送共产党员出境，朱德仍以与朱培德等同系云南部队出身的老关系留任原职，并未被认为共产党员而遭遣送。这时中共特别抬出朱德来，给他以一个第九军军长的名义，希望他能影响并转变朱培德的部队，形成一个新的军事力量。

根据这种种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部署，革命委员会的具体组织也就形成了。任委员长的谭平山，算是对内对外的领袖，吴玉章以秘书长的资格，组织了一个秘书处，为革命委员会的办事机关。革命委员会下成立一参谋团，等于国民政府下的军事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刘伯诚任参谋长，贺龙任前敌总指挥，叶挺任副总指挥，郭沫若任总政治部主任。此外，设有农工委员会，由我任主任，李立三、郭亮、彭湃、陈荫林等任委员，负责领导工农运动和建立各地方政权等任务。另党务委员会，主任张曙时，负责领导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宣传委员会，主任恽代英；财政委员会，主任林祖涵，后来又增设一个政治保卫局，由李立三任局长。这些组织的性质，是党政军一元化的。既杂有一点国民政府的成规，也渗有中共的特殊作风。

革命委员会的政纲，大体还保存着北伐初期的色彩。

其中最特殊之点，是规定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地主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耕种。这种规定，虽然还是在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之下提出的，然而，已是中共公开宣布没收土地的第一声。再则，规定经过选举的方式，成立乡村政权，在这种选举中，工农团体自然是其中的骨干。此外，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等项，都和过去国民党的政纲没有多大出入。

革命委员会略具规模，还没有来得及大事宣传，就不得不根据军事情况的需要，离开南昌。军队之向南移动，对内对外，都引起一种不安的情绪，许多人感觉到，中共的军队是在向南逃难。武汉的中共中央又已通告各地区组织与工农团体，停止响应南昌暴动，前敌委员会对两湖各地工农的配合行动，已失去了指望。即对在平江暴动的余洒度部，也认为时间上来不及命令他们赶到南昌与大队会合，只有通知他们就地行动，后来这一部分军力就成为毛泽东所组织的湖南工农红军的基干部队。

八月五日，这一支暴动军，护卫着革命委员会的庞大组织，经由赣东的抚州、瑞金等地，向广东的潮汕进发。这支军队，除了打着革命委员会的招牌以外，可以说与其他的国民革命军没有显著的分别。一般士气反不如北伐初期那末旺盛。溽暑行军，行李又非常笨重，需要大批民伕，而民伕又征不到，于是沿途拉伕和兵伕逃跑的事，不断发生。中共的干部们，是在那里第一次学习军事行动。

第一天的行军情况，特别显得七零八落，当天走了九十华里，到李家渡宿营时，许多干部，脚板上都瘪起了水

泡。要人们要坐轿子，轿伕又不易找到，走路似乎比任何事都辛苦。一般干部，在出发前，总想多带点日用的东西，可是上路后，这些所携带的东西都成了极重的负担，似乎几两重的心爱的物件，这时都成了千斤坠。因此，在多数干部要求之下，决定把这些包袱扔掉。在李家渡河边的沙滩上，各种漂亮的衣物，堆积得象一座五颜六色的小山一样，引火焚毁，以示决心。这可算是中共"无产阶级化"的一次表现。可是，有些人对着那一堆余烬残灰，也不免叹息着说：我们为甚么这么傻呢？为甚么不将这些衣物分赠给当地的老百姓呢？然而，当时的中共，只是想到那里便做到那里，我们老是在"上当中学乖"。这件小事，也许就是我们的一个实地写照。

从李家渡到抚州的途中，周恩来等候在路旁，与我会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懊丧的说：据一位逃出来的同志报告，行进到进贤的第十师蔡廷锴，业已叛变，拖着队伍向东跑了。蔡廷锴在进贤借集合干部训话为名，将三十团团长范孟声及其他中共同志三十余人，一律扣留杀害，其余同志数十人，也下落不明③。现在只逃回来一个同志。似此，我们在第十师中的基础，已完全被毁了。……

周恩来接着以引咎的语调向我说：这件事是我的大意，我应完全负责。……他的这种表示是有原因的。当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向南昌集中的时候，叶挺师担任前锋，蔡廷锴师跟进。南昌暴动之夜，蔡师全部驻在南昌附近，蔡本人正由九江赶来南昌，蔡于八月一日才赶到南昌，是由我与周恩来叶挺三人和他在叶挺师部接谈的。蔡初到叶挺师

部时，大概因没有参预这次暴动的密谋，神色显得有点慌张，我因与蔡不熟，一直没有多发言。只由恩来对他说了一篇南昌暴动的大道理，叶挺也以老战友的资格，从旁向他说：高佬！就这么干吧！蔡低头踌躇一下之后，即表示一切愿听指挥。这一幕过后，革命委员会和参谋团的多数委员，都对蔡有些不放心，主张应派得力的人员去控制第十师。独周恩来认为不应对蔡表示不信任。因此委蔡为参谋团的委员，第十一军副军长，兼左翼总指挥，并且命令他单独循进贤一路南下，即对范孟声等同志，周只嘱咐他们听从蔡廷锴的指挥，并没有要他们提高警觉。如今，蔡竟叛变了，而且范孟声等同志又因而被害，周对于自己事先的疏于防范，当然有内疚之感。

我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和意见之后，心中难过，踌躇了一阵才对他说：现在事已至此，是无法挽救的了。看来，蔡廷锴拖着队伍往东走，还没有与我们敌对的意思，他既怀异心，即使和我们一同到了东江，在紧要关头再来一个拆台，岂不更糟。我们对于这一件事情的处理，显然是太大意了。应当视为一个严重的教训。这件事如果公布出来，将会动摇军心，还不如不公布的好。在此紧急时期，你也不要灰心，不要提出引咎辞职这一类的话，还是咬紧牙根的干下去吧！周恩来听了我的话，似乎有多种感触而不得不表示继续勉为其难。不过，我们也就失去了最有战斗力的一师了。

我军失去蔡廷锴师之后，连革命委员会的机构在内，人数不过二万五千人左右，枪支不过一万三千支。我们行

军所经过的赣东地区，中共的地方工作还很薄弱，军队又缺少现金来购办粮食和必需品。原有的地方政府，都已预先奉到朱培德的命令逃避一空，沿途的人民，多数藏躲起来，避免兵灾。因此，地方民众工作和建立地方政权工作，都无法进行。而且，不得不沿途向大户征发粮食，这样，军纪自然也就随着堕落下去，军队中落伍的，患疟疾的，逐日的增加，这种种困难，都非一时所能克服。

朱德所统率的所谓第九军，是一支特别的队伍。朱德在暴动后曾担任南昌公安局长，从南昌出发的时候，他的第九军共有一千多人，其中包括第三军教导团的一部（大都已逃亡），南昌市的一部分警察，和他从南昌各机关临时所收集的武装与非武装的人员，此外还有一些运输伕。因为朱德对江西情形较熟悉，同行的各机构各部队，都向他要运输伕，因此第九军老是被派去担任打前站与征发粮食民伕等杂务工作。他的部队，逃亡的最多，到达抚州的时候，所剩余的员兵，已不过三四百人，到达瑞金时，只剩下一百多人了。不几天，这一百多人就被改编到其他部队中去，所谓第九军这一番号，从此便不存在了。我是经常与朱德保持接触的，他那时对于他的所谓第九军，老是愁眉不展，认为毫无办法。

八月二十日左右，我军在会昌与敌军钱大钧师发生激战，结果，钱部败退筠门岭。当我们行进到瑞金的壬田市时，即与钱部先行部队遭遇接触，我军迅即攻击前进占领瑞金城，积极备战。据当时所知的敌情，除钱大钧师集结在瑞金以南九十华里之会昌外，敌军黄绍雄部，还在寻邬

一带地区，距会昌尚远。他们都负有阻击我军南移的任务。因决定以各个击破的策略，先行打击钱大钧部。

这一战役，是有“刘伯温”之称的参谋长刘伯诚第一次表现他的军事天才。他的作战计划是由贺龙的二十军任正面，叶挺的第十一军，由右翼施行侧面包抄。但他却曾发生一个时间上不准确的失算。瑞金距会昌沿正面的大路行进，只九十华里，沿右翼的小路抄近，预计为一百一十里。因为小路的里程计算不精确，实际超过一百五十里，因此，当贺龙部的周逸群师正面与敌军恶战而败退下来，任总预备队的贺部第一第二两师，不得不增援卷入战斗的时候，右翼的包抄部队，竟还没有赶到战斗阵地。敌军因为在抑制了贺龙部之后，抽调正面部队以加强左翼力量，经过叶挺部竟日的恶战，才在会昌城附近将钱部击溃并占领会昌城，钱部乃狼狈败退会昌南面九十华里的筠门岭。我方也因伤亡惨重，不得不停止追击。

参加这次战役的陈赓，曾向我描述这一战役的经过。陈赓那时任参谋团的参谋，他曾向我指出，叶挺的第十一军和钱大钧部的战斗，是他所遇到的第一个恶战，比他两次参加东江战役的战况还要激烈。尤其是在会昌城下进行肉搏战的时候，双方作战的中下级干部，多是黄埔同学，他们不仅彼此认识，而且有许多是儿童时的好朋友；他们在黄埔时，或者是同队同班，在军队时或者是同营同连。但在肉搏战中，竟彼此叫着小名或浑名对骂。那边骂这边：“中共为甚么要造反？”这边骂那边：“你们为甚么要做反革命的走狗？”双方都有些人，一面像疯狗一样的混杀，一面

又忍不住在那里暗掉眼泪。他在前线目击这种情形，也为之心酸。只有硬着心肠喊杀，督促同志们往前冲锋。

陈赓讲述了这些经过之后，曾有这样的感慨：看来，政治斗争是很残酷的，竟使许多老战友对杀起来。钱部那些黄埔同学，在战场上作战的那种坚决精神，是中了反革命的毒太深了，加上国共之间无法破除的成见，我们如果要获得胜利，专凭硬打还是不够的。他的这种描述和感慨，可以说是国共第一次战争的真实写照。

贺龙在会昌战役后，便正式加入中共为党员了。他本人与中共合作，没有发生过甚么破绽。但他的生活习惯，完全不像一个共产党员。他的军部组织是相当庞大的。他有四人抬的轿子，经常养着十几个人的轿伕班，还有中西厨房，每天到了宿营地时，都要像宴会似的大吃大喝一顿，他自己与革命委员会的要人们和叶挺等，没有深厚的交谊，他的第一师长贺敬斋是他的兄弟，第二师长秦光远是他的亲戚，这些人，都是他干土匪时的老部属。贺龙的部队，纪律不好，有点土匪的作风，与叶挺的第十一军相处得不算融洽。第十一军的官兵们，暗中常要骂他们一两句“土匪”。

因此，中共的要人们，一面对贺龙的合作表示敬佩，一面又深恐因合作的不够圆满而发生甚么事故。甚至有人这么说：要注意啊！如果情势不好，贺龙是可以拖着他的部队干他原有生涯的呵！因而为了与贺龙发生更密切的联系，中共的要人们，常到他的总部去，吃他一顿那时不易享受到的好东西，并且与他闲谈一阵，用意是设法影响他。

我也是常到他总部中去的一个，常常在他那里吃饭谈天。

有一次，贺龙和他的座上客人们，谈到他做土匪的故事时，曾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他得意洋洋的说到，做土匪么！是要工于心计的，主要是机警。他做土匪的时候，手枪从不离身，睡觉也要摆在枕头边，因此养成习惯，即使在睡梦中，偶一听到响动，也不自觉的便会拔出枪来。他带着部队行军的时候，老是防人暗算，经常采取神出鬼没的行动，使人不知究竟。他与其他部队合作的时候，也无非是利害关系的结合，谨防上别人的当。他在川黔湘鄂边一带多年，那一个有实力，他就与那一个合作。一声不对，拔脚一跑了事，或者踩人家的尾子，抄人家的后路。这种事，他都做过不知多少次。这一席话，曾使在座者听来为之毛骨悚然。

贺龙那时也钦佩中共，认为中共的作法，比他过去做土匪的作风要高明些。他认为做土匪的时候，只有一些铲富济贫，和为穷人打抱不平的简单想法。中共有主义、有政纲，又会组织工农民众，显然有一套完整的办法。贺龙的种种观念是当时颇为流行的一种土匪军阀哲学，也是中国历史上农民暴动中颇为流行的流寇主义。当过大兵的毛泽东也当深得其中三昧。而且他的游击主义就是以流寇主义为起点的。

会昌战役以后，周恩来、周逸群两人，便提出了贺龙入党的问题。他们的理由是：贺龙自南昌暴动到会昌战役，都表现了真诚合作的精神，而且，他本人业已提出这种要

求，如果置之不理，将引起他的不安。前敌委员会因而一致同意他们的提议。但在当时一般同志的心目中，贺龙显得是一个特殊党员，为了军事政治上的需要，不得不准其入党。

我军在会昌战役胜利后，集结瑞金附近一带休息的时候，贺龙的入党仪式，便在瑞金举行了。这次的仪式，是由我主持的。我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训以应信仰共产主义，执行决议，服从纪律等等。贺则誓言愿一一遵守，努力作一个忠实党员。接着由谭平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等先后向他表示祝贺与欢迎的意思。仪式举行时，贺龙的情绪颇为紧张，似乎他还不明白他要接受一些甚么约束。仪式结束后我们相互恳谈，他曾表示，加入共产党的手续并不严格，还不如加入土匪队伍和哥老会的纪律那么森严。我曾向他指出：土匪、哥老会，是专靠森严的纪律来维持他们的团结的，加入中共为党员，则须心甘情愿的信仰主义和执行决议，以信仰为主，以纪律为辅，纪律虽不繁琐，但均须严格遵守，不能视同具文。……后来南昌暴动完全失败以后，贺龙这位新党员，流亡到上海，中共曾给以优异的待遇，并指派同志，每日向他实施共产主义的教育，贺龙经历了这些薰陶，也就渐渐的布尔雪维克化起来了。这就是一个著名的“山大王”转变为共产党员的简单过程。

军事行动路线的决定，是根据多种因素的。往往一些并不十分重要的因素，也会影响决定。会昌胜利以后，关于军事行动，曾有过三个方案：第一，乘势向筠门岭的钱

大钧残部进攻，经浔邬占领梅县一带地区；第二，即以瑞金，长汀一带为根据地，分兵略取潮汕一带东江地区；第三，经长汀、上杭、大埔直趋潮汕。惟会昌战役中，曾有四百多个伤兵，要用担架抬走，我们不愿将他们弃置于当地。据在长汀方面活动的部队报告，福建境内与江西境内的情况，显然不同。江西方面因人民逃亡，运输伕不易获得，福建方面则正相反。长汀方面的报告：认为运输伕的征集不成问题，而且可以将伤病兵用木船装载顺韩江转往潮汕，并已征集了千余大脚妇女，担任担架运输工作。当这些妇女运输队源源到达瑞金时，使我们大为兴奋。因此，就决定采取了第三个军事行动方案，我军在瑞金停留了约两个星期，全部越过了赣闽边界，向长汀地区进发。

中共初期的军事行动，相当幼稚。军事的情报工作，也做得不够，对于敌军的分布和动向，非常模糊。本身部队内部的组织和联系，也不健全，政治工作，相当空洞。军事首脑们，颇以革命委员会机构的拖累，影响行军速度为苦。因此，自瑞金经长汀、上杭，向潮汕进发时，便决定分三批行进。首批是集中最大的兵力，乘潮汕一带空虚，兼程急进，俾迅速予以占领，次则是革命委员会各机关，赓续前进，再次是由政治保卫局局长李立三负责搬运伤病兵，并由周士第率领一营人为后卫掩护队。这样，整个部队，拉成一条很长的行进线，先锋已到了潮汕，而后卫却还在长汀上杭一带。

我们沿途所发生的花花絮絮，不胜枚举，我简略的举几件事例，便可以说明当时的现象。当时行军的速度，不

算很快，然而已使部队疲乏不堪，特别是一般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显得垂头丧气。振作士气的政治宣传工作，无法进行，负这一方面责任的恽代英常埋怨说：一般干部，走路累得要死，还有甚么气力“卖膏药”？沿途占住民房、拉伕、征粮，弄得老百姓鸡飞狗走，宣传又有甚么效力呢？政治工作人员，本身就不振作，怎么还能振作士气呢？……因此，他决定以身作则，光着头，赤着脚，在酷烈的太阳下前进。他的换洗衣服已丢掉了，身上穿的一套粗布军衣，弄得污秽破烂不堪，肩上搭着一条供各种用途的长布手巾，满身晒脱了皮，又黑又瘦，任何人看到他，都要叫他一声“甘地”，他这种作风，当然也有不少的追随者。这使一般士兵们大受感动，往往有人惊叹：“那些大委员们，比我们更能吃苦些……”这就是当时最显著的政治工作。

我所率领的工农委员会，是一个约四十人的组织，行军中每天忙着安排住所，自行警戒和了解情况诸事，一直没有时间和精神来举行会议，草拟办法，实施组织工农与建立地方政权等等工作。当我们大队行进到宁都附近一个宿营的村庄时，我的工农委员会驻扎在一所单独的大地主庄院中。彭湃在庄院内发现了一个可疑的青年人，而和他攀谈，用反间的办法去套取他的实情。那位知识青年，竟中了彭湃的计；带彭到一个山岗上的树林深处，与他四个同党会面，其中较老练的一个，宣称他是“A B 团”④，并对彭湃加以盘问。结果，彭湃出其不意的拔出手枪来，将这五个人制服了，并收缴了他们身上所藏的短枪。他们原拟约集二三十人来夜袭我们住所的计谋，因此也被打破

了。这件事，可以表现国共初期的斗争情形，“AB团”这个名词，从此也就深深印入了我们的脑海中。

当我们乘船由长汀向上杭出发的时候，我们没有征集当地船伕，也未问明河流和当地的情况；有几位委员，有过驾船的经验，便租了两只船，自行驾驶，顺流而下。谁知驶行不远，河流非常险急，河中到处横亘着无数的大石，这两只船挣扎前进，桨篙工具，陆续损毁，驾驶的人纷纷落水，幸水浅而不致丧生。最后我的船上一位撑竿能手，也被抛落水，险状百出。这样走了约六十华里，到了实在无法再行的时候，只好弃舟登陆，步行前进。可是，登岸后，又走到了一片荒凉毫无人烟的区域。

我们这一支又累又饿的农工委员会队伍，循着山洞小路前进，走到天已深黑了，还找不到一个有人的地方。十时左右，才在路上遇到几个行人。他们用很难听得懂的福建话告诉我们，前面是武平县附近的一个市镇，武平县和这个市镇，都被土匪占领了，他们是逃难走出来的。幸亏我们队伍里，有人懂得闽南话，担任传译，我们才明白了他们的语意。才知道我们竟走到土匪窝里来了。他们曾警告我们，这一股土匪很凶恶，我们这一大群人，到了这里，便已无法逃出土匪的掌握了。他们又告诉我们，这个市镇上，住了有三四百名土匪，正在演戏取乐，市上商人，又是与土匪互通声气的。

我们听了这些话，也不知是真是假，只得压抑自己的惊慌，故作镇静的对他们说：土匪么？没有关系，我们正是来找土匪的，我们的大军在后面就快要到了。待这几个

行人走过以后，我们商决只有用单刀赴会的精神，大摇大摆的走到这个市镇上去再说。于是，我们将自己的队伍编制成为一支打前站的部队，由我任指挥官，其余委员都装成士兵模样。我们循着一条小路，进入了市镇，并在街头上的一间豆腐店，宿营下来。扮演卫士的小小个子的郭亮，演得最逼真，他在那里大叫口令，声势显得特别响亮。他告诉店老板，要他去通知土匪司令，说：我们司令有令，要他们继续演戏，我们的前站部队，就驻在街头上，不到市内去，以免引起误会。这位店老板和土匪通消息后，演戏是停止了，土匪虽向我们警戒，但未引起任何冲突。

我们在这间豆腐店内，不管外间的情况，在那儿大吃大喝一阵，以饱饥肠，吃饱以后，由我这位高座上首的"司令"，找着店老板和他临时邀来帮忙的两个伙计——这两个伙计似是由土匪派来探听虚实的……向他们问话，我说："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的大军在会昌打垮了钱大钧部的消息？"他们说："听说过。"于是我向他们宣称：我军是要攻取大城市和打天下的，与这里的山大王，没有甚么利害冲突，你们可以设法通知他们的司令，来这里和我见见面，我军可以加委他一个名义。其中有一人回答的大意是：他们的大司令不在此地，这里只有一个支队小司令。他可以将我们的意思传达给他们。但那位大司令能不能赶到这里来和我们会面，那就说不定了。我们这样交涉完，也就睡觉了。

第二天清晨，当我们整装待发的时候，土匪方面，居然派来一个向导，领我们翻山越岭，走到一条河边的小镇。这条河，原来就是我们前一天遭遇重重险象的汀江。那位

向导在途中曾向我们表示：他的司令是很讲义气的，决不会和我们大军为难，我们沿途如有掉队人员，他的司令都已吩咐一律加以优待，将来说不定他的司令，还要找贺总指挥。这样，我们就走出了这个土匪窝，在那小镇上雇到两条船，向上杭进发了。河流还是一样的险恶，但我们的船因为有当地的船伕驾驶，显得履险如夷。我们看见河流中有不少被打毁的船只；也有许多伤兵和革命委员会的人员，滞留在两岸待救。

负责航运的李立三，先我们到达了上杭。我向他谈及我们遇险的经过。彼此不禁哈哈大笑，他向我说："我也做了一件傻事。"他从长汀出发的时候，封了一百多条船，找了四百多个船伕，以便将他所率领的全部人员，都运到上杭来。他并未问明这条河的情况，也没有让那些船伕驾驶他们原来驾驶的船，便来一个统一分配。他心想年壮力强的船伕，总比年老船伕更为得力，因此就将那些壮年船伕驾驶的船，分载负责干部和伤病干部。老弱船伕驾驶的船，装载次要人员和病伤兵，谁知这个作法完全错了，老船伕都是一些有经验的舵手，他们所驾驶的船都安然到了上杭，而那些壮年船伕所驾驶的船，大多出了事，损毁了。不少干部，都曾落水遇险，停留在两岸待救。现在，他急须设法找船去接应他们到上杭来，还要赔偿船老板的损失。

这类不顾实况，任意采取行动的故事，当时是我们间意味深长的笑谈资料，也曾认为要引以为戒。可是人们包括我自己和李立三在内，并不容易从自己的过失中吸取宝贵的教训。

我们在上杭休息了两天，便继续向广东的大埔步行前进。谭平山等已轻装随先头部队出发了，率领革命委员会各机构的责任，只得由我肩负，革命委员会的行列，真是七零八落，尤其是秘书处和财政委员会的先生们，没有轿子是走不动的。任主任秘书的姜济寰那位大胖子，便要八个轿伕轮流的抬他。因此，和我一同走的工作人员，虽只三百多人，但连伕役算在内，就将近千人了。此外，李立三的政治保卫局是一个最庞大的机构，包括一连兵在内，共有四百多人。并照料着五百名左右的伤病官兵，加上伕役，总共两千多人，李立三等因须料理未了事件，须迟一两日才能跟进，周士第所带的一营后卫部队，那时还在由长汀循陆路来上杭的途中。

我率领着革命委员会各机关，由上杭到大埔，沿着闽粤交界处的汀江，一路欣赏山峡急流，水势有如万马奔腾的美景。我们到达大埔以后，曾在西山会议派要人邹鲁的乡居，留宿一宵，行时还留下一封信向他家道谢，表示我们对政敌也是很有礼貌的气概。我们由大埔改乘较大的民船，沿汀江顺水直放三河坝。三河坝本是我军行进途中的枢纽，但先行部队并未设防，因此我们到达这里，竟陷于四面受敌的境地，驻在梅县的敌军黄绍雄部有一团兵已到达离三河坝三十华里的淞口，可以在三小时之内攻击我们。三河坝的周围，又有一些民团，向我们警戒。三河坝镇内，也有一支五十支枪的民团潜伏着准备作黄部的内应。

我面临着这种危险情况，立即约集那时已不任第九军军长而跟随革命委员会行进的朱德和号称“东江农民王”的

彭湃等商议对策。我们在革命委员会各机关内，聚集了二十余人的长枪兵，由朱德以九军军长兼革命委员会警卫司令名义，向淞口方面警戒并封锁消息。彭湃则集中了十几人的短枪队，负责去解决这个镇上的民团。我则在一所大房子里面，招待镇上的绅商，故作闲逸之状。革命委员会的其他人员，多留住在船上休息。我们的主力军，那时已经在三百华里以外的潮汕，李立三周士第所带的队伍，还在上杭一带，尚须两三天才能到来，我们孤悬在这里，急切得不到援救，只有尽量表示镇静，摆设这个空城计。

我们安然渡过了难关，似乎出乎意料。首先是彭湃大显身手，他熟悉本地情形，很顺利的将镇上的民团缴了械，他还搜获了隐藏在镇内的十多个携带短枪的人，其中自然包括黄绍雄的密探在内。两三小时之内，我们已控制了三河坝整个市镇，我们的枪支也增加了。三河坝的那些绅商们，愈来愈多的到我这里来客气一番。朱德所带的那一排人，在离三河坝八华里的地方，即与黄绍雄的先头部队接触。黄部似尚不知我们的虚实，向淞口方面退却，朱德乘势派出八个兵，对敌作虚张声势的追击。朱德本人，则奔走于三河坝与前线之间，摆出军长的架子，吓唬那些乡下人。

这样维持了两天，李立三和周士第两部陆续到达。我和李立三彭湃等，率领着革命委员会各机构，由保卫局的一连人护卫，顺韩江，分水陆两路，向潮汕前进，朱德和周士第，则率领着后卫营留驻三河坝，监视梅县方面的敌军。并照料留在那里的伤病兵。后来我主力军在汤坑被击

溃向流沙普宁海陆丰一带流窜时，朱德和周士第便被敌军隔离在三河坝。他们因孤立无援，不得不率领所部和一部分轻伤病兵，共千余人，向粤赣边区开始游击活动。朱德部历尽艰险，终与毛泽东部汇合，在井冈山下寨，成为工农红军的主力。

汕头是我们预定的临时首都，我们准备在那里大展鸿图。先我们到达那里的周恩来，在一九二五年曾一度出任汕头的东江行政主任，情况比较熟悉，我们只有唯他的马首是瞻。根据他的提议，李立三被任命为汕头公安局长，致力于秩序的安定。这里的中共地下组织原是渺小没有力量的。当地人民对我们多持冷漠和观望的态度，敌探的活动更是防不胜防，敌人的便衣队便袭击过汕头的公安局。

敌军徐景唐、黄绍雄、任庭飏等部占住了潮汕西面汤坑一带险要阵地，企图居高临下，俯击我军。我军正向汤坑前线集结，准备决战。我们觉得这是一场决定命运的战役，大家忙着供应前线。革命委员会的工作，须俟这一战役的胜败而定。

不两天，张太雷奉着中共中央的使命，由香港潜来汕头。他的到来，最初被视为是海外来的救星，令人兴奋，但我们知道了他的使命，又大感失望。他要我们根据中央的新政策，将革命委员会改为苏维埃，丢掉“中国国民党”这块招牌；放弃潮汕，将军队调驻海陆丰。会合那里的农民，改组为工农红军。这是一件影响我们今后行动的大事。我们现在挂的招牌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有一套合乎这个名称的政纲，我们的军队正与敌军对峙，就要发生

激战。在此紧急关头，如何更改招牌和政纲，如何让军队脱离火线等具体步骤，才能切合时宜，都是要煞费考虑的，而代表中央的张太雷也无法解决这些难题。

张太雷也曾隐隐约约的说到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及其以后的情况。他告诉我们，中共中央早迁回上海，由瞿秋白负责，他自己也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广东区委书记。此次中央又赋予他全权来指导我们工作。而我们这些主持南昌暴动的首脑们，则都丧失了原有的领导地位，谭平山李立三都不再是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周恩来和我降为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他虽没有明说我们被判为机会主义，但我们既受如是的处分，也不难推知瞿秋白中央对我们的看法的梗概了。

于是我们一致推张太雷负起这里的领导责任，但他却不肯接受，他不肯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也不肯迳行领导，因为他就要赶去广州，执行区委书记职务。他吩咐潮汕中共地方组织的负责人，要仍然保持秘密，以免我军离开时，遭受敌人的打击。他还传达中央的命令说："张国焘李立三应即回上海去，与中央商定今后政策，这里的事由周恩来负责处理；谭平山在取消了革命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之后，也应离开这里。"我曾质问他："这不是丢掉军队散伙吗?"但他说："八七会议后的中央命令是要严格执行的。"这一切使我们觉得中共中央对南昌暴动已不存任何指望，所谓苏俄援助，更是落空了。

周恩来鉴于这件事难于处理，因以前线紧急为理由，赶往指挥作战去了。他行前曾向张太雷说明，这些事是要

从长计议的。我军如果要移到海陆丰去，也要先击溃汤坑的敌军，一切变更都要在这次战役之后，才能实施。张太雷看见事势如此，也只好同意了。我曾与张太雷恳谈，向他委婉说到南昌暴动的前夕，只注重反机会主义的罗明那滋，要我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停止这一暴动的举行，但为在南昌的全体同志所反对，可为殷鉴。这次他的态度仍没有著重现实的领导，大概又是以反机会主义为主题在做文章。如果，我们不对准敌人，只是浇些反机会主义的冷水而将这股本钱丢了，那确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不如依据现有的局面，逐渐改变，譬如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改为苏维埃，就须考虑周详的，而且在战事紧急中，如果采取激烈的改变步骤，无异是拆自己的台。

瞿秋白从中央透过张太雷的手，对我们所浇的这瓢冷水，对当时的人心士气以及这一战役的失败，究竟有过多大的影响，固然不能精确估计。但至少我们这些负责人确是因此大伤脑筋，以致未能全心全力的去为战斗努力，则是事实。我对此一直引以为憾。我觉得当时中央应以全力协助我们争取南昌暴动的胜利，不应当这样胡闹。不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不能任意取消，就拿谭平山个人来说，他既成为这次暴动的旗帜，也不是可以任意撤换的。

前线的军事失败，解决了我们内部的争执，敌军占领汤坑的高山险地，构筑工事，以逸待劳；我军仰攻伤亡极大，终至不能支持而败退下来。十月三日汤坑的失败，便决定了这次暴动的最后命运。

在汕头一带的革命委员会各机关，接到前线的败讯，便不分昼夜，向普宁方面，落荒而走。那时秩序已乱，人心惶惶，颇有草木皆兵的情形。我在行进途中，曾遇到由前线来的聂荣臻，他懊丧的向我叙述："这次失败，完全是指挥失当。参谋团不慎密研究敌情与地形，只知将部队开上阵地去打硬仗。叶挺同志那位猛将，也只知硬攻，在前线象发了疯一样的拚命。等到气力用尽，连退却也弄不好了。我们经过这次惨痛的失败，以后如果要再举，非大大记取这一次的经验不可。……"

张太雷在汕头和我们朝夕相聚了一星期，在退出汕头的时候，又和我同行了一段路程，他才化装转回汕头，取道回广州。他和我分手时曾说：果不出中央所料，暴动终于失败了。现在只有照着中央的指示执行。我回答说：一切我须与前线的同志们会面商决，如情况不十分恶劣，我也许一时不能回上海去。

十月四日午后我们和由汤坑败退下来的队伍，在流沙地方相会合。在大道旁一所相当雅致的小庙中，我停留下来。我的工农委员会的人员，那时一部分派到沿途去维持秩序，一部分则失去了联系，与我同行的，不过几个人。我在那里与李立三等会集，他的保卫局的队伍，那时也分散得七零八落，失去掌握：张曙时、郭沫若、林祖涵、姜济寰等，都陆续来到这里，谭平山、恽代英等已经走到我们前面去了。从汤坑败下来的队伍，似乎比汕头来的后方人员，还要惊慌些，那些士兵，一面急行，一面喊着："快走！敌人追来了！……"

集聚在流沙小庙中的革命委员会的要人们，准备等前线周恩来、贺龙、叶挺等到达后，举行一次紧急会议，以决定行动方针。不久，周恩来躺在一个担架上，被抬来了。（贺龙叶挺已走到前面去了，周算是殿后的）他面带病容，更显得特别懊丧。他下了担架，走进这所官兵拥挤的小庙中，提高着嗓子向在场者宣称："你们这些先生们还不走呀！现在我们奉中央命令，我们共产党，不再用中国国民党这面旗帜了，将在苏维埃旗帜之下，单独的干下去。现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事实上已不存在了。你们各位先生，愿脱离队伍的，就在这里分手。"张曙时立即回答说："那也好！就这么办吧！"周恩来这一懊丧而气愤的宣布，显然是因为军事已失败了，他根据张太雷前所转达的中央命令，仓促间来不及与我们商谈，乃以他那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作此决定。这一决定，居然成为历史上中共与国民党左派最终的分离，中共扯出苏维埃这面旗帜的开始，也是中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更陷入歧途的标志。

正当人们纷纷准备逃离时，周恩来转而和我与李立三作紧急的商谈。他说：你们赶紧离开部队潜返上海。我将随部队行动，沿途由我相机处理，除应留下的人员外，一律遣送到香港上海一带去。我问他：你的病怎样？你病了应先离开部队，让我留下来代替你的工作。前线情况到底如何？……他急遽的回答说：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撑得住。我不能脱离部队，准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你们快走吧！不能再讨论了，迟了就来不及了。前线糟得很，还能剩下多少队伍，现在一点把握都没有……。

这样，我们就不得不离开这小庙，各奔前程了。

我和李立三，在小庙的大路旁边处理了一些遣散同志们的必要事务，并告诉一般同志，分别找向导向海口方面逃出这个危险战区。然后我才和李立三贺昌（少共中央常委，奉命回上海工作）还有一位是中级军官×××（姓名已忘记），跟着一位向导脱离队伍，循着田间的小路单独行动。

当时我的同行者作何感想，不得而知，我自己则频频回首，望着那七零八落的队伍，百感交集。我们走了约一华里，从流沙大路那面传来零零落落的枪声，愈来愈密，大路上的队伍，乱作一团。从远处看，一部分人是在抵抗；另一部分则无目的的乱逃。我们目击这种情况，很想奔返鼓励士气，坚决抵抗，以挽颓势。那位向导——中共普宁县委派来的一位农民同志，能干而熟悉当地情形——却反对我们这样作，领着我们从速脱离火线。

不久，天已黄昏，我们走到了一所有碉楼的村庄，流沙那面的枪声，也停止了。那位向导安慰我们说：我早就知道天快黑了，敌人追击部队的射击，是不能加害于我军的，你们放心吧！他悄悄的引我们进了他家里的后门。随即出去了一会，抱来了一包便衣服，我们脱下身上的军服换上合身的便装。他并为我们准备了可口的晚餐，我们这些饥饿的人，围桌大吃一顿。

这个村庄，有一两户地主人家是反对农民协会的。其余的农户大都加入过农协。这位向导是农协的活动分子，看来家境相当富裕，我们为着避免地主的注意，躲藏在那

里不敢声张。饭后，我们将所携带的短枪，交给那位向导，请他妥善的收藏起来，以为将来农民起事之用。他非常高兴地谨慎的将枪埋藏好了；即领我们走出他家的后门，偷偷循着山涧小路，向海滨进发。

我们四人追随着向导，在无人烟的山岭中行走了一夜，沿途还是和平常旅行似的悠然自得，向那位向导问东问西。他那时真像一位大军统帅一样，总是笑而不答。他不告诉我们要走多少路；到甚么目的地；几时可以走到，我们除在两三处喝了一点泉水，吃了少许饼干外，他不顾我们的疲劳和饥渴，不让我们休息，一个人走在前面，催着我们急走。第二天近午，我们望见前面的海面，他才休息下来，向我们说，前面是“甲子港”，再上前去，我们将要分开走，要表现得我们五个人毫无关系。但各人互相照顾，不要失去联络。到了市镇上，我将要走进一家熟识的店铺，你们也陆续进去，不要出声，一切由我交涉，自然有人出来招待。昨晚到现在，我们走了一百多里小路，幸好都平安渡过，现在到市镇上去，一切更要注意！我们都笑着说：一切听你指挥。

我们放慢了脚步，装着普通旅客模样，先后进入了甲子港，这个海滨市镇，完全是个渔港，市镇上尽是鱼产品。海港中停泊着大小的渔船，海滩上则晒着各式的渔网。不仅各户门楣，以鱼虾蛤贝等作装饰，多数妇女们，从头至脚，也以鱼虾蛤贝等作装饰品。这个镇上，没有民团，也没有警察，除了有些大鱼贩操纵市场外，似是一个无人管理的世外桃源。我们四个奇异的客人，依照向导的话，走

进了一间海边的店铺，看着正在那儿和店老板谈话的向导的眼色，坐在一条长凳上，像普通的顾客一般。随即由那位向导引我们到店铺后进的楼上，他向我们说：你们就在这里休息吧！这位店老板很怕事，不愿留你们在此过夜。他即将送茶饭来，你们不要下楼。我去找船，船找好后，你们就上船去。

我们四人并未完全遵从向导的嘱咐守在楼上，饭后，我们单独的去市镇上溜跶，曾看见那位向导正和渔船上的人在饮茶谈天，一会又蹲在沙滩上和另一些渔人交头接耳，近黄昏的时候，向导回来了，他说：船是找好了一条，船资一百大洋，午夜开船，直驶香港。他表示，他对于渔船的情形，并不清楚，还要去继续打听。我们这些急于要逃走的人，不管许多，就将一百元船资派人随同向导去交给那位船主，并催他赶速准备启程。

天黑时，我们四人更是毫无顾虑的在海滩上荡来荡去。那位向导很着急的跑来对我们说：我找错了船，那是一只海盗船，船老板已侦知你们是大军官，一定带有金银财宝，可能在海上谋害你们，决不能坐！我现在才弄明白，他一面指着海上的船轻声说：你们看！这面的都是渔船，那面的少数几只，便是海盗船。

我们立即决定请他另雇一只渔船。不一会船雇好了，但向导坚要去向那海盗船的老板，讨回所付的一百元定洋。可是我们不愿他这么做，我们要他催促新雇的渔船，准备一切，尽早开行。并要他故意去和海盗船老板攀谈，说我们今晚因事不走了，改在明晚走。使海盗不知道我们的实

情。我们还嘱咐向导为他的安全计，最好他明早离开这里，那一百元丢了就算了。这样安排之后，我们便在十时左右，踏上了那只新雇的渔船，船伕解缆，驶向香港。

其他同志们所采取的逃难途径，多少是和我们相似的。不少逃难的同志，也是经甲子港逃往香港，再转各地。我军因被敌人沿途截击，并衔尾追逐；贺龙部全被缴械，叶挺部的少数残部逃到海陆丰，与农民队伍合流了。周恩来、谭平山、贺龙、叶挺、刘伯诚、郭沫若、恽代英、林祖涵等也在这一两天内先后离开部队，从海上逃向香港上海。至此，轰轰烈烈的南昌暴动，就这样悲惨的结束了，它所剩下的，即是我前面所说过的，被隔离在三河坝的朱德部，还在那里继续挣扎；这也可以说，是南昌暴动所遗留下来的一点没有被扑灭的火种了。

① 南下广东的路线曾有两种主张，甲、由赣东抚州瑞金线入东江，即暴动军所采用的路线。乙、由樟树吉州赣州线，即系沿赣江的大路，周逸群曾有此主张。见一九六四年英文中国季刊第二期 C. Martin Wilbur 所作《The Ashes of Defeat》文中之周逸群报告。

② 郭亮陈荫林等两湖农运工作人员曾有此主张，当时他们的声音显得不够响亮，故也没有见于文件的记录中。

③、据《蔡廷锴自传》（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香港自由旬刊社出版，上册第二二〇页）叙述此一事件时，仅谓将范孟声等共产党员，给资遣散。但范孟声从此即告失踪，亦属事实，究竟那一说法确实，作者也无从证明。

④ 所谓 AB 团是那时国民党在江西一个反共产主义的秘密小组织，由蒋介石所委派的整理江西省党务特派员殷锡朋所领导，据曾参加此秘密组织的人说，那时为了团结在江西的反共人士，殷锡朋发起组织所谓 A 团和 B 团，凡是资望地位高的编入 A 团，一般人则编入 B 团，其 A

B 二字母并无特殊之意义。不过这个团体以反共产主义为宗旨，所以后来人们就把 AB 二字母，解释为 Anti-Bolsheviks 的缩写。至于彭述之在《向导》周刊第一百九十期上所发表的《目前革命右倾的危险》一文中所说殷锡朋“在江西国民党内已经组织了一个小小的秘密团体，有党纲有章程，名字叫 SM 呀!”是否即 AB 团的别称，抑在 AB 团之外尚有所谓 SM 团，则不得而知了。

# 第 二 章

# 八个月的地下生活

我返回上海，渡过近八个月的地下生活——一九二七年十月至一九二八年五月，这是一段够苦闷的日子。我为中共的挫折而伤感，也为我个人所受处罚而不平。我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我爱党，也许是逾于别人的；我不得不反对瞿秋白的盲动主义。我又老在逃避警探们的追捕，任何活动都受到限制，因此，心绪和生活都极不安。一直到一九二八年五月下旬，我赴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我的生活情趣，才开始有了改变。

一九二七年十月五日晚间，我们乘着一艘渔船，沿着广东的海岸线，向香港进发，一路倒也风平浪静。这艘船的船主兼舵手，是一位慈祥的老者。他的两个助手，是他的子侄辈，为人也很诚实。他们殷勤的招待我们；有时，途中偶然发现可疑的船只在远处航行，船主便立即请我们卧在舱里，免得暴露目标。

可是，这艘渔船很小，舱内除了铺着的粗糙木板，作为我们的卧处以外，别无任何设备；而舱房不过三英尺高，我们睡在里面，起卧稍不留神，头就可能碰着舱面。此外，由于思潮起伏不定，以及海浪打击船板声响的骚扰，我虽

很疲倦，也没有好好安睡过。因此，我这次旅行，不能算是安适的。

我们在船中计议如何脱离险境，到了香港怎样办，到了上海又如何等等问题。我们叹息自己的处境，按照“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这句老话，认为我们现时既不能成“王”，也不能成“寇”。因为，我们脱离了部队，也就不成其为“寇”了。我们自比于“丧家之犬”，这对失去了一切的我们，似是切合的。

第三天的清晨，渔船进入了香港的鲤鱼门，到了铜锣湾海面，我们就在那里登陆了。在香港人的眼中，我们也许是几个怪物，我们几天没有修面，身上穿的，还是流沙乡下所换上的粗白布衣裤，染着黄一块黑一块的泥土渍子，头上戴的是又破又脏的草帽，脚上穿的是经过长途跋涉的黄布鞋。但走起路来，个个倒也显得神气十足，我们在街上买了许多份当天的报纸，这是我们两个多月所没有看到的东西，我们边走边看，忘其所以。我们的形状曾引起沿途人们的注意，他们一定都在那里推测：“这是从汕头败下来的军官。”

我们走进了著名的大东酒店，选了一间大房间。茶房们看见我们这些形同乞丐的乡下人，而却又派头十足，不说甚么，笑了一笑，就要我们付房金。我们这几个穷光蛋，在甲子港付了双倍的船资，还有一路上的其他花费，囊中所剩已少得可怜了。我们四人都各将所有的钱凑拢来，付了两元多的房金，剩下的只够坐坐车子，连一天的饭费也不足了。我们于是将草帽、报纸和少得不足道的零碎东西，

都留在房间内，就到街上去活动。

贺昌和×××去找中共在香港的秘密交通站。这是需要几番转接才能找得到的。我和李立三则去找那位曾任过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长、华侨出身的彭泽民。他是与我们友好的国民党左派，在武汉分共时，他潜回香港，重操商业。在中环一间颇大的铺面里，我们果然会见了彭泽民。他那时忙着和一些穿着西服，状似华侨的人物交谈，似乎适逢是生意很忙的时候，他看见我们这两位奇怪的客人，显然有点惊慌，不知和我们如何招呼才好。我们看见这种情形，坐了一下，也就离开店铺。彭随即陪我们走出来，问明了我们的地址，答应和我们打通关系，帮助我们离开香港，并在他袋中掏出仅有的十几元港纸，交给我们。这是我们那时最需要的东西，便欣然接受，和他告别了。

有了使彭泽民受窘的经验，我们再不好去找其他的人了。事实上，也很少可靠的朋友可找，因而我们在街头上走来走去的选购一些廉价的衣物鞋袜必需品，然后理发和洗澡，从汕头所带来的一切土气，似是一扫而光了。贺昌他们也找到了中共在香港的交通机构，但要在旅馆等候负责连络的人员来见面。他们也同样找到一点钱，买了一些应用杂物，改变了原来的怪形状。

我们在旅馆，一面等候来找我们的人，一面想享受一次多日没有过的安睡，在晚上九时左右便就寝了。十二时左右，有人来敲我们的房门，把我们从梦中惊醒。开门一看，原来是中共在香港的交通负责人到了。他急促的向我们说：快走，一刻也不要耽搁。据广州方面的确实消息，

广州国民党当局已知道你们的真实姓名和地址，公安局长吴铁城，即将亲自带人来香港，会同这里的差馆，捉拿你们并要求引渡。我们听了他的话，连忙收拾必要的东西，跟着那位负责人，走出了旅馆。我在想：让吴铁城将我们那些旧衣服破草帽搜捕去吧！

我们由他带领着，在街上先先后后的转弯抹角走了一阵，觉得没有跟踪的人，才直奔一条倾斜的横街，进到一所房屋的楼上。这层楼有一间房子，是中共的交通接待机构，其余的房子则住着普通人家。我们走进房子，看见里面已经坐了几个人，其中也有从汕头来的。我们的到来，使这间房子更拥挤不堪。那位交通负责人吩咐我们，不要高声讲话，如果愿意打牌赌钱，倒有掩护的作用。

接着，他低声的向我们解释他没有很快的来找我们的种种理由，并且说明他没有耽搁时间。他责备我们，象我们这样的形相，不应该住大东酒店。不是他来得快，今晚准定要出岔子。他并说现在一切情形都不同了，再不是武汉时期的情形；过去的同志和朋友，现在都不知道变成甚么样子；即使在街上遇见，也应立即设法躲避，不可贸然打招呼；稍一不慎，就可能有被陷害的危险。

这位交通负责人对我们的这一番训诫，曾使我和李立三相视而笑，认为小伙子居然教训起前辈来了。原来这位交通负责人是一个约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与贺昌具有同样的少年气盛的气概，又是八七会议以后的新人物，显得神气十足似的。我们挤在这间小房子里，有的坐着，有的躺在地板上，如此渡过了一宵。

第二天早上，依照那位交通负责人的安排，我们都无言的分手了。他将我安排在一间小旅馆的小房间内，给了我一笔必需的旅费，替我购置了一些应用物件和到上海去的船票等等。他买给我的物件中有一只大柳条箱，但是并没有东西可以填满这只箱子；我乃临时买了一条棉絮，将它塞满，以壮行色。当天下午，我采取了各种避免人们注意的方法，悄悄的走上了一艘开往上海的轮船。其余三个同伴的行止如何，我也就不知道了。

我在那艘轮船的统舱内，听到一个我所熟悉的谈话声音，我不得不提高警觉。这是一个三层的高铺位，我静静的躺在那里，以免被人发觉。开船以后，我才证实了那个熟悉的声音，原来是我的老友朱宝庭。他是宁波籍的老海员，有名的“朱缺嘴”(嘴唇缺了一块，因而有此绰号)。他交游甚广，这条船上的海员，多数是他的朋友。他喜欢喝酒，往往终日在醉乡中与人大声谈笑。那时，他也是这个统舱中的乘客，搭这艘船到上海去。与他交谈来往的人，川流不息。

我考虑到：朱宝庭原是一位可靠的同志，也是海员工会领导人之一。这时他竟毫无顾忌的在那里大声谈笑，是否他已经变了呢？即使他没有变，但如果我和他打招呼，又可能会遇到其他认识我的海员；或者这位“朱缺嘴”酒醉了，乱说一阵，岂不要将我的身份暴露吗？因此，我决定避不和他见面。同在一个统舱内，这很不容易做到。于是，我只得装晕船有病，老躺在铺上不下来；只有当“朱缺嘴”睡了或不在统舱内时，才下来走走。这样，我算领略了那

种无病装病的痛苦滋味；而终日躺在床上，也使我陷于一种苦思焦虑的状态之中。

这样过了三天，我居然没有被“朱缺嘴”发觉，顺利的到达了上海。其实，那时“朱缺嘴”还是一个忠实的同志，我沿途的顾虑和所吃的苦头，实在是多余的。

我到上海后，很快的便和中共中央联络上了，我也开始领略到“四一二”上海清党以后的那种恐怖滋味。李立三这时也到上海了，他是不是和我同乘一艘船，我不知道。但他的化妆，显然是比我要阔绰些，他装扮成一个富商的姿态，也有点像一个花花公子。我们当时在李维汉（任瞿秋白中央组织部长）的住所内会见，谈论我们如何住下来的问题；又重新听了一遍由李维汉告诉我们应注意的种种保密事项。

李维汉告诉我们：中央已经在英租界的重庆路一条横巷内，租好了一层楼的房子，准备给我们居住。经手去租房子的人，曾告诉房东，是准备给新来上海的朋友居住。要我们以旅客的姿态搬进去，一点也不可露出形迹。我们听了他的话，随即商谈，以何种身份搬进去，如何应付环境。我那时容颜显得相当憔悴。于是，装成一个来上海就医的有病教员，李立三则权充我的弟弟，系一间银行的高级职员，陪同我来上海医病，并顺便做做买卖。我们这样商定后，李维汉从旁欣赏着说：“像得很。”

我们搬进了这所中共中央的“高级招待所”，这是一幢两层楼的单独洋房，房东住在楼下，我们住在二楼。这层楼有六个房间，相当宽敞。各房间内，都早经布置了一些

租来的家具。我们的扮演，倒也非常逼真。李立三每天都向我致候："大哥，你今天感觉怎样？"如果有同志来往，也要谈上一些有关我的病状，似乎都是一些来看病的亲友。弄得房东都在那里推测楼上那位大先生，是生了肺病罢！李立三却是好动的人，在家里耽不住，不管风声怎么紧，他每天都要出外去混一阵。有时，一个人去看电影，倒也很像一位忙于生意的人。

我和李立三闲居在那里，似是等待处罚的机会主义者。瞿秋白避不和我们见面，其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也不和我们谈党的政策问题，甚至也不要听取我们关于南昌暴动经过的报告，由于我们的要求，那些委员才对从流沙逃出来的同志的安排问题，加以更多的注意。中共中央发给我们阅读的，主要是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①。我们对于这个文件，读了又读，有不少的感想。

李立三曾向我表示：读了这个文件，才明白为甚么在汕头的时候，张太雷要我们离开部队到上海来，和不要谭平山再当委员长；原来我们都被判定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非要进行思想改造不可了。他更进而指出：这是一篇富于煽动性的文章，看来不免有许多武断的地方。可是他从来没有看见过共产国际第八次扩大会议的决议。现在这个文件中说，我们违反了共产国际这个决议，不知道我看过没有？我回答说：我也没见过，应当找来看看。

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虽未明白提出建立苏维埃政权，但确是中共进入苏维埃运动时期的先声；也为中共

以后接二连三的盲动主义的错误种下了根苗。中共在国共合作时期固然是太偏重了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甚至在马日事变以后，仍然为了维持这一联合战线，一味让步。共产国际也为了避免这个联合战线的完全破裂，而有停止南昌暴动的指示。这个文件却正好相反，它说明“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及社会革命相对立的观点是不正确的”。② 继而，强调阶级斗争，它还将对外与对内的问题混为一谈；认为“封建制度的破坏，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上严重的致命的打击……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正可以掘断帝国主义压迫所依据的支柱。”③ 并没有提出中国革命的反帝的具体任务，因而也不重视民族的联合战线。

其实，半殖民地的中国，并不因蒋介石的胜利，脱离了殖民地化的危险。废除不平等条约，驱逐外国势力出中国，争取中国的独立自由，仍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内涵。中共在西安事变以后，也不得不宣告取消苏维埃和红军，停止土地革命，与国民党再度合作抗日，以期完成一九二七年时所未了的革命任务。对于共产国际这个或那个的死板的革命公式，这似乎是一个残酷的历史讽刺。

平心而论，当时检讨中共政策的得失以及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本有其必要，但八七会议告党员书却是像瞿秋白自庐山回武汉时对我讲的那样，只是一篇满足政治需要的文章而已。这篇声讨机会主义的洋洋大文，是手执上方宝剑的罗明那滋的杰作。他那个半罐子水的托洛斯基主义者，在行文中也难免偷运了一些托洛斯基的“私货”。在罗明那滋的笔下，仿佛中共党员做了一系列的革命工作，而

中共中央则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这难免有乖于一般的逻辑。他戴着"左倾"颜色的眼镜，仿佛像中共这样一个幼龄的党，是不会有左倾蛮干的举动的。因此，他特别赞扬左倾的举动，这就鼓励了盲动主义的发展。但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南昌暴动举行之初，中共发表这样重要的文件，竟对之只字不提，是不是这件事如果提出，会影响整个文章的论点，不适宜作为打击中共机会主义的资料吗？其实，他这样不顾后果的打击中共中央的领导，不仅没有为中共的前途着想，似也没有为共产国际着想，因为他所提及的那些指责，对于共产国际恰是适用的。

这篇告党员书引证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决议："现在的局面中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不在国民党之内取得领导权，而打算达到无产阶级在中国之内的领导权，是不可能的。"④在国民党取得领导权的做法是否应当的问题姑不置论，但一到了一九二七年五月底，事实上显然没有那种可能了。不过，无论共产国际对外的措词如何合于革命的公式，但鲍罗庭在一九二七年初发动反蒋，特别是在四月间蒋介石清共之后，根据斯大林意旨，总是要中共不惜任何让步，来维持武汉左派政权。至少在鲍罗庭看来，武汉的左派政权似是大海中的一根浮木，我们已经落在海中的共产主义者，就只有抱着它作为救生圈。这位熟知行情的鲍罗庭也就是为了这个理由要我们让步的。所以直至最后关头，他仍不肯让中共退出国民党，以免多犯一些"机会主义的罪恶"。怪不得后来陈独秀先生在告全党党员书中说："党犯了以上这一贯的根本错误（作者按——这是

说中共忠实的执行共产国际，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这个机会主义的政策），别的大大小小不可胜计的错误，自然要跟着不断发生出来。”

知道内情的同志们曾告诉过我关于八七会议的一些经过。“八七”紧急会议是匆匆举行的，参加的人很少，只有瞿秋白、任弼时、张太雷、李维汉等人。这个告全党党员书，是由共产国际代表预先准备好，而由瞿秋白译成中文的；在会议中宣读了一下，就算了事。接着，中共召集湖北干部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的决议，曾遭到不少同志的质难。他们曾问中央对于南昌暴动的态度如何？为甚么对领导南昌暴动的同志给以严重的打击？为甚么张国焘、李立三、蔡和森、周恩来等人都被取消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瞿秋白曾就各重要委员受到处罚的事，有过说明。他指出：陈独秀、谭平山两人是八七决议文件中公开指出来的机会主义者，应受到严重的处罚。谭平山可能被开除党籍，陈独秀的党籍尚可保留，但中央委员在事实上已经开除了。至于张国焘同志，曾表示反对共产国际，袒护过去的机会主义。湖北总工会的领导错误，应由李立三负责。解散工人纠察队应由周恩来负责。中共许多宣传文件，有机会主义的错误，是蔡和森经办的。因此，他们也分别受到处分。在八七告党员书中，指出全国农民协会发出许多荒谬的训令，是毛泽东经办的，应由他负责。而且他在马日事变后，通知湖南省委，取消农民进攻长沙的计划，因而也要负机会主义的连带责任。

八七会议中，任弼时成为天之骄子，因为他所领导的

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早就反对陈独秀的机会主义。原任湖南区委书记的李维汉，避开对马日事变事先缺乏警觉的指责，成为湖南农民运动的“英雄好汉”。熟悉共产国际行情的张太雷，不待说是拥护共产国际的。瞿秋白对于过去自己的责任，是最难于解释的。他不止一次声言，他早就反对陈独秀的机会主义，又能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摆脱机会主义的错误，进而与过去的机会主义作坚决斗争，因此，他出来领导，似是责无旁贷的。

八七会议后改组的中央政治局，是由瞿秋白、苏兆徵、李维汉、张太雷、项英、向忠发、卢福坦七人为委员。在增加工人成分的前提下，算有四个工人委员——项英曾在武汉做过一个短时期的工人；曾任湖北全省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发是湖北的一个驳船工人出身；苏兆徵是一个著名的海员；卢福坦也是广东籍的工人，曾系省港罢工委员会的要角。此外，任弼时仍以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的资格，罗觉则以上海区委书记的资格，经常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苏兆徵担任过一个时期中央书记的名义，后来苏兆徵因病去世了，瞿秋白才接替苏兆徵任名符其实的中央书记。

十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我被剥夺了参加会议的权利。这次会议是因为南昌暴动业已失败，须作出一定的结论；同时，八七会议究未规定今后工作进行的明确方针，因而也须要来一个补充。这次会议正式决定“建立苏维埃工农民主独裁政权”，采用自下而上的发动暴动的办法，来实现土地革命。早已提出过的苏维埃口号，

从此成为定案。又这次会议认为中国革命形势，正在不断高涨，因而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托洛斯基式的概念，这就显明的露出了罗明那滋的马脚。后来，第六次代表大会，曾轻描淡写的批评这次扩大会议，误用了“不断革命”这一名词，盲动主义的倾向似也是由此发生的。

这次会议，否定了南昌暴动的意义，认为它仍然采用国民党的旗帜是机会主义的表现，而这种机会主义应负南昌暴动失败之责。谭平山因而被开除党籍，当时谭平山已从潮汕逃到了上海，他被断绝了与中共的一切联系，中共中央也不给他以任何辩护的机会。不久，他在上海《申报》上，登载了一个启事，声明脱离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共的政策，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超时代的。

在这次扩大会议中，我也被缺席裁判，开除中共中央委员之职务；而且还有其他受惩罚的同志们⑤。我的罪状是“假传圣旨”；这个决议是根据张太雷的报告，反谓我未根据中央指示，去坚决领导南昌暴动，复假传中央的意旨，去阻止南昌暴动。这与事实正相反，真使我觉得现在的中央是不顾信义，任意说谎的。不少的同志，曾为我抱不平。他们曾质问中央：为何不让我去出席申辩？为何任意颠倒黑白？我也曾有过一封长信致中央扩大会议，申诉我所受到的冤屈。有些同志还要求瞿秋白中央分派我一项具体工作，他们觉得我虽被开除了中央委员，但仍是党员，应受到公平的待遇。

就在同志们要求的压力之下，瞿秋白不得不来找我。他和我会见的时候，神色很尴尬，他绝口不提扩大会议以

及我被开除中央委员的事，但向我表示：中央的一切决议，是完全根据共产国际和它的代表的指示的。他说这句话的意思，等于是推卸他的责任，表示我的被处罚，是罗明那滋的主意。我对于这种解释，自然是一笑置之。他曾进而向我这样说明：现在的中央，也许领导能力不够，但它在“布尔什维克化”这一点上是有进步的。有些同志，认为现在中央不免左倾蛮干；可是他觉得左倾总比右倾好些。他认为我是反动政府所通缉的南昌暴动的要犯，不便要我担任实际工作，以免受到危险。因此，他希望我能根据过去的丰富经验，随时向中央提出建议。我曾回答瞿秋白：现在革命受到这么大的摧残，那么多的同志牺牲了生命，还有甚么个人的得失荣辱可言呢？总希望中央能够将工作做好，就是不幸中的大幸了。我愿多了解一些情况，随时提出意见，供中央参考。他虽表示赞成，但事实上他并不让我与闻党内事务，我偶尔提出一些意见，也被认为是机会主义的言论。

周恩来算是最幸运的。他回到上海以后，立即表示完全拥护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央；遵奉共产国际的指示，反对机会主义。同时，他在党内的地位也因南昌暴动而提高了。他逃避了南昌暴动失败的责任，而且由南昌暴动失败逃到上海来的许多同志，都需要由他去安排；因此，他在这次扩大会议中，不仅没有受到处罚，反而重新跻进了中央政治局做一位委员，主管军事和特务方面的工作。李立三则相形见拙，仍被搁置在那里，听候分派工作。

那位手腕圆通的周恩来，是最现实而又八面玲珑的。

也许他觉得我和他在武汉末期和南昌暴动中共任艰巨，竟获得如是不同的结果，有点过意不去。他请求我去指导关于分配从潮汕逃来上海的一般同志的工作。我在情不可却之下，答应帮他的忙。我到了一个秘密联络从潮汕来的同志的中心机关，才知道直接主持这个机关的是一位留俄学生何家兴。他的太太却是和朱德离了婚的贺芝华。她曾随朱德去过德国，当她从德国经莫斯科回到武汉的时候，邓演达、章伯钧等人，曾和我谈到关于她一些不可信任的故事。我因相信他们所说过的话，故向周恩来说："那个联络机构有点不妥当。因为贺芝华那个女人，也住在那里，是具有危险性的。"周恩来那时也许是受了"摆脱机会主义，大胆提拔新干部"这个观念的影响，并未接受我的建议。于是我在那里只工作过两个上午，以后也就不愿去了。这就是我在瞿秋白的中央之下，参加过的唯一工作。

我之所以不愿参加工作，因我认为瞿秋白中央的暴动政策，是错误而极有害的。我并不在原则上反对暴动，但我认为暴动是要有准备，不能轻举妄动；要有群众斗争做基础，而不是少数人的蛮干行动。在罗明那滋指导下的瞿秋白中央，却把暴动当作家常便饭，任何行为离开了暴动，就好像是机会主义。这样，所谓暴动政策就走到了"儿戏暴动"、"强迫暴动"、"命令暴动"的道路上。其效果不是打倒或者推翻反动政权，而是危害自己帮助敌人，如果说这种暴动是"自杀行为"，也不算是过份。

一九二七年的秋收暴动，是八七会议后瞿秋白中央的暴动政策第一次出笼；他以为这才是土地革命；较之仍具

有机会主义成份的南昌暴动，不可同日而语。当时，两湖粤赣等省，继农运风暴而来的是地主豪绅的疯狂报复。他们以恐怖手段向农民追缴欠租欠债，农民如稍有反抗，动辄遭受家破人亡的危险。在农协仍保有潜力的地方，农民们为了秋季收获不致扫数为地主豪绅们所勒索而去，在酝酿着反抗，中共两湖的地方组织也因此提出了秋收斗争的要求。中共中央则企图扩大这种秋收斗争，发展成为实现土地革命的秋收暴动。

在秋收暴动中，中共中央以为只有赤色恐怖才能对付白色恐怖，提出了杀尽地主和烧毁其房屋的“烧杀政策”。其实，这种并无实效的烧杀手段，除拖着中共走到恐怖主义的险境而外，只有促使地主豪绅们更加疯狂的向农民进攻。当时国民党政权已不再考虑农民的利益，一味怂恿地主豪绅迫害农民；这自然给予中共在农村中活动的机会。不通甫经大难的农民，在痛定思痛的时候，立即驱之进行大规模的暴动，当然不合时宜。而且各地农协潜力强弱不一，农民斗争情绪各地也不相同；就是局部的暴动，也非随处都可举行。中共中央执行这种错误的暴动政策，不仅失去了农运复苏的机会，而且使不少地区的农协潜力，又遭一次严重的打击。

瞿秋白在上海亭子间里所设想的暴动蓝图，也很可笑。他设想群众是革命的，所受压力愈大，革命的反抗力也愈强，只要有中共党员去英勇的发动，暴动就可如愿进行。他甚至抹杀敌人力量，抽象的设想到一个中共党员拿着一根火柴，偷偷的把地主的房屋点燃起来，乘势大叫杀尽地

主没收土地的口号，就会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响应，然后从四乡浩浩荡荡的去夺取县城；集许多县城，然后去夺取省会；再集许多省会而去夺取京城。由暴动成立苏维埃政权的壮举，就这样可以实现了。

为什么这样显明的盲动政策盛行一时呢？罗明那滋的意志是主要原因之一。他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却自以为有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大可以表演一些奇迹出来。而神经受着重大刺激的瞿秋白又以为过去一切都是机会主义的做法，现在要愈左愈好，多来几次暴动，既可以洗清他们过去的机会主义的污点，又可以树立新领导的威信。同时也有不少同志，因受到严重的压迫，满怀愤恨，急求复仇；这种心理也发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譬如和我在香港分手的贺昌，就曾明白表示，不满意我们在南昌暴动中不够激烈的做法，而他自己要痛痛快快干一番。

这种政策的为害，不问可知。当时的事实表明，有些中共地方组织，不顾本身实力，盲目遵行这种暴动政策，受到严重的打击。其他的一些地方组织因为领导人的才干，没有彻底执行这个政策，反能保全一部份实力。后来散布在各边远地区的苏维埃区域，就是以这些保留下来的实力为基础的。

毛泽东在湖南东部所领导的武装部队，就是秋收暴动中的一支主力。也由于毛泽东的老练，能根据本身的处境，来采取行动，保全了若干实力，因而后来能成为井冈山上的英雄。他所并凑起来的队伍，以农民武装为骨干，来不及与南昌暴动的主力相会合，乃向湘鄂边境的山区单独行

动。当这些队伍企图进攻平江、浏阳等县城，遭受到严重失败的时候，毛泽东曾被批评为专凭枪杆子的军事冒险主义者，也即是不肯发动群众的机会主义者。当他受着敌军的压迫，向井冈山退却的时候，又被批评为不顾群众的逃跑主义者。他也曾因此受到接二连三的处分。但他能掌握了这支约一千人的部队，建立井冈山基地，并费尽心机来应付中共中央的指摘，才没有成为盲动主义下的牺牲品。

中共中央的盲动作风，在上海也表现得淋漓尽致。瞿秋白等并没有计划以暴动夺取上海，但仍不惜采取一些冒险行动，以表现中共在上海的力量。上海的中共组织，经过四一二的打击，创巨痛深，需要有细密的组织工作，才能恢复元气。瞿秋白等却不耐心去做那些基本工作（如组织秘密工会小组巩固中共支部组织等），而且觉得中共过去几年来关于这一方面的努力，多半是机会主义的表现，不足重视，他们号召党员起来行动，要各工厂各地区的中共组织，做些极危险的工作；认为这样纵然牺牲了，也是有价值的——既可丧敌人之胆，又可壮大革命的声势。

中共中央经常命令几个或者十几个同志，在某家工厂上工或散工的时候，混在工人群中，突然喊几句："武装暴动！""打倒国民党！""拥护苏维埃！"等类的口号。这样，喊口号的同志们往往因此暴露了身份，被租界巡捕或其他的特务人员所逮捕，终于丧失了生命。其他如散发传单，写贴标语，强行开会等类的行动，也是在上海的同志们，所常被中央命令执行的，因之而遭受牺牲的不少。甚至担

任秘密交通的同志，也常被命令硬去闯过巡捕们的搜查站，以至蒙受不必要的牺牲。这些行动又养成同志们一种挺而走险的心理，他们似觉得保密措施是畏怯的表现，而足以夸耀的则是那些无意义的冒险行为。

瞿秋白中央认为过去负过重责的同志们，不免依然有机会主义的遗毒，因而命令他们去冒险；以事实来考验他们是否具备有布尔什维克的条件。这又发生了一个对待同志不公平的和分配不适当的问题。有些老干部就在这类冒险行动中牺牲了。另外一些新提拔起来的同志，则因滥竽充数的流弊，发生了工作效能低落和增加牺牲等的现象，甚至出卖党的事件也发生过。

许白昊同志就是因执行这类冒险行动，而丧失了生命的显明例子。他是一位受到尊重的工人出身的党员，在党内地位与项英、刘少奇等人齐名，担任过中共湖北区委委员、全国总工会委员、湖北全省总工会秘书长等重要职务。他和他的太太秦怡君于十月间由汉口来到上海，与我同住在那所高级招待所住宅内，瞿秋白拒绝了项英的分配许白昊一项重要领导工作的建议，迳行指派他去干下层的艰苦工作，借以洗涤他过去的机会主义作风。这位顶顶大名的许白昊，不久就在一次仅有十几个工人的街头集会中，和其他的几位同志一道被捕了。

许白昊被捕以后，瞿秋白立即派人通知我，许白昊是机会主义者，可能供出住所地址，要我们赶速迁避。我听了这些话，十分痛心。许的太太更是悲伤得不得了。我愤恨瞿秋白的盲动和他对许白昊的歧视；我也觉得也许就因

为许与我同住，而增加了瞿秋白对他的怀疑，以致有此悲惨的结果。我向来人悲愤的说：回去告诉瞿秋白吧！他无异是杀害许白昊的刽子手，不必要的将一个重要的同志白白的牺牲了，还要诬蔑他是机会主义者，真是岂有此理。我信任他决不会牵连同志们，我愿意仍住在这里，用不着他耽心！后来事实证明，许同志虽受到严刑拷问，充分表现了他的高贵品格，没有供出任何秘密，就壮烈的与世长辞了。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共所发动的广州暴动，使苏维埃旗帜在一个大城市中第一次出现；也是瞿秋白中央一个最重要的表演。当这个消息传到上海的时候，瞿秋白等兴高采烈，幻想着胜利就要来临了。我则向他们建议，这支暴动队伍很难在广州立足，应迅速开往海陆丰一带农运有过优良基础的区域去。我这种实事求是的建议，竟被视为故意浇冷水，是十足的“逃跑主义者”。李立三同样抱较乐观的见解，他向中央表示，在广州暴动的紧急关头，他愿立即接受中央的命令，担负一项实际工作。三天之后，广州暴动失败，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张太雷阵亡的噩耗接踵传来，李立三便奉派赶往主持广东区的工作。从此，这位小弟弟，染上了瞿秋白的作风，而青出于蓝的酿成后来有名的“立三路线”。

十二月二十日左右，张太雷的太太王一知同志带着她的一岁多的女孩，从广州逃回上海。她被安置在我的寓所，住在李立三以前住过的房间内。她的到来，使我们这些同住者，触目伤感。她本是活泼美丽的少妇，那时一变而成

为蓬首垢面的泪人儿了。她在旅途中，强抑哀思，谈笑自若，以免暴露身份；一到了我们这里，满腔的悲痛，便尽情的倾泄出来。我曾劝慰她：悲伤是无补于事的。张太雷还算是死得好的。他是广州暴动的英雄。也许我们不久也要死，死的情形或许还不如他。

王一知同志亲身参加这次暴动，知道其中原委。她曾详细向我叙述这件事的经过。现在我概括的追记于下：

十二月十一日清晨三时左右，广州市内的枪声响了。暴动的基干队伍，是原第四军的教导团，团长叶剑英同志。这一团里面，暗藏着的中共党员很多。他们首先制服了这一团里面的反动军官；再开始袭击第四军的炮兵团、警卫团和城内各机关；分别予以缴械和占领。但工人赤卫队参加暴动的并不多。因此，这支约二千人的暴动队伍，摆在诺大的广州市内，实在感觉到力量薄弱。广州的河南，依然为李福林部据守，连第四军在广州的一个留守处，都没有攻下。四郊的农民，也没有响应。

十一日中午，在广州市内举行群众大会；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实在不见得热闹，到会的人不多，多半是些共产党员和少数同情中共的工人，暴动对于广州市民说来，是突如其来的。一般人都不认为暴动会成功，因此，站得远远的。连各工会的工人都在那里观望，并没有什么总同盟罢工。机器工会，不待说是持反对的态度。这个大会，在那里冷冷落落的提出许多口号，如“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饭给工人吃！”“土地给农民耕！”“一切政权归工农兵苏维埃！”……等等之后；旋即提出成立广州苏维埃

政府，由苏兆征任主席，张太雷任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兼海陆军人民委员，周文雍为劳动人民委员，彭湃为土地人民委员，杨殷为肃反人民委员，何来为经济人民委员，陈郁司法人民委员，恽代英任秘书长，叶挺任总司令，张太雷任总指挥，徐光英任参谋长。这一幕之后，苏维埃政府算是成立了。张太雷一直在那里东奔西跑，忙着指挥军事行动，那里有工夫去安排政府的事情？苏兆征、叶挺等多数人，那时都不在广州。事实上，一切事都堆在张太雷身上。

张太雷从十一月中旬在上海出席中央扩大会议回到广州之后，就在那里计划暴动。有一个共产国际的代表德国人罗易门（Roemann）⑥经常和他密商。据张太雷告诉王一知，罗易门虽只是罗明那滋的助手，但比罗还要凶狠。张太雷认为他们两个都是荒唐鬼，远不及鲍罗庭那么老练。太雷也曾向王一知说起扩大会议对我处罚的事。太雷告诉她：处罚我的决议，虽然是以他的报告做根据，但实际是那两个荒唐鬼坚持要如此做的。太雷曾以慨叹的口吻向她表示，做领导工作，真不容易，稍一不慎，就要如张国焘一样受到处罚。她觉得太雷现在已经死了，她应代他向我表示，他对我并无成见。

南昌暴动的时候，张发奎率部返粤，因与驻守广州的李济琛部争夺地盘。南昌暴动失败以后，他们间的争执，日见激烈。十一月十七日，张发奎以护党名义，驱逐了李济琛、黄绍雄，随即发生战争⑦。张的军队都陆续调往东江西江北江一带前线去了，广州的防务，非常空虚，而且

留下驻防广州的部队，恰恰是教导团。因此，罗易门认为是绝好的暴动时机。十一月下旬，太雷和他们便忙着准备暴动，每天都在谈论如何准备暴动力量，规定暴动政纲与建立苏维埃政权等。

十二月上旬，正是张发奎李济琛两方军队在各个战线上打得激烈的时候，太雷他们就决定在十一日起事。一般同志，因工农势力曾遭受摧残，对暴动前途，不抱乐观；但也只得遵照命令行事。有些同志，主张不要死守广州；惟罗易门反对这种主张，他以为苏维埃政权，如能在广州存在十天，就有莫大的国际意义。王一知觉得牺牲几千个同志的生命，将广东几年来的工作基础，断送得干干净净，即使苏维埃存在了十天，又有什么意义呢？除了罗易门要将张太雷等中国同志的血肉去向共产国际邀功外，她简直找不到其他的解释。

十二月十一日暴动以后，不到三天工夫，张发奎的军队便调回广州外围，向暴动军进攻了。外国军舰也在珠江，掩护李福林部队过江攻打长堤一带⑧，机器工会领导一般反动工人，到处向我们袭击。我们陷于四面作战之中，不少同志主张向东江方面撤退，罗易门却命令在街头构建工事，进行巷战。张太雷就在十三日午间，在敌人前后夹攻中，中弹阵亡。这次暴动也就随即被打得七零八落而失败了。只有少数同志，带了一些零星部队，向郊外退却。广州便成了恐怖世界，文德路和西关一带，一片大火，到处都是枪声，街道上堆积着死尸。人民被误杀的也不知有多少；当她于十五日晚间偷搭省港夜渡离开广州的时候，

广州的秩序还是乱得很。在戒严状态下，到处搜捕共产党。

王一知叙述这些经过之后，表示她自己遭受这次的惨痛打击，业已万念俱灰。她痛惜张太雷不该只是愚诚的顺从命令；如果不完全听从罗易门的指示，按实际情形的需要，不在广州市内硬拚，何至失败如此之惨；她更愤恨瞿秋白的儿戏暴动，毫不珍视干部的安全。如今，他虽然恭维她是“女英雄”，这究不足以抚慰寡妇孤儿的悲哀。所以她不久便脱离了中共，隐居去了。

广州暴动失败得如此悲惨，曾使中共内部为之震动。虽然瞿秋白中央极力夸张广州暴动是布尔什维克的壮举；不少同志却认为这是机会主义的军事冒险，葬送了中共在广州工作多年的基础。后来斯大林也不得不说“广州暴动是退兵时的一战”。当时我除痛恨盲动主义的作祟外，还对广州暴动政纲中所列“杀尽一切地主豪绅”的口号，表示抗议。

广州暴动失败以后，瞿秋白等仍是一味盲动。他们低估中共在暴动政策下所受到的打击和失败在群众中所引起的懊丧和恐惧的心情；硬说中共是愈斗愈强的，群众的革命情绪是有增无已的，革命的浪潮是继续高涨的。他们整理暴动的资料，作些有利的片面解释和违反事实的宣传。他们坐在中央，只要看见某个地方中共还有一些组织的基础存在，就来一个暴动计划，命令执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所谓“两湖暴动计划”。此外，在上海本地，他们还是继续命令同志们进行一些毫无成功希望的冒险勾当；如有同志表示异议，就给他戴上一顶机会主义的帽子，予以惩罚。

这一切曾逼使我与瞿秋白中央处于完全对立的地位。

这段时间，我所耳闻目见的是瞿秋白中央无休止的盲动行为；深觉七年来艰苦缔造的中共，会因此被摧毁掉。机构被破获，同志被捕杀，以及这个地方或那个地方的工作受到打击等恶劣的消息，纷至沓来。我们心情十分痛苦。我的生活虽极不安定，老在逃避警探们的追捕；但我仍在设想这种或那种方法，来挽救中共的危机。

我被瞿秋白等目为反中央的首脑，我的住所也被视为是机会主义者的俱乐部。和我同住在这招待所里的，先后有李立三、许白昊夫妇、王一知，以及刘少奇夫妇等。刘少奇夫妇是在广州暴动前不久，从武汉辗转来到上海的，他们同样被视为武汉时期的机会主义者，大概就是因此才被安置与我同住。这段时期，到我们住所来访问的同志很多，如匿居在上海的林伯渠，他也是南京政府通缉的要犯，就常偕同太太和侄女等作我们的座上客。这些客人们在我们那里，常可以无拘束的议论党事，发发牢骚，也有过一些人讥讽瞿秋白的“反机会主义”、“盲动”、“乱发命令”、“任意惩罚”等等，与我的议论互相唱和。这一切自然为瞿秋白所厌恶。

十二月下旬，当广州暴动失败的惨痛情况完全判明以后，我曾向瞿秋白进言，要求他改变政策。我向他指出现在再不是继续暴动的时候，应该保全剩余的实力。中央应通令各地组织，不可任意暴动或做其他浪费同志生命的冒险行为。在农村中应着重秘密组织农民，准许农民武装，集结在偏远地区，休养生息，在城市中要注重保密工作，严

紧自己的组织，整理党的支部。在工人学生等群众中，注重组织秘密地下小组。只有留下这些资本，才可以再图大举，来一次成功的暴动。

我的主张与中央的现行政策固然大相迳庭，但瞿秋白也说不出充分的理由来加以否定。同时，中央的负责人中，如工人出身的项英也鉴于损失的惨痛，不愿一味盲动。因而瞿秋白曾要求我承认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接受八七会议和十一月扩大会议的决定，并在根本赞成暴动政策的条件之下，才可以提出一些补充性质的意见，并参加一部份实际工作。而这种苛刻的约束，又是我所不愿意接受的。因此，我们无法获得谅解。

一九二八年二月下旬，我又与瞿秋白有过一次摊牌性的谈话。瞿秋白向我坚决表示，无论各地同志牺牲如何重大，中央仍坚持暴动政策，反对所谓盲动的诬蔑。我则答以如果再不停止这种断送中共命脉的暴动政策，我将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来挽救目前的危机。瞿秋白听了我的话，就气忿的走了。我这种意图虽因种种因素没有实现，后来，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中，瞿秋白曾声称他虽然犯了错误，但没有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的意图；就是指我这段话而言的。我和瞿秋白之间，除了政策问题各有所见而外，当时我们处境危险，见面的机会愈来愈少，这就使我们更形隔阂了。

当时，我们共产主义者，稍有不慎，即有被捕的危险；如果被捕，也不一定要经过法律手续，就可被秘密处决的。杨虎陈群这两个刽子手，在上海就严格执行“对共产党宁

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的恐怖政策。上海一般市民，诚惶诚恐，怕染到一丝一毫红色的嫌疑。而我们的寓所，发生过许白昊突然不见，王一知哭哭啼啼而来等类事件，而且来往的人形形色色，都足以引起房东的诧异。

尤其是一九二八年的开头几天，刘少奇太太何葆贞自杀未遂事件，使我们这些同住者陷于窘境。在刘少奇王一知都没有结婚以前，他们原是好朋友。王一知这次在广州丧失了张太雷是悲痛愈恒的；她来到上海恰恰又与刘少奇夫妇朝夕相处，刘少奇在人情上自然要多方劝慰她，这就引起了何葆贞的妒意。何葆贞的心地不免窄隘，同时我们大家遭受不断的打击，前途茫茫，这也许增加了她的悲观情绪。她乘刘少奇不在身边的时候，竟闭门服毒自杀，为女工发现；刘少奇冒着极大危险，立即将她送往一个私立医院去救治。不几天，何葆贞安然出院又回到原住所了。这件事发生后，王一知立即迁走了，刘少奇也就避重就轻的向医院负责人及房东等承认是并不严重的妒忌事件，疏通他们不要向外宣泄；这样，才避免了警方的查问。

我早就认为中央对刘少奇这样重要的干部，闲置在招待所里是要不得的，现在何葆贞又有这样意外的举动，非从速迁居不可；因而我去找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要求他从速分派刘少奇夫妇的工作，并为我们布置新的秘密住所。李维汉对我态度一向还算友善，对我们的处境也甚关切。当我再度去找他具体解决这件事的时候（约在一月二十日左右将近旧历年关），我又遇着了另一个意外。

这是黄昏的时候，我正在李维汉的寓所和他及任中央

会计的龚饮冰同志说说笑笑。何叔衡突然跑进来，急促的告诉我们，几个钟头以前，他和几个同志在某工人区从事街头活动，一道被捕，解往捕房。唯有他被捕房认为是误捉的老学究，他也顺水推舟的和审讯他的包打听说了一些孔夫子的道理，旋即被释放出来，其他的同志，则被拘禁；因而他赶来报告，要求李维汉设法营救。我们听了他的报告，立即觉得何叔衡这样轻易被释放，显然是捕房故意放他出来做“吊线的”⑨；同时何叔衡也不能确实知道他的背后没有跟踪的人。于是李龚二人立即烧毁文件；不到五分钟，我们就分途离开那里。

我走出这条弄堂，跳上一辆人力车，指挥车夫转弯抹角的向前急奔。在街灯照耀之下，我发觉后面果然有一辆人力车在跟踪。我知道跟踪的线人，没有得到捕房的允许，是不能逮捕我的。如果我不能脱离他的视线，那就终有被捕被杀的危险。在闹市中，我跳下车子，混入人群，东钻西闪，企图脱梢。这样，我时而急走，时而乘车，玩了好几个钟头的迷藏戏。

到了夜晚十一时左右，我自信脱离了跟梢，但仍不敢回自己的寓所，以防万一。我乃到三洋泾桥的广泰来旅馆投宿。当我走进一间选定的房间，旅馆账房拿着旅客登记表要我填写的时候，我发觉他的身旁站着一个可疑的人，大致我仍是被跟踪着的，我只得泰然的填写登记表，交付房金，并脱下我的帽子和大衣，叫茶房弄水洗脸，表示满不在乎的神情，等到那个可疑者随着账房下楼去了，我便丢下大衣帽子，装着如厕的样子，循着另一楼梯，急步下来。

我通过旅馆门口柜台前时，那个可疑者正在柜台内面朝着墙打电话（电话机是安装在墙上的）。我乘着这个机会，溜出大门，穿过好几条小巷，闪坐上人力车，在夜深人静的街道上急驶，我仔细观察，这次确是摆脱了跟梢了。

我嘘了一口气，暗想：惭愧！暂时总算脱离危险了！我考虑仍以不回自己的寓所为妙，因为我不知道李维汉他们的遭遇如何，会不会牵涉到我的寓所，不无疑问。所以我决定到同志们很少知道的林祖涵家里去借宿（那时林本人已赴莫斯科去了）。午夜，我敲开了林家的门，为了避免林家邻居发生疑窦起见，托辞刚从南京来，因钱被扒手窃去了，特来打扰。那位从梦中惊醒的林太太，是一位大家闺秀，又饱经革命的磨练，她立即会意，留我在他家住宿，并忙着弄东西给我吃。

我悄悄的告诉她我今晚的遭遇，并托她那位侄女（少共团员）明天替我去打听消息。林太太祝贺我的脱险，并幽默的说：那个家伙，白白辛苦一晚，可以到手的奖金⑩，竟落了空！第二天下午，林小姐将一切情况打听清楚了，李维汉等都安然无恙，我的住所也没有问题，因而我在黄昏时，又悄悄的回到原住所去了。

我认为中共中央仍令何叔衡等从事街头活动，是十分愚蠢的事。我和李维汉等这次遭受到不必要的惊险，就是中央这种愚蠢办法所招致的。李维汉等逃出那所房子后，虽和我一样没有落入敌人的陷阱；据说也扮演了不少的惊险镜头，不得不将他的那所房子内的一切东西白白的丢掉，另外安排新的寓所。从此，我因不知他的新住址，无法再

行接触了。至于龚饮冰更是因这次的惊险，脱离了中共中央的工作，据说他在千方百计脱险后，逃到天津，从事他个人的商业去了。何叔衡也在这个时候，逃离上海。我曾以这个显明的事例为据，要求中央转而注意指导党员秘密活动，这才是危险性较小而收效更大的办法。

二月上旬，我们住的这个高级招待所，终于解散了。我的太太和我是在我由武汉赴南昌时分手的，她带着我们的孩子回她的家乡躲避"分共"的压迫。这时她将我们的孩子交给她的母亲抚养，只身来到上海，伴着我共渡这地下的惊险生涯，我们准备单独居住，并且已经物色妥了一个新的住所。刘少奇夫妇已被派往内地工作去了；从此，我也不知道这位共事多年的密友的行止。一别近十年，直到一九三七年，我们在延安重逢的时候，他已是中共白区秘密工作的巨星，也是我们老友中寥寥无几的人物之一了。至于他的太太何葆贞，自从那次分手以后，不久便被国民党杀害。许白昊的太太秦怡君仍和我们夫妇住了一个短时期，也被派到内地工作去了，后来她因所受刺激过甚中途离开了党。我们同住在那个招待所的同志们，就这样各奔东西了。

我们夫妇搬到北京路附近一个商业区的里弄房子里。这个区域很少政治人物的踪迹，距离中共的各机构也很远，比较安全。中共中央仅有一个交通员知道我的新住址，他也是我与中央间的唯一桥梁。项英是我的密友，常到我家里来。我们之间有一种"互助公约"，即是遇到有被捕危险之时，尽先互相通知互相援救。我们夫妇很喜爱这所新居，

准备就在那里安定住下来，做一名“亭子间的作家”。

不料我们在那个新居住了约三个星期，又因一项意外事件，不能不再度搬移。有一天下午二时，项英匆匆跑来告诉我，两个钟头以前，上海区委书记罗觉在他的秘密办公处被捕了。这个突然发生的意外，可能是我们内部有奸细告密，有波及整个中央机构的可能。我的住址虽只有一个交通知道，但他是新进同志，如果他被捕了，难保不泄露出来。项英恰在那时找好了一个没有任何人知道的新住址，他要我们夫妻暂时在他那里躲藏起来，等情况弄明白了再作计较。我们到达项英的新住址之后，他就出去打听消息。

当天晚间，项英回来又告诉我们，罗觉的被捕果然是由于奸细告密，而且牵连极广，据捕房的消息，今早有一个能说德语英语的漂亮女性，自动去找捕房政治部的负责人告密；她自谓她手中有三百五十多个共产党员的名单和地址，其中多数是参加南昌暴动的人物；只要捕房答应给她一张出国护照和五万元美金，让她到她所愿意去的国度，并替她保守秘密，她就可交出来。她愿意先报告出罗觉的地址，要捕房立即去逮捕，以证明她所说的话是真实的，此后，双方再履行条件，完成这桩买卖。捕房依照她的话行动，果然抓住了罗觉。

项英还说到捕房如有逮捕同志的行动，中央大致能在半小时之前获得消息，因而避免了不少的损害。但这次罗觉的被捕，事前毫无所知，现在中央已经查实了，那个告密的女人，便是贺芝华；正在设法将贺芝华手中的名单夺

回来，并消灭这个告密的“口”。我听了项英这个惊人的报告，曾慨叹的向他追述一段关于邓演达、章伯钧等在武汉时期怀疑贺芝华的忠诚，甚至企图将她当作张作霖的侦探来枪毙的往事。可惜周恩来没有接受我的忠告，仍然信用何家兴、贺芝华这对宝贝夫妻，以致酿成今天的大祸。

我和项英曾就这件事作竟夜的长谈。他说起许多连我也不完全清楚的事。他指出中央的秘密工作做得很坏，而且对保密工作也不够重视。现在机关庞大，数目又多，开会的次数频繁，占时又久，往往十几人聚在一起开上半天的会。文件增加了，传递的手续又非常烦复，那里像是地下工作，简直是官僚的排场。就像贺芝华这样一个不重要的职员，手头竟积有三百五十名以上的党员名单，这是过去从来没有的事。以往从陈独秀起这类重要的负责人，也不会知道这样多同志的姓名和住址。现在，不仅发现了贺芝华一人是奸细；许多新进的同志，多未经过考验，就参加机密，也是万分危险的。

项英认为中共的组织之所以没有遭受更重大的摧毁，主要是敌人工作效能不够；而周恩来所做的情报工作的成效，也是原因之一。他详述周恩来情报工作的内容。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清党以后，我们有些同志伪装反共，混进了陈果夫所主管的反共特务机构，其中有三个同志竟担任陈果夫机构中的秘书、科长等重要职务，李克农就是其中之一，因此，陈果夫逮捕同志的机密，大多事先为我们所获悉，但日子久了，陈果夫就由怀疑而开始肃清内奸；那些隐藏的同志只好溜之大吉。从此，我们在国民党特务

机构中的内线工作就失灵了。

周恩来自南昌失败后重返中央，继续主持情报工作；他主要是指导顾顺章的特务部，进行租界捕房的情报工作。顾顺章原系青帮的活跃分子，凭他的精干，建立了各种情报线索。捕房方面每逢有逮捕中共党员的行动，他用贿赂的方法，往往在行动的半小时或一小时之前就购得消息。这次罗觉的被捕，顾顺章事前不知算是情报工作最大一次失败。

项英觉得租界和国民党的特务，多将逮捕共产党的工作当作生财之道。这些人可能有这样一种想法：如果真卖力，将中共党员一古脑儿捉完了，无异是自毁财源。倒不如慢慢的抓，让它细水长流，才可以混得久，收入多。这班恶狗，在思想上本说不上甚么反共，就连国家观念也没有；他们受雇于外人或国民党，一切只为个人利益着想，似不会对中共施展出斩尽杀绝的手段。我们就在这种微妙的关系之下，能够生存下去。

项英对于这种情报工作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他指出顾顺章在这方面所花的钱是太多了；而且情报工作的组织日渐扩大，自成一个特殊系统。中共有限的经费，既大部分花在这方面，自然要减弱其他方面的工作。而这种情报工作究竟只是预防性的，组织工农群众的工作才是积极性的。如果减弱了积极性质的工作，就会使党变质，换句话说，中共将因此由群众性质的党，变为脱离群众专事冒险以图侥幸的党。其实严密组织，注重保密，使党员和党的组织隐藏在群众中，才是避免摧残的正当途径。情报工作只能

弥补这些工作的不足。

项英叙述了这些情况和他的看法之后，并向我建议从速另搬新居，不要让任何一个中央交通知道地址。他认为贺芝华手中的名单，如果夺不回来，我们都要陷于极度危险的境地。我觉得项英的话是正确的，我对中央的保密工作也失去了信心，我决定另觅较安全的住所。

第二天一早，项英出去活动了。我则仍留在他那里，等候消息。不久，项英回来很高兴的告诉我："何家兴和贺芝华已被解决了，今早顾顺章指挥几个行动人员，到他们的寓所去，他们尚在睡觉。行动人员掏出手枪，逼他们将名单交出。名单到手之后，就在门外的爆竹声中，将这两个叛徒枪毙了；行动人员也安然脱逃了。"项英认为名单既已夺回，叛徒又已枪毙（其实后来证明贺芝华只受重伤，经捕房送医院治愈，不过她没了名单已不能作祟，而返回四川乡下去了）。捕房大概不会有名单的副本，现在危险性自然较少；但也不能就断言不会再被牵连，所以仍主张我还是照原定计划搬家。

我迁居之后，便与中共中央断绝了直接的联系。我搬到垃圾桥附近一个旧式的弄堂里。房主人是一位多病的老太太，她的唯一的儿子在海船上工作，每每几个月不回来。我和我的太太以我养病为借口，住在她的楼上，彼此相处得十分和谐。没有一个中央交通知道我的地址，自然也没有信札或文件送到这里。同时，其他同志们也多搬家了，我也无法去与他们联络。这段时间，除项英以外，只有老友邓中夏后来知道我的地址，间或来看过我。

在这段时间，我与陈独秀先生的接触，是我们生活中一个重要的节目。他没有参加八七会议，由汉口潜返上海，渡着极度秘密的隐居生活，也没有受到甚么风波的牵连。在广州暴动失败以后，我们觉得有交换意见的必要，因而我被他的联络人引导到他的寓所去了。他住在老靶子路华洋交界的一个弄堂里，他之所以选择这里居住，大概就是由于这是个两不管的区域。

我们小别重逢，彼此心情都相当沉重。我曾对他的两个儿子的被杀害（曾任广东区委书记的陈延年和曾任北方区委书记的陈乔年在四一二清党后，先后在上海遇害），婉词表示悼唁。我们谈到许多同志们，尤其是李大钊、赵世炎等的不幸遭遇，不禁唏嘘良久。我们旋即避开追忆令人伤感的往事，转而检讨目前的政局。

隐居中的陈独秀先生，对于时局的演变是时刻关注着的，他谈到宁汉合流的经过；蒋介石的下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五日），特别委员会成立所引起的争执，讨伐唐生智战争的发生以及汪精卫等所发动的护党运动等等。这些国民党内部纷争的内幕，他都了如指掌。我们约定经常接触，检讨时局，大致每两个星期晤面一次。为了安全的理由，我必须一清早就到他那里去，在他那里消磨一个整天，直到黄昏的时候，才便于离去，以免进出为警探或他人所发现。在孤独生活中的陈先生，对于我的造访，看作一件大事，每次他都是预先准备一切。在我们以后若干次的谈话中，只有项英曾偶尔偷闲来参加过。由于我们这样经常接触，就被瞿秋白指为党内机会主义的反对派。

我们的谈话渐渐涉及党内问题。我们彼此间原有些芥蒂，这点我在前面都说过，我不满他在武汉末期采取消极的态度，他对此表示遗憾，但觉得即使他没有这个过失，也未必能使八七会议的决议有所改变。他误信我阻止南昌暴动是我个人的主意，并认为是不应该的。我告诉他我主张南昌暴动，但为了遵守纪律，根据共产国际的电令，不能不前往阻止的经过。他这才明白这件事的原委，确认十一月间中共扩大会议处罚我的决议是颠倒黑白的。由于彼此了解了这些往事的原原本本，我们间的隔阂就大致扫除了。

陈先生曾对最近（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蒋介石返回南京复任总司令职的事大发议论。他觉得南京政府并不因蒋介石的复职能有显著的改善，国民党内部各派及各军将领之争，仍将继续不已。这个政权与列强的关系，仍是有矛盾的。它仍只知搜括钱财，纵容流氓特务横行，残暴清乡，欺压农民，并不能改良民生，安定社会。他的结论是如果中共有领导群众斗争的正确策略，会有翻身的机会。

他之反对瞿秋白的暴动政策，与我是完全一致的。他认为这种儿戏暴动的行为，不合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也违反列宁关于暴动的遗训；而且事实上每次暴动都遭受严重的失败。他曾屡次向中央进言，改变暴动政策⑪，但无效果。现在，他极愿与我共同纠正瞿秋白中央的错误。

我则指出我们以往一切对中央的劝告，都被当作机会主义的见解，遭受拒绝了。我慎重建议为了有效的挽救中共，和抛弃以往纠纷以及开展以后的光辉前途，应另行组

织一个工农党；这个党仍以原有的同志为基础，扩大其政纲要点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土地革命，但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瞿秋白中央的一味盲动，是以共产国际的指示为护符的；罗明那滋等共产国际代表，不懂中国情况，任意胡闹，是祸害的根源。如果命名为"工农党"的新组织，不再是共产国际的支部，而只是国际主义下的友党，一切取决于党内多数，也许可以减少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进而由黑暗步向光明。

陈先生对我的建议大感兴趣，认为是合情合理的改变党内现状的要图；但他似在遭受这许多打击之后，已无足够的勇气来负担这个艰巨任务，因而他提出了实行起来会遭遇许多困难的话。首先是共产国际不会平心静气的考虑这个建议，反会予我们以无情的打击。同时西欧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不重视东方问题，自不会予我们以有力的支持。再就内部状况来说，即使多数同志同意我们的见解，经费问题也是难于解决的。

三月初，中共中央各机构因罗觉的被捕，陷于混乱的时候，陈先生向我表示：现在看来中央机构为了自身安全，正在重新布置，各地组织又大多损毁了；即使瞿秋白等仍高叫暴动，事实上已无力再盲动了。组织工农党的事可以暂时搁置一下，作为我们的最后步骤。现在或许有旁的办法来改变这个现状。这样，我曾向瞿秋白提过一次的另组工农党的事，就因陈先生的慎重，而作罢了。

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日军借口护侨，屠杀济南民众数千人并惨杀外交特派员蔡公时惨案发生，这又激起了全

国性的反日狂潮。瞿秋白等对此态度冷淡，认为中共的任务是实行暴动，反对南京的国民党政权。日军的行动似只是打击国民党的，如果中共卷入这个反日运动中去，无异是帮了蒋介石的忙。这种荒谬的看法，曾使我们为之大哗。我和陈先生主张应积极领导这个反日运动，既可暴露蒋介石对外的妥协面目，更可以争取群众，如果我们不参加这种反帝运动，简直是罪恶。在这个问题上，上海的多数同志，在项英的影响之下（罗觉被捕后，项英接任上海区委书记），支持我们的见解。

五月中旬，邓中夏来看我，告诉我现在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于六月间在莫斯科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检讨中央现行政策，并谋求党内团结。我和陈独秀、蔡和森、罗章龙和他自己共五人是由共产国际直接邀请出席，中央特要他来正式通知我。如果我决定去，现在就要办理旅行手续了。邓中夏那时也不满意瞿秋白中央的做法，不过不如我们的激烈，他也知道党内危机是很严重的，因此，他向我恳切的说到他不愿见党的分裂，劝我接受这个邀请。

接着，项英也来看我，告诉我党内的一些近况。他说到罗明那滋和鲁易门早已被调回莫斯科去了，据说曾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共产国际最近有指示给中共中央，不赞成随便暴动。我们的反对意见，也陆续由中央报告到共产国际去了。共产国际以鉴于党内危机严重，因而超越中共中央，直接邀请我们五人去出席大会。他认为中共的命运可能因此而获得转机，反对中央的直接行动，似已无必要了。

蔡和森、罗章龙这些同志，我已好久没见着了，也不知道他们的地址和近况；所以我只有去找陈先生商谈应否接受邀请的问题。陈先生主张我们四个人应前往参加，他自己则不愿出席。他预料第六次代表大会能改正瞿秋白这种显明的盲动错误，我们如果不去出席，只提出书面意见或表示不合作的态度，都是不妥当的。

我和项英曾先后劝陈先生一同应邀前往，我甚至说：如果不去，你与共产国际及中央间的关系的破裂，只是时间问题。他回答：八七会议的决议对他批评如此严厉，足证共产国际早有牺牲他的决心；他的处境不同，即使出席，也难有所挽回的。他表示绝不出席第六次大会，以往他常为中央刊物做些短篇文章，今后还可多做一些，再不愿参加中共的领导工作；不为自己辩护，也不出面批评别人。如果第六次大会成绩不错，他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将不持反对态度，以后如果要他到莫斯科当一个政治难民，他是可以考虑的。

这样，我便经由邓中夏通知中共中央，接受邀请，并由邓中夏为我办妥所有旅行的手续。邓中夏这个热心的老友，对我的接受邀请，深感欣奋；对陈先生的拒绝，则耿耿于怀。他曾要求我再去力劝陈先生，可惜我终无力改变陈先生的决心。而共产国际在六大以后，也再没有邀请陈先生游俄了。

我在上海八个月的地下生涯，至此告一结束，而再度驰赴遥远的赤都——莫斯科。

① 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同志书，全文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胡华主编，第一九一页至第二二三页——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第九版。

② 见“八七”会议告全党同志书。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这次扩大会议的政治纲纪整饬案是这样的：

（一）谭平山任国府农政部长，脱离党而自由行动，联络邓演达组织第三党，反对中共中央，未得中央许可，向汪精卫请假，与汪代表陈春圃谈话时攻击本党政策。党派其赴俄，不遵守命令而赴九江、南昌，宣传第三党，对于清算土豪及没收土地政策尤为反对，应予开除党籍。

（二）张国焘受中常会之委托，指导南昌暴动，可是至九江后，即不执行命令，甚至反对。南昌暴动后，主张联络张发奎，反对一切没收土地的政纲，由于他如此违反中央政策的结果，使全体同志受很大的影响，革命委员会亦随之动摇。其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均予除名。

（三）此次前敌委员会犯了重大错误，所有委员一律予以警告。徐光英任汕头公安局长时，压迫工人，滥行逮捕，而且杀害平民三人，予以一年监视的处分。南方局广东省委指导农民暴动的错误，在于不了解标语，不发动群众，只知道用军事行动，应全体予以警告。湖南省委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汉取消现任省委资格，彭公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之资格取消，并予以半年之监视。毛泽东在八七紧急会议之后，奉派至湖南改组党部及指导秋收暴动。事实上他就是湖南省党委的中心，所以湖南省党的错误，毛泽东应负重大责任，其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予以罢免。

（四）鄂北特别委员会违反中央命令，全体予以警告。陆沉时任特别委员会的书记，而其主张行动均出自军事投机的心理，根本不做农民运动的工作，应取消其中央委员的资格。

（五）鄂南行动委员会傅国志应予半年的监视。

（六）王若飞指导错误，应予警告。

（七）杨匏安取销中央监察委员的资格。

⑥ 这是我第一次从王一知口中听到罗易门的名。

⑦ 一九二七年九月，南京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执行中央执监委员会的职权，另有一部分中央委员则认为这是破坏党章，足以招致祸乱，提议迅速召开第二届第四次中央执监全体会议。那时李济琛任特别委员会广东政治分会主席，而张发奎率师返粤，以护党的名义，表示拥护召开第四次全会的主张；同时采取军事行动，首先将在广州及虎门一带之李济琛的军队包围缴械，再派军分驻肇庆、惠州一带，以阻李济琛的反攻，李被迫离粤。这就是所谓"护党战争"的经过的大略情形。

⑧ 关于外国军舰（美舰沙克拉明拖号及英舰莫丽翁号）掩护李福林部攻打长堤一事，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广州《南方日报》所发表的《广州公社史略》一文中，有较详的叙述，可以参阅。

⑨ 所谓吊线指捕房故意将嫌疑犯人释放出来，再派人暗中跟踪，以便捉拿其他有关的人犯。

⑩ 我和其他南昌暴动的首脑们，都被南京政府各悬五万元奖金缉捕。

⑪ 见陈独秀《告全党党员书》。

# 第十四篇

# 在莫斯科

# 第 一 章

#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

一九二八年五月下旬，我经大连、哈尔滨，偷渡过满洲里边界，进入苏俄境。在共产国际所设立的边境接待站里，我办理了必要的旅行手续。全程约两个星期，便从上海到达了莫斯科。从此，我在莫斯科逗留了两年半，直到一九三一年初，共产国际因为要纠正中共立三路线的错误，才派我回国。我在这里，仅追述我在莫斯科经历的几件大事。

我到达莫斯科后，没有在市内停留，便被带到莫斯科郊外的一所旧式的庄园。我记不清楚这个地方和庄园的名称，只记得离主要交通线相当远，是一个偏僻的乡村。共产国际选择了这里给中共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或系为便于保密之故。这所过去属于贵族地主的庄园，虽已陈旧，但还可以看出一些富丽堂皇的痕迹，附近还有一个国营农场，和一些零零落落的农舍，阡陌葱绿，呈现着莫斯科郊外的初夏景色。

大会场所设备很简陋，类似兵营。没有图书馆，没有娱乐设备，只设立了一间简单的医疗室，为我们检查身体。给我检查的那位医生说，我的体格很强健，这使我特别欣

慰。这几年来的艰苦生活，竟没有使我的身体受到折磨，不能不说是最大的幸事。苏方供应我们的伙食，质量特别好。这是对我们的优待，也意味着苏联在经济上经过新经济政策的恢复时期，已有相当大的进步了。

我到达较早，以后每天陆续有代表到来，瞿秋白中央的人员，也先后到达了。大会举行的日期，渐渐逼近，大家都在忙着准备。在大会举行前三五天的一个晚上，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率领共产国际中国部长米夫等和中山大学学生陈绍禹等，共十余人突然来到，布哈林要求举行一次预备会议，听取我们的意见。于是我们已经到达的约二十余位代表，便和布哈林他们共同聚集在一间小会议室内开始会谈。室内仅有一张长桌，四周摆了一列椅凳，我们大家挤在一块，有的坐着，有的只能靠墙站着。

布哈林首先说，请反对共产国际的人先发言。瞿秋白陈绍禹等人立即附和着布哈林说：那就请张国焘同志先发言吧！其他的人，也都表示赞成，并向我催促。北京代表王仲一赞成我发表批评中央政策的意见，但对任意加我以反共产国际的头衔一点，表示抗议。我于是站起来发表演说，包括翻译的时间在内，花了约三个钟头。布哈林没有再要求第二个人发言，预备会议就结束了。以后也没有再举行。

我这次演说的全文，自然无法全部记忆，但主要论点，我还是记得很清楚。我从反共产国际这一点说起，没有否认我对共产国际领导的不满。更进而表示：在我看来，中共领导的错误，不在于反共产国际，亦不在于违反共产国

际的指示，恰恰相反，是太过于倚赖共产国际。年轻的中共，它的领导者不待说是缺乏经验的。我们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认为是下级服从上级的应有义务，我们信仰共产国际，认为共产国际的老革命家比我们见多识广；每当我们的看法与共产国际的指示发生参差的时候，我们总以为自己不过是一些学生，对于自己的见解，不敢自信，而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必然深谋远虑。因此，也就牺牲自己的主张，来迁就共产国际的指示。甚至，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任何指示，也奉若神明，无不言听计从。这种情形，简直已经到了迷信共产国际的程度，这就是事态的真相。

接着我举例证明：一九二三年六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国民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这一指示，作出结论，认为一切工作应归国民党，全体中共党员，都应加入国民党为党员，并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工人阶级须先有民族觉悟，然后才有阶级觉悟；并且预言至少五年之内，中国不会产生真正的共产党。当时我和其他同志，不同意他的说法，而且希望中共能获得独立的发展。我因此便被视为反共产国际，并受到中共中央的严重处罚。可是，马林说了这些话，仅仅四年以后，共产国际另外一位代表罗明那滋，于一九二七年七月间向我们宣称，中共中央犯了极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主要是它放弃了争取整个革命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他的见解恰恰与马林的相反，似乎中共已经强大到这么一种程度，即是只要不犯机会主义的错误，中国革命就可以在中共领导之下获得胜利。我们又因在没有机会陈述自己意见的情况之下，被

判以反共产国际的罪名，受到谴责和处罚。这两种极端不同的看法，摆在我们面前，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我们不能发现其中的矛盾么？这些都是代表着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吗？

我进而追述国共合作时期的情况，我没有直指加入国民党政策的根本错误，但认为这是一无可取的。我曾指出中共和国民党在组织上混成一体，相互间的纠纷必然日甚一日。中共在国民党内卖气力、做苦工，且被视为不安份。中共并没有掌握军队，因此也说不上能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武汉反蒋时期，我们一直被国内外反动势力所围攻。中共居于劣势，只有退让，企图阻止反蒋联盟的分崩离析，稳定武汉的所谓左派政权。这其中最显明的事实是中共实力不够或者可以说，不自量力，任重道远的担子把雄心壮志的中共压垮了。

当我说到这里，布哈林打断我的话，说道：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你为甚么花许多时间，旧事重提？我停顿了一下，想了一想，心中觉得我既没有直接指斥加入国民党政策的根本错误，现在也不必直说共产国际的估计错误，因而接着表示八七会议的告党员书，就没有说到武汉时期敌我力量对比这一点。似乎中共中央机会主义的错误，曾导致革命失败，因而失败的责任也应由中共中央完全负担。难道这种批评是恰当的么？我继续表示我不否认中共中央在武汉时期犯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且是必须纠正的；但如果纠正不得其当，又会诱发另一种极端的左倾错误。

我继而检讨南昌暴动的问题，指出这是我们在武汉末期停止让步，转而积极反抗的严正表现。当时罗明那滋根据共产国际由布哈林同志具名的电令，要我亲自赶赴南昌，阻止暴动的举行，我为了遵守纪律，曾不折不扣的转达了共产国际的意旨。后来，南昌暴动因事实上无法停止，终于发动了。但南昌暴动失败后，瞿秋白中央竟抹煞事实，指斥我没有坚决领导南昌暴动，反假传圣旨，予以阻止。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接着我郑重质问：现在，我要请问布哈林同志，究竟有无拍发这个阻止南昌暴动的电令？还要请问当时在场的瞿秋白同志，为甚么在要我去南昌阻止之后，反而颠倒黑白，说我假传圣旨呢？

我又根据事实，批评瞿秋白中央儿戏暴动；把过去一切，不分青红皂白，都当作机会主义来掩饰种种可笑的行为，反自诩现在的中央是布尔什维克的暴动指挥部。因此，我讥笑瞿秋白中央，它何曾是暴动指挥部，只不过是不高明的“暴动编辑部”而已。

接着，我申述对中共中央政策的看法，指出在暴动条件尚未具备的情形之下，不能任意暴动，而应争取群众，扩大自己的实力。又由于现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更不应有轻率冒险行动，而应保全实力。可是，中央的方针恰恰相反，不注重团集革命势力，只图急功，不断暴动；即在广州暴动严重失败之后，仍认为革命潮流在继续高涨；制定两湖暴动计划，坚持继续不断的暴动，这简直等于自杀。

我认为争取群众的机会很多。并着重指出今年五月三日，济南惨案发生，激起了全国性的反日浪潮，瞿秋白中

央竟认为这种反日运动，会帮助国民党和蒋介石，因而采取消极态度。虽然我和上海的同志曾表示异议，要求中央领导反日的群众运动，但中央仍置之不理；这简直是放弃争取群众的机会。中央似认为实现土地革命的暴动，才是主要的工作；但对反日反帝国主义则不予重视。可是，我要问我们甚么时候取消了这个反帝的根本任务。在我看来，反日并不会帮助蒋介石，恰恰相反，不仅可以将群众团集，在中共反帝旗帜的周围，也可以打击压抑反帝运动的蒋介石。

我说到这里，布哈林皱皱眉，摇摇头，惊叹着说：原来是怎样的！你先从这里说起就好了。我接着表示，故事还多得很，我只能说个大概。工人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原是我们久已适用的原则；但瞿秋白中央却否定了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日常组织工作的重要性。在农运方面也是一样，只希望农民武装，攻城略地，夺取一省或数省的表面胜利，忽视农民的组织和各种程度的经济要求。至于中共本身则已沦为支离破碎之局，我们除了遭受敌人的肉体摧残外，又遭受中央错误政策的蹂躏。现在中央为了推行它的错误政策，实施强迫命令和惩罚手段，因而党内滋生一种离心的倾向；党内民主也已不存在了。

我陈述了这些意见之后，更坦率指出瞿秋白中央犯了严重的盲动主义错误；我虽屡次提出建议，企图纠正，但均为瞿秋白所拒绝；因而我曾十分愤慨，准备采取行动，反抗这种错误政策，直到共产国际直接邀请我来参加这次的大会，我才决定停止反抗，到这里来陈述自己的意见。

我也并不想算旧账，而是希望错误能获得纠正，并规划出今后所应采取的路线。我记得在这篇演说的末尾，我曾说："这就是我这个被指为反共产国际的人的真实意见。"

我这篇演说，虽没有预先拟好底稿，确是理直气壮一气呵成的。所有到会者，无论赞成与否，都认为是一篇中共反对派的代表作。布哈林最后也曾表示所获甚丰，认为再无征求反对意见的必要了。有一位曾在中国工作过的俄国同志，看了我这次演说的记录，向我表示：这是一篇奇佳的演说，刻划出中共的真相；但他指出，惟一的缺点是没有更明确的提出自己的积极主张，他希望我在大会的正式发言中，补充这一点。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于六月下旬正式举行。到会的代表共三十余人。莫斯科的中共留学生出席旁听的约有十余人。大会开幕以后，由布哈林向大会作主要报告，题目是"世界革命形势与中共的任务"。他在这篇冗长的报告中，花了很多时间答覆我所提出的意见。他的这篇报告，成为这次大会政治决议的基础。他的种种表现，给我和其他同志以深刻的印象，认为他有正直诚实的风度。

他说到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时，虽然避免提到共产国际政策上的错误，但也没有肯定表示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示是完全对的；也没有说到陈独秀时代中央的错误是由于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但却直率的说：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们，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这是铁一般的事实。他根据这种论断，对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这种关系深表遗憾。

他提到国共合作时期，尤其是武汉时期的种种事实时，认为革命的失败是由于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同时国际革命力量并不能给中国革命以有力的支援，这是因为中国革命达于高潮时，西欧的革命运动却正受到挫折的缘故。但中共中央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联合战线的任务，缺乏正确的了解；在紧急关头，不能打破敌人的包围，因而犯有机会主义的错误。

他提到南昌暴动一事时，大声地说，共产国际阻止南昌暴动的电报确有发出。但他没有进而批评这个举动是否正确，和为甚么发出这封阻止的电报。他继而宣称南昌暴动是反对中国国民党的军事行动，这一行动基本上是对的。他对于未能使南昌暴动与秋收暴动结合起来这一点，认为是最大的失算。

他严厉批评盲动主义的错误，要求这次大会予以纠正。但他毕竟不愿中共受到更大的震荡，多少采取和事老的态度，号召中共党员在共产国际正确路线之下团结起来。

他极力说明反帝国主义的重要。他认为日本有瓜分中国的野心，而且，太平洋将有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大战发生；因此，争取中国的独立，还是中国革命者主要的任务。由此出发，他认为中共将来还要与广泛的小资产阶级结成反帝联合战线。甚至认为将来中国革命政权可能由中共和谭平山这一类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平分职掌。他不主张过份强调反富农，他的这种主张，甚有先见之明，后来却被斯大林派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

继布哈林之后，是瞿秋白作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花

了很多时间谈国共合作时期的故事。他批评陈独秀虽然赞成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但放弃领导权的争取，甘心做国民党的尾巴。又指我一贯反对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不敢去和国民党争革命领导，同样是右倾机会主义。只有他自己自命能正确的遵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赞成加入国民党去积极争取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但他的论据，除了引证一些列宁的话以外，究竟不能指出若干显明的历史事实，来证明他的立场完全正确。而且他并没有着重表示如何改正盲动主义的错误和明确表示中共今后应取的方针，因此，他的报告曾引起多数代表的不满。

大会讨论这些报告将告结束时，瞿秋白提出了各组审查委员会的名单，负审查各种报告和提案，以及起草决议之责，再提交大会批准。由于许多代表不满意他所提出来的名单，认为各名单中没有适当的包括反对方面的同志，曾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大会否决了他所提出的名单。这件事使瞿秋白认为是大会对他的不信任，因而退出会场，向共产国际求援。结果，共产国际派来四位年老资深的委员，半用压力半用调解的方式，才将名单予以适当的修改通过。

代表们在主张上，大致有这么一种分野，瞿秋白和他的少数追随者，坚持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是正确的。王若飞、汪泽恺这两位与陈独秀关系较密切的人物，严格批评瞿秋白所作所为都是错误的。在这两种极端主张之中，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等，主张维持瞿秋白中央的领导，但须纠正错误，我和蔡和森、项英、罗章龙、王仲一等，主张瞿秋白应彻底改正错误，才能继续在中央工作。

这次大会，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之下举行，布哈林等人，并不经常来参加，但担任中国部长的米夫，率领着土地问题专家沃林等人，却是每次会议都在座。米夫甚至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在那里施用压力。他曾约我恳谈，开门见山的向我说，共产国际希望我和瞿秋白能化除成见，互相合作。我表示，只要瞿秋白能纠正错误，合作当无问题。他进而探询，是否这种合作带有勉强性质。我曾指着案上一个磁茶杯说：就像这个茶杯，被打成几片，虽然可以补起来，究竟不如没有补的那么自然，也希望以后再不会有人将它打碎。米夫回答说：共产党的组织，究竟不好比作一个茶杯，因为它是有机的东西，共产国际自信有力量领导中国同志，改正错误，并使他们团结合作，只要你答应，我就可以向共产国际报告我们中间已获得谅解。我觉得他的话涵有强制的气味，因而表示我尊重共产国际的裁处。他似向瞿秋白也同样表示过，也收到同样的效果。

米夫的横加干涉似是过份了，也把事情弄糟了。我与瞿秋白之间的意见虽极参差，但经过争论，各自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和取决于多数，也许事情的解决要自然些。米夫似乎有一种印象，觉得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以及共产国际或其代理人都错了，抑或这个或那个中共领导者错了，都不易弄得清楚，因而只有由共产国际来强制裁处。这样做的结果，显然会使争端的解决，不能达到水到渠成的顺利效果。各人都觉得受了委曲，而且会埋怨米夫的多事。因此，在大会期内，我和瞿秋白双方都觉得米夫锋芒太露，有操纵中共的野心。

陈绍禹、沈泽民等在大会中的举动，也不利于米夫。这些中大学生，被认为是米夫派，在大会里任翻译等工作；他们是后进同志，大多自命不凡。听了一些代表互相指摘的言论，不免对于原有领导人物，意存轻视。他们听了瞿秋白那种“半罐水”的马列理论，往往在那里暗中窃笑；觉得自己比他们的前辈懂得更多。对于有些代表，若干不能自圆其说的发言，他们又认为过于缺乏理论。他们表示既反对瞿秋白的盲动主义，也反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似乎今后党的重任要由他们来负担了。这一切的一切，都被认为米夫是在那里培养干部，来打击我们这些原有的领导人物。

向忠发在大会上的活动，也是令人侧目，这位在武汉时期任湖北全省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发，于一九二七年武汉分裂后，来到莫斯科，任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他被共产国际视为中国无产阶级的象征，他也一切听从米夫的摆布。因此，他的身价与时俱增，也学会了一些马列主义的口头禅。在这次大会中，米夫与陈绍禹等，便将他当作一张王牌，来批评我们的错误。他也当仁不让的以陈独秀的继任者自居，摆出一副比陈独秀还要严厉的家长面孔，往往在大会中高声责骂这个或那个同志，三句话便不离“这是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受人尊重的人，有点江湖气，与他共过事的李立三项英等，都知道他的底细，不免暗笑他的那种扮演。我们多数人总觉得他不能负起领导的重任，也讨厌他的“米夫味”，但因中共缺乏领导重心，而又没有其他适当的人来充当，只好暂时

容忍。

这次大会虽有许多不协调的因素，但毕竟在共产国际强力领导下进行，不能没有冠冕堂皇的交代。因此决议倒是洋洋大观，也曾被人据以宣称是一次最有成效的大会。但细按那些决议的内容，有些地方混淆不清，首尾不能相顾，甚至埋下了一些暗礁。

这次大会首先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任务。在国共合作破裂以后，中共的基本方针究竟应如何，实在是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大会根据布哈林的报告，规定"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乃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这一革命，具有两大任务："第一，驱逐帝国主义者，完成中国的真正统一；第二，彻底的平民式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①"大会认为："以上两项任务，虽然没有走出资产阶级生产方法的范围之外，但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广大工农两大革命动力，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用武装暴动的革命方法，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地主军阀和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建立苏维埃工农民主专政，开辟中国革命向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的前途进展。②"这个公式，后来就成为毛泽东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蓝本。

这次大会批判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并指出"中国现在并没有甚么革命高潮。因而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③"大会认为：在城市中，主要应进行工人群众的组织工作，和领导反帝运动，在农村中应利用尚保存着的苏维埃根据地和少数工农红军，依据革命情形的发展，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因而制定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的决议》

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穷苦农民的《农民土地决议》等等。

中国苏维埃——即工农民主独裁——这个概念，或者说这个公式，在这次大会的决议文中，最是含糊不清。例如，政治决议案中说："广州暴动开始了中国革命的第三时期——苏维埃时期。"同时又说广州暴动是"退兵时的一战"，这显然互相矛盾。布哈林在他向大会的演说中着重指出：日本在济南出兵，采用暴力侵略，中国有被瓜分或爆发太平洋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在将来剧烈的反帝国主义斗争中，中共有与谭平山这类小资产阶级平分政权的可能。这个与"工农民权独裁"，显然不同的"联合政府"的概念，既未列入决议，但也没有人批驳过。这个重要的论断被忽略了，是这次大会最大的失败，也是斯大林反布哈林右派的一个恶果。决议文中还进而武断地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走到帝国主义豪绅地主的反革命营垒，他以前是削弱并动摇军阀制度的动力(一九二七年春天以前)，现在却变成巩固并团结帝国主义与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这种说法非常荒谬，后来的抗日战争这个事实就把它完全否定了。至于当时托洛斯基主张中共不应搞苏维埃，应当要求召集国民会议，力争民主之说，更没有讨论过。因此大会决议并没有证明中共此后非走苏维埃道路不可，也没有详细说明它的发展前途。

苏维埃这个公式似是既成事实，南昌暴动失败，结束了国民党左派政权这个政治斗争目标，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又树起了苏维埃这面旗帜。而且，没有人愿意出面抹

煞这个既成事实，发动从新检讨的讨论，因此，讨论的重心就转到了“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发展前途。即是说，这次大会所最注意的是已有的农村苏维埃如何生存下去，能否和如何向前发展。

斯大林在回答中国农村苏维埃存在的意义时，曾说过一些有趣的话。在这次代表大会前，据说斯大林曾指出：在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的情势下，许多中共党员跑到偏僻的农村去，组织农村苏维埃和从事农民武装是有好处的，即是较易于保存一部份干部和一部份实力。不久斯大林又补充说，中国不统一，而交通又极不发达，苏维埃和红军可以在偏僻的地方生存下去；四川的刘存厚，帝制余孽，守旧的军阀，弄到形单势孤，还能凭藉少数兵力在四川绥定地区盘据了十几年直到现在，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从斯大林这些话看来，可以看出他对中国苏维埃运动之缺乏信心，简直是近于悲观程度了。他不敢提到孙中山曾据广东一隅反抗北京，甚至没有提到其他许多割据称雄的事例，却举刘存厚处在极偏僻地区的最反动割据以为例，实在耐人寻味。

“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这句口号似是万应灵药。因为这个新名词第一可以挡住“割地自雄”、“反动割据”和“分裂国土”这一类的指责，再则它可以随意解释，便于盲动主义者和斯大林的徒子徒孙们——米夫派——乘机走私，以图近功。这句口号，在这次大会中讨论得极多，瞿秋白曾利用这句口号，多方掩饰他的盲动主义，似乎不管革命形势是否高涨，只须利用国民党内部的混乱和军阀战争，就可

在乡村大搞苏维埃，并把这些散处各乡村苏维埃集合起来包围大城市，不就是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端么？米夫和他的门徒们表面虽不多说，心目中总以为中国土地革命涵藏着了不起的神秘力量，可以凭此找出中国革命的捷径。因此，后来特别强调巩固苏维埃区域，和积极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组成，也就是他们这种想法的具体表现。我对上述观念批评最多，一直坚持土地革命须与反帝相配合，如果没有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和城市工人的再起，就不能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这次大会的决议文虽将当时的苏维埃政权根据地和少数工农革命军，看作是农民斗争，也并不将他看作革命政权，还警告不可对它估价过高，因为它的力量还很小。但在另一方面，这决议文却判定："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新高潮之下，是革命先在一省或几个重要省区之内胜利。"根据这个假定又进而说到："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表会议的宣传口号，将要如何变成直接行动的口号。"这些论断便是后来整个苏维埃运动的理论根据。由于米夫瞿秋白等在草拟决议文时上下其手，这次大会没有扭转忽视反帝的倾向，特别漠视日本侵略的危险；更抹杀了国民党反日本侵略和作为民族派的积极效能；又夸大了土地改革的作用，错误地移植了苏维埃这个政权公式，因而先后酿成了中共内部许多纠纷。例如立三盲动路线，米夫、王明的苏维埃路线，毛泽东的游击主义和我自己对中共中央的反抗等等。

除以上说到的政策的漏洞外，大会另一个重要表演，

是促进了党的团结云云。但这只是表面的文章。我们一致通过了新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单；除陈独秀因未到会落选外，中央委员包括向忠发、瞿秋白、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蔡和森、项英、顾顺章、邓中夏、罗章龙、毛泽东、任弼时、卢福坦、陈潭秋、彭湃、蔡畅、王仲一等，尚有候补委员李维汉、罗登贤、王若飞、邓颖超、余飞等。

大会闭幕后，新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新的政治局：布哈林、米夫等人，认为这是一件大事，都亲身出席参加。当组织新政治局议案提出时，有一位委员首先表示："应淘汰原有的政治局委员，另行选举新人参加。"他的理由是："旧有委员都犯有严重错误，而且彼此不和洽。"布哈林起而回答说：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仍是党内最好的同志；除没有参加大会的人(按即指陈独秀)，只好置之不论外，其余的都有资格参加政治局。他并且极诚恳的表示：如果没有原有政治局委员参加，或者没有反对过去中央的人参加，都不能组成一个有力的政治局。米夫跟着不加说明的就提出了一张七人的名单，即：向忠发、瞿秋白、张国焘、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项英等七人。这个名单就在各个委员不愿引起新的辩论的情形下，无异议的通过了。

米夫接着表示：这个新政治局的委员提名，是共产国际经过慎重考虑而决定的。现在既已通过，共产国际表示非常欣慰，按照中共的成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提名，应由上届中央政治局提供出来。这次由共产国际直接提出，当然含有否定瞿秋白中央的意义在内。米夫看见进

行的情形颇为顺利，因而进一步提议说，共产国际认为最好由向忠发同志任书记，瞿秋白张国焘两同志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李立三同志任组织，蔡和森同志任宣传，周恩来同志任军事，项英同志任工运。米夫这个提议，也迅即获得一致通过。

这次大会闭幕以后，跟着就要举行共产国际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了。中共代表约有半数的人，仍留在莫斯科为出席共产国际六次大会的中共代表。向忠发、李立三、蔡和森等人则率领其余的代表，先行陆续返国，从事新中央的工作。中共党内的纷争，经过这次大会，总算是解决了。我这个被认为中共右倾反对派领袖的人物，从此，改称为少数派的领袖。共产国际这样做，是因为中共党内的争端已经是公开的事实，似只有笼笼统统的来一个少数派和多数派，却并不说明这两个名称有甚么内涵。

这次大会又为俄共党的斯大林派与布哈林派的纷争阴魂所笼罩。斯大林与布哈林中间的争执，那时还没有公开出来，我们原不知道底细。首先是陈绍禹等私下说到布哈林右倾，并不能代表斯大林、俄共和共产国际的意见。瞿秋白就利用这个消息，认为布哈林支持张国焘，是右派支持右派；并指斥布哈林过份批评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央，是他个人的私见，斯大林并不与他一同见解。

这种消息在大会中传播着，形成有利于瞿秋白的形势。有些代表觉得布哈林既被俄共指为右倾，他的报告又有与小资产阶级平分政权的主张，将来斯大林不赞成，中共不免要连带发生震动。米夫在这种空气中，不仅不否认这种

传说，而且表示他是站在斯大林一面的；并有意无意的否定布哈林平分政权和联络富农之说。这种气氛，减轻了布哈林发言的作用，也无异使瞿秋白获得意外的解脱。

李立三在这点上，更沉不着气，他曾向我表示：我们不要站在布哈林的一面，要站在斯大林的一面。他觉得共产国际现在主要是反对右倾，布哈林又是右倾的主要人物，因此，他的报告不能完全算数，今后中共的方针，与其右，不如左。他的一贯作风又是好大喜功，也爱遇事强迫命令一番，他感觉到斯大林的作风与他不谋而合，因而更有自信的干起来。这样，六次大会就不能完全克服盲动主义，后来竟酿成了著名的"立三路线"。

① 见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决议（全文载胡华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二二四页至二四六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 第 二 章

# 中山大学的风波

共产国际得到苏俄政府的协助，将训练各国共产党干部一事，当作是一项重要工作；特别重视训练中共干部。早在共产国际成立之初，莫斯科就设立了一个东方大学，训练亚洲各国和苏俄境内少数民族的学生。一九二一年东方大学设立了一个中国班，学生全是由中共选送的党员或团员。最早的学生为刘少奇、彭述之、罗觉、卜士奇、袁达时、任弼时、抱朴、廖划平等八人。此后，东方大学的中国学生续有增加，达六十余人。苏俄在支持国民党时代，又有为国民党训练干部之议。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苏俄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起见，在莫斯科另设一个中山大学，招收具有国民党籍（包括跨党的中共同志在内）的学生。该校于是年成立后，学生达一千余人，成为留俄学生会集之所。由于中国政治情况的变动，这间大学，也就成为中国问题的主要争论场所。

一九二八年夏季，我到莫斯科时，国共关系已完全破裂，共产国际和中共正在推行反国民党的政策；中山大学也因之从训练国民党员的学校，转化为训练中共干部的场所。原来这个学校的学生多是由国民党各级组织所保送

的，其中多数是纯国民党员，也有少数的跨党分子。那时，这些纯国民党员，除依附中共者外，有的被遣送回国，有的被送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剩下来的，再加上武汉分共以后，中共中央所陆续选送的几百名党员来就读，人数常在一千人左右。不过多数已是中共党员或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少数是同情中共的分子而已。除了中山大学而外，当时，莫斯科的步兵学校、炮兵学校、工兵学校等与列宁格勒的军政大学，都设有中国班，每班人数由二十余人至四五十人不等。冯玉祥曾送过三百多名下级军官来俄，就是就读于这些学校，直到一九二八年尚有一部分分散在这些军校。又列宁学院也有十几个中共学生，分别编在俄文或英文班上课。

中山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是拉狄克，系著名的托洛斯基派。米夫则任副校长，隐然以斯大林派自居，牵制拉狄克的活动。拉狄克曾将中山大学当作一个据点，与斯大林派展开争论。他的理论是：中国在历史上虽与欧洲各国一样，有过封建制度；但由于商业资本的发展和农民有时得着政治上的胜利，组织自己的政权，使它的历史发展，有其异于欧洲史的特点；尤其是自秦汉以后，土地就已可以自由买卖，再加上十九世纪以后的外国资本的侵入，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远离了历史上的封建制度，而是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从此出发，他反对斯大林所主张的工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四个阶级联合反封建之说。他认为中国革命，一开始就应反资产阶级，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发展①。这种理论，显然是托洛斯基在武汉时期主张中共建

立苏维埃的根据。斯大林曾亲到中山大学发表演说，强调中国革命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的性质，主张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共同进行反帝国主义反封建的革命②。这两种主张，成为中山大学的主要争论。

由于托洛斯基派与斯大林派的斗争，托洛斯基派受到严重打击的结果，拉狄克被免职；米夫于一九二七年春，继任中山大学校长。从此，中山大学便完全落在米夫掌握之中。米夫这位约三十多岁的俄共党员，在俄共党内，并非斯大林的嫡系干部，学识经验，都很平庸；但他却是一位颇有野心而长于斯大林策略之术的人物。他夤缘时会，由中山大学的校长，又一跃而兼任共产国际东方部下的中国部部长。到中共举行六次大会时，他似是共产国际唯一的中国问题权威。

米夫所以能左右中国问题，也是由于他的前辈都因中国革命失败而倒下去了之故。威金斯基自中国回国以后曾受到指责，俄共中央改派他担任合作社方面的工作，再也不谈中国问题了。鲍罗庭回国后，斯大林不予理睬，他曾向老布尔什维克会报告他在中国的经历；他的报告，被米夫等人批评得体无完肤。他那时闲居在莫斯科，意志非常消沉。罗明那滋和鲁易门，虽然仍是共产国际的要角，因在中国的胡闹行为而受到批评，至少表面上不敢过问中国的事。至于荷兰人马林，印度人鲁易，他们离开中国后，都不知到那里去了，我在莫斯科，也没有听到关于他们的消息。

米夫主持这个是非多端的中山大学，酿成了不少的风

波。中共六次大会开会的时候，向忠发陈绍禹等，逢人便说:“中山大学，问题大得很，里面有一个国民党的江浙同乡会的小组织，参加的达一百五十多人。”他们认为清除这些江浙同乡会分子，是一件重要的事。向忠发回国时，还郑重其事的要求我和瞿秋白重视这件事。

据向忠发看来，所谓江浙同乡会的内容大致如下：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时，中山大学曾发生清除国民党分子的斗争。在反陈独秀机会主义时，又发生反陈独秀派的斗争。这些国民党分子和陈独秀派，都曾与托派相结合。拉狄克的理论，成为他们的靠山。另外还有许多学生，不满意米夫和学校支部局的领导，经常在那里妨碍学校工作的进行。江浙同乡会，就是这些反党分子的结合。其所以命名为江浙同乡会，是因为这些分子多半是江苏与浙江人，曾系上海学生领袖的顾谷宜是这个小组织的主要领导者，蒋经国也是领导分子之一。那些领导分子每星期都要聚在一块，到莫斯科贫民区的一个小中国餐馆内，大吃一顿。表面看来，似是这些公子哥儿，为了要吃中国菜饭，荷包里有几个钱，就纵情享乐一番，实际上，他们却在那里进行反党阴谋，和华侨以及中国使馆有关系者勾结。

我们曾将这件事交由周恩来处理。周恩来调查的结果，觉得所谓江浙同乡会事实上并不存在。因此，这个小组织的案子，就不了了之。同时，“中大”著名的反米夫分子也先后转送到其他的学校去了。如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早已转送到列宁学院去；朱务善、左权、蒋经国等，则转送到列宁格勒的军政大学去了。虽然如此，中大内反

米夫的活动仍是继续不已。

中大学生不断批评学校当局领导的不当。的确，这间年轻的学校，一切因陋就简。米夫这班人，又缺乏办大学的经验。他们指责米夫不能改善学校状况，只知压抑自我批评，动辄给批评者戴上一顶帽子，不说他们反党，便说他们是国民党分子等等。这些不满米夫的分子，往往向共产国际及俄共监察委员会控告米夫。多数同学称陈绍禹等是“米夫的走狗”，只知当翻译，拿高薪，借着米夫的势力，专门做小报告，打击同学。

中大所发生的事情，迅即成为米夫与中共代表团之间的一项主要争执。共产国际六次代表大会以后，除我和瞿秋白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外，邓中夏、余飞代表中国工会为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王若飞代表中国农会为驻农民国际的代表。我们这五个人，合组为一个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团。这个代表团对于米夫在中大的措施，曾一致表示不满。在米夫看来，中大内部的事，应完全由任校长的他负责处理，中共代表团不应干涉。而中共代表团看来，中山大学学校当局，只应负教育方面的责任，关于学生的思想能力方面的甄别，和那些学生应派回国担任何项工作等事项，则应由代表团考查处理。

中大是由多头管理的。从教育的体制方面说来，它属于苏联政府教育部所管辖。从党的系统上说来，中大党员支部局，则属于俄共莫斯科市党委会下的一个区委所管辖。又因它是为中共所办的大学，所以又要受共产国际中国部的指导。同时，学生多数是中共党员而不是俄共党员，中

共驻莫斯科的代表团，要去过问中大的事，共产国际与米夫都不能加以拒绝。

我和瞿秋白、王若飞都不愿多过问中大的事，也很少到中大去，以免卷入是非漩涡。邓中夏与余飞两人却经常到中大去，在那里进行考察。因此，邓中夏与余飞曾与中大当局发生过许多次的争执。主要的争执之点，是关于学生的甄别问题。如工人出身的李剑如、余笃三等，领导过大部分学生，反对中大支部局的措施；在邓中夏余飞看来，他们都是好同志，而学校当局，则认为他们是反党分子。在学校的壁报上，常有批评中共领导的文章，在邓中夏余飞看来，是破坏中共领导威信的不应有的举动，而学校当局则认为这是正当的自我批评。学生们也往往将我们代表团不满学校当局的话传播出去，发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事都使米夫大伤脑筋。

九月间，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枯西宁似曾听到一些消息，和我谈到关于中共和中大的一般问题。我向他表示：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和中大校长由米夫一人兼任，并不是件好事。因为负责指导中共任务的人，最好不多参预中共内部的纠纷。而中大校长这一职务，却不能避免这一点。因此有不少中国同志，认为米夫越权干涉中共的事。他听了我的话问道：你以为甚么人来担任中国部的职责最好？我答：我简直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约在那个时候，瞿秋白向枯西宁提出撤换米夫的建议。他事先没有和我谈及，也不知道我已和枯西宁交换过意见。枯西宁问他谁可继任中国部长，瞿秋白推举鲍罗庭。这些

事后来都给米夫知道了。他左右的人常讥笑瞿秋白与鲍罗庭的关系，认为他推荐鲍罗庭，根本违反共产国际路线。同时，我们两人不满意米夫的控诉，曾大大加深米夫与中共代表团的隔阂。

米夫等虽对我不快意，但也觉得我在中国学生中有较大的影响力。当时各校的中国学生，颇有不安于学习的心理，常要求改良学习状况，或要求派遣回国工作。米夫等有时只好请我去向学生解释，我认为使学生安心学习是一件应做的事，因此，也乐于接受这种邀请。我常常在晚间被送到郊外的军事学校，向中国学生们演说，我没有机会详问学生们的情况，只是鼓励他们安心学习。

例如当时米夫曾集中中大大部分的女学生，办了一个看护训练班，而且安排在一间陆军医院中实习。这个班，几乎不能再维持下去了；因为她们都不愿继续学习，请求回国工作。当我到达这个训练班和她们四十几个学生举行会谈时，她们纷纷向我诉苦，大意是：没有教材，没有教员，也没有翻译，根本不能学习，每天只是和女工一样，做些替病人洗伤口、倒痰盂等工作。我知道这些女生中，有些是出自于国民党要人的家庭，或者在国内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我曾讥笑她们为小姐脾气，并多方说明看护工作的重要，希望她们继续的艰苦学习下去。我这篇谈话，居然使她们安静下来了。最后她们一致表示，撤回她们的请求，继续努力学习。这件事，曾使俄国人认为是奇迹；只有中共的领导者可以做到，他们是万万做不到的。

因此，中共代表团为留俄学生的事和米夫之间，形成

一种微妙的关系。米夫从权力观念出发，绝不愿任何中共的代表去干预学生的事；但问题弄到不能解决的时候，中共代表出来说话，似对他有极大的帮助。可是他始终没有调整这种关系的意思。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间，俄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因接到学生们好些控诉，组织一个审查委员会，审查中大的纠纷。在一间小会议室内，出席审查的有四五位俄共年长的中央监察委员；参加作证的为米夫，中大支部局书记柏耶金和我三人(瞿秋白那时到南俄休假去了)。审查委员会主席曾拿出一大堆文件，声言这些都是学生们先后控告学校当局的资料，并表示开会的目的，是要寻找出一个处理的方针。

柏耶金首先起而为学校当局辩护，发表一篇关于中大经历的报告。他大致认为学生成份复杂，中共又发生许多错误，乃为学校工作不易进行的主要原因。他说明学生和大多数知识分子，其中不少曾参加国民党，到国共分裂后才转到中共来的。学生们受过托派、陈独秀主义、盲动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学校当局与上述种种非布尔什维克思想作斗争是正确的。从前应当这样做，以后还是应当这样做。这是一种阶级斗争，即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斗争。既然是阶级斗争，那就是残酷的和长期的。也可以说明为甚么中大虽然调去了许多捣乱的学生，现在还有许多学生不满学校领导的原因。因此，除继续进行阶级斗争以外，实别无他法。米夫继柏耶金之后作简单的发言，表示完全支持柏耶金的说法。

我随即表示反对意见。我曾先批评所谓阶级斗争的说

法，认为如果将阶级斗争广泛的在中大校内运用，就抹煞了教育的作用。共产国际的决议曾指明，即使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具有急进的革命思想，应当予以争取。难道在莫斯科这个赤都，就不能用教育的方法去争取他们吗？如果根本将他们看作异己分子，那就非清除大部分的学生不可，这岂不是教育的失败吗？

我接着又说明事态的真象。我表示：学校内可能仍有少数异己分子，但最大多数都是不满学校当局的措施的。我举出下列一些理由：第一、学校创设不久，设备不够完善。学校图书很少，懂俄文的学生更少，翻译人才又更少，受学生敬仰的教授也不多，因而很难满足学生的学习要求。第二、学校党的组织由俄国同志负书记的责任，语言不通，难于了解中国同志们的意见。支部局所信任的学生同志，多半是能说俄文的，或者是能表示拥护共产国际和俄共的政治路线的。但在一般学生们看来，就有不同的观感，他们观察同学主要是以在中国境内的艰苦工作中曾否有过表现为标准。他们常常这样说：某人只会说几句漂亮话，得到支部局的信任，在国内却从没有过工作表现；某人在国内曾出生入死做过许多令人敬佩的工作，现在却因稍有不满学校的表示，被学校当局认为是反党分子。第三、中国学生的一些不良习惯，是与中国的落后现状有关。如不爱清洁，不守公共秩序，不爱惜食物用品，爱闹小脾气，和对工人职员的态度不好等等。这些毛病是可以用耐心的教育方法来纠正的。第四、支部局似未注意到这些中国学生和学校的真实状况，据此以实施领导和教育；却笼统的偏

重斗争，因而与学生们不能互相谅解。

那几位监察委员，对我这篇议论，曾喜形于色的表示赞许。他们根据所看到的材料，提出质询，表示与我有同样的看法。这使米夫与柏耶金面红耳赤，不快之极。这次会议，并没有作出结论，即由主席宣告下次再举行而散会了。

两个星期以后，俄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召集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米夫未到，却由柏耶金领着另一支部局委员秦邦宪来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后，即由秦邦宪起立用俄文发言。他的那篇冗长的俄文演说，是预先准备好的，说得相当流利熟练。他反击中共代表团对于中大事务的干预，特别指摘我个人。因为翻译的蹩脚，我并不能知道他说话的全部内容。但我所懂得的，是他在那里痛骂我为机会主义者，并坚持中大内部是阶级斗争之说。在他看来，我的机会主义妨碍了中大应有的正当斗争的发展。他这篇讲话，曾使一些监察委员为之摇头。

我听了他那番话，简直气极了。我声言现在是讨论中大的领导应采何种方针，而不是清算中共代表团或我个人，秦邦宪不仅转移了目标，而其所言又多系无根据的诽谤。这件事，是俄共党内一些权力主义者的恶劣作风的标准例子。米夫与柏耶金因为上次会议曾受到我的批评，似对他们的权位颇有影响，因此，他们放弃正面的答辩，却找出中国学生秦邦宪来攻击我。参加会议的几个监察委员，似以为会议这样发展下去，是不可以的，所以提早宣告停会。后来监察委员会再也没有找当事人参加，曾作成一个

决议，批评中大领导方面的错误。监察委员会决议虽然拘束力较小，但对米夫来说，无异是重重的打了一记耳光。就因为这件事，我与米夫的关系，从此更加恶化了。

米夫与中共代表团之间，为中大问题既然发生很大的隔阂，但彼此为中大学生的处理问题，仍须在一块儿商量解决。有一次，在共产国际中国部米夫的办公室内，他邀约我们这些中共代表和他一道开会，他提出一张十几个学生的名单，准备将他们送到西伯利亚的偏僻地点去作苦工，我立即起而表示抗议，认为将这些所谓不可靠的学生送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究竟不是一个好办法。试想，将来许多留俄学生都在苏俄境内不知下落，他们国内的亲友将发生一些甚么样的感想？为甚么不将他们送回中国去，让他们在中国去表现。如果他们忠实于中国革命，自然很好；即使他们反动叛变了，在中国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增加几个反动分子，也不见得就是中共的致命伤。

米夫对于我的发言，似颇不快，但未表示意见。但后来米夫便再也不提出这类问题和我们商讨了。也许是共产国际的首脑们，为了不愿让苏俄多树敌，支持了我的主张之故，大部分的学生，后来都陆续被送回国；放逐到西伯利亚去的事件，相应减少。米夫这种将学生放逐到西伯利亚做苦工的政策，曾引起中国学生某种程度的恐怖感。于右任的女婿屈武，当时在一个军事学校就读；他几乎被这种斗争的空气吓得要发神经病。他从学校中逃出来，坐上西伯利亚的火车，企图私自回国，他走到中途，被当作逃兵拉回来了。按照当时的苏俄军纪，是要枪毙的。中共

代表团曾向莫斯科的军事机构，表示屈武的逃亡，是出于对斗争的恐怖，希望从轻处理。后来，屈武曾被监禁多年，到抗战时才被释回国，现在居然成为中共政府的一位要员。

米夫对中大虽然采取高压政策，有的学生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去；有的学生被遣送回国；有的学生送到工厂去做工；但大部分留在学校内学生，仍然反对学校当局和支部局的领导，斗争没有一天停止过。真正支持米夫的学生，只有陈绍禹等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③。其余一千多名学生，都是站在反对派方面。中共代表团内，对中共各项问题，意见并不相同，可是对米夫和中大，始终行动一致；这也许是米夫太过可恶了。一九二九年夏季，中大举行学年总结大会时，又爆发了代表团与米夫之间的一次大斗争。

这次学生大会，瞿秋白曾应邀参加发表演说，在多数学生反支部局领导的热烈气氛中，瞿秋白的演说，对支部局的领导也颇有批评。这次大会，僵持了三天，不能解决。瞿秋白有点着急了；他邀请代表团的人员举行会议，要求代表团对中大事件采取一致态度；并请我也到学生大会中发表同一论调的演说。我同意他和其他代表的主张，经过中大学生的邀请，我便出席去演说。

我这次演说，着重指斥支部局的领导，没有尊重中共六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因此，他们反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斗争，没有顾到党内团结的需要。支部局方面没有与中共代表团取得必要的协调，大多数学生，向代表团陈述他们对学校不满的意见，不能认为不正当，支部局应采取团结最大多数同学的方针，不应压抑自我批评，造成党员中

的分裂现象。我的演说，除了“二十八宿”以外，一致鼓掌拥护。大会的空气因而愈见激昂了。他们要求改组支部局，并通过一个决议，批评支部局过去工作方针的不对。

这次学生大会，曾使米夫与柏耶金等，大伤脑筋，共产国际的首脑们，那时似认为代表团与米夫两方面各有是非，因此，也就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米夫与柏耶金究竟颇有手腕，他们千方百计将俄共莫斯科市委下的区委会书记请出来了。那位区委书记参加大会的事是非常突然的。他是俄共一个土包子干部，不懂外国共党情况。从他的发言中，也表现出一种俄共的自大作风和权力观念。

他一开始就表示中共代表团干预中大的事，是侵犯了他的职权。他高声指斥中共过去犯过的错误；认为俄共帮助中共布尔什维克化，来训练中国的青年，不能依照中共代表团的意旨行事。中共代表团出席学生大会演说，根本就是不应该的。他支持支部局的方针，认为大多数学生的不满是反党行为，他径直指出我的名字，说我被共产国际判定为右倾调和派，我的发言，根本就不应当受到学生的信任。他的演说，曾使多数学生为之大哗。

我面对这种挑战，非常愤慨；立即登台答辩，我说明我实未被共产国际判定为右倾调和派，区委书记竟将这个名词任意的加在我的头上。我们代表团对中大事件的一致主张，是不应当被抹煞的，我也指斥那位区委书记是个十足的官僚，平时不知道如何领导中大这么一间大学的党的工作，等到问题发生了，又不尊重中共代表团的意见，一味的压抑自我批评。这样一来，使这次大会更为之大僵特

僵，随即宣告散会了。

瞿秋白看到这样的发展不妙，有点着慌；于是他去找那位区委书记，陈述中大事件的一般经过，并指明俄共的一个区委书记，不宜与中共代表团站在对立的地位。那位区委书记似也觉得他的话说得太冒失了，因此与瞿秋白成立了协议，向学生大会发表一个中共代表团与俄共区委会的共同声明，用意无非表示是因言语不通，引起了一些误会；其实彼此都关心中大的正常发展，并无任何冲突云云。这次大会，于是由瞿秋白宣读共同声明，并通过一个敷衍性质的决议，一场风波，才告一段落。

我曾向共产国际秘书长柏金斯基，简单报告那位区委书记的发言，指出他对我任意诬蔑，表示抗议。他向我耸耸肩，摇摇头，不置可否。我对秋白态度软弱的处理方式，虽感不满；但我也知道那种权力主义与官僚主义，并非中共代表团的力量所能克服的。同时，我那时准备到乌克兰去休假，因而我也只好勉强赞成，瞿秋白与那区委书记发表共同声明暂时平息风波的方针，不过我曾向秋白等声明不愿再过问中大的事。

我在莫斯科住了一年，大部时间都用在阅读方面。莫斯科的中文出版物，主要是中大的教材，我都全部阅读过，我每月领取二百五十个卢布，这个数目是当时苏俄机关的最高薪额。我的太太也于一九二八年底到了莫斯科。她在中大的特别班受训。我们夫妇的用度很省俭；那时莫斯科物资缺乏，有钱也买不到东西。有足足三个月，我们每顿饭的菜色都只是鱼类。由于每顿吃鱼，使我见着鱼就讨

厌。因此，我将剩余的钱，都用来买书。莫斯科所能买到的英文政治性书刊，我大体都买着了。我虽然不会说俄语，有些俄文书刊，也一知半解的可以看得懂；所以俄文书刊也买得不少。我在一九二九年暑假中，即拟到列宁学院旁听，以期加深学习，并避免参预共产国际的会议与斗争。

我没有将我要到列宁学院旁听的事，通知共产国际的任何人，便直接找列宁学院院长季诺桑诺娃。她是俄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耶诺史诺夫斯基的太太，也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看来是和蔼慈祥的中年妇人。我向她要求准我参加该学院的英文班，和其他学生一样的经常上课；但我说明我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之一，不拟参加该学院支部局的工作。她欣然接受了我的要求。当时列宁学院的正式学生，不仅要参加学习课程，还要编入学院支部局，接受党的训练。因此，我只能算是旁听生或者说是半个学生。

我仍住在鲁克斯旅馆，这是共产国际人员的宿舍。我在列宁学院与董必武是同班同学，在图书馆的席位也是毗邻，我们都在那里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我那时已不再向共产国际支领薪金，每天都在列宁学院食堂中吃饭，和其他学生一样，每月领二十个卢布的零用费。可是我在鲁克斯的房间，每月要付四十多个卢布的租金，我自然付不出这笔费用；曾向该旅馆的管理人说明我不能付房金的原委，他也未置可否，等到我三个月没有付房金时，他居然向莫斯科地方法院控告我拖欠房租，他的这种做法，不知是有意撵我，抑根本只是官样文章。

我致函柏金斯基，简单说明我的近况，并将法院的传

票附送给他。柏金斯基审查的结果，才知道我早已自动没有在共产国际领取薪金，和我在列宁学院就读的经过。他赞许我这种做法，认为一面不放弃中共代表的职务，一面在列宁学院学习，处理得很得体。因此，他召集共产国际秘书处的会议，通过一个决议，认为我有住在鲁克斯旅馆的权利，特许免缴房租。这样，地方法院这一案子就被撤销了；而我就读列宁学院的事，也无形中得到了共产国际的默认。

列宁学院是共产国际所直接指导的一个高级党校。当时学生约三百人，都是各国共产党所选派来的。其中中国学生有十余人。我所参加的英文班，学生共十余人，包括英、美、澳、纽、日、韩与中国等国籍的学生。课程有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俄共党史，列宁主义，党的建设与军事学等。学习的方法，主要是由学生按照学习计划，自行阅读。每星期上课时间不过十小时左右，上课时由学生提出学习报告，教授略加指导而已。

列宁学院与中山大学比较起来，情况完全两样：列宁学院当局与一般学生的关系，都很正常。支部局的会议和党员大会经常没有甚么重大争论，会议的次数与所占的时间也比较少。学生们多在图书馆中埋头读书，学校的领导人与学生，不管在学习方面与生活方面，都能打成一片，绝没有中大那种扰攘纷争的情形。

一九二九年底，斯大林为了巩固他的领导，发动了震动全苏俄的大清党，中大掀起了很大的风波，也打破了列宁学院的平静状态。俄共这次清党是反托派，反布哈林右

派，清算工党，实行农业集体化和强调消灭富农政策等等之后所举行的。那次清党运动，有点像瘟疫一样，任何人都有被传染的危险；即使平日自信是斯大林嫡系党员，到了这时，也不免要发生危惧。按照共产国际和俄共的规章，共产国际委员和俄共中央委员，不受清党影响。理由是这些委员在当选时，等于经过了严格的选择。根据这一点，我这个中共中央委员，又是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候补委员，当然在清党中无须有所顾虑。

列宁学院的清党，是由共产国际指定一个清党委员会所主持的。清党大会首先清算校长季诺桑诺娃。她在大众之前，叙述她的整个政治经历，尤其不曾隐瞒她政治上所曾有过的错误，在她一个多钟头的发言中，还说到她年轻时候的私生活，这使许多外国共产党员，感觉非常新奇。接着，又清算学校其他负责人和支部局的委员，依次再清算学校职员和一般学生。如果某一个被清算的人报告的言词中有含糊之处，或被人认为有疑问时，就要遭受到严格的质询。有一位波兰学生，系军人出身，参加过反苏战争，因为在他的经历报告中，没有提起这一点，被人揭发出来，当场就被特务捉去了。中国学生有一个姓马的，因为被认为参加托派的活动，也在清党中失踪了。这次清党大会，日夜连续举行，学生的学习课程，几乎完全停顿了。这样经过近两个月的时间，清算了少数的几个人，才算告一结束。

中大的清党，特别显得紧张。清党委员会是由共产国际指定三个委员所主持。主席是柏津，一位军人；另两位委员是共产国际的某监察委员和任过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

的威金斯基。这三位委员倒还算是老成持重的正直的人物，遇事不愿多所挑剔。但支部局的委员们，却和一群猎狗一样逞凶。他们会同特务机关人员，多方搜寻学生反党的罪证。有一位姓李的学生，在清党中被官方宣布自杀，宣布的事实是说这位李某，是一个托派秘密组织分子，曾供出一百多个参加托派组织的秘密名单，因良心不安，遂自杀。但实情究竟如何，没有人知道，一般学生在惊慌万状中，谁也不敢去追问这件事情。以这一事为例，中大的清党，完全是在一种恐怖现象下进行的。

我和瞿秋白认为无法干预中大的清党事件，因而从不加以过问。王若飞那时也在列宁学院就读，他自己便有托派的嫌疑，更无法表示意见。只有邓中夏和余飞，曾企图以代表团对于学生的鉴别去影响中大的清党，但被拒绝了。而且中大的所谓“二十八宿”在清党之初，他们本身很轻易的便通过了清党的考验，因而他们可以毫无顾忌的指摘其他学生们的错误。

在中大清党正热烈进行的时候，柏金斯基等曾找我去谈话。他向我说：“中大清党牵涉到你了。你已知道，有一位学生自杀了。他所供出的托派分子中，有一人曾透露：托派秘密组织的领导人刘仁静，曾将一件托派的秘密文件，交给你看，你看后向刘仁静表示，托洛斯基这种主张很好。你有没有这种事，希望你好好为自己辩护。”柏金斯基是共产国际成立以来的一个元老人物，他曾与列宁共过事，担任过长期的秘密印刷工作。他态度很严肃，说话很直率，可是心地却很慈祥。他平时对我的态度很好，这次告诉我

关于以上的事，显然也是善意的。当我向他否认这件事，并问他是否有点怀疑时，他回答：我相信你是一个正直的同志，因为我一直觉得你有话总是直说的。我对你没有甚么怀疑，但你得到中大清党大会去为自己洗刷。这位正直的元老人物，几年之后，据说也被斯大林清算掉了。我在这里提到这件事时，心中对他还颇为怀念。

在中大的清党大会中，我出席发表演说，我首先说明我一向不赞成托洛斯基的主张，并否认关于我私阅托洛斯基文件的指摘。我说明我一向不满意中大的领导，重申我在中共中央既反机会主义又反盲动主义的立场。最后，我向全体到会者挑战说：你们任何人，如果知道我有甚么错误和暧昧的行为，不妨公开指出，我准备答覆一切。我说完之后，居然没有人提出质问，一场风波，便算了结了。

所谓我私阅托洛斯基文件一事，几年以后我才明白了真象。原来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时，大会的秘书处曾将托洛斯基关于中国问题的意见，用各种西方文字印成一百多页的小册子，公开发给各代表阅读。我也得到过一本英文译本，那时刘仁静是列宁学院的学生，在中共代表团担任翻译工作。他翻译了这个文件的一部分，将译文交给我看，并说：我已交瞿秋白看过了，他认为翻译得很好，现在请你看看，有没有甚么缺点。我那时因为忙着旁的事情，就说：你的翻译一定很好，用不着看。这样一件平常的事，想不到被托派分子以讹传讹的说我私阅托洛斯基文件。这也可见清党中牵连的事是无奇不有的。

在中国学生中的清党工作，拖延了三个月时间，快要

结束的时候，瞿秋白遭受着比我还要重得多的打击。在柏金斯基的办公室内，围坐着少数人在那里举行秘密会议，我和瞿秋白也在座。首先由共产国际那位主持中大清党的监察委员，报告中大清党的经过，根据他所搜集的材料，认为在中国学生中，长期存在着一个托洛斯基的秘密小组织。中共代表团方面，一直采取放任的态度。他指摘瞿秋白曾让刘仁静这个托派领导人物，经由土耳其回国。刘在土耳其曾会见托洛斯基，请示机宜，回国从事托派活动，又指出其他若干托派分子，都是经由瞿秋白的提议，一一派遣回国。并指控说：材料证明，中国学生中的不可靠分子，与其他代表来往较少，与瞿秋白来往独多，这些指摘，弄得秋白面红耳赤，无法答辩。参加会议的季诺桑诺娃和米夫，都在简单发言中将自己的责任轻轻推开了，更使秋白感觉很窘。

我看到这种情形，曾为秋白抱不平。我替他辩护：瞿秋白同志，毫无疑问是忠实拥护共产国际路线的人。因为他是中共代表团的首脑，所以接触面很广，处理的事情也多。托派小组织没有揭发以前，谁能断定某些学生是托派，某些学生不是托派。所以，不能因他与这些学生来往独多，而受到指摘。我的辩护虽使秋白松了一口气，但对他究无多大帮助。会议没有甚么结论便散会了；瞿秋白从此便成为应负中大托派事件主要责任的人物。

中大清党事件，米夫得到完全胜利，清党委员会认为米夫与中大支部局的领导是正确的。所谓“二十八宿”正式被认为是布尔什维克分子，一部分学生被当作托派清除了，

其他曾反对这支部局的学生，都被认为有嫌疑的分子；如我的太太在清党中的结论是要她将来回国后从工作中证明她的忠忱，并曾罚她到工厂中去工作了一个时期，以资考察，这种对我太太的结论，无异是对我处罚的象征。瞿秋白的太太杨之华和其他多数学生，也得到和我太太类似的批评和处罚。

在柏金斯基办公室会议之后几天，米夫曾约请我和瞿秋白、邓中夏、余飞四人（王若飞那时已不参加代表团工作，并在列宁学院经过了清党的考验），在他的办公室内举行会议。他以从未有过的骄傲神态，扳起面孔向我们宣读一件共产国际谴责中共代表团的秘密决议。这个简单的决议文大致是：共产国际谴责中共代表团，在中山大学采取助长学生间的纷争与妨碍中大党组织的正常工作进行，是一种恶劣的分裂活动，这种分裂活动，曾助长托派小组织和其他反党倾向的发展。中共代表团的多数如瞿秋白等，一直坚持这种活动，从未改悔。其中少数人如张国焘，犯有同等的错误；直到后期，才未积极参加，但亦从未反对过这种分裂活动。

我和瞿秋白心中都很明白，这是上次在柏金斯基办公室内举行秘密会议，在我和瞿秋白等当事人退席后，共产国际的少数巨头会同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所作出的谴责决议，米夫只是受委托向我们宣布而已。这个会议，当无改变这个决议的可能，争论也是无益的。可是邓中夏和余飞并不知道经过的内情，因而邓中夏立即起而抗议，声言他反对这一决议，将向共产国际主席团提出控诉。余飞几

乎急得要哭了，声言他在留住莫斯科将近两年的时间内，牺牲了他的学习，主要是从事中国学生的考察工作，并曾将考察所得，一一告诉中大支部局，这于清党有很大补益，但结果反得到一个从事分裂活动的罪名，心实不服。

米夫曾以教训的口吻向余飞说："余飞同志，你是一位年轻的工人，本应当专心学习，而不应当去做自己不应当做的事。现在你们向上级控诉，也是无益的。"瞿秋白听了这些话，以懊丧的神情说："算了吧！我看这个决议是不能更改的了，我们就无言的接受好了！"我看瞿秋白那种神情，也只有默默的向他点点头。邓余两人望望秋白和我，似已无话可说。因而在秋白向米夫用俄语说了一句表示接受的话之后，会议就算结束了。

这个谴责决议案，无异是对中央代表团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清党。这对中共代表们的打击是非常严重的。实质却是俄共党内米夫的官僚主义对天真的中共代表团的一种压制行为。这个谴责决议案，也等于是米夫的凯旋之歌。从此，米夫便可以为所欲为，中共代表团则只有销声匿迹，丧失了它的发言地位。

米夫乘胜直追，企图夺取中共的整个领导。他于一九三〇年夏季由共产国际派往中国，担任共产国际代表，指导中共中央工作，陆续将中大的所谓"二十八宿"的大部分人，派回中共中央工作。那时，共产国际对于中共中央李立三的领导，已有不满。米夫就准备将他手下的"布尔什维克分子"，取李立三而代之。

瞿秋白、邓中夏和余飞等，都在纷纷请求回国。共产

国际对于他们的请求，似无理由拒绝，因而他们也陆续获准回国了。在他们回国之前，余飞这个小伙子，曾这样向我表示："现在斗争的战场，移到国内去了。在莫斯科我们斗不过米夫，到了中国，看他还有甚么更大的本领。担任东方部长的枯西宁，似也知道一些中共代表的愤慨心情，曾在瞿秋白离莫斯科之前，特别加以抚慰；他表示他深信瞿秋白是始终拥护共产国际的，回国以后，必然与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密切合作。瞿秋白那时似乎只想迅速的离开莫斯科这个苦海，再也无意表示甚么意见。只有我则仍留在莫斯科。据说，共产国际的首脑们，认为我还是不满共产国际的，有点不放心我回国去。因此我只好泰然自若的继续住下去，也不作回国的请求。

我曾到黑海之滨的雅尔达去作夏季休假，对于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所应做的工作，我都采取消极的态度。但当我在八月间回莫斯科之后，发觉情形有变动的迹象。米夫到中国以后，似曾遇到李立三的反抗。他所带去的"布尔什维克分子"，似也因为是一批新手，在国内的地下工作中，并不能有所表现。这些情形，米夫曾去函告他在莫斯科的党徒。因而他的这些党徒，对我的态度便有了显著的变化。从前他们是不理我，不敢和我来往，这时他们却特别对我表示好感。共产国际的行政机构，也对我客气起来了。他们要我从新领取共产国际的薪金，即使我还在列宁学院念书，也照常将薪金发给我；并且发给我一张特别购物证，可以在国营商店中任意购买物品。这在当时的莫斯科，只有少数的要人和外国驻俄大使，才能享受这种权利。

我仍旧在图书馆中埋头学习，非接到共产国际正式约请，也不轻易到它办公大楼去。有一位米夫手下的“二十八宿”之一，终于向我说出一些实际的经过。他所知道的内幕消息，似乎很多。他告诉我，他曾看过共产国际谴责中共代表团的秘密议案。

他向我说到，在清党中关于中共代表团的材料很多；可是关于我的却很少。那位供出我私阅托洛斯基文件的人，并不能说出是甚么时候和甚么文件，也只说我的反应“很好”两字，此外并无托派分子说到我与他们有甚么秘密联系。我平素与一般学生谈话，与我公开所表示的意见是一致的，因而清党委员会认为我与托派有关的供词并不足信。而且认为我并无所谓两面派的作风，因此，那个谴责案特别表明，我的情节较轻。他认为这样将我与瞿秋白等分别开来的谴责，隐含重大的意义在其中。现在共产国际除认为我仍有不满共产国际的想法外，已无别的误会。

他继续告诉我：瞿秋白等的情形便不同了。瞿秋白勾结鲍罗庭反对米夫，在中大进行派系活动，又主张联络富农，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应反对富农的决议相对抗。

在清党中，许多材料证明瞿秋白公开的表示和私下向学生们所说的话有许多出入之处。因此共产国际怀疑他故意放走刘仁静。再则，从旁的材料中，也发现瞿秋白曾与德国一个右倾领袖有三小时以上的密谈，在这次密谈中，瞿更表示了反共产国际的意向。因此谴责案将主要责任归之于他，他也许还蒙在鼓里，其实，在莫斯科做任何事，都会有人知道的。

我听了他这些话，有点毛骨悚然。似乎任何外国共产党代表，都在被监视之中。他又告诉我：米夫到中国以后，发现李立三并不是执行国际路线，而且排斥莫斯科派回去的“布尔什维克分子”。

米夫信中也认为有些同学在中大表现得很好，但对中国的实际工作，究缺少经验。他们须与过去有工作经验的一部分好同志相结合，才能建立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他并说到我如果能积极表示拥护共产国际的路线，将来共产国际是会派我回国去的。

我听了他的这些内幕消息，更证实了我一向的想法，米夫的所作所为，完全是玩弄权术；他似乎认为目前主要的对手是瞿秋白和李立三。为了和他们对抗，想暂时联络我，以收个别击破之效。我仍采取不理会这些事情的态度，照常在图书馆阅读资本论。

这一切一切，就是中共代表团和米夫之间斗争的一个大概经过。米夫在中国表演了一番之后，似已登峰造极。据说几年以后米夫也就失势了。后来斯大林也用他所用过的手腕，将他清算掉了。

① 拉狄克曾著《中国革命运动史》一书（中文本系克仁译，上海新宇宙书店一九二九年版），对于中国社会结构，有较详细的分析，可以参阅。

② 详见斯大林：《和中山大学学生们谈话》，载《斯大林论中国革命问题》，什之译，第四十四页至第七十六页，上海时代出版社，一九四九年版。

③ 所谓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亦称二十八宿），是那时在中山大学支持米夫领导的二十八个中国学生，其中最著名的是陈绍禹、秦邦宪、张闻天、王稼祥等。

# 第 三 章

# 斯大林与立三路线

斯大林的独裁权力日渐膨胀的结果，共产国际完全变成了他的御用机构；这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时及其后尤为显明。共产国际初期的理想主义是褪色了，它为苏俄的需要所左右，它对中共的领导，更是随着莫斯科的政治气候而摇摆不定。我前面所说过的罗明那滋与鲁易门，在中国的蛮干行为，和米夫顽强的控制中大和中共的手段，都不是个别的偶然例子；而是斯大林主义的构成部分，甚至后来的立三路线虽为斯大林所反对，但事实上也是由斯大林的蛮干作风所诱发起来的。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七日在莫斯科的工会大厦揭幕；主要议程是：（一）世界状况与共产国际的任务；（二）殖民地问题；（三）共产国际的党纲等。大会的公开主持人是被斥为右派的布哈林，他担任第一项议程的报告，并提出一个共产国际的党纲草案，东方部长枯西宁则为殖民地问题的报告人。斯大林从未出席这大会，但却在幕后操纵一切。

我是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中共代表团之一。在中共第六次大会闭幕后，我搬到莫斯科市内一个代表招

待所居住。中大等校的中国学生川流不息的来访问我们这些代表，彼此异地相逢，特别亲切，其中有些还是我的患难之交。我的住房里挤住了八个人，谈话虽不方便，但他们仍设法告诉我一些莫斯科的真实情况。

曾有朋友说，现在的莫斯科已今非昔比了，斯大林支配一切，任何人发言如果与他的话稍有抵触就是异端。也有人说现在共产国际主要是反右倾，布哈林被视为右派，已经失势了。外间传说我是布哈林所支持过的，因而也是布哈林的右派。甚至有朋友要求我在这次大会中，不要表示任何意见，以免惹是生非。

这些留俄学生认为托洛斯基色彩万万不能沾染。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的十周年纪念日，托派曾在莫斯科散发反俄共中央领导的传单，曾被俄共中央判定为反革命的行为。从此，托派再也不是党内的一个派系，而是反革命的集团。托洛斯基本人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去了，因托派嫌疑被捕的人为数甚多。他们曾以中国问题来攻击俄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领导的错误，如果现在有人再认为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与共产国际的领导有关，那就难免有托派的嫌疑。

另一位熟悉德共情况的中国同志向我说到共产国际在欧洲的活动是失败了，德共所受共产国际之蹂躏情况，不下于中共所受到的。德共由李布克拉西组织起来的“斯巴达团”那些老党员，都受到排斥，现在德共书记泰尔曼，领导能力不足，惟斯大林之命是听；曾在中国主持广州暴动的鲁易门是他的唯一灵魂，也是人所共知的斯大林的打

手。鲁易门虽为德共老同志们所瞧不起，但在这次大会上，他要起重大作用。因此，我的这位朋友认为我是鲁易门的对头，要我小心防备他的袭击。

朋友们这些话，引起了我的诧异。我怀疑人们在表面上都拥护斯大林的领导，而暗中却有许多不满，难道共产国际真的变质了吗？这些窃窃私议之由来，是独裁制度的结果，还是私议者的偏见呢？当我在大会中体验了几天之后，我觉得他们的这些话，并非无的放矢，而是现实的写照。我的同志们向我忠告，出自于不计利害的友谊情感，在我个人来说弥足珍贵！

我经常出席大会，耐心听取经过翻译的冗长的报告和发言。如果遇着有重要人物发表演说，会场就挤得满满的，否则，出席的人，就寥寥无几了。多数代表往往离开议席，在会场周围的宽大走廊或休息室中，三五成群的踱来踱去，东一堆西一堆的，细语聊天，或者放言高论；有时，我也间或厕身其间。

大会情况的不健全，实是我所少见的，会场内外的气氛迥然不同，除大会在正式举行外，会场外尚有许多小会在进行。而那些小会，因为有斯大林的势力作怪；比正式大会还重要得多。大会内布哈林以俄共首席代表的身份发表动人的言论，受着会众的欢呼，但会场外则以罗明那滋和鲁易门两人为主角，他们一个是俄共代表，一个德共代表，顶着斯大林的招牌，作打击布哈林的活动。

布哈林代表俄共一致的意见，向大会宣称世界革命已进入了第三时期。所谓第三时期，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曾有一个革命高潮时期，被称为第一时期；由于西欧各国革命运动的失败和西欧各国经济的复苏，又有第二时期的说法，这是以国际资本主义的统治获得暂时稳定为其特征的；现在这个稳定时期业经过去，开始了第三时期。换句话说，这是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这种国际形势的估计，显然是共产国际一切政策的出发点。

其实所谓资本主义发生总危机，资本主义各国矛盾加深，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和苏联在国际间的地位更形重要等等说法，都不免言过其实。但这是斯大林脑海中的幻影，而且斯大林由这些想像出发，拖着共产国际和俄共急剧的向左转，这是以后几年共产国际和俄共许多史实可以证明的。当时布哈林似不完全同意这种夸张的说法，可是他为了尊重斯大林和俄共多数的意见，也就这样报告出来，平心而论，他不应该再受到挑剔，可是，他还是未能免于被清算的命运。

所谓第三时期又被称为革命与战争时期，斯大林所耽心的是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的国家，正准备对苏战争，因而共产国际也就号召各国共产党拥护苏联，反对对苏进攻，并将进攻苏联的战争，转化为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革命。布哈林除赞成对资本主义各国的进攻，严加戒备外，也曾主张应当由苏联主动设法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斯大林却不重视这种见解，认为只有进攻才能对抗进攻；他除了在苏俄施展他的铁腕以外，并在国际上加紧反对各国的社会民主党，称之为“最危险的敌人”和“社会法西斯蒂”；在各国共产党内，更疯狂的反右倾。这就抹杀了各国的实际

情况，似只有完全听命于斯大林的人，才能算得是一个真实的共产主义者。

布哈林虽从未公开表示过他与斯大林之间有什么意见分歧，而且大体上还是迁就斯大林的。但罗明那滋与鲁易门对布哈林的攻击，却是有增无已，他们向代表们游说，指摘布哈林的某些话某些行动是右倾的，甚至赤裸裸的说，反右倾就要反布哈林。他们在代表中制造分裂，在那里甄别那一个是忠实的同志，那一个是布哈林派。他们强调斯大林的权力高于一切，任何不尊重斯大林的都是罪恶。他们这些活动简直是非法的和破坏性质的，也是远离共产主义的权力崇拜的表现。

我知道罗明那滋和鲁易门在中国一些胡作胡为的事实，因而对斯大林也有不满之感。我觉得这两个宝贝居然是拥护斯大林的健将，足见斯大林手下也没有什么出色的人物，我讨厌斯大林的玩弄权力，为所欲为。我惋惜权力主义将毁灭一切，尤其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共产主义者的道德，以及党内民主的原则均遭受蹂躏。

然而，我明白我并无回天之力，而且我很易于受到攻击，我只有采取消极的防御态度。在大会举行的头几天，我曾用这种态度挡住了鲁易门对我的挑衅。鲁易门将我看作是中国的布哈林，曾找我作过一次试探性的谈话，他说了一些惋惜在中国没有机会和我见面的客气话之后，便问我是否愿意与瞿秋白合作，共同去反右倾，我回答他，我对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情况，还不很清楚，暂时不能表示什么意见，至于中共内部问题，已由中共六次大会解

决，既反机会主义又反盲动主义。我是拥护中共六次大会的决议的，如果有人反对这个决议，那我可能给他一个反击。不过我不挑战，只是应战，鲁易门明白了我的意思，也就没有在大会上发言攻击我。

罗明那滋和鲁易门的活动是令人侧目的，其他的代表们，包括其他的俄共代表在内，大都持稳重态度，所有发言，多系就事论事，不去播弄是非。曾有一位我不认识的某国代表笑着向我说：这两个宝贝，是斯大林的打手，专门制造纠纷。也许是由于这两个宝贝的活动太离谱了，后来他们先后都为斯大林所唾弃。

这次大会的决议是根据第三时期这个根本看法而制订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造成的灾害，不亚于瞿秋白盲动主义之在中国，这在德国问题上，尤为显明。当时德共书记泰尔曼曾出席中共代表团的会议，发表一篇冗长的演说，企图说明共产国际和德共政治路线的正确，他曾指出德国是资本主义统治矛盾的焦点，德国内部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剧烈冲突，在国际关系上，又有战胜国与战败国的多种矛盾；因而认为德国已经具备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只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障碍着革命的发展，如果德共起来积极反社会民主党和党内对社会民主党的妥协倾向，德国革命将很快的获得胜利。

我曾向泰尔曼提出质问，表示他并未明白指出德共的势力究竟已壮大到什么程度，也没有证明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政权被推翻，就等于德共的胜利。泰尔曼对于这些问题并没有详细置答，却以惊奇的眼光盯着我，也许他觉得

我与布哈林的见解如出一辙。

其实，事先我并没有与布哈林交换过有关德国问题的意见，我的这些疑问，只是根据我的直觉。可是后来事实证明，泰尔曼的看法是错了，德共反社会法西斯蒂的政策，无异替希特勒铺平了统治德国的道路。希特勒上台以后，推行反共反苏联的政策，这些显然是共产国际六次大会政策失败的明证。后来，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不得不改采人民阵线反法西斯蒂的策略，也无异是斯大林的盲动主义的悼歌。

瞿秋白不满意布哈林对他的盲动主义的批评，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中企图乘势翻案。中共问题原已在它的六次代表大会中获得解决，并经以正式文件报告共产国际，布哈林在共产国际这次大会的发言，曾说到各国共产党在第三时期的新形势，主要是反右倾，只有中共是个例外，它应继续克服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瞿秋白曾起而反驳，认为中共盲动主义并不严重，而且已经克服了，目前在中国白色恐怖之下，有些同志不敢坚决与蒋介石统治作斗争，是当前主要的右倾危险；因而在中国也同样要着重于反右倾。

不待说，罗明那滋和鲁易门支持瞿秋白的见解，此外，不少斯大林的追随者似也觉得在反右倾的高潮中，居然有个例外，未免有些煞风景，甚至也有人觉得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布哈林指导之下所形成的决议，可能有右倾的私货，因而共产国际虽批准了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但仍决定将中国问题交由东方部重新予以检讨。

大会闭幕以后，东方部经常举行会议，讨论中共问题，中共是共产国际在东方的一个主要支部，自然受到重视，东方部和西欧局是共产国际两个重要的组织，它们分别主持所属各支部的政策拟订工作。然后再由共产国际主席团或秘书处核定。

当时的东方部自然也是在斯大林势力控制之下。支持布哈林主张的人已经没有了。任部长的芬兰人枯西宁是共产国际一位重要理论家，他曾拥护过布哈林的主张，当时正忙于洗刷他所沾染上的色彩，遇事不敢作主。任枯西宁主要顾问的沙华洛夫，原是季洛作夫的亲信，曾任东方部长，他之所以再度成为东方部的红人，似是斯大林认为在反布哈林的右倾中，这个被处罚过的左倾反对派，还有利用的价值。还有一位顾问是匈牙利籍的理论家马加尔，曾著过《中国农民问题》一书，强调马克思所说的亚洲共产方式的说法。与官方在这方面的理论，颇有出入。他们多不愿卷入纷争里面去。至于任东方部之下的中国部部长的米夫，则谨守着斯大林的立场，不敢有所主张，我们曾目之为"官僚"。其实，在独裁制度之下，个人虽具天才，也是无由表现的。

瞿秋白和我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上，瞿秋白获选为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委员，兼秘书处的秘书，我则被选为候补委员及候补秘书。我们都可以经常参加东方部的会议。尤其是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更非我们到场不可。

最初是瞿秋白向东方部提出了有关中共问题的意见

书，主要内容是说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即将到来，因此，中共应积极准备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中共要和共产国际的其他支部一样，着重于反右倾的主要危险。

我觉得我应该维护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不要让盲动主义再抬头，因而也提出了与瞿秋白针锋相对的意见书，我说明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并无立即到来的迹象，更因中共所受到的惨重损失，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反被推迟了，应遵照中共六次大会的决议，积极争取群众，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急躁情绪，决不可让盲动主义复活。

此外，中共驻农民国际的代表王若飞也写了反对瞿秋白关于农民土地问题的意见书，他除表示中共应继续克服盲动主义的倾向外，进而指出那些盲动主义者在农民问题上，不了解反对富农的重要，反而犯着主张联络富农的右倾错误。王若飞这种见解，显然比我更进一步，企图将左倾和右倾的错误，一股脑儿集中在瞿秋白身上，曾使瞿秋白大伤脑筋。

我们为了这些不同的意见，反复辩难，相持不下。瞿秋白诬指我认为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遥遥无时，正是右倾的思想。我则平心静气的答以我是维护六次大会的决议，不要毫无理由的任意更改；所谓中国革命新高潮即将到来的主张，究竟有何根据，似应首先予以证明。

这个争论在东方部每周一次的会议上，都曾不断的讨论，经过两个月的时间，还是不能作具体的解决。东方部的要人们都或多或少的表示并无充分理由来修改六次大会的决定，但又不愿直接否定瞿秋白的主张，当瞿秋白喋喋

不休的发表反右倾的高论的时候，枯西宁曾讥讽的说："我看中国同志似乎每人都同时有左右两个倾向。"我当时即觉得这句话也许适用于中国同志。一般说来，东方部的要人们不愿在左倾与右倾这个问题上纠缠，大多就南京政权占有北京后的前途①、亚洲生产方式、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以及富农等问题，作理论的阐明与研究。

在东方部最后一次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枯西宁曾宣称："斯大林本人是中国问题的最高权威，而且他对共产国际目前应予中共中央以何种补充的指示的问题，也极有兴趣。"接着他提议组织一个中国问题三人委员会，包括斯大林本人，米夫和另一位斯大林身边的中国问题的秘书，草拟对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将东方部讨论这个问题的全部记录，统交这个三人委员会处理。枯西宁这种作法显然是放弃了东方部的职责，推给斯大林去直接处理，也许是他另有苦衷。从此，东方部的会议，也不经常举行，对东方各支部的指导改采个别处理的方式，这似是对讨论中国问题引起了麻烦，而加以改变的。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初，中国问题三人委员会成立后约两个星期，斯大林约我和瞿秋白去会谈，这也是我们第一次与斯大林直接商谈中国问题。那天晚上九时，在他那间陈设很简单的办公室里，斯大林坐在大办公桌的后面，我们则与他隔着桌子对坐，他不断的抽烟斗。开始时他问了一些有关我们在莫斯科的生活情形，对我们很亲切，表现了他那老于世故的态度。

接着斯大林问我们：像宋庆龄这样的人，如果在中国

大城市的街上，遇见一个共产党员，会不会叫警察逮捕他？原来宋庆龄在离开武汉后，来到莫斯科，正遇着中山大学在进行反国民党运动，她参加过几次这个学校的学生大会。有些大学生的发言曾批评过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和作法，为她所不满，并曾公开表示抗议，因此，斯大林才提出这一问题。

我直率的回答："我看不会的。"接着说明宋庆龄不仅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而且确是热烈拥护孙中山先生主张的人，她对过去孙中山先生手订的联俄联共政策，曾表示过信守不渝；对南京那些军阀政客，公开背叛孙先生的理想和主张，更是厌恶②。虽然她在莫斯科曾有过不满我们的表示，但不会因此跑到反共的极端上去，退一步说，她也受着中国孔夫子道德观念的影响，不至于在街上捉拿共产党员的。

斯大林接着问：陈独秀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钱和获得其他的条件来办一张报纸？他这个问题，似是判定陈独秀被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排出中共中央之后，可能会采取反共产国际的态度。他所耽心的是陈独秀有无能力另行办报或另行组党等等。

我告诉他："陈独秀办不起一张有力量的报。"我根据我所知道的事实，告诉他陈独秀在中共六次大会以前，还希望与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改善关系，他之没有来莫斯科出席大会，也并非是表示决绝。不过，最近他的反应如何，我则不得而知。他从前确有能力办一张像样的报，但他做了这么些年的著名的中共领袖，其他的社会关系早已断绝

了，现在似乎没有人敢于支持他办报。在我们看来，他也许不再追随共产国际。但一般人看来，他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著名共产党员，因此，他之不能从事公开的政治活动，是很显然的。至于他是否真有另树一帜的打算，也还是一个疑问。我和斯大林的谈话，都由瞿秋白翻译，他一直没有表示自己的意见，这时斯大林转问瞿秋白，对这两个问题，有没有反对或补充的话，瞿秋白大致表示赞成我的意见。斯大林的神情，似对我的意见颇为满意，也许他认为这两个问题对于中共今后的决策有重大的关系，因为前者的答案，表示中共还有一些非共产主义的同盟者，后者的答案，表示陈独秀并不能在中国作反对共产国际的有力活动。斯大林之没有否定布哈林所说的，中共将来仍须与小资产阶级平分政权的说法，和没有指示中共加强反右倾，其原因或许即在于此。

瞿秋白把话题转移过来，迳向斯大林报告了一些东方部最近关于中国问题讨论的大要，并说明他个人的见解，请斯大林予以指示。谁知斯大林却淡淡的回答说：我认为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已经够了，现在我没有什么新的意见。斯大林这样一句简单的话，使瞿秋白反右倾的调子，不能不大打折扣。

于是，斯大林转而表示中共的布尔什维克化，应首先学习马列主义，他眉飞色舞的叙述他少年时的故事，瞿秋白在那里听得出神，顾不得翻译给我听。斯大林大体说到他少年时，在穷乡僻壤中，过着极艰难困苦的生活，直到三十二岁的那一年，才得到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册，他

如何在警探环伺的环境中，偷读这本“圣经”。后来又如何千方百计找到《资本论》的第二三两册，和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他花好几年的工作，熟读这些书籍，才真正的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

我们经过三小时的谈话之后，我觉得斯大林倒是一位颇具风趣的现实主义者，并不如外间想像的那样狰狞可怕。可是，他的演绎逻辑是够冷酷的，任何人对共产党一有不满的表示，就会被目为反共，在街上见着就可能要抓人，即对多年共过患难的同志，也不例外，像陈独秀这样的老同志，如有不满，也被认为会走上反革命的道路。这是心理变态，也许是过于自卑。

几天之后，斯大林的中国问题三人委员会，向共产国际提出了一个给中共中央的指示，其内容说明中国革命正处在两个高潮之间，不可过份估计新的高潮的迅速到来，因而要中共中央继续执行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各点。东方部又依据这个指示信的要点，就中共苏维埃区的经济问题，对待俘虏问题等，分别作了单独的决议和指示。如经济问题，反对当时苏维埃区域强迫订定物价的办法，主张随市场价格的变动，予以适当的调节，对俘虏要采取优待办法，对土匪要采取尽量争取的方针，这些，都是米夫和中共代表团的共同作品，对于后来中共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

斯大林对中国问题虽仍能持较稳重的态度，但对俄国问题则一意孤行。他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想之下，锐意发展重工业，不顾一切条件的限制，企图在短期内使苏

俄由一个贫穷而落后的国家，变成强大的工业农业国，他那时正由反托洛斯基主义和反布哈林右派的运动中，形成个人独裁的无上权威，他的粗暴的蛮干作风，也风行于各国共产党。

就俄国问题上看来，斯大林较之托洛斯基，不仅他是俄共的正统，而且他的主张也是当时所需要的，并得着较广泛的支持。他的胜利是在反托派的斗争中奠定起来的，从此俄共中央权力大为加强，斯大林也可以为所欲为。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托洛斯基、季洛维夫被开除党籍，托派秘密小组织被宣布为党外的反革命的组织，一九二八年九月已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的托洛斯基，又被驱逐出国，在反托派斗争的过程中，俄共内部就养成了压迫反对者的狂热，这在反布哈林右派的时候，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

在斯大林与布哈林的争论中，真理并不一定在斯大林方面，当时，布哈林等似从未获得机会公开表示他们的见解，即就俄共中央所发布的一鳞半爪的公告来看，也不能说明布哈林真正有甚么可指摘的错误。

据俄共中央宣布，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三个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因征购粮食问题，于一九二八年春向俄共中央提出要挟性的辞职，被视为罪无可逭的行为。一九二八年是苏俄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俄共中央因建设资金短绌，粮食不足等因素，实施紧急征购粮食办法，其主要内容是以低价强征一般农民的粮食，并在乡村中组织贫农委员会，实行没收富农粮食。这件事曾使农村骚动，一般人认为是军事共产主义的复活。而斯大林认为

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所不能不这样做的，布哈林等三人则认为这会妨碍建设的进行，因而提出辞职，作为抗议。

一九二八年下半年，俄共内反布哈林右派的斗争日甚一日。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以后，布哈林再没有露面了，他的著作也被禁止发行了。莫斯科遍传反布哈林的声浪，却听不见答辩的声音。俄共的传统，反对派原是可以公开辩护的，甚至反对派可以向共产国际控告俄共中央的多数派。可是到了此时，这种种权利完全被斯大林剥夺了。布哈林没有任何回答的机会。

一九二九年初我曾列席俄共中央扩大会议，充分领略了这种滋味。莫洛托夫代表俄共中央发言，他用坚决的语气，表示要毫不留情消灭右派。由反右派发展到消灭右派，自然是一件可怕的事。布哈林、托姆斯基不知为了甚么理由，没有出席这次大会，只有李可夫在大会中发言，表示尊重斯大林的领导，毫无违抗之意，他和其他的同调者不过是想修正一些实行中的偏差而已。虽然如此，布哈林等仍是受着严重的处罚，后来，竟因此丧失了生命。

俄共中央所宣布的布哈林的右倾主张，有下列各要点：一、减低重工业发展的速度，增加轻工业发展的比重；二、改善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减轻战争的威胁；三、苏联境内的阶级斗争，不应该日益加剧，而应该逐渐降低。

斯大林恰恰相反，认为减低重工业发展的速度，会使受着战争威胁的苏联，束手待毙，这是绝对不可以的事，他主张竭尽一切力量，加速重工业发展，要求全国人民扎紧裤带，不要幻想轻工业供应的提高。他不相信苏联与各

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可以改善，甚至不愿采取一些措施，增进与它们间的贸易。他认为苏境内的阶级斗争确是日渐加剧，因而主张雷厉风行的用政治手段来反富农，和在党内进行惨酷的两条战线的斗争。

斯大林这种政策几乎使苏联濒临灭亡的境地，他强迫实施农业集体化，由反富农的政策进到消灭富农这个惨绝人寰的政策，使苏联的农业三十年来一蹶不振，他接二连三的实行大清党，不仅许多老党员被杀，而且使苏联的国力大受损伤。如果不是希特勒自掘坟墓，四面树敌，苏联在第二次大战的命运，可能是很悲惨的。

当时莫斯科的政治气氛确是使人窒息，斯大林强调反右倾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是惨酷而毫不留情的斗争，不仅要打击政敌，还要根本消灭反对者的生命，他又强调反对对左右倾的调和态度，任何人言行不慎，都可能被指为调和派，他更进而反对所谓阳奉阴违的两面派，和口是心非的暗害者，任何忠诚的党员和奉公守法的人民，都可随时被指为两面派或暗害者，恐怖笼罩着整个苏俄，斯大林所直接指挥的特务机构具有无限制的权力，这样任何人讲话都得找着斯大林的言词作根据，否则就有莫大的危险，所谓“偶语弃市”的话，又出现在二十世纪的苏俄！

我在上面说过的中山大学的斗争和清党运动，就是在斯大林这种作风之下发生的。我曾参观过对工业党要犯的审判，我觉得至少有些工程师们，是因工作上的过失，而被判为暗害者。我也到过农村参观集体农场，考察过反富农的斗争，反宗教的斗争等等的实况。我想起我们在武汉

时期有过的一些农运过火行动，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六次大会后的共产国际，反右倾成为最主要的节目。在反右倾运动中，反对德共右派和对右倾的调和派和美共中央多数派，算是较重要的事。此外，在一次共产国际的扩大会议中，枯西宁表示因为他对俄国情况了解得不够清楚，曾在一九二八年夏季，赞成过布哈林右派对俄国问题的主张，深感后悔，并声明此后无论对情况如何不了解，也绝对拥护俄共中央和斯大林的正确主张，不敢有所怀疑。枯西宁这些话，也许是出之于不得已，但我当时觉得他这样甘愿盲从，简直是荒谬的，我也想到枯西宁这几句话是意味着共产国际的独立性早已不存在了。

李立三得着莫斯科反布哈林右派的鼓励，也在中共内依样画葫芦的干起来，他开除蔡和森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以请共产国际纠正蔡的右倾错误为理由，将蔡送到莫斯科。李立三向共产国际的报告，指斥蔡和森老是维护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要求准备群众力量，他看不见高潮的到来，忽视了发动群众、配合工农红军、夺取大城市的暴动，足见是明显的犯了右倾的错误。

这件事确是反右倾的怪现象。共产国际的首脑们对之不免啼笑皆非，他们觉得李立三的做法是过火，也许还觉得在中共中央应受处罚的，不该是蔡和森，而应该是李立三，但在反右倾压力之下，他们似又觉得不便为蔡和森主持公道，他们无言的接受了这个既成事实，这就助长了李立三的盲动气焰。

一九二九年夏季，蔡和森来到莫斯科，他保持极度缄

默，不愿表示任何意见，也没有向共产国际作任何的申诉，仅要求在莫斯科学习一个时期。他也绝不向我和瞿秋白等谈论中共内部的事，甚至不轻易与人来往，终日索居在住所中，借助于字典，埋头读书。我觉得我责无旁贷应为蔡和森作不平之鸣，但他却反对我这样做，甚至声言如果我这样做，他将指斥我无事生非。

从蔡和森的神情看，也许他觉得在目前汹涌的反右狂潮中，任何人被指为右倾，都会或多或少的倒霉，那里还有甚么道理可讲！任何申诉都于事无补。我明知这样消极，不合道理，但客观环境，确是如此，只得作罢。

共产国际主席团和秘书处每次开会都发给我一些文件，通知我按时出席，我常借故请假，就是前往出席，也从未发言，蔡和森事件发生之后，我更显得意态消沉。这样，我自然使人认为是反右倾不够积极，但我也不管了。

米夫的行政助手瓦尔格终于来质问我，为甚么不常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不发表一些反右倾的言论？我告诉他，蔡和森的事我是应当发言的，但我终于保持了缄默，避免在反右倾中来唱反调，其他的事有瞿秋白发言，也就够了。我猜想他一定将我的话转告他的上司；但此后也没有甚么下文。

当时，莫斯科的党内斗争，对外国同志还算宽大一点。共产国际首脑中，也有些人不愿任意给人扣上一顶右倾的帽子，我的处境似很微妙，我是人所共知的对共产国际有过不满，反右倾又不够积极，但也有人觉得中共将来还是需要我的，而且我受过盲动主义的委屈，因而不愿对我多

施压力，就在这种微妙的关系之中，我避免了许多麻烦。

瞿秋白当时的处境似乎比我还要苦恼，不仅米夫和他作对，而且反右倾的火也燃烧到他的身上，他一直自认为奉行共产国际的意旨，可是是非总是跟着他，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以至当前的右倾等等祸害，他都沾染上；这使他不无危惧之感。他似觉得中共党内的纷争还不算严重，莫斯科的斗争才真正是毫不留情，因此，经过鲍罗庭的疏解，他和我意见上的距离，逐渐缩短了。

不用说，米夫的一举一动是以克里姆林宫主人的颜色为转移的。他似乎觉得莫斯科正在反右倾，中共就不能专反盲动主义，莫斯科在反富农，中共也就不应例外。他不理会象蔡和森这类严重的事件，却锐意去找中共领袖们的右倾毛病，他根据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有联络富农的话，同时瞿秋白也有联络富农的主张，认为这就是他做反右倾文章的好材料。

瞿秋白和鲍罗庭不直米夫所为，他们两人的出发点也许不一样，但一致主张在中国不但不能反对富农，甚至有时还要推行联络富农的政策，瞿秋白以为如果强调反富农，将使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基础缩小，可能招致失败的危机。

那时困居在莫斯科的鲍罗庭是政治上的失意者，本不愿谈现实政治，但为了中国的富农问题，却卷入了争论的漩涡中。我是鲍罗庭那间大客厅中经常的座上客，我们在中国所建立的友谊，使我们的谈话不拘形迹；他谈笑风生，娓娓叙述我国的民间故事，也常陪我下棋，虽然他的弈技比我高明得多。

鲍罗庭熟悉国际政治情况，对中国问题，仍保有武汉时期的观点。他透露出他对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并无信心，认为日本对中国的野心漫无止境，他设想斯大林终有一天会回头要中共与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重新结合起来，反对外国的侵略。因此，他觉得此时要中共强调反富农是不了解中国问题的错误想法。

鲍罗庭表示了他反对米夫的见解之后，向我直率指出我和瞿秋白的合作极为重要。他不赞成瞿秋白的左倾作风，并曾劝告瞿秋白改正过来，他相信瞿秋白不会再反对我。后来事实证明瞿秋白确实改弦更张了。我和瞿秋白之间，虽没有完全恢复初期水乳交融的友谊，但他确不再向我进攻了。

米夫曾召集一次中国问题的会议，请鲍罗庭就中国富农问题发表演说，在我看来，鲍罗庭那次演说不算精彩。他站在扩大中国革命基础的立场上，主张联络富农。他的措词吞吞吐吐，似不便露骨表示不赞成中共现行的苏维埃政策，这样一来，就显得难于自圆其说了。

米夫就利用这个机会施展他的手腕，他一面批评鲍罗庭的主张，认为是矛盾多端的落伍论调；一面偷梁换栋的将中国富农解释为半封建性的阶层，把反富农的范围缩小，认为雇用一两个佃农的富裕农民，只能算作富裕的中农，不应予以反对。并认为富农多半是除了自己雇用劳力耕作外，还出租土地给人耕种，这样就混淆了地主与富农的界限。

一九二九年六月间，共产国际东方部讨论中国富农问

题时，米夫显然居于优势。苏俄正在加紧对富农进攻，因而共产国际的人们，觉得中共也推行反富农政策，是天经地义的事。瞿秋白却与米夫对抗，认为富农主要是剥削劳动力，米夫的富农界说，不合原则；而且当时的中国，也不应强调反富农，他们两人反复辩难，相持不下。

我当时采取不介入的态度，但曾劝告瞿秋白不必坚持。我曾向他指出中共的现行政策，是平分土地，那就不得不反富农，否则，就要将全盘政策予以检讨，这在目前是做不到的。关于富农的界说，是次要的问题，也许就由于我的劝告，瞿秋白才勉强同意了米夫提出的决议书。

富农问题的争端，影响很大，瞿秋白被视为以右倾路线与共产国际的正确主张相抗衡。米夫一伙更多方攻击他，指他联络鲍罗庭和其他不满共产国际的分子，互为声援，不忠于共产国际。米夫对于我的不介入态度，也满怀愤恨，他攻击我以前曾不满共产国际，反右倾又不积极，如今在富农问题上，不仅态度暧昧，而且与瞿秋白暗中妥协，显然也非共产国际所能信赖的分子。由于这个争论的发展，中大学生的米夫派更加活跃起来，夺取中共领导权的企图，也就昭然若揭了。

我们和米夫为了富农问题，已经有了争论，而中大学生斗争的问题更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恶化。我和瞿秋白等都愤恨米夫的所作所为，认为他是自私自利之徒，不为中共的前途着想，只知拿着共产国际的招牌，排斥异己。我们也有点藐视米夫，认为他不过是十月革命后的新官僚，竟敢拿着鞭子，对我们这些筚路褴褛缔造中共的人们，装腔

作势，那是我们非反对不可的。

以上所述在莫斯科的一切，影响到中共内部，酿成不断的纠纷，最显著的是助长了立三路线的发展。

凡不择手段打击他人的，往往就是搬石头打自己脚的人。这在李立三事件中也表现得很明显。立三路线就是在反右倾运动中滋生起来的，由于莫斯科默认了蔡和森事件，李立三因此更为得势，他觉得自己的见解已为莫斯科所正式承认，于是他将一九二八年底斯大林亲自草拟的那封指示信，视同废文，接着莫斯科还要他加紧反富农，似又进一步坚定了他左倾蛮干的信心。

李立三舞动着他那把斗争的剑，向四面攻击。继蔡和森之后遭殃的是陈独秀先生。李立三也许自负是无敌于中国了，他的剑锋又指向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起初是指德国籍的两个代表为右倾调和派，接着他的刀光剑影又落在米夫的头上，他对米夫在政见上虽无显著的冲突，但对米夫所卵翼的陈绍禹等人，则视为是右倾的敌人，不客气，给予打击。到了最后，图穷匕见，他竟指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也是他所要反对的右倾对象。

一九二九年八月起，陈独秀先生连续向中共中央表示出他的托派态度，他反对中共中央在没有革命高潮的情况下，以“建立苏维埃政权”为行动口号，主张此时应为“召集国民会议而奋斗”③。十一月中旬，李立三中央开除了陈独秀先生的党籍。十二月十日，陈先生发表《告全党同志书》，表示拥护托洛斯基的主张，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莫斯科立即批准了这个开除的决议，并嘉奖李立三这

种维护共产国际的作法。

陈先生在中共六次代表大会以后，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更形恶化；他之不满中共李立三的领导也日甚一日。托派重要分子刘仁静从莫斯科回国，虽与陈先生的政治见解接近，但又觉得他是著名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应加入托派。据说当时流亡到了墨西哥的托洛斯基，曾批评刘仁静这种态度是幼稚的表现，曾径函陈独秀，对他加以推崇，欢迎他合作反斯大林主义。这样陈先生才正式加入了托派，陈先生当时虽有不少的追随者，但因托派那些左倾空谈家，并非实际行动的能手，他们之间还分成许多小的派系，即以陈先生的声望，也未能挽回托派的颓势，所以他们在中国终于没有甚么成就。

李立三顺利的解决了"陈独秀的反党事件"，似乎更为意气风发了。但他与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之间的交恶，也随着展开。一九二九年夏季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是德籍两个著名的右倾调和派领袖爱维尔特和黑克尔特，他们因反对德共书记泰尔曼的领导，被共产国际判为右倾调和派，不准再预闻德共的事。

蔡和森事件发生后，共产国际鉴于李立三依然流露出盲动色彩，企图暗中予以纠正，便选派了两个右倾调和派做驻中国代表，以约束李立三的蛮干作风。此外共产国际这样做，也许有更多的苦衷，他们两人在德国和国际上都有相当声望，没有犯过甚么严重错误，却已遭受打击，似不能不予以抚慰。而且在任意斗争和任意惩罚的作风之下，有的已经倒下去了，共产国际不无才难之叹，于是戴

罪立功的办法，乃成为必要了。

但这样做的结果，又种下了另一纠纷的祸根，共产国际派他们两人到中国去的时候，曾授予全权，设法纠正李立三的偏差，同时，共产国际又正式通知中共中央，说明这两人在德国问题上是右倾调和派，但希望中共中央能与他们两人和谐合作。这又给李立三一种暗示，即这两人也不能完全代表共产国际。当这两位代表与李立三发生意见参差的时候，李立三就凭借共产国际这个通知，不重视他们两人的意见，甚至斥他们为右倾，不能代表共产国际。

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显然危机四伏，除了李立三的态度以外，我和瞿秋白在中大清党中，又被视为制造分裂的人物。共产国际寄望于周恩来，认为李立三不过是放大炮的能手，周恩来却握有实权，能左右李立三的动向。因而邀请他去莫斯科，以便面授机宜。

周恩来于一九三〇年四月间来到莫斯科（正是中大清党事件结束以后），共产国际对他优渥有加，斯大林更是赏识他，认为他一向主管军事和情报工作，成绩裴然，他的能干和政治手腕都难能可贵。六月下旬，俄共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举行时，周恩来应邀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受到会众热烈的欢呼。这不仅是中共代表第一次受到的特殊待遇，即其他各国共产党代表，也很少受到过这种荣誉。

周恩来的莫斯科之行，收获甚为可观。他一方面与米夫相处得很好，并表示欢迎他去中国指导中共工作，陈绍禹等那些米夫的支持者，多经由周恩来接洽，派回中国工作。另一方面他又同情瞿秋白、邓中夏、余飞等所受到的

委屈，帮助他们解决回国工作问题。我那时正忙于学习，表示仍愿留莫斯科，他对我也表示相当的好感。这些都表现周恩来的应付才干，而为共产国际首脑们所倾服。

共产国际所期望于他的，是他能纠正李立三的偏差，担负起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责任。他也从未表示半分踌躇的态度，使共产国际信任他确是游刃有余。谁知后来，他回到中国以后，仍不以第一首脑自居，也许这就是他特别聪明的地方。他仍旧一贯的推重于李立三和瞿秋白，不仅不纠正他们的偏差，有时还附和他们，使共产国际的期望又落了空。

国民党政权的不安定，也助长了“立三路线”的发展，国民党党内军阀的战争连续不断。南京政权统一全国之后，一九二九年三月爆发了蒋介石与桂系的战争；九月有张发奎反南京的战争；十月有蒋冯的战争；十二月又有石友三与唐生智的反南京的战争；一九三〇年春，蒋冯之战又发展为蒋与冯阎之战；这一幕一幕的战争，相因的又产生了工商业的不振，人民负担的加重，工农的痛苦加深，饥民的大量增加等等，酿成整个社会的不安。

当时，苏维埃运动获得可观的发展。一九三〇年初，大小苏维埃区增至十九个，一九三〇年五月间，工农红军增至十三个军，实力约为六万二千人，枪枝约为人数的一半。一九三〇年七月间，蒋与冯阎之战白热化的时候，彭德怀所率领的工农红军第三军于七月二十七日攻下长沙城，占领了五天。这些事使李立三更为乐观，认为革命成功，为期不远了。

八月间李立三制订了一个全盘革命计划，重点是由中共中央发号施令，集中各地红军，再度进攻长沙，并乘势夺取南昌等大城市。他认为中国的革命时机已经成熟，要求共产国际，立即命令外蒙古红军，向平津一带进攻，苏联红军向东三省进攻，以配合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行动。在李立三看来，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苏俄红军为中东路事件与东三省中国军队开火，那时中共曾极力支持苏俄，现在该是苏俄以实力支持中国革命的时候了。

李立三这个计划为共产国际的两个德籍代表所反对。李立三声称作为世界革命大本营的共产国际，应本国际主义的精神，配合中国革命一致行动，如果共产国际不能这样做，他将坚决反对，他忠实于中国革命，就不能忠实于不遵守国际主义的共产国际了。至此，立三路线发展到了最高峰。他无异向斯大林说：如果你只知道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忽视国际主义，不支持中国革命，那你就是犯了右倾的错误。

李立三从此被视为半托洛斯基主义者，当中共政治局会议记录寄到莫斯科时，共产国际的首脑们对于李立三的这套议论，为之大惊失色；尤其是要苏俄卷入战祸一点，表示愤慨，有的说：李立三是不是发疯了？他是不是日本侦探？外蒙古出兵平津，苏俄出兵满洲，正是苏俄所不能做的，而是日本军阀梦寐以求的。李立三的主张无异是予日本军阀以占领满蒙，进攻苏俄的最好借口。有的说：李立三的主张比托洛斯基的还要坏得多，不过他还没有采取行动反对共产国际，至少也算得是半个托洛斯基主

义者。

这份记录也显示了瞿秋白周恩来等人的态度，瞿秋白讨论到李立三这个主张时，并未表示反对意见，只说反共产国际是严重的事，如果真要这样做，先得考虑一切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瞿秋白这句话模棱两可，既可以说是赞成，也可以说是劝阻。共产国际的首脑们，不了解中国人措词的习惯，认为瞿秋白是在助纣为虐，尤为可恶。周恩来也没有反对李立三主张，因而被共产国际很诧异的视为调和派。甚至有人说，看来整个中国支部造反了。

其实，李立三的谬论，是不足为怪的。当时斯大林的蛮干歪风，就是促使李立三向左狂奔的主要原因。斯大林既然打着国际主义的幌子，要求一切共产国际的支部服从他，如今他的徒弟李立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是合于逻辑的发展。但共产国际似乎没有从这个活生生的事件中，获得应有的教训，李立三虽因此倒下去了，盲动主义依旧是中共内部的主要祸害。

李立三的异动给予陈绍禹等米夫派在中共内抬头的机会。恰于此时到达中国的米夫，和那时已经回国的陈绍禹，立即里应外合的行动起来，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的旗帜之下，反对李立三。陈绍禹等因曾受李立三的压抑，早就满肚皮冤气，现在有此机会，自然要磨拳擦掌。同时李立三的盲动主义也太失人心了，国内一班老干部，早已怨声载道，这就形成了米夫等共产国际代表，陈绍禹等留俄学生和国内一些原是支持我的老干部，合作反李立三的局势。

李立三的胡闹所造成的微妙局势，又促成了我的回国。柏金斯基首先去找蔡和森，要求他立即回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蔡和森表示无力负担这个任务，不愿回国。柏金斯基用激将法的口吻向蔡和森说，他和他的同僚都认为蔡是可爱的同志，既能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又能置身于党内纠纷之外，但与张国焘同志相较，负责的勇气则还有逊色。

蔡和森并未因柏金斯基的力劝，而改变初衷，他进而向柏金斯基建议，最好派我回国去。柏金斯基曾问他：此时派张国焘同志回国，是否适宜？蔡和森坚决回答：我保证张国焘同志必能本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完成纠正立三路线错误的任务。

很久未晤面的蔡和森，突然来看我，将他与柏金斯基谈话的经过告诉我，向我说及由于共产国际有意要他回去，他有机会看到了一些机密文件，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知道李立三即将来莫斯科，但立三路线错误的纠正，仍须花很大的气力。现在党内大致有三派，一是李立三、瞿秋白、周恩来等当权派，仍然或多或少的执行过去的错误政策；二是陈绍禹等米夫派，企图脱颖而出，但苦于资望不足；三是何孟雄等老干部派，人多势大，但被目为右倾，这班人支持我，要求共产国际派我回国去。

蔡和森的话，有些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引起我的感触。我反问蔡和森拒绝回国的理由，并说：共产国际首脑们既不让我知道要你回国的事，以及中央的一些内情，他们会相信你的建议，信任我吗？蔡和森却撇开这些问题，迳

行劝告我说：共产国际要你回国去，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我感谢蔡和森的盛意，开始考虑回国的问题，我对于回国的可能性，不敢作过高的期望。代理中国部长的马加尔曾向我说过这样的话：共产国际有能力纠正李立三的错误，并不需要求助于任何中国同志。他这种傲慢态度，也许是故意暗示我不要作回国的打算。我在瞿秋白走后，是中共中央驻莫斯科的唯一代表，但这只不过是名义上的，我仍致力于学习，不问外间事；我也从未为反立三的事表示过兴奋的态度，对于蔡和森所谈到的种种，也未作任何表示。

我决定不放弃回国的机会，至于共产国际是否信任以及我回国能有什么作为等问题，我认为是次要的事情。莫斯科的政治气氛使我痛苦，我要脱离这个樊笼，到浩瀚的祖国去有所施展，不管将会遇着什么困难，甚至丧失生命，我也是不顾虑的。如果必要的话，我愿为此付出代价。

回国的代价显然是放下反共产国际的武器。共产国际所一直希望于我的，是我公开宣告我过去对共产国际的不满是我自己的错误，而现在是不折不扣的拥护共产国际的路线。读者从上文已经知道我一直避免满足这种希望，事到如今，低头认罪，究系心有未甘。无言的接受共产国际关于中大事件的谴责，还可说是被迫接受，现在似是自动承认那不肯应承的过失，更不是味儿，只有回想列宁在其所著"左派幼稚病"中所说"遇着强盗不得不低头"的话，来自我解嘲。我当时要弄清楚的是我公开认错之后，在政治

上要承受一些什么样的约束，这是要从头到尾考虑一番的。

向共产国际表示忠诚然后回国工作，似是我必需做而又无从选择的。我如果表示要留在莫斯科完成我的学习计划，那将被视为是避免公开表明政治态度的托辞，而且显得有点乐不思蜀，将被指为留恋莫斯科，失去斗志。蔡和森曾这样做，我如学样，后果将不堪设想。我如果只愿回国反立三路线，而不愿对共产国际表示忠诚，那将立即成为斗争的主要对象。脱离苦海再说便成为较合理的结论。

从莫斯科看中国的动态，有类瞎子摸象。中国出版的报刊，莫斯科不易见到，那时没有广播，又很少人来往。我当时能够设想的是苏维埃旗帜已在中国南方一些边远地区树立起来了，其真实状况有待回国作再深一层的研究。立三路线所酿成的党内危险急待克服，一般同志的苦难急待解救，这些对我都责无旁贷。我过去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有过和共产国际间的争执，事过情迁失去现实的意义。我大体上必须在、而且能够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既定政策下努力工作。因此我认定为了回国救党，个人受些委屈也是应当的。

我追思三次访问莫斯科的一切，失望的因素是大大的增加了。简略的说我前两次短期观光赤都，（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三年）我的心情除了有类唐僧取经外，还将苏联当作无产阶级的祖国，似乎觉得自己身属其中。那时我虽然有过若干不满，但总以为过失和偏差不能避免，而且可望改善。第三次（一九二八年）重履斯土的时候，大概不满心情积累得太多，数量变质量，我的观感便因而改变了。

我再也不将苏联当作我的祖国，日甚一日的觉得自己身处异邦。我心目中的共产国际，再也不是什么世界革命大本营，而是斯大林鞭策各国共产党人的指挥所。

我于一九二八年夏来到莫斯科，苦恼虽然老是纠缠着我，但我一直以革命志士自比，强自振奋。我要利用流亡在外的机会，锻炼我自己，以便我将来返国，重振旗鼓。我日以继夜的阅读，既要研究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又要对国际动态、苏联真相以及中国近况等等多方探讨，老是觉得头绪纷繁。我的生活简单朴素，也持身严谨。我与人交往，相当谦虚有礼，那种奋发图强的劲儿，也是不少的人可以感觉到的。

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最易作为中国革命的借镜，我自始即注意研究。我所搜集的苏联现状的资料，倒也别具一格。可惜事隔多年，脑海中的俄国地名、人名和确定时间都已模糊，无法公之于世，因此，在本书中也就省略了苏联游记的描画。我认为俄国所发生过的种种，都有俄国的历史根源，富于俄国色彩。列宁主义很像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斯大林虽强调列宁主义的世界意义，但他比诸列宁，俄国气味还要浓厚些。

我自信对斯大林并无偏见，我还很原谅他，对他的作为每以善意去解释，我不以为他是国际共产时我所佩服的能干的统治者，有时痛恨他是残忍的独裁暴君。在我看来，不能因为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制，便去宽恕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即使独裁专政，也应有开明的作法。中国传统的帝王政治思想中，宣扬王道，贬抑霸道，很有道理。作

为政治家，执掌国政，为国为民定下切实可行的大政方针，那是起码的义务。如果利用独裁政制，滥用权力，不择手段，甚至残民以逞，那就一无是处了。

斯大林坚持苏联"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反对托洛斯基世界革命的空谈，无论从那个角度去看都是值得赞许的。俄国那时候较为落后，以往又在历次的对外战争中吃过苦头；十月革命后，又亟须从废墟中重建一切。不论单独一国能否建设社会主义，亦非从事国内建设不可。因此从世界革命退到一国建设社会主义，避免对外战争，相信国力迅速强大乃是自卫和进取的当务之急，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者所应当作得出来的结论。

但斯大林性情粗暴，急功近利，反对布哈林王道的想法，是大错特错了。他过份恐惧外力侵袭，国人反侧，抱定"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之旨，制敌机先，确保胜利。拿他自己的话说，即是要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他在俄共党内消灭托派和右派，反对主义运动的领袖，包括调和派、两面派；进行大清党、大清算；他又在苏联国内，消灭富农，清算专家军人，整肃暗害者；一切的一切，闹得天昏地暗。苏联没有因此灭亡，真是万幸之极。

斯大林缺乏国际知识，似是定论。他的那些第三时期——战争与革命时期、资本主义总危机、社会法西斯等等，都是不切实际的武断想法。在他的淫威之下，共产国际内那些老成持重的人物，如柏金斯基、枯西宁等人，大多噤若寒蝉，不能有所作为；得势的多是小人，像米夫之流。读者只要回味一下斯大林在中国搞苏维埃，和我说及

的米夫一些低级表演，就知道斯大林的胡作胡为到了什么程度。

我的思想已由不满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某些作为，发展到厌恶斯大林的整个领导　我沉默已久，是到了发泄的时机么？明知不能讲理，绝无回天之力，难道要以卵击石么？一切都要我回国去碰运气。我对共产国际表示忠诚后，可以完全遵守我的诺言，不再在过去的问题上批评共产国际；为了顾全大局，反对斯大林的思想也可暂不公开。但根据中国实况，来决定我的作为，那是无论如何不受约束的。

一九三〇年十月中旬，柏金斯基约我见面，郑重的问我：如果共产国际决定派我回国去，我的反应如何？我回答：回中国战场上去与我的伙伴们一同奋斗，实属义不容辞。他欣然的说：那很好；我们相信你是一位好战士，但有一点我必须向你说：你对共产国际的不满由来已久，迄今没有看见你有什么回心转意的表示，我们固然不计较过去的事，却关心你现在是不是拥护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不是会在紧急关头，像李立三一样，也反共产国际？因此，我们希望你有明确的表示。

柏金斯基这番话，自然是代表共产国际首脑们的意旨，并经过克里姆林宫大老板的认可的。他们鉴于九月廿八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三中全会，仍没有克服立三路线的错误，中共党内纷争，依然汹涌，所以才要派我回国去。我本着愿付代价的心情回答他：我决在适当的场合，表示我拥护共产国际的立场。柏金斯基听了我这句话，紧握着我的手，

表示满意。

十月下旬，李立三来到了莫斯科。这位失去用武之地的英雄，闲居下来，没有什么人和他来往，共产国际首脑们大概是要他反省一个短时期。我们每天都见面，往往一谈就是半天。他在国内采取过反对我的态度，但这时我又成为他亲爱的大阿哥了。我不公开指责他的错误，只鼓励他安心的住下来学习。这位个性好动而又风流倜傥的李立三，虽处逆境，仍若无其事的与女朋友们交往，以冲淡他的苦闷。

十一月中旬(约在李立三来后的三星期)，共产国际主席团开会讨论立三路线，被指为半托洛斯基主义者的李立三，首先发言。他高声承认他完全错了；一切对于他的反共产国际和半托洛斯基主义者的指责，他都无条件的接受，认为这是帮助他改正错误。不过他申述他并没有实际作过反共产国际行动，因此他已遵命来莫斯科，接受制裁。他这种从善如流的天才，使人叹服。

有匈牙利的列宁之称的伯拉昆，继起发言，表示不相信李立三已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他讥讽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那么轰轰烈烈的反共产国际，如今又表现得这么忠诚的拥护共产国际，一夜之间判若两人！他以自己为例，追述他从前犯过错误，经过好几年的深思熟虑，才有相当的了解。他要求李立三作深刻的反省，不只口头承认错误就算。

我继伯拉昆之后发言，赞成伯拉昆的说法，认为要真正认识自己的错误，决不是容易的事。我指出我自己在国

共合作时期及以后，对共产国际领导中国革命，曾有若干不满，这些不满多半是出于我自己的错误，最近一年在莫斯科学习的结果，我才认识了这一点。我愿与李立三同志互相鼓励，互相督促，更深一层去了解自己的错误，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的立场，尽自己所应尽的职责。

这次会议发言的人很多，大家都淋漓尽致的检讨李立三的错误，不过并没有作出结论。我在会议上，算是第一次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接着，我就将发言的记录加以修正并署名，当作我承认错误，表示拥护共产国际的声明书。共产国际对于我那次发言，表示满意，我回国的问题因而也获得决定。

在独裁的压力之下，人们的心理多少有些变态。像我这样权宜之计，简直不算一回事。我曾遇见一些人，公开热烈拥护斯大林，但暗中又有很多怨言，这也许是独裁政治必然滋生出来的毛病。我的太太在莫斯科一家印刷工厂做工的时候，厂内的共产党员和同情共产主义的工人们，时常公开高叫"斯大林万岁！"但私下里却向我太太说：我们的老板不好！这种情况，至今在共产国家中，似仍存在着。

我开始办理回国的手续，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和我太太的假护照都办好了。在这段时间内，似乎我已恢复了我原有的地位，人们对我的态度显然有所改善。共产国际交通处长为我办理回国手续甚为周到；早与我有交谊的沙发诺夫这时不再避嫌，常与我滔滔不绝的谈论中国问题；主管中国事务的马加尔对我更是亲善。

在我动身的前几天，马加尔邀我在他家中共进晚餐。

他的住房，小巧精致，颇有点西欧绅士家庭的派头。他向我多方解说：共产国际的任何人，对我不仅没有误会，而且很是器重；希望我回国去放手工作，挽救中共的危机，共产国际将充分支持。这样，我过去被人目为布哈林派，右倾调和派和中大分裂派等等的嫌疑，似是一扫无遗了。

临别马加尔还问我：你回国工作，还有什么困难和疑虑的地方？我想了一想，向他说：关于拥护苏联一点，究应如何进行？他回答说：我想，各兄弟党努力发展他们本国的革命，就是拥护苏俄的最好办法；如果将拥护苏俄当作一项单独工作来进行，将使资本主义者诬蔑我们是苏俄的第五纵队。我答复他：如果都照你这样解释，那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

马加尔是一位自命不凡的理论家，放言高论，有时如脱缰之马，任意奔放。也许就因为多言惹祸，据说他后来终于被斯大林清算掉了。他被清算的消息，曾引起我许多的回忆，也曾因此想起当时共产国际那些风云人物，如柏金斯基等，多数都不知下落了。这些人曾为世界革命，捧过斯大林的场，但终于又被视为乱叫的讨厌的乌鸦。

我行前的态度相当谨慎，从不流露出将有什么雄图，我以一个士兵自居，表示一切决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去奋斗。也许就因为我这种态度，使我能顺利结束了我在莫斯科两年半的生活，重归我的祖国。

① 南京政权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八日进占北京。

② 宋庆龄那年赴莫斯科前曾在上海发表声明书（一九二七年八月廿二日），同年九月六日在莫斯科又一次发表声明（两声明见宋庆龄著《为新中国奋斗》第八页至第十一页及第十四页至第十六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均曾说明这两点。

③ 见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 第十五篇

# 从立三路线到王明路线

# 第 一 章

# 白区党的团结工作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四中全会压抑了立三路线，也严重的打击了一班反立三路线的老干部，并使米夫的党徒陈绍禹等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机构。陈绍禹（即王明）等这些留俄学生中的布尔什维克，受着莫斯科政治气候的影响，经由米夫的直接领导，在中共内部首先推行阴谋诡计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倾的立三路线，又将反立三路线的何孟雄等老干部视为右派，加以排除，结果造成了中共支离破碎的局面。他们由此出发，以莫斯科的教条，统治了中共几达五年之久，成为有名的“王明路线”。我于四中全会闭幕后约十天，到达上海，为了挽救党的危机，只有忍痛号召党内团结。不久，中共的领导重心，又分散转移到各苏维埃区去了。

我的太太也早已厌恶中大的斗争，很想早日归国。一九三〇年圣诞节后，我们由鲁克斯旅社搬到一个秘密住所，搜购一些适用的衣物，从事改装。我们居然得到两张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护照，护照上用的是假名字，籍贯是江苏，年龄相仿，注明系由德国留学返国。我们依照这种身份，改装得维妙维肖。我们虽未到过柏林巴黎等城市，但学习

了那些城市的情况，特别注意街道名称、华侨住所和中国领使馆所在地等等，以便应付查询。我们这种做作，经过一对招待我们的俄国年轻夫妇的考验，认为合格，于是便踏上归程。

我们伪装由柏林动身回国，路经莫斯科，因我的太太患病停留了几天，现在病愈才又从莫斯科上车。一九三一年元旦后的几天，我们坐着撬车到达车站，和普通旅客一样，经过查验护照和换取车票等手续，搭上了东行国际列车的头等卧车。一个俄国乞丐在车站上用俄语向我们讨乞，我们对他摇摇头，表示完全不懂俄文，只给了他几个"哥别克"了事。我猜想这乞丐是奉命来试探我们，是否会在无意中露出形迹。

国际列车的头二等卧车内，多是外国旅客，以日本外交官员为最多。曾有一个日本旅客对我们这一对从莫斯科上车的夫妇，颇感兴趣，想从攀谈中获取一些甚么消息，但他没有如愿以偿。此外，卧车中另一位中国旅客，象北洋的官僚，似乎姓王——我已记不很清楚了。我主动的找他攀谈，我们时常在一道。他似是奉着"关外王"张学良的使命，到欧洲去有所活动之后归来的，所以他不愿吐露他曾旅行过的地点和目的。他大概以为我是南京政府的新贵，对我的旅行目的，也不多所探问。这样，我与王某的接触，对我们夫妇旅行的目的，多少有些掩护作用。

车行到中俄边境，停在一个俄国车站上听候检查。一个我所认识的高高个子姓金的高丽人，是检查员之一，他悄悄的向我说：你沿途发现过甚么可疑人物吗？如果对你

们安全有问题的话，我可以用扣留你们的名义，将你们接下车去。我告以毫无问题，用不着在这里下车。我们的列车经过检查以后，便开到中国境内满洲里车站。

我们夫妇和王某一同在满洲里车站下车；转车赴哈尔滨。不少日本人分布在车站各个通路上，那些熟读人面照片的日本暗探，穿戴着厚厚的皮衣皮帽，连面孔都遮盖着，瞪着眼睛，注视着我们这些旅客，这似乎也引起了王某的反感，他向我说：这里各车站都布满了日本的暗探。

我则别有感触，不觉向王某冲口而出的说：总算回到自己的国土了！王某并没懂得我这话的真正涵意，却接着表示：这是我们的国土呀，南京国民政府老是将东三省当作特别区；其实，这和别个省区相较，不都是一样的吗？他继续说了许多不赞成东三省特殊化和希望南京与奉天消除成见的话。他也露出了他的要人身份，当地军警当局都来伺候他，为他奔走。我这个同行者，也得着他的庇荫，避免了军警的盘问。我想起国内的政治矛盾，居然能为我所利用，这不能不说是意外的事。

我们夫妇很顺利的到达了哈尔滨。王某曾表示要尽地主之谊招待我们，我婉词谢绝了。在哈尔滨下车的时候，王某在一些官吏迎接和军警敬礼声中，步出车站，我们也随着他大摇大摆的出来，避免了军警的检查和日本暗探的噜苏，坐上一辆的士，到了一家白俄旅社投宿。

我们由哈尔滨经大连，搭上一艘日本轮船直赴上海。一切都出乎意外的顺利。但船开航后，一个日本侦探竟麻烦了我们约两个钟头。不知怎样，他似知道了不少我们的

旅行经过，尤其是对于我们在国际列车上坐头等，而此时竟改坐统舱的事，表示奇怪。他故意向我说起官舱内住了一些南京政府的官员，要我去看看他们。这些，都被我一一应付过去了。于是他拿着我们的护照，详细检视，似对护照的真实性有些怀疑。最后，他跟我讲：在大连和日本船上，你们是安全的，放心好了，可是你们在上海上岸时，得特别留心！

这个日本侦探的种种表示，除令我心神不安外，还触发我不少的想像和感慨。那艘轮船在平静的海洋上航行，我置身其间，不敢到舱面上散步，也不敢和我旁边的太太谈论甚么，闷处舱内，那里说得上舒适愉快，但也不妨碍我发泄幻想的幽情。

首先我觉得在大连和日本船上不会有危险的那句话，大致不会是假的。我想起以往瞿秋白周恩来等路经大连时，都曾被日本侦探指出他们的真姓名，但结果并未引起麻烦而获释放了。我设想那侦探很可能也知道我的真姓名，只是在船舱中，众目睽睽，不便多说罢了。日本侵略者的作法，一向是乐于看见中国各派互相残杀。在他们看来，该杀的中共和那不肯就范的蒋介石，彼此厮杀得更为热闹点，该是多有趣呀。如果中共能和李闯王一样打到对方的首都，国民党内也爆出一个吴三桂，使“满清”得以因利乘便的入关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那该多么好。不管时移势易，也许野心家们觉得满清可以这样做，日本皇军当然可以做得更胜一筹。可叹那些勇于内争的中国人，对于外侮之来，觉察得未免过于迟钝。

日本人不仅在南满线上，而且在中东线上大小车站满布暗探，究竟是何居心？我在思考、再思考。他们在这国际通道上的露骨活动，两年半前还不敢公开，现在为何明目张胆，不再掩饰日本攫取东北的野心？果然，九个月后，东北的河山突然变色了。我躺在统舱内的铺位上想起布哈林果有先见之明。我旅居莫斯科时，加拉罕和鲍罗庭都向我谈论过日本侵占满蒙灭亡中国的野心。我又连想到从斯大林到米夫，似都没有重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我猜测他们不会毫无所知，如果不是有意做作，便是不敢触怒日本，或者另有打算，让远东的火山爆发后再看风驶舵。

“在上海上岸时，得特别留心！”这句话老在脑海中打转转。我那时才确切的认识到，在莫斯科住了两年半，对中国近况竟然隔绝得这么厉害，简直成了半聋半瞎，一切都有点惘惘然。我有点后悔为甚么要直奔上海，为何不在哈尔滨多住几天，看看风色，再定行止，绕道往上海，是有多种方法的。在上海上岸时会遇到甚么风险？总想不出头绪来，只有返回现实来设想。我确认南京的断头台是在等候着我，脱离了莫斯科的樊笼，步入危机四伏的“自由天地”，万一有一着之差，就是性命交关的事。我得聚精会神的观察四周的一切，要辨别是否有人识破我们的行藏，要留心旅客们对上海的谈论，以期增加了解，并注意伪装以掩人耳目。我必须竭尽心力，作死里逃生的设想。

真是运气，我们夫妇于一月二十日左右，安然到达上海，住在东方旅馆。几天以前何孟雄等十七个重要老干部就是在那间旅馆内开会被捕的，而我们又适于此时住进那

里，真是无巧不成书。幸好我的太太在我们住进这间旅馆以后的一个钟头，就在马路上遇着了沈泽民，使我们很快的与中共中央联络上，并获知了何孟雄等被捕的不幸消息。我们立即离开旅馆，搬到中央组织部暂住。在那里我会见了新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赵云（即康生）和秘书陈铁铮（现名孔原）等人。

那些同志见着我，便向我叙述何孟雄等的被捕经过。何孟雄任过上海区委书记，他与担任重要宣传工作的林育南及任少共中央常委的李求实等十七个重要干部，因反对米夫派陈绍禹等，假东方旅馆一个房间秘密集会，竟全体被捕，这件事震动一时。他们向我叙述的最初谈话中，沈泽民默默寡言，也不敢直说何孟雄等是右派和反党；赵云、陈铁铮等都为这些同志的不幸而悲伤，也深恐牵连中共所有机构和同志的安全。尤其令他们担心的，是一般同志的不满情绪和有些同志竟树起了反中央的旗帜。主持全国总工会的罗章龙，主持海员工会的陈郁和上海区委委员徐锡根、余飞、王克全等，都不满四中全会的决议，反对米夫派的行为，已有一些分裂性的活动。这在显示，受尽折磨的中共似乎已频于灭亡的边缘。

我一到上海就遇着这次重大变故，不禁叫苦连天。我悔恨来迟了。假如我能早到两个星期，那些不幸事件也许可以避免。何孟雄等都是我的老战友，而且是公开支持我的，如果我在四中全会上能够表达他们的意见，抑制一下米夫、陈绍禹等的胡闹，他们何至冒险，另行秘密集会？现在事已至此，只有赶快了解情况，速谋补救。

当天我又会见了周恩来，他熟悉全盘情况，态度也颇持平。他对何孟雄等的被捕极为难过，他认为如果我能早到，和他们事先谈谈，可能一切迎刃而解。他指出四中全会的政治决议①是不错的，即何孟雄等对之亦无异议；他自己也在会上承认了对立三路线采取调和态度的错误，他这一自白为会众所满意，因而继续担任中央工作。他说明何孟雄等所不满意的，是陈绍禹等留俄学生毫无历练，就迳行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因而反对四中全会关于中央人选的决定。现在罗章龙等同志对于何孟雄等的被捕，发生极大误会，竟认为是由于陈绍禹的告密而遭暗害。周恩来说话素来是四平八稳的，只说明事态的要点，不轻易表示自己的意见。他那次也是这样，对何孟雄、罗章龙、米夫、陈绍禹等人都不加褒贬，对此严重局势，也保持平静。但他也忍不住要求我向各方解释误会。

周恩来还告诉我，四中全会后，米夫偕陈绍禹即赶回莫斯科去了，现在代理米夫职务的是一位波兰同志。他要安排一个时间，约我和那位波兰同志会面。周恩来并未向我说明米夫和陈绍禹为甚么匆匆的赶回莫斯科去，我猜想他们是将四中全会的结果，尽先去获致克里姆林宫主人的认可。也许米夫这个小官僚所最注意的，是他自己在莫斯科的地位，而不是真想对中国革命有所贡献。他在共产国际内，居中国革命指导者的地位，这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在中共中央内，他的亲信门徒已占据要津，在他身边又有陈绍禹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资格与他互相唱和。从此他大可为所欲为，青云直上了。

第二天晚上，我和周恩来同去看那位波兰同志——这个人我就只见过一次，名字也已忘记了。他说明他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后，便开始板着面孔向我说：你是何孟雄那些反党分子所拥护的人，你是否拥护四中全会的决议，请明白表示。假若你不赞成，共产国际准备将你撵出中央政治局。周恩来在旁听着，似也觉得有点不象话，因此抢着说了几句为我解释的话。我抑制住我的愤怒，故意面对着周恩来说：我回国是准备和同志们一道奋斗的，并不是来闹纠纷的，共产国际也表示过对我信任。

那个冒失的波兰青年不看风色，又喋喋不休的说了一些反右派的话，他竟主张用暗杀手段对付罗章龙。他对何孟雄等的被捕，不特毫无同情，反说那些反党分子是自投罗网。他认为罗章龙是何孟雄等的智囊，现在又发表反党言论，因而要立即予以制裁，用极机密的手段消灭这可恶的反对者。周恩来对此不置可否，但曾说到：现在党内意见纷歧，需要分别疏通，不可逼使反对者走到反党方面去，张国焘同志回国了，我们正好在这方面一致努力。那位波兰人听了周恩来的话，无词以对，我们的会谈，至此也就不欢而散。

我对那波兰人的印象十分恶劣，我叹惜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代表，竟是一代不如一代。我觉得他不过是米夫手下的小卒，只知玩弄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手腕，残害反对者。他们将莫斯科的斗争作风，硬生生的移到中共地下组织里来，这是会毁灭中共的。我想到共产国际对我没有诚意，我不相信那位波兰人对我的态度是自作主张的表现；

大概共产国际在玩弄两面手法：当面对我表示信任送我归国，然后又给他的代表以另一种秘密指示。也许立三路线没有纠正以前，它有求于我，四中全会后，便又觉得不再需要我了。而它那个蠢才代表，不过对那个秘密指示冒失的向我背诵出来罢了。

这件事刺痛了我的心，使我整夜不能入睡。我讨厌共产国际，叹息它变质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从那个波兰人的那种杀气腾腾的言词和气派看来，那是甚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同志们指责和怀疑米夫和陈绍禹等暗害了何孟雄等十七位老干部的话，似也不是任意捏造。米夫不等我回国，就召开中共第四次全会，用独裁手段将陈绍禹等安置到中共中央及其各级机构去，粗暴打击何孟雄等。他们做了这些见不得人的事，又在我回国到上海的前夕，急忙溜之大吉。这一切的表现，是何等的丑恶。

我详加分析，便觉米夫等这些罪行的发生决非偶然，而是独裁专政的必然后果。共产专政制度产生了玩弄权力的斯大林暴君，理想和道义早被淹没了，正人君子大多无法立足，高高在上的暴君需要一群鹰犬，来现实他的独裁权力，自然有一群逢迎权势的群小，象米夫那样的小丑，任意胡作非为。那不信任我的共产国际和米夫这样的对头，他们决不会放过我这个富有正义感的人，因而我的前途将会荆棘丛生。我觉得即使极度忍让，也将难逃厄运。我在莫斯科时，曾以书面对共产国际表示过忠诚，我也曾决意谨守诺言。但现在共产国际，对我这样背信弃义，我如果反抗，也是义正词严的。

我素来将中共和共产国际分别看待，我对中共有难以形容的感情。好像中共是我亲生的儿子，我一直全心全意爱护它。最初我觉得这小孩子发育得很好，后来经过数不清的变故，我的期望减少了．有点觉得这孩子多灾多难，不太长进。我和任何父亲的心情一样，孩子虽不争气，但仍然是自己的儿子。我最痛恨斯大林对待自己的同志采取残暴的手段，我向来是反其道而行之，对自己的战友采取友爱和宽容的态度。因此，我一向不将陈绍禹与米夫等量齐观。我认为陈绍禹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不过是在米夫错误领导之下，犯了不少的过失。现在在中国极端白色恐怖之下，他们既然准备冒死奋斗，将有逐渐改过的机会，我不应排斥他们．宜大量宽容，不究既往。

我当时采取的方针，就是在这种复杂的心情下取决的。我曾设想如果当时揭发米夫派的罪恶，要求立即举行中共五中全会，将陈绍禹这一群撵出中共中央，局面将会难于收拾。如果何孟雄等没有被捕，或许我可以这样做，现在没有了他们，那就煞费考虑了。因此我的答案是“投鼠必须忌器”！换句话说，就是决不能使中共陷入更大的混乱，甚至万劫不复的境地。我也曾反躬自问，我能脱离这些是非，置身事外吗？我能消极下去，甚至脱离中共的战线吗？答案是：不可能！主要是不忍见中共就此完蛋。我的结论，是应当忍受牺牲，从事积极挽救中共的工作。任何其他的设想，都是行不通的。当时要急救中共，就只有根据四中全会已有的决议，号召党内团结，消除纷争。我明知这样做的一个副作用，将会稳定米夫派在中共中央的地位，但

当时也顾不了这些，只有从危机中挽救了中共再说。

中共六次代表大会后，向忠发一直担任总书记。因为他无能，他几乎被人忘记了。李立三任宣传部长时，中共中央的事大多由他决定。现在李立三倒下去了，中共中央形成周恩来与陈绍禹合作的局面；重要的事大多取决于周恩来。我这次会见向忠发时，觉得他仍是遇事说不出一个要领，除表示拥护共产国际的路线以外，便没有甚么确切的主张。

中共第六次大会所选举出来的政治局，到那时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瞿秋白的政治局委员资格，由四中全会取消了；但我仍尽先去拜访他，请教他对党事的意见，他不愿多谈，只表示将从事写作，意态消沉。李立三蔡和森则在莫斯科，他们的政治局委员资格也先后失掉了。项英那时已到江西苏区。剩下的只有向忠发周恩来和我三人。四中全会将非中央委员的陈绍禹补选为政治局委员，这是最为人反对的事；他又随米夫到莫斯科去了。四中全会也将中央各机构改组：组织部长由老干部赵云担任，宣传部由留俄学生张闻天沈泽民负责，工运由杨尚昆（留俄学生）代替项英，少共中央书记则由秦邦宪（留俄学生）接替任弼时（他已去苏区）。

在这种局面之下，我遇事只有和周恩来商谈，而我和周恩来的一切商定，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我曾向周恩来说明我要号召党内团结的意向。我不赞成将抱有不同意见或犯过错误的同志斗争掉，主张爱惜他们，说服他们，信任他们。只有少数执迷不悟的，坚持反对四中全会、破坏

团结的同志，才应受到制裁，但也不能采用超纪律的手段。中央自身也应有所调整，不要使同志们觉得有某些人在把持。周恩来赞成我的意见，并应允分别采取具体措施来实现。

我第一次参加的政治局会议，约在我到上海后的第五天，出席的人，除我们三个政治局委员以外，还有秦邦宪赵云张闻天杨尚昆等。（这种并非由政治局委员以平等权利参加的会议，是四中全会后的创例）。周恩来首先以便于秘密开会为理由，提议由向忠发张国焘周恩来等三人组成常委会，为最高决策机关；其余中央各部主管人，根据常会决定，进行工作，但必要时得列席常会，讨论有关其主管的事务。这个提议很顺利的通过了，其作用是为了使那些新进的领导人物退让一步，以缓和党内反米夫派的气氛。

我和周恩来分别向一般同志进行说服工作。我与不少同志个别谈话，间或参加支部小组会议。我向他们说明我的团结方针和努力的经过，对于他们有过的反对意见不予责备，但强调现在同志们除团结奋斗外，别无出路。我这样做，收到很好的效果。同志间彼此不满的情绪减低了，相互间的信任逐渐恢复。例如当时反对四中全会决议的陈郁，态度有所改变，就是明显的例子。但罗章龙则极力避免和我见面，我想说服他的企图终于失败了。结果他仍是被开除党籍，使我不无挥泪斩马谡之叹。

周恩来进行团结工作，所遭遇的困难远过于我。譬如黄警魂的事，就是一个例子。黄系黄埔第一期学生，是周恩来的好友，一直在他所领导的军事部担任重要工作，因

受不住党内斗争的打击，企图回到他的蒋校长那里去工作。周恩来进行说服无效之后，竟把他当作叛徒处决了。事后，周恩来向我叹惜的述及黄警魂这个叛徒，因反立三路线受到打击，竟由悲观失望走上了叛徒的道路，这是很痛心的事。当时的激烈残酷斗争，于此可见一班。

黄警魂的事，使我大吃一惊。周恩来见我难过，又向我补充说，黄警魂有一亲笔信，向蒋校长表示要弃暗投明，立功赎罪，并曾当面承认信是他写的，经过再三劝说，仍倔强的坚持原意。至此周恩来认为证据确凿，时机紧迫，乃断然处置，“先斩后奏”。但周恩来从未向我叙述怎样搜到黄警魂的信件和用甚么方法处决他，这大概是周恩来所主持的特务工作的秘密吧。我曾板起面孔向周恩来说：中共纪律的最高制裁是开除党籍，决不可像握有政权的苏共那样动辄采取非常手段。周恩来也曾向我解释，以前没有这样做过，这还是第一次。只用以对付立即可能危害全党的叛徒，决不宜用之于抱有不同意见的反党分子。当时罗章龙那些反党分子，没有受到超纪律的处置，也许就是这些话的结果。但这也仅收效一时，后来独裁的毒手，特务的伎俩，还是以势不可当的气势发展下去。

中共四中全会后，中共暴露出种种危机，其中最突出的是陈绍禹等之上台和何孟雄等被捕。此外还有许多重要的事是一般同志所不知道的。像黄警魂的被杀和那波兰人的态度，始终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也从未向外宣泄过。现在让我就许多同志向我谈到的，而我又大致可以记忆的，概述一下，以了解当时中共内部的状况。

当时多数同志的谈论以何孟雄为中心。读者或能记忆何孟雄是最初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支部和中共北京支部的一员，虽然没有同我经常一起共事，但自始就是我的亲密战友。一九二七年何孟雄在李大钊等被害后，不能在北方立足，调到上海工作，历任上海区委委员等重要职位，曾一度担任中共上海区委书记，与李立三常有争论，因而成为老干部派的代言人。一般同志提起何孟雄就会联想到在莫斯科的张国焘、蔡和森，在江西苏区的毛泽东、项英，以及在北方的刘少奇等，有点老干部的味儿。如果谈到反立三路线，往往会叙述何孟雄是怎样怎样说过的。似乎在中共多数中坚干部的心目中，何孟雄一度是中共正统派的代表。

一九二八年，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后，原系反对瞿秋白盲动主义的何孟雄，根据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指责李立三没有遵照决议实行。一九二九年，蔡和森被撵出中共中央的时候，何孟雄进而指责李立三违反了第六次大会的决议，其所作所为，实是瞿秋白盲动主义的继续。到了一九三〇年上半年，何孟雄更进而策划推翻李立三的统治。他指责李立三使中共蒙受重大的损害。在何孟雄看来，这些年国民党内斗不已，军阀战争，愈演愈烈，实予中共很多复兴的机会。由于李立三的错误，中共不但没有乘机获得充分发展，而且不断遭受许多挫折。何孟雄瞧不起李立三，不信任他的领导能力，说他只是一个煽动家，根本不能做舵手，如果再让他胡闹下去，中共就会完蛋了。

我所遇见的同志，都没有提到李立三之要求苏联出兵

东北、外蒙，进攻京津，来配合他夺取武汉的那个“天才计划”。这是共产国际极为愤怒的事，似乎没有人知道。也很少人说到应联合富农抑或反对富农的问题，似乎这都是莫斯科的清谈。何孟雄及一般同志所知道的，是李立三那些革命高潮之类的左倾空谈。他们多根据日常体念和切身痛苦来批评李立三。他们讽刺李立三这尊大炮只会吹牛，一味言过其实，好大喜功，揠苗助长。他们举出很多实际的例子，例如应该在若干大城市发动工人和知识分子，为这件事或那件事来反对国民党之类，但李立三若非不重视，便是只凭主观乱搞一通。比如，某一个工厂的工人，因为切身痛苦而酝酿罢工，李立三硬要提出一些工人不能接受的过高要求，所得的结果，往往是吓走了工人群众，不但罢工不成，而且使到有些中共党员和工人活动分子因而被捕和被开除等等祸害。在农村中也是一样，不让企图再起的农民有准备力量的机会，老是命令他们作力不胜任的进攻。总之，那些满怀郁抑的同志们，常这样慨叹：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共在广大工农群众和知识青年中，已培植了相当基础，虽经清党反共和白色恐怖的残酷镇压，仍在各处埋藏和保留着不少的根苗，经过瞿秋白、李立三的胡闹，这些根苗也几乎丧失殆尽了。

李立三朝夕梦想凭苏维埃和红军来打天下，虽也获致可观的发展，但一般同志还是认为他坐失良机，没有达到更好的成绩。我没有听见过同志们根本反对苏维埃路线的说法（当时只有托洛斯基派曾这样说）。一般同志大多认为苏维埃路线是既成事实，或者说要反对国民党，那就非要

竖起苏维埃的旗帜不可。一般批评都集中指出李立三对此作法甚有偏差。同志讥讽李立三专爱发号施令，中毒之深，似是他生活中的鸦片烟瘾一样。他务虚名而不求实际，重量而不重质。他坐在那间秘密的办公室中，俨如统帅，颁发军队番号，签署委任状。譬如某一地区有几名游击队，他便委派一名司令；某一地区如果有百人左右，他就颁发一个师或军的番号。因此他纸上的兵力，总在不断增加，革命也就高涨起来。李立三于是左一个命令，右一个命令，指挥今天进攻这里，明天又进攻那里；或者，凭他的主观，指示甚么应当做，甚么不应当做，声斥这样，褒奖那样，忙个不停。至于如何进行土地革命，如何用各种方式组织农民斗争，训练各种人才，充实苏维埃，协助解决各种困难，实际掌握红军，增强战斗力量等等，李立三不是不去刻苦研究，便是不够重视。

李立三一向爱搞甚么行动委员会，一九二二年，领导安源矿工罢工和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时，都曾这样做过。一九三〇年六七月间，当他认定中国革命形势已经成熟，须在全国范围内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时候，更命令所有中共各地组织、少共和工会等等都混合起来，组织成行动委员会。所谓行动委员会，即是暴动指挥部，其组织人员，由李立三自上而下指定，其所进行的工作，也是直接有关暴动行动的。李立三这种作法，遭受何孟雄等的反对，也使共产国际大伤脑筋。他们都认为李立三根本违反了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即是取销了中共、少共和工会的经常工作，如争取群众、宣传、组织、教育、训练等等日

常工作。一句话，没有这些经常工作，即等于根本取销了这些组织。

一般同志更讨厌李立三乱发命令，任意惩罚的作风，指斥他蹂躏了党内民主。他们形容从前瞿秋白惩罚同志的时候，有点阴森森的，如今李立三却有点耀武扬威的气概。李立三撵走蔡和森，开除陈独秀，都做得有声有色。虽然不少同志因此消极了，或者走上托洛斯基的道路，幸而还没有伤害到中共的根基。中共一般中坚干部，多是与李立三同起同坐的老战友，应该是不能随便撵走或任意开除的。李立三老是怒责他们右倾或是机会主义的残余。但实际惩罚，除了调动职务、降级、警告、留党察看等等外，也别无其他办法了。不少同志，形容李立三粗枝大叶。他从前搞职工运动的时候，老是打冲锋、放大炮，刘少奇总跟在后面替他收拾烂摊子。如今他坐上了中共中央领导的宝座，仍然一味唱黑头，周恩来跟在他后面埋头苦干。当时中共中央的实际情况，只有周恩来知道，一切实权都在周恩来掌握中。他也不完全了解各地中共组织的活动实况。同志们的不满情绪，他也不完全知道。甚至何孟雄等酝酿反对他，他也不深知其原委。也有同志这样说过：幸好他粗枝大叶，不然更不得了。

许多同志也埋怨周恩来，说他没有尽力纠正李立三的错误，一味追随李立三。有些同志指出，只有周恩来能够影响李立三，甚至可以左右他的动向。他也了解一些李立三的错误，有时也会在不动声色之中加以修正，但从不与李立三正面冲突。他比较了解中共各级组织的情况，也知

道若干同志对李立三的不满，他不是故作痴聋，就是不着边际的解释几句。日子久了，同志们也就不指望他能够改弦更张。有些同志，说周恩来的性格圆滑，为了避免是非上身，不敢负起他应负的责任。有人说周恩来和李立三是半斤八两。自一九二四年，他从法国归来后，就进入黄埔搞军队工作，没有参加过领导群众的基层任务。不懂领导群众的艺术，只知招兵买马，因而他的思想与李立三极为接近，又怎能希望他纠正李立三那种军事冒险的作风。

一九三〇年上半年，在莫斯科大清党以后，陈绍禹等即陆续返国，李立三对他们所采取的压抑手段，陈绍禹等也曾表示过反对。该年夏天米夫也来到中国，他奉共产国际的命令，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指导中共，并纠正李立三的错误。这样，米夫派就完全卷入了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之中。

陈绍禹等返国后，多派到上海区委属下的各分支机构担任较低级的工作，因而与原在上海区委内工作的何孟雄多所接触。在何孟雄与陈绍禹最初几次谈话中间，即发现彼此意见极为接近。何孟雄强调必须本身力量充实和坚强起来，才能获致胜利，陈绍禹说明共产国际主张巩固苏维埃根据地，扩大和充实红军以及在广大国民党统治区域争取群众的政策，并指斥李立三对于此一政策诸多违反。他们这样彼此唱和，一个了解实况，一个引经据典，登时成了志同道合的战友。在米夫来到上海之后，陈绍禹以充当翻译之故，建立了彼此经常接触的关系。在事态发展中，陈绍禹因能居间勾通米夫与何孟雄的关系，陈曾向何吹嘘

米夫，也向米夫说明何的主张和他在中共的潜势力。

关于对米夫陈绍禹等的态度，一般老干部发生了不同的意见。大体说来，何孟雄认为米夫主持中大，亟谋训练一批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成为中共的领导骨干，似乎未可厚非。何也觉得米夫除反瞿秋白外，没有过分排斥张国焘等的言论，大致是可信的。何认为陈绍禹等确是懂得马列主张，再经过一番锻炼，将可大用，因为老干部应以宽大胸怀，奖励后进，不可因小故而有歧视之意。何认为推翻李立三的统治是首要任务，并应提携陈绍禹等人，再经过陈绍禹来打通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米夫等人的关系；如此共策进行，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罗章龙当时极力反对何孟雄的看法和作法。罗曾赴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亲自领教过米夫的手法，因向何孟雄指出，米夫趋炎附势，那里有甚么领导中国革命的抱负，不过在反拉狄克斗争中，在维持他本人在中大的统治的挣扎中，俨然是一个马列主义的口头革命家，在那里猎取权势的朋党而已。现在他又因利乘便，利用此朋党来控制中共。陈绍禹等走入了米夫的邪门，如疯狗一样，逢人便咬，那里能干得出好事来。在罗章龙看来，决不可联络米夫派去反立三路线，宁可让李立三统治中共中央十年八载，也不可让米夫派在中共当权。

米夫和陈绍禹等的名誉是太不好了。中共内部没有人为他们说好话，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则根据中大斗争的经过指责他们。但因为大多数人不能忍受李立三的胡闹，对陈绍禹等便存有原谅与容忍的忠厚心理，因而很多就与

何孟雄采取同一步调。就因为这件事，罗章龙日益消极，终于一步一步脱离中共，在沉痛心情之下，不愿和我见面再谈论此事。就因为这些事情，何孟雄所领导的反李立三运动也显得有些不够坚强。一九三〇年九月间，中共三中全会未能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来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这次全会除表面接受共产国际政治指示外，李立三瞿秋白等仍控制中共中央，当权如故，反指斥何孟雄陈绍禹为右倾反党分子。这就使共产国际觉得立三路线的顽强，须采取进一步干涉中共的手段，一面调李立三到莫斯科去，一面策划举行另一次四中全会，改组中共中央。

陈绍禹等初时对何孟雄极力表示友好，遇事推崇老干部，因而他们合作日趋密切，彼此讨论到代替李立三的人选问题。何孟雄似不止一次透过陈绍禹转告米夫要求我回国之意。到了三中全会后，何孟雄曾具体提出李立三瞿秋白都须退出中共中央，由我和蔡和森回国继续负领导中央之职责，周恩来只有在改正错误后，才可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何孟雄曾向陈绍禹表明，他们自身领导反立三路线，应避免争权之嫌，何况又不是中央委员，按理不能成为政治局委员，因而应在原来中委中选出二人来继任李、瞿的遗缺。接着何孟雄又以三十几个老干部的名义，要求共产国际派我和蔡和森回国，这就是柏金斯基找蔡和森和我谈话并派我回国之由来。

也许就因为何孟雄对我的拥戴，为米夫所最不愿闻，因而使出了阴险的绝招。米夫联络好了周恩来，在四中全会上让周恩来认错得到会众的宽容后，通过政治决议，周

恩来即以征得共产国际同意的名义，提出补选陈绍禹为政治局委员，以及张闻天秦邦宪等出任中央要职的议案。何孟雄当即起而反对。接着陈绍禹突然改变态度，指斥何孟雄等为右派，表示在克服了左倾的立三路线之后，应立即转过头来反对主要危险的右派；又说何孟雄刚才反对共产国际的表示，简直是公然反党。

经过一番争吵，四中全会也就一哄而散，未经表决，陈绍禹等就这样打进了中共中央。如果不是国民党帮了米夫陈绍禹等的大忙，消灭了何孟雄这一批人，陈绍禹的江山又那里能坐得稳。事情如此这般的过去了，只留下一些中共老同志在那里叹惜伤感。他们是否会不约而同的想到，专政是玩弄不得的，决不会局限于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对付阶级敌人的必要方面，必然会用来在共产党内争夺权力，必然会发生米夫陈绍禹等在中共四中全会上表演夺帅印的那样一幕。

虽然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去了解从立三路线到王明路线的种种经历，但上面所说及的演变轮廓却是相当清楚的。一般同志都知道我在莫斯科曾吃尽米夫派的苦头，现在苦心孤诣讲团结，自易收一时之效。我当时所讲的话，指出这些年来我们的损失大极了，现在还剩下一点点，不要在我们的手中断送光了；失去了何孟雄等，已是无法挽救，谨防再因内部纠纷招致更多损害；现在只有忘记某些惨痛的过去，减少互相猜疑，让我们团结奋斗吧。当时由于我的这些感动人的话，掩盖了米夫陈绍禹等一切罪行。但他们所种下的恶果，几年之后，仍然使他们垮了下来，

后来毛泽东在延安的整风就是针对他们而发的。如果我们再想一下现在中苏关系恶化的历史根源，米夫派的“德政”不会不活生生的遗留在中共首脑们的心目中。

中共内部的危机不仅限于上海，显已普及到每一角落，其中尤以中共北方各省组织的反中央倾向最为可虑。以中共北京区委为中心的中共北方各省组织，自一九二七年四月李大钊等被杀害后，又接连遭受过若干次摧残，中共中央似也没有大力援助过它们，后来李立三老是指斥北方区委右倾，引起多次争吵，因此弄得彼此关系恶劣。我把上海方面的党内紧张空气扭转以后，即建议到北方去一趟，举行一次北方区委紧急会议，从事挽救。我此行在当时是十分冒险的，但也没有别人可以代替。我的建议，经中央同意并作了一些必要的安排以后，二月中旬，我就循海道直航天津。

我到达天津后，立即去找设在日租界的中共秘密交通站，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联络地点。我在交通站内，会见了一对我所不认识的青年夫妇，从他们口里我知道这地点极不安全，他们正准备迁移。他们埋怨中共没有为他们的安全着想，一切都是因陋就简。他们知道了我是住在法租界一家旅社里，来时又直接经过日租界的大马路，他们很为我的安全耽心，因为在那条大马路的路口上，有一个叛徒张开运②经常守在那里，专门猎取中共人员。

我知道了这对青年夫妇的不安心理，曾多方予以鼓励。他们告诉我应邀前来与我会晤的同志们，多数可于当天由北京等地赶来，至于会议的地点，除这里外，他们以为并

没有更适当的地方，因而我决定明天一早，就在这个交通站举行会议，并要他们假装过生日，让到会人们充当祝寿的亲友，以掩耳目，他们也告诉我下次来时，如何绕道避免经过日租界大马路。

第二天一早，我首先到达这个开会地点，应邀来的同志接着陆续来了。参加会议的连我在内共有九人，聚在楼上的卧室内，围着一张方桌，桌上还摆有麻将牌九等赌具，以备必要时作为掩饰。那对充当主人的青年夫妇，则在楼下应付。

担任会议主席的是北方区委书记陈原道，他在一九二七年，任过中共河南区委的组织部长，曾在莫斯科中大就读，也是反米夫派的重要分子，于一九二九年初归国，参加北区工作，后来升到区委书记。其余到会的多是从北京来的，太原开封各有一人参加，济南西安等地的同志则未赶到（到会者的名字，我已记不清了，也许现在北京任要职的人中，有参加过这次会议的）。

会议开始后，到会者都觉得为了安全起见，应节省时间，尽早结束。我则认为这次会议举行不易，应尽量发言，不受时间限制；我建议到会者，脱掉皮鞋，以免走路声传到隔壁去；不要吸烟，以免烟雾从窗口冒出；低声讲话，不要引起邻人的注意；我还鼓励他们自由发言，不要有任何顾忌，以便将长时间积下来的问题，一一澄清。我的这些建议，使与会者精神为之一快。到会者的发言非常动人，他们所追述的事，有些为我闻所未闻。有人追述到北方各地组织，自李大钊先生被害以后，遭受敌人的种种摧残，

为之凄然泪下。有的指出八七会议后的中央，对北方组织颇有歧视，仿佛这是机会主义影响较深的地区，不禁愤慨叹惜。有的以党内纷争和同志们不满情绪为虑，并举一九二八年少共北京市委书记张金彪(即张慕陶)，利用托派口号，带走四十多个团员，另行组织一个少共中央，形成分裂的局面为例。他们纷纷批评李立三在六次代表会议以后，不顾北京实况，乱发命令，如某一同志新到国民党军队中任下级军官，李立三即命令他发动兵变，这无异是白白送死；同时他又命令北方组织，配合南方各处的暴动计划，要求他们做些破坏交通等工作，这种任务不仅毫无意义，而且耽误了北方组织本身争取群众的独立任务。北方区委为此曾多次表示过异议，但被中央斥为机会主义。

北京区委执行李立三命令的结果，是组织被破坏，同志被逮捕，而李立三却又无法善后。北方区委得不到中央的支援，即有所请求，也十九是碰钉子。李立三这种鞭策同志的作风，引起了同志们的离心倾向。同志们有的消极了，有的抗不遵令，甚至会议都很少人出席，纪律也废弛了。“党既不爱护党员，党员为何要服从党。”这句话是北方同志那时常说的。他们这次要求我设法改善中央这种作风，并赋予北方区委以实现本身任务的较多权力。

他们对于四中全会是否克服了立三路线，颇有怀疑；对于陈绍禹等的当权，深感危惧。曾有人询及四中全会后，是不是中央完全为米夫派所控制？周恩来是不是成了米夫派的傀儡？何孟雄等的被捕是不是米夫派的告密？也有人问我：“你这次回国，有何善策挽救党的危机？”

当时，我十分难过，热泪也不禁夺眶而出。我极力安慰他们，并说明我的看法。我要求大家忘记过去，一致团结，从新做起。我的这些话得到陈原道的热烈响应，他表示相信我能挽救北方组织的危机，要求到会者提出各项具体的建议。

经过几个钟头讨论，我把种种意见归纳起来并作出结论，大要是：一、以前中央各种错误指示概行无效，同志们因不满这些指示而受到的谴责和处罚，除张慕陶那一班人外，一律取消。二、此后工作应遵照六次代表大会、四中全会和这次北方区委紧急会议的决议进行。三、北方区委及其属下各级组织，应注重联络暗藏在各工厂各铁路各学校以及农村中和军队中的同志和同情分子，致力于秘密组织工作，扭转消极气氛，利用反对帝国主义的热情和群众的切身利益的要求，展开活动，争取群众；并注重领导陕西及其他各地游击战争的发展。四、北方工作具体进行步骤应根据北方实情决定，中央应尊重北方区委意见；北方区委也要尊重所属各级组织的意见。五、分配同志工作的时候，应尊重同志的自愿，顾及他们的安全。在环境允许的条件下，扩大党内的民主。六、如同志不幸被捕，应极力援救，对被捕者的家属，也要有适当的援助。

参加会议的同志对于这些结论十分满意；有的觉得是重见天日，有的表示各地组织将因此恢复元气，有的说这是“热”和“爱”代替了“鞭”和“剑”。我也说明北方组织如果能做好这些初步基本工作，不难实现在北方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任务。

我们的会议到夜晚才结束，到会者所提出个别的具体问题，都一一获得适当的解决，分别离去。我和陈原道最后才离开那里。临行他向我表示今天一切都圆满解决了。他要我尽早返沪，他将根据今天的结论分别作成书面决议，呈报中央并通告各地组织。晚十时左右，我们才握手告别。我此后没有再见过他，也不知道他是何时丧失了生命的。

翌日，我仍循海道返回上海，向中央作了此行的交代。不几天，北方区委关于这次会议的正式报告，也送达到了中央，表示拥护中央的领导，遵照这次的决议行事。北方区委这样的表示，是这一两年所没有过的事，因此，中央同志都为之欣慰；同时，这件事在其他各地同志间，也引起了良好的影响。这样，党内洋溢着和谐的气氛。

我在上海天津这些活动，感动了向忠发。他向我说：我从前骂过你是机会主义者，现在才知道你对党有这么大的贡献，因而我相信你真实的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他这是由衷之言，但我觉得我的这些工作，依理说来于党固属有利，可不一定是共产国际的路线。事实上，我的这些努力，也许对于刘少奇以后的白区地下工作的成就，不无助力；但在我离开中共后，经过那些留俄学生的教条主义的残害，这点助力，也就大大减色了。

① 四中全会决议案全文见：南昌行营编的《赤匪反动文件汇编》第二册 第四二四页至第四三四页。

② 张开运是留俄的华侨，加入俄共后转为中共党员，曾为沙发诺夫所赏识，和我相识。他在北方工作了一个时期。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他成为北方著名的反共行动分子。

# 第 二 章

# 移向苏维埃区域

一九三一年初，中共的苏维埃运动获得可观的发展，尤其是军事上的胜利，该年一月间，江西的红军在永丰龙冈一带，消灭国民党军队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张本人被俘，缴枪四千余支，冲破了国民党对江西红军的第一次围剿。同时，鄂豫边的红军，也在九里关一带消灭了岳维峻师的大部，岳本人被俘，获枪两千余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各大城市的原有根基，历来是中共的支柱，已残破不堪，而这些边远地区的军事胜利使得我们大为兴奋，认为苏维埃的曙光已现。中共中央常委会不愿坐失时机，因而决定将中共的主力移向苏区。

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相继失败后，其所剩下来的残部都退向偏僻的山区，开始游击的生活。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重视这些游击队的活动，认为这在中国苏维埃运动上，是有其伟大的前途的。六大政治决议案指出：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新高潮之下，革命应先在一省或几个重要省区之内胜利。不过这个决议案又警告，这还只是一种展望，目前尚没有实现的可能。

一九二九——三〇年间，散处各地的中共游击队，克服了重大的困难，继续不断的在发展。国民党内各派军人内战不已，是促成这些发展的主要原因。立三路线的形成也是以这同一客观环境为背景的，李立三一向夸大这些发展，特别在一九三〇年七月间，彭德怀部一度攻下长沙之后，更鼓舞着他向前冒进。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是到来了，各地革命的形势已趋于平衡的发展，现在，不仅要攻取大城市，获得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而且在苏俄军事支持的条件下，要获致全国范围的胜利。

当时国民党削平群雄的战争，于一九三〇年九月间暂告结束，国民党虽还没有完成统一，显然代表最大军事势力的蒋介石是战胜了，国民党的地位也因而大大加强了。中共的苏维埃政策，限制了它自己，使它不能在连续不已的国民党内战中捞上几把。单凭游击战争打天下，虽然乘机获得一些零星胜利，但实力仍是渺小得很。如果冷静地估计一下这些形势，那就很容易发觉，不仅李立三的狂妄想法甚为可笑，即共产国际所强调的巩固苏维埃根据地，又何尝不是中共一时无力实现的任务。

我很注意考察苏维埃和红军的实况，从不完全和不甚正确的材料中，也可以看出一些梗概。根据李立三所颁发过的红军番号，有江西东南部朱德毛泽东所统率的第一军，湘鄂西洪湖地区贺龙的第二军，赣西地区彭德怀的第三军，鄂豫皖边区邝继勋的第四军，赣西地区黄公略的第五军，湘鄂边萧克的第六军，广西西南部李明端的第七军，俞作柏的第八军，赣南罗炳辉的第九军，赣东北方志敏的第十

军……和湘鄂赣边孔荷宠的第十六军等等。此外，还有一些纵队司令等类的番号。在这些番号之中，只有三处值得一说，江西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部合计约有一万五千支枪，鄂豫皖边区红四军约有一万支枪，以及湘鄂西贺龙部约七千支枪。

也只有在上述三个有军事实力的地区，形成了一些县级的和乡镇级的苏维埃政权，在其上也相应形成了江西苏区，鄂豫皖边苏区，湘鄂西苏区。细考其内容，无论在那一方面说，它们都很难说是一个政权，如果名之为游击根据地，那要恰当得多。那些苏区确是由枪杆子打出来的，也靠枪杆子支持住，在困苦条件下，挣扎着力求与土匪有别，还说不上对全国或者对农村土地革命，有甚么号召作用。散布在湘鄂赣粤桂闽浙豫陕川等省边远地区的游击队和游击区域，都在为增加枪杆子而努力，东游西荡，等而下之，更说不上有甚么较稳定的游击根据地了。

从这些游击区来的文件，都是大声疾呼要求中共中央给予各种人力物力的支援。其中大多是要求医药器材，无线电等通信器材，兵工器材等，甚至要求望远镜、指南针、手表等类东西。所要求的人员也是以具有专门知识的为多。李立三似没有根据各地呼声要求过共产国际接济，反将各游击队秘密运送到上海的金银，留作中共中央之用，一时成为李立三的主要财源。米夫似也没有接济过游击队，老是强调应由游击队自身设法解决。

上面所述，仅为一些大概情形，已可从中知道巩固苏维埃根据地是何等的不易了。换一句话说，这要靠力量，

尤其是军事实力。如果中共有实力巩固一个苏维埃根据地，就不难获致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甚至在全中国范围内的胜利。中共四中全会决议建立和巩固苏维埃的根据地，并经过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强有力的苏维埃政权机关，这是中共的主要任务。但党内对这一决议的了解和解释，有程度上的差别，因此酿成后来许多纠纷。

米夫和他的门徒似乎相信他们手中的鞭子能产生中国苏维埃政权。他们一直在制订土地革命方针及分配土地的细则，以为这里面有不可思议的神秘力量。此外，还制订一些苏维埃政策，颁发下去。他们以为只要运用他们手中的鞭子，反右倾，反左倾，驱策着整个中共队伍往前直奔，中国苏维埃就成功了。这种狂妄想法确实与李立三的荒谬不相上下。

当时中共一般干部(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觉得应该有一个巩固苏维埃根据地的奋斗目标，但须长期努力才能实现。何况巩固苏维埃根据地的口号，比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那句口号也较切合实际，而事实上亦非如此做不可。首先中共的本钱只剩下这些苏区和红军，如果不为它们提出一个奋斗的目标，一致为此努力，那就会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但我认为一切决议不可视作死板教条，应根据实况，具有伸缩性来予以执行。

当年三月初，我看到一份赣西南少共区委控告毛泽东的文件，这个文件是指责毛泽东一贯违反中央指示，一意孤行，走到了反党反革命的境地。内容是陈述赣西南中共区委和少共区委以及不少的将领，大多拥护中央的领导

（即立三路线），而毛泽东却不敢和敌人战斗，不遵守中央进攻南昌的命令，带着部队逃跑，显然是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三〇年冬，毛泽东不仅不改正错误，反利用肃清ＡＢ团的名义，杀害了大批同志，因此，赣西南少共区委要求中共对毛严予处分。

少共中央书记秦邦宪被邀参加中央常会，报告这件事的经过。他说明：一、据赣南少共区委来人的口头报告，与文件内容是一致的，不过有些补充；二、这个来人系赣西南少共区委委员，曾来过上海数次，少共中央的同志们都认为这位同志可以信赖，这次他还带了几十两金子和其他文件来；三、据来人解释，中共赣西南区委对于控告毛泽东这个文件是同意的，至于没有共同具名，是惧怕毛泽东知道了，会将他们当作ＡＢ团清算掉。秦邦宪根据这些情况，认为这个文件和来人的口头叙述大体都是真实的。

秦邦宪接着陈述：赣西南中共和少共同志以及军队中一部份同志，早与毛泽东有许多意见上的分歧。在反毛斗争中，他们曾提出“拥护朱德，打倒毛泽东”的口号，但朱德在毛泽东挟持之下，表示支持毛；彭德怀则是不满毛的，在他的第三军内，不满毛的干部也占多数。赣西南少共区委认为，可能有少数ＡＢ团分子，混进了我们内部，这些人在反毛斗争中也可能兴风作浪。因为他们发现了ＡＢ团的破坏活动，毛泽东便不分青红皂白，将大批不满他的同志，也当作ＡＢ团逮捕起来，任意刑讯杀戮，在富田一个地方，便杀害了以百计的同志。参谋长陈毅在富田事件中，简直成了刽子手，这便形成了江西苏区最严重的危机。

秦邦宪认为毛泽东确实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他指出毛泽东反对李立三的指示，可能是对的，但他自己也不免右倾；他只知道保全实力，利用诱敌深入的游击战术来打击敌人，但他忽视了进攻敌人，巩固苏维埃根据地的重要性。再则毛泽东也不了解反右倾主要危险的重要，而且江西苏区在土地问题和富农问题上，都发生过右倾的偏差；在富田事件中，毛泽东可能有意无意的将反对他的同志清算掉，这更是不可宽恕的。

中常会听取了秦邦宪的报告之后，觉得事态严重，不能立即作出决定，乃要求秦邦宪先行通知赣西南少共区委来人，暂时严守秘密，听候中常会处理。我忙着搜集有关这件事的材料，认为秦邦宪指斥毛泽东为右派一点，并无充分证据。我觉得以前何孟雄等曾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受到严重的打击；他们并不是失去斗志的人，只是认为在反立三路线的紧急关头，不应该强调反右倾，因而被视为右派；现在决不应当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就将苏区的老干部毛泽东等当作右派来整肃掉，这样做会使苏维埃和红军受严重的损失。

在中常会再度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曾指出：江西红军一月间消灭张辉瓒师这件事，就证明那里并没有甚么严重的危机。毛泽东以前不遵照李立三的指示行事，大体都是对的，他根据实况来指导军事行动，注重游击战术和政治纪律，这也都是切要之图。注重扩充军事实力，不勉强去巩固一个根据地，也是势所必然。毛泽东和江西苏区的同志们，都是艰苦奋斗的，不能视之为右倾，即使有些

右倾的见解，也不过是观念上的错误而已。在肃反问题上，毛泽东似犯了严重的错误，他没有去区分反革命的首要分子和胁从者来办理，甚至将不是反革命的人，也当作反革命清算掉了，这是要予以纠正的。

中常会讨论的结果，决定：一、赣西南少共区委的报告表现了一些青年急躁的情绪，不能完全信赖，因而也不能判定毛泽东是右倾。二、将中央关于肃反的决定，附加说明，迅即送往江西苏区，作为纠正毛泽东等在肃反中所犯错误的根据，并催促毛泽东报告富田事件的真相。三、中央鉴于江西苏区已发生严重情况，应从速采取具体步骤，加强苏区和红军的领导。

如何加强苏区和红军的领导，乃成了迫切的问题。我在回国以前，中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曾派了一些重要干部到各苏区去，如项英刘伯承等之派往江西苏区，任弼时夏曦等被派往湘鄂西和湘赣边境等苏区。现在如果要进一步加强领导，就应将早已拟议的中央迁往苏区的案子付之实施。这件事共产国际旋即同意。

周恩来为此提出了一个具体计划，经议决通过，其要点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迁往江西苏区，由向忠发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等领导前往。在鄂豫皖和湘鄂西两区分别设立中央分局，前者由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前往主持，后者则由已在那里的夏曦关向应等主持。中央迁往江西苏区后，在上海另设中央分局，指导白区工作，预定由赵云李竹声等主持。

这个决议是中共将工作重心转到苏区去的一个重要关

键，对于此后中共的发展有极大关系。我们当时的理想，是希望在江西能有一个巩固的根据地，在那里竖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旗帜，联络长江以南各苏区的红军游击队，共同奋斗，以期握有一省或数省的地盘。鄂豫皖苏区则为长江以北的主要核心，我们希望以那里为起点，向北发展，以期在大江以北掌握更广泛的地区。至于湘鄂西苏区则似是一个主要的卫星，对江西鄂豫皖两区，可以发挥掩护的作用，并且可以向西南发展。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具有雄图的尝试，虽然实现的条件尚属缺乏，但事势发展又非这样不行，因此，我们只有竭力以赴了。不过在另一方面，我们实力既大部移往苏区，对广大白区的工作，自然更为削弱。当时中共的党员人数，是没有精确统计的，估计约在十万左右，百分之九十七以上，系在各个苏区和红军中，大多为农民出身者。这个事实也使我们对苏区工作寄予莫大的期望。周恩来是极端主张将力量集中到苏区去的，他经历这么多变故，深知中共在白区很难立足，势将继续被国民党破获摧毁。他决意将中共大部份干部调往苏区，他估计从白区可以调到苏区的干部，约有四百人。他准备将其中百分之四十调往江西苏区，其余两个百分之三十分别调往鄂豫皖和其他各个苏区。

我是自愿去鄂豫皖的。当时鄂豫皖区还保有较多的立三路线的残余，负那个区域领导责任的曾钟圣就是著名的立三路线的拥护者，我的同志们觉得我去那里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是游刃有余的。我自己也觉得我对那一带的情况较为熟悉，而且大好中原，正是便于驰骋的所在，我为之

向往。

我摒当一切，准备起程，担负我的新任务。当时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远东局（即共产国际派驻上海人员所组成的机构）对这件事很注意。那个我所讨厌的波兰人，为此曾要求和我面谈，但我托词拒绝了。另外一位德国籍军事代表，我倒极愿和他谈谈，请教一些有关军事方面的问题。

那位德国军人虽只和我见过一面，但给我的印象很深。他在第一次大战中，任过中级军官，手上带有伤痕，是他的光荣纪录。他年逾五十，具有冷静的头脑和丰富的知识。他奉命到江西苏区去，后来几次改装牧师前往，均为国民党军队所阻，未能到达目的地。共产国际乃不得不改派一位较年轻的德国军人李特去江西苏区，任军事顾问。那位李特似远不如他老练，与毛泽东等发生过不少磨擦。我想如果是那位较老的德国人去了，也许会有不同的结果。

他那次和我会面，表现很诚挚谦和，他要求我不要信赖翻成中文的军事书籍，一切要凭自己的判断去处理。他特别指出一个独当一面的指挥者，要预先想到如果打败了应该如何。在这游击战争中，是会经常遇到的，我觉得我的同志多富有勇往直前的精神，往往易于忽略可能受到的挫折。他的这种议论，实在切中时弊。我也觉得他不是一个巩固苏区根据地的教条主义者，而是根据实际情况行事的人，即此一端，也远较米夫之类的人大为高明。

我们的计划在执行中遇着接二连三的困难。我自己是四月间到达鄂豫皖区的，但中共中央其他的人则因敌人的阻挠，直到当年八月间，才完成了前往江西苏区的任务。

我总结我在上海这一段时期的努力，虽相对的抑制了王明路线的发展，但他们究竟还是日甚一日的抓住了中央机构。那些教条主义的盲动主义者，遇着机会是会把事弄糟的，而且在共产国际的掩护之下，为害将是更大。他们不顾实情，死板板的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如在巩固苏维埃根据地这个问题上，他们往往不计敌我力量的对比和自己军事实力的可能损失，硬要死守这个地区或那个城市，如果任何人不这样照做，便被视为右倾的逃跑主义者。共产国际的其他决定，也一律被视为是御定的，不能改变的。这就是有名的王明路线的特色，其结果是使苏维埃运动硬化，招致了极严重的损失。如果不是日本的侵略，使中共回到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上来，也许整个中共会在苏维埃运动中完全葬送掉。